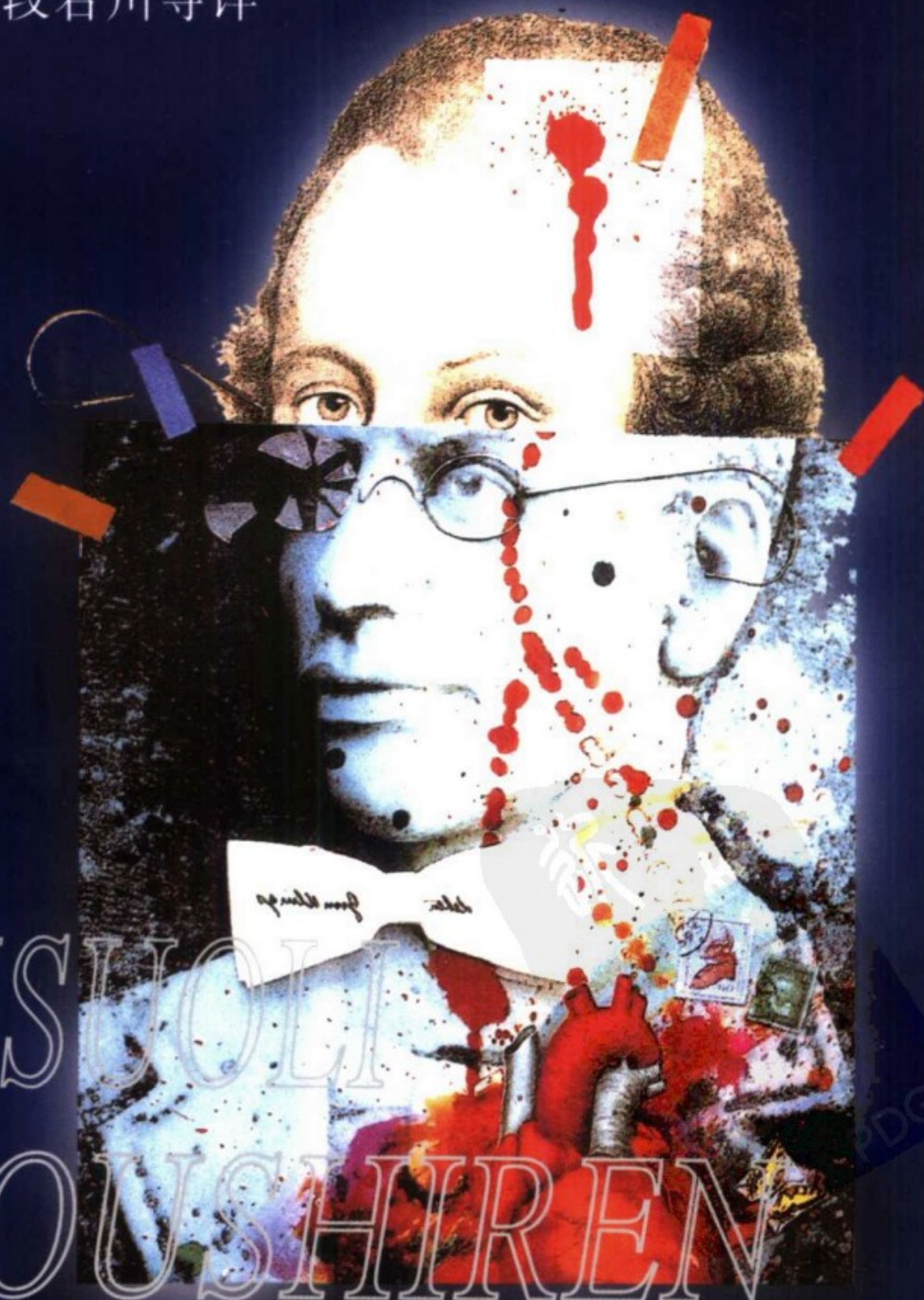


# 交易所里 没有诗人

〔阿根廷〕雷蒂霞·比希尔著  
段若川等译



JIAOYISUOLI  
MEIYOU SHIREN



上海文艺出版社



# JIAOYISUOLI MEIYOUUSHIREN

〔阿根廷〕雷蒂霞·比希尔著  
段若川等译

## 交易所里 没有诗人



上海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交易所里没有诗人/(阿根廷)雷蒂霞·比希尔著;段若川等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6

ISBN 7-5321-2222-0

I.交… II.①雷…②段…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阿根廷-现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阿根廷-现代 IV.I78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150 号

责任编辑:曹元勇

封面设计:王志伟

## 交易所里没有诗人

[阿根廷]雷蒂霞·比希尔 著

段若川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06,000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100 册

ISBN 7-5321-2222-0/I·1787 定价: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512-6063782

## 作者授权书

此信授权段若川教授和她的儿子翻译我即将出版和销售的文学著作《为了养活他的那个她》、《红色庭院里的白玉兰》和《交易所里没有诗人》。

同时放弃本人原应享受的为期十年的版权。

蕾蒂霞·比希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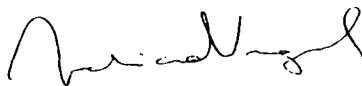
布宜诺斯艾利斯, 2000 年 8 月 30 日

## 授权书原文

POR LA PRESENTE AUTORIZO A LA SEÑORA PROFESORA  
DUAN RUO CHUAN Y A SUS HIJOS PARA LA TRADUCCION Y  
POSTERIOR PUBLICACION Y COMERCIALIZACION DE MI O-  
BRA LITERARIA. PARA MANTENER A SU FULANA, MAGNO-  
LIAS BIANCAS EN PATIO COLORADO Y NO HAY POETAS EN  
LA BOLSA DE VALORPS.

RENUNCIO ASIMISMO A LOS DERECHOS DE AUTOR QUE ME  
PODRIAN CORRESPONDER POR EL TERMINO DE DIEZ AÑOS.

LETICIA VIGIL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Leticia Vigil', with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BUENOS AIRES, AGOSTO 30 DE 2000.

## 作者序

从少女时代起，我就开始写作。我出生于一个写作世家。我的祖父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康斯坦西欧·比希尔。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甚至包括中文，那是三四十年代的事。我的父亲也是作家，我是他的独生女，我觉得我生来就是要继承这一传统的。原来我觉得写作将成为我的生命。但是命运总是给我们带来意外，等到该我拿主意的时候，我选学法，成了律师。我结婚了，有了八个孩子……我的真正愿望被推迟实现。

于是，我就这样开始悄悄地写了一些短篇小说……但是直到 1985 年我的第一本书才得以结集发表，也就是我 45 岁那年。与此同时，我参加了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文学车间的活动，他是我伟大的导师。

从那时候起，我不断地写作，我改变了自己的兴趣和职业。文学囊括了我的头脑热点中最主要的部分，甚至还远不

止这些。因为写作是一种既强烈又深刻的事情，不能把它仅仅说成是在从事一项脑力劳动。

现在我非常高兴，是因为我的三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并由这家出版社介绍给你们。它们是《为了养活他的那个她》，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主要说的是 1976 到 1982 年我国军事独裁期间的一些故事，是关于那些失踪者和被追踪者的悲剧。《红色庭院里的白玉兰》写的是十九世纪末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出名的独裁者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将军和 1985 年正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执政的一位著名将军的一些事情，后者与罗萨斯有很多相似之处，作品中试图玩弄时间游戏。

这本书中还包括《交易所里没有诗人》。这是一部典型的描写九十年代布宜诺斯艾利斯风情的小说。在这个世界上，在我的国家里曾发生过多少事情！生活使年轻人失去了他们的理想主义，生活的核心就是不惜任何代价、不顾何种方式去挣钱。

我的这些书讲的是一些故事，是我对阿根廷和拉丁美洲的想象的产物，并非真实事件。不能要求它们具有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我只想以我的故事中的那些广泛意义上的恩恩怨怨使你们开心。

我非常感谢我的老朋友段若川，她是我的正式译者，她以极大的专注与爱心翻译了我的作品。我也感谢我所有的中国朋友，他们信任我的文学工作，使我的这些书，能像中国的伟大作家们的作品一样，呈现在这个国家的人民面前，供他们阅读。在北京生活过的三年中，我已经从中国人民的伟大以及

他们经受的痛苦中，学会了热爱他们。

蕾蒂霞·比希尔

1997 年 12 月，北京



## 译者前言

本书作者蕾蒂霞·比希尔在她的简短前言里提到我是她的老朋友，确实如此。我和蕾蒂霞相识已经有六个年头了，而且，我们相识在一个很不寻常的时间和很特别的地点，是共同的对拉丁美洲文学的执着把我们联在一起，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

那是 1994 年。正当北京暮春时节，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却恰逢深秋，我在著名的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的家里见到了阿根廷驻智利的公使劳尔·埃斯特拉达和他的夫人蕾蒂霞·比希尔。他们之所以要见我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劳尔在智利当外交官已满六年，即将离任，并且马上要到中国北京去当大使，他们知道我来自北京，当然很愿意先认识我。另一方面因为蕾蒂霞在圣地亚哥六年期间，一直在何塞·多诺索主办的文学车间里从事文学活动，听大师讲课、讨论问题、创作小说、切磋技艺。当她知道我是专门研究何塞·多诺索的并且翻译过

他的六本书，这次专程来到圣地亚哥，她当然很有兴趣和我认识。

约好的那一天，我比他们到得早，因为我住的地方离大师家很近，我就在客厅等他们，一边和大师闲聊。那是一个阴雨天，街上的悬铃木树叶被秋风扫落，枯黄的叶子铺满了一地，在那上面走起来只听得一片沙沙声。他们就是踏着那枯叶，伴着那沙沙声，急匆匆地走来的。那一天我们只是认识了一下，在一起也就待了十来分钟，他们就告辞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只见他们离去，风衣在他们身后摆动。我不由得犯愁：连他们长什么样也没记住，到北京以后认不出来可怎么办？

我的担忧是多余的。回北京以后，阿根廷大使和夫人对我频频发出邀请，让我去参加他们的种种活动，而且大使夫妇设便宴单独请我和丈夫赵振江，想和我们好好聊聊。当他们得知赵振江是阿根廷的民族史诗《马丁·菲耶罗》的译者时，更是高兴。大使说 如果你们到阿根廷，人们一定会把他抬到肩膀上，欢呼、鼓掌的。赵送大使一本《马丁·菲耶罗》，大使回赠他一把高乔牧人用的短刀“法贡”，两个奖汉拥抱在一起，十分开心。

此后，我们常常到阿根廷使馆去，不仅仅出于大使夫妇对我们俩人的关爱，还因为他们对促进中阿两国以及中国和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很感兴趣，并且身体力行。自从他们到北京以来，阿根廷使馆便成了这种活动的中心。1995年4月21日在阿根廷大使馆举行了文学研讨会，会上蕾蒂霞做了题为《阿根廷当代文学》的长篇报告，受到中国西班牙语工作者

的热烈欢迎，以后又举行过科塔萨尔的《跳房子》中文版首发式等活动。

1995 年在北京举行了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蕾蒂霞把整个阿根廷妇女代表团领到北大来参观，尔后，举行了报告会，没过两天，又组织了一个摄影组，到北大来采访，在未名湖畔拍了一天关于“北大学子”的记录片。她还组织过拉丁美洲各国大使夫人到北大和我系师生座谈，并赠送给我们一批珍贵图书。此外她经常请我到她家，去和她谈文学、谈北京、谈中国妇女。

1996 年 12 月 7 日，我们共同的导师和朋友何塞·多诺索病逝，两个月以后，他的夫人马丽亚·碧拉尔也因伤心过度，随他而去，我们共同分担那份哀伤，就一道策划如何在北京纪念他们。1997 年 4 月份，我们俩和智利驻华大使在智利大使馆举办的纪念会上都做了发言，向中外人士介绍这位伟大的作家，以此来表达我们的哀思。

我们相知，还因为我们有许多共识和共同的感情。记得，在 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她兴奋地告诉我说，劳尔和她将应邀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回归仪式。他们那种由衷的高兴令我难忘。当然这和阿根廷曾与英国打过马岛战争有关，我们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都有被人侵略和欺负的惨痛经历。

劳尔是个职业外交家，他不但曾在多国任外交官，还曾多次代表阿根廷出席联合国的重要会议。他曾主持过 1997 年在东京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当然他还做过许多重要的工作。可是蕾蒂霞很少和我提到这些，从不以此向别人炫

耀,她身上没有一点大使夫人的架子。但是她是‘ 格丽拉 ’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 格丽拉 ”是一个业余活动组织,由在京的西班牙、拉丁美洲以及会讲西班牙语的其他外交官夫人自愿参加其活动。她们组织起来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或举办过各种讲座,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那都是一些高雅的活动。

蕾蒂霞从不热衷于在社交场合出风头,也不倾心于在北京逛商场、购古玩。据她身边的服务人员说,她就是喜欢看书、写字。再有就是把她的八个儿女一个一个地召唤到北京来,让他们感受中国。她曾和我说过。八个孩子都是她亲手抚养长大的。当给他们洗澡的时候,她和劳尔不得不采取‘ 流水作业法 ’:一个人管洗澡,另一个人管擦干、穿衣服。啊,她这位辛劳的妈妈 所以,正如她在前言中所说,她只有等孩子们长大以后,才得以拿起笔来开始写作。然而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写作才能是否能靠家传 我不知道,可是我认为,虽然蕾蒂霞的祖父与父亲都是作家,她依靠的绝对是后天的努力。我们这一本集子中那篇《那一切称为感情的事物》写的就是她在圣地亚哥参加何塞·多诺索的文学车间的第一天的真切感受。看,她是多么诚惶诚恐地走入那文学殿堂的!在圣地亚哥的六年里,她一直坚持在大师的指点下进行文学活动。正是由于她的勤奋好学,何塞·多诺索才特别敬重她,才把她收为入室弟子,1994年,当她的《交易所里没有诗人》问世时,曾得到这位大师的好评。

在北京的三年里,她又创作了一部小说《四合院》。本来



我们也将这部作品收入本书,但是她在反复推敲,她认为还不是将它在中国发表的时候。

这部作品集中收进了她的三本书:《交易所里没有诗人》、《红色庭院里的白玉兰》和《为了养活他的那个她》。

《交易所里没有诗人》是蕾蒂霞 1994 年写成的一部小说,反映的是阿根廷首都当今的现实,非常贴近生活。创作手法以现实主义为主。有时运用人物独白,有时用对话,有时用传统的叙事方法,多种写法穿插交错地运用。行文中没有明显的说明和过度,这就要求读者用心阅读,仔细揣摩,才能跟得上情节的发展,掌握人物的心理和性格。但是与六七十年代的实验小说相比,这本书读起来通顺畅达得多。全书分十六段,分别写六位主人公及相关人物的事情,最后汇拢为一个总的故事。

小说讲的是六个好朋友,少年时代他们是同学,曾是学校里“六个疯子”小合唱队的成员,当年就结下了牢固的友谊。他们个个风流倜傥,愤世嫉俗,指点江山,自以为今天他们是领导新潮流的先锋,明天将是世界的主人。二十年过去了,他们年近不惑,各人的经历与现状有很大差异,当他们重逢时,回首往事,感慨万千,友谊如旧,互道珍重。他们是:

胡安·曼努埃尔·胡斯托·芒西利亚(简称胡安曼)。目前他在商界春风得意,从事国际贸易。他生活富裕,爱情如意,家庭和美,有娇妻、长女和两个幼子,有豪华的住宅和最时髦的汽车。他的工作繁忙,但生活丰富而有节奏,还能腾出时间与情人芭芭拉调情,他们相约不久以后到纽约去幽会。

特里斯当目前正飞黄腾达,是经济部长的助理,总统须臾不能离开的重要人。他的父亲曾因反对庇隆而惹过麻烦。他年轻的时候也曾有过有理想和抱负,曾信仰过格瓦拉主义。但是在这弱肉强食的社会,他的理想难以实现。当年他在大学任教,没有能力支付患重病的儿子的医疗费,爱子的夭折给他的婚姻带来危机。妻子是现任总统宠爱的侄女,他便走上了一条从政的道路。一开头,他对现行政策很不习惯,但年深日久,他就习以为常了。

塔尔西修是一个颇有威望的神甫,由于他的贫穷、虔诚和独身主义,人们说他像保罗四世。现在有人传说他是个落魄的共产党人。其实不是,只不过他为人太正直单纯。他隐居在一个小镇,清心寡欲,安贫乐道。他不盲从教会的思想控制,他善于动脑筋,苦心钻研教义,要发掘其中人道主义的核心。他全心全意地希望自己能普济众生。

弗拉基米尔是小合唱队里的主角,以后他顺势走上了艺术之路,七十年代他演唱风靡拉丁美洲的“抗议歌曲”,为此他曾被流亡国外。现在他成了最走红的摇滚歌手。名声给他带来富足,却剥夺了他的隐私权。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他认识了胡安娜的女儿、音乐学院的学生、20岁的胡安娜。他俩相爱。刻骨铭心,他们超越了年龄的差异,决心结为夫妻。

胡利安成了一位名医,他过的是中产阶级小康生活,思想上左倾。这类人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中占有很大比例。他们对贫苦的劳动人民有同情心,而对上层统治者不满,他们自己则只能处在一种不上不下的尴尬地位。

六人名单上的最后一位成员是马里亚诺·法尔孔内。在

几个人中间他的形象最不鲜明。不过他的家是那次多年不见的朋友聚会的地点。他和妻子盛情款待朋友们。大家一起回首往事,针砭时弊,虽然各自的地位名望、贫富程度、权利大小有着明显差别。因此,他们的这次聚会“就像超现实主义画图”,显得怪诞,看着新鲜。

那次聚会以后,我们的六位主人公仍然过着自己的生活。胡安曼来到纽约,忙于他的国际贸易,百忙中拨冗与芭芭拉幽会。他不知道有人已经在暗中给他设下了圈套,危险就在眼前。不久,胡安曼就被卷入一件复杂的、牵涉到国际毒品走私、洗钱等罪行的案件之中。负责审理此案的法官是罗伦索,他大吃一惊。他知道,在这个社会里,这类事件屡见不鲜,确实应当严肃处理。但是作为老同学,他了解胡安曼,他认为无论如何也轮不到胡安曼来受到严惩,而让更大的罪犯逍遥法外。与此同时,特里斯当和弗拉基米尔也在利用自己的声望在报界活动,以挽救胡安曼的形象。

在人们的眼中,罗伦索是个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法官,但是他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他是一名同性恋者,现在的伴侣是个 20 多岁的小伙子。当后者发现自己与众不同时,就想自杀。罗伦索认为自己一定要保护他。这个小伙子不是别人,正是神甫塔尔西修的侄子。神甫了解到侄子的真实情况以后,对他抱有深切同情,就百般劝解他,让他放弃轻生的念头。他认为天主教的教义本应以慈悲为怀,耶稣教人们要有仁爱之心,为什么当一个人与众不同时就只有死路一条呢?在他的劝解之下,他的侄子得救了,他决心将这份爱心推广开来,去对待因为有同样问题而前来忏悔的信徒。他的行为与

言论确实与一般神甫不同。

为躲开无孔不入的新闻界，胡安曼躲进塔尔西修隐居的小镇。神甫给他极大宽慰和最实际的帮助。胡安曼对自己近年来的所作所为深感后悔，现在他要努力摆脱困境，因为一位女法官非置他于死地不可。

特里斯当与弗拉基米尔在一家酒吧约会，商量营救胡安曼的办法。但是有电话打来，告知胡安曼出事了，正在医院抢救，在他的最后时刻守候在他身边的是芭芭拉。

所有的人都赶到医院去看望垂危的人。他留下遗言，说自己经不住金钱的诱惑，落入了别人的圈套。他不愿以坐牢来了此生，也无法面对尚少不更事的幼子，于是决心自杀，临终前他托付弗拉基米尔照顾女儿胡安娜和他的全家人。

在墓地，人们与胡安曼告别，昔日的朋友悲痛万分，他们感慨人生之苦短，生命之脆弱。葬礼的肃穆气氛震慑了那群如蝇逐臭的记者，使他们不敢前来提出那些哗众取宠的愚蠢问题。

到墓地的人们中还有曾为死者设下圈套的盖布罗瓦。他是近十年来涌入阿根廷的外国人，他们未曾与国人分担过任何苦难和担心，只是前来分享财富。这些人被新闻媒介宣传成文质彬彬、健康富裕的新贵，而从来没有人揭露他们生活中的阴暗面。

昔日的小合唱队的成员现在只剩下五个了。他们举手，向胡安曼道一声永别。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故事，以其平凡，好像每天都会发生在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都市。然而，当你掩卷时，仍然会

受到深深的感动和震撼。你的头一个感觉是 真深刻,真贴近现实!作者写的故事就发生在 1994 年。呈现在主人公面前的是既现实又崭新的问题 柏林墙推倒了,东欧社会主义制度解体了,格瓦拉和他的理想主义过时了。与从前相比,阿根廷国内的经济有了较迅速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正如塔尔西修在布道辞中所说:“并非一切富人都坏,一切穷人都好,资本主义并非绝妙,社会主义的一些想法是好的。”作家对现实的批判态度是显而易见的。“现行的经济制度只能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我们的国家把贫困现象掩饰起来。人们一提起贫困,政府就恼火。可是,我们骗谁呢 是骗我们自己,还是骗外国人?”

作家对胡安曼所持的态度是既批判又同情。他是膨胀起来的经济怪物的牺牲品。当他飞黄腾达时,踌躇满志,得意忘形 当他被卷入丑闻时,又不知所措,只能以自杀来求得解脱。在遗书中他说,自己他被盖布洛瓦的甜言蜜语欺骗。他是为了钱!他觉得自己有如急流中的一片枯叶。朋友们分析:是他的妻子害了他,因为这个女人的野心太大。这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她早先“穷怕了”。

引人注目的是作家对一些事物的观点非常开朗:比如摇滚歌手弗拉基米尔与他的老友的女儿相爱,虽然两人的年龄差距很大,但是爱情可以不受年龄的限制。因此,作家为这爱情唱颂歌,把它写得很美好、很真诚、充满浪漫情调。相反,胡安曼与芭芭拉一老一少这对情侣的幽会就显得畏畏蕙蕙,令人生厌。对于另一个敏感的问题——同性恋,作家持一种非常坦诚而豁达的态度。在她看来,他们的行为虽然好像违反

自然,但是,在人群中他们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况且,说到底,这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属于私生活范围,别人无权指手画脚、粗暴干涉、甚至置他们于死地。相反,人们应当以仁爱之心来对待他们这些被歧视、脆弱无助的人。

最令人感动的是贯穿全书的那种少年时代结下的深情厚谊。岁月如梭,风雨无情。他们每一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有了很大差异。他们都执着地各司其职,我行我素,但他们互相尊重,互相记挂。当谁有难时,都认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和责任,都会挺身而出,鼎力相助。人间少年时代结下的友谊最为真诚、纯洁、永恒!

读蕾蒂霞的这一部小说,犹如品一杯浓浓的马黛茶,苦涩而芬芳。

《红色庭院里的白玉兰》(1989年),这个题目就叫人感到亲切。我们知道,玉兰的原产地是在中国,但是,以它的色泽的洁白、花姿的优雅,早已被世界各国引种,甚至在远至美洲南半球的智利和阿根廷也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当我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时,一天去交电话费,出门低头看那票据,猛然看到院子的地面铺满一层玉兰花瓣,抬头一看,哟,好大的一棵玉兰再留神看看,在圣地亚哥临街的一些院子里,玉兰花开得正茂,心中的那份欣喜真是难以形容,因为它们也和我一样,来自那古老的东方之国。而在蕾蒂霞的这部小说中,白玉兰是对故乡小镇恬静生活的怀念,也是纯洁爱情的象征。

《红色庭院里的白玉兰》虽然讲的是一些平平常常的爱情故事,但是由于作者运用了一些特殊的写法,使得这部小说显



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作品中同时有两条线索，平行发展，有时又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有时有明显的标记，有时又不做任何交代，使作品变化无穷，扑朔迷离，耐人寻味。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女记者，名叫阿古斯蒂娜，她从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十几年前，在她的祖国阿根廷时，家庭受到政治迫害，她的弟弟被杀死，她只好仓皇出逃，来到欧洲，在那里读完大学，然后，和一个法国建筑师结婚，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女。现在她以《巴黎时报》记者的身份，被派往一个南美洲国家。全篇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个国家的名字，但是我们从各个角度和各种暗示中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这个国家就是智利，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个国家当时正由一个军事独裁者把持政权，这使得我们的女记者不由得回忆起曾在她的祖国发生的种种惨剧：追踪、搜捕、秘密监禁、不经审判就枪杀……这一切使她一开始就把同情心放在了进步人士、革命者、游击队、共产党人一边。她接触到一群热心的医务工作者，他们在简陋的条件下，为贫苦人和被军政府迫害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和各种帮助。他们的首领是巴斯多尔，他喜欢阿古斯蒂娜的聪明、美丽，而她则被他的非凡气质所吸引，他们双双堕入情网。当然，这最终不过是一场没有结果的婚外恋。然而女记者在她的三年任期间，通过和这群人的交往，比较深入地了解这个国家的现实。作为《巴黎时报》的记者，她有机会访问了军事独裁的国家元首。独裁者总是要把自己描写成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为民造福的仁人君子，而女记者则亲身体会到了独裁者统治下的国家一片恐怖，她亲眼看到警察拷打公民、随意逮捕百姓。尤其是看到自己熟

悉的朋友被追捕、他们的家属被关押,这使她更清楚地认识了这位独裁者的反动实质。这使她不由自主地拿他与阿根廷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独裁者罗萨斯类比。最后,她离开了这个充满恐怖的国家,去与亲人团聚,又回到她早已习惯了的舒适生活。

我们的女主人公除了她的记者工作,还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她正在写一部小说,是上世纪中叶发生在阿根廷的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那正是罗萨斯当政期间。小说的情节如下:

18岁的智利姑娘菲利西达斯出嫁到一个阿根廷小镇圣路易斯,新郎比她大20岁,叫文塞斯劳,是罗萨斯的忠实信徒,也是她的得力干将。年轻的新娘在与他的结合中,没有体验到一点爱情的激动和感人的柔情,虽然文塞斯劳可以提供给她舒适的生活,华美的衣饰,她还是感到婚后的生活单调而空虚。此时,文塞斯劳一个最小的弟弟阿莱霍从巴黎回国,菲利西达斯和丈夫一同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港码头去接他。这样她便有机会离开那个沉闷的小镇,来到南美洲的最大都会,去感受一下城市的生活。在等候弟弟的几天,文塞斯劳不但给她买漂亮的衣物,还把她引见给大独裁者罗萨斯。菲利西达斯见到了罗萨斯,她觉得他并不像人们传说中的漫画化了的那副丑陋模样,他是个金发美貌的男子汉。接到弟弟阿莱霍以后,他们回到小镇圣路易斯。文塞斯劳把弟弟接回来带到身边,是怕他在巴黎接受欧洲的革命思想,在那边闹出乱子。在他的眼里,弟弟一事无成,简直就是他们家族的败类。然而,对菲利西达斯来说,有一个年龄相仿、眼界开阔、趣味相

投的青年陪伴在身边，她感到开心多了。阿莱霍把他从欧洲带来的新思想传播给她，又给她看一些反对罗萨斯独裁的报纸、杂志和书刊，她渐渐地理解了自己的这一位小叔子，他们的情谊一天一天地加深了。其实，阿莱霍是一位回国干革命的集权派骨干，他潜入阿根廷内地是为了做联络工作。当革命需要他上战场时，他毫不犹豫地去了，不吝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抛舍下最珍贵的爱情。上战场的前夕，他给菲利西达斯写了感人至深的几封爱情书简。

表面上看来，不论是阿古斯蒂娜的故事，还是菲利西达斯的故事，都无甚独特与新奇之处，这类故事无论在当时的阿根廷还是在今日的某一个南美洲国家，都可能发生。但这部作品却写出了新意。蕾蒂霞是把这两个故事交叉在一起写的。一边写女记者阿古斯蒂娜在一个新的国度的见闻和感受，一边写新娘子菲利西达斯来到阿根廷一个小镇的初步印象。当女记者见到该国的军事独裁者时，她的小说的女主人公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到了血腥的刽子手罗萨斯。两个独裁者都在为自己辩护，他们坏事做尽，却很注重自己的名声；当女记者和巴斯多尔的恋情大大发展时，她的小说中的菲利西达斯与阿莱霍也越来越投缘。

蕾蒂霞在发展他的小说的两条线索时，采取了一定的办法来区分两个不同的故事：她把她的女记者写的小说用斜体字印刷。如果读者把这些斜体字印刷的章节挑出来，就可以读到一个完整的、充满十八世纪浪漫情调的小说，与上个世纪的那些作品非常相似，比如，阿根廷著名作家何塞·马尔莫尔的《阿玛莉娅》以及智利的布莱斯特·加纳的《马丁·里瓦斯》。

其中有那时的风土人情，社会氛围，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有革命的理想，当然也有永恒的爱情。写作方法也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按时序的发展来一步一步地展开故事情节。从这一点来看，蕾蒂霞在这方面很有功力，写革命加爱情的浪漫故事游刃有余。而女记者的故事则不同，这是一个具有不少当代新小说特色的故事。虽然基本上仍然是按时序写的，但是其中穿插了很多时空颠倒、内心独白，回忆和对话等等。有时把女记者正在构思的小说情节和她的内心独白搀和在一起，使人要费点思量才明白，原来是女记者在想她的那部小说呢。蕾蒂霞惜墨如金，有许多重要情节就是在几句话，几行字中交代了。所以她用一部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给我们讲了两个时空不同，风格各异的故事。这个关于女记者的故事可不像另一个故事读起来那么方便。因为蕾蒂霞在其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识流，同时作者把很多人和事掺杂在一起写，如果读者不用心仔细地阅读，就常常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甚至连讲的是上个世纪的菲利西达斯的故事还是女记者阿古斯蒂娜的故事都搞不清。然而当我们经过仔细推敲，把蕾蒂霞的两个故事都看懂时，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会觉得犹如嚼橄榄，回味无穷。

但是，《红色庭院里的白玉兰》是一部带有很大现实意义的小说。这是当作者在智利时写作、并且在圣地亚哥的一家出版社发表的，实际上描写的正是那里的现实，虽然作者从来没有提到智利二字，也没有提到那靠军事政变上台的皮诺切特的名字。1973年9月11日在圣地亚哥发生了军事政变，这场悲剧使所有的拉丁美洲进步人士永远难忘的。他们把它看

成是整个拉丁美洲的耻辱，是民主、发展与进步的一次大倒退。智利的军政府，由于它的大屠杀、大迫害和大追捕，连续17年在联合国人权大会上受到谴责。而蕾蒂霞，作为一个具有‘拉丁美洲良心’的作家，就在这部作品中来表达她对独裁者的蔑视、愤怒和仇恨。她把这位暴君比做十九世纪阿根廷的独裁者罗萨斯，并且说，他连罗萨斯都不如，以他的平庸，可能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不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1994年的一天，我在圣地亚哥的中央公墓里看到的那座巨大的白色大理石纪念碑。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刻着的是1973年军事政变以来在智利被杀害的人和失踪者的名单，被杀害者是1395人，失踪者是1044人，总共2439人。这块纪念碑是‘纪念失踪者、被处决者基金会’树立的，日期为1994年2月。当时皮诺切特虽然已经从政坛的前台退到了幕后，但是，他的威风还在。当时我心想，这真是一些勇敢者，他们竟敢在‘老皮’的眼皮底下树起了偌大一座石碑。这就是一种无声的控诉，就是‘老皮’的耻辱柱。然而独裁者总是不自量力，这些年来他还胆敢大模大样地去各国游荡。可是，当他于1998年底到英国治病时，不承想被英国警方扣押，西班牙法庭要求将他引渡过去，以便审判他当年迫害在智利的西班牙籍公民的罪行。现在他狼狈不堪，朝不保夕。虽然现在他已经回国了，时过境迁，他的终身议员的资格将被取消他要面对智利公正的法庭的审判。

同样，以当时阿根廷独裁者罗萨斯的猖狂霸道来看，人们真是难以相信他终有一天会败在集权派的手中，最后他仓皇逃到英国南安浦顿，于1877年客死他乡。

蕾蒂霞在她的小说末尾记录了一条最新消息：经阿根廷总统梅内姆同意，罗萨斯的遗骸从英国南安浦顿运抵布宜诺斯艾利斯。表面上看来，她只是实录了一条新闻，但是，不用多说一句话，她的立场，她的爱和恨全都表现出来了。

《为了养活他的那个她》（1987年）是一个短篇小说集，其中包括十二个故事，反映的都是拉丁美洲国家各阶层人们的现实生活。与书名相同的第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穷苦的女仆，为了让远道而来的婆婆看到自己家里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偷窃了主人家的信用卡，到超级市场买来了大量物品。当她的被抓住时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处，因为她觉得富人家的东西太多，而自己却一无所有，她想起一家人在丰盛的餐桌前的开心笑容，她一点也不后悔。《两个半球上的三个人》写的是一位大使夫人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表兄，他们早年相恋，但是，现在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他还在为革命的理想而奋斗，她则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表兄的突然出现打破了女主人公的内心平静，表兄的惨死使她难以自持，然而，作为大使夫人，她还须在外交场合周旋。《何塞芬娜》讲的是一位画家，他创作了一幅女人肖像画，他是那么执着投入，以致于他的妻子心生嫉妒。《来访者和雨水》说的是一名被政府军追捕的革命者逃亡到一个偏僻乡村，受到一个女教师保护的故事。《地铁，巴勒莫——大教堂》说的是发生在军事独裁时期的事情，持不同政见者受到追捕和杀害，军官们收养他们的遗孤，一个小女孩就遭受到这样的命运，长大以后，面对自己的亲祖父也不能相认。《假如我打破常规》讲一个女科学家到非洲后的初步感

受，她把一切都理想化了，然而她的黑人司机让她打破幻想。

《玛利亚商店》讲的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常常光顾玛利亚商店，为他的妻子买最时髦的衣物，从他要的尺码来看，她应当是一个苗条的女人。当商店老板自作主张地送货上门时才发现，原来他的妻子是个大肥婆。《牧师的儿子》是描写一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小孩的心态。《散步》讲一个可怜的老妈妈，一心希望儿子陪她去散步，可是狠心的儿子却把她送进了养老院。《再见》写一个少年历尽艰辛、担惊受怕，去寻找在政变中失踪的母亲的过程。最后母亲没有找到，但是在故乡小镇广场上每个周末的抗议游行的人群中，多了这个少年的身影。

《玛丽亚妮达·罗丹的小小悲剧》讲的是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女人步入老年以后的惨境。《那一切称为感情的事物》写的是一位女作家初涉文坛的心态，如前所说，其中有蕾蒂霞·比希尔的影子，是她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参加何塞·多诺索的文学车间时的亲身感受。

这一个个的小故事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写作手法为我们呈现的是一幅幅风格不同的图画，使我们得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感受拉丁美洲那遥远的国度的现实。

在前言中，蕾蒂霞称我是她的正式译者，这是我的莫大荣幸。出于对她的为人的崇敬、对她文学才能的欣赏，出于对她的爱，我欣然接受了这项工作，同时邀请我的两个儿子一道参加这项译事。我们家的四个成员都是西班牙语工作者。这种情况在中国大概并不多见，由此可见我们夫妇对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文化的挚爱。大儿子赵小闯翻译了《交易所里没有诗

人》,小儿子赵晓鸣翻译了《红色庭院里的白玉兰》,我翻译了其余的短篇小说。我力促他们和我一道搞一点文学翻译,是因为我们终会成为‘过去时’;很有必要辅佐年轻人,让他们加入本来就不大的翻译队伍。因为,在当今商品社会中,热衷于文学的人已经不多了。但愿我们的读者能像接受我一样地接受他们俩人。

段若川

2000年7月12日



## 目 录

|                 |     |
|-----------------|-----|
| 作者序.....        | 1   |
| 译者前言.....       | 1   |
| 交易所里没有诗人.....   | 1   |
| 红色庭院里的白玉兰 ..... | 123 |
| 为了养活他的那个她 ..... | 237 |



# 交易所里没有诗人

赵小闯译



## 一 埃米丽亚

这一刻是那么的美妙。整幢房子都是那么安宁。萨蒂<sup>①</sup>的音乐陪伴着我。

我书中每个人物的故事都已经像拼七巧板似的一点点凸显出轮廓。有时候，写作进展得很不顺利。可有时又是那么轻松自如，就像细沙从指间滑过。

我似乎生来就该住在这样的地方：绿树掩映，青山环抱，远处还能眺望到永远也不会让我厌倦的大海。

我热爱大海，为它的力量，它的涛声，它变幻无穷的色彩和永不停息的动感所倾倒。

今天我起得很早。冒着八月的严寒和冷风<sup>②</sup>，在沙滩上赤脚漫步了近两个小时，然后坐回案边写作。

房子的一层有一间书房，里面摆着一张佩佩用来写作的别致的松木长桌，现在成了我的书案。在我自己的这个小天

① 萨蒂 (1866—1925),法国作曲家。

② 阿根廷居南半球，七八月份为隆冬。

地里,只有纸、笔、字典、一张勾起无限思恋的全家福照片和总是与我相伴的圣弗朗西斯科的小雕像,在我周围构成了一道独特风景。

燃着干柴的壁炉为我把寒冷挡在屋外,一扇大窗又帮我引来自然风光。

我和胡利安就是在一个与此相似的地方相识的。我们第一次接吻也是在海边。

我在编织弗拉迪米尔和胡安娜的爱情故事时,总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我们自己那段让人心驰神往、难以忘怀的经历。我们当时那样年轻,风华正茂,充满自信,自命为世界的主人,历史的创造者。

自从比拉尔把这座消夏别墅借给我,我就独自在这里待了三个月。其间偶尔收到胡利安、某个朋友或者正在上学的孩子们写来的信。有时我也给他们打几个电话,问问他们过得如何,以保持我与现实世界的联系,我已经决定不在这段时间里看报纸、听广播了。

然而,如果这也能称得上是牺牲的话,作出这种牺牲值了。我的小说已经完成,现在就可以在手稿上写下‘完’字。

这是我的第一本真实情节多于杜撰,而且以男性的角度写出来的小说。主要人物有‘俄国佬’<sup>①</sup>、法丘<sup>①</sup>,还有神父等等。女性和其他人物仅仅是背景和陪衬而已。

胡利安总想纠正某些情节并让另外一些情节更真实。他觉得我在处理某些人物时心太狠,对另一些人物又过于宽容,

<sup>①</sup>讲究穿着,含臭美的意思,系胡安·曼努埃尔的绰号。

要么就是没有完全理解那些人物的原型……

我一直向他分辩 尽管我想尽量忠实于原始素材,但我写的是自己的故事,一个我喜欢的精彩故事而已。我不可能,也不愿意原封不动地展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但愿有一天有人会把我的故事续写下去。

## 二 胡安·曼努埃尔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每一天,和着维瓦尔第《四季》中前几小节的音乐节拍,胡安·曼努埃尔·胡斯托·曼西亚都会在早晨八点整从他那张大得有些离谱的双人床上一跃而起,精神饱满地把他那件真丝睡衣套在自己那运动员般健美的裸体上。

然后他悄无声息地来到穿衣间精心挑选今天要穿的衣服。

接下来,就要精心沐浴半个小时。对他来说,这简直就是每天都不能丝毫怠慢的仪式。

他拧开镀金的水龙头,在大浴缸里放满热水,然后打开收音机,调到马塔雷纳清晨节目的频道……

这间宽敞的卫生间是用他太太亲选的最新科技产品和最讲究的材料装修的:加拉拉的大理石墙地砖、黑色的洁具,还挂了一幅他们夫妻共同挑选的克里姆特<sup>①</sup> 的绘画复制品。

<sup>①</sup>克里姆特是奥地利著名画家。

在这样的卫生间里沐浴真可谓一种享受。

洗浴完毕,他穿上一条颜色花哨的内裤开始剃须,再把头发梳理得又光又亮。身上、头上都洒上“高田贤三”牌香水。

楼下的饭厅里已经为他准备好早餐 麦片、什锦果汁和三片面包。

他一边吃着早餐,一边攥着一杆绿色的粗笔翻看着三种他经常阅读的报纸。首先是找找《民族报》上的讣告栏里有没有熟人的葬礼,他将它们划出来,然后酌情决定是亲自参加还是让恩丽姬塔应付。接着,读几篇《新闻报》上的经济内幕报导。最后,浏览一下《第十二页》<sup>①</sup>上的大标题和报尾的小幽默,再找出几篇有意思的文章,做上标记,准备拿到办公室去认真阅读。

九点整结束晨读。他上楼去穿戴齐整,重新修整发型,直到穿衣镜里出现了一个他觉得满意的胡安·曼努埃尔方才作罢。

吻别了仍在睡梦中的妻子,他离开家向他的汽车走去。

每天他都分毫不爽地重复这个程序,一丝不苟。

他新买的“美洲豹”跑车停在车库。他现在还为能买到这辆车自得。这辆车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偶像。说他崇拜这辆车一点儿也不夸张。自从他用头一笔薪水买下平生第一辆菲蒂托牌小型车的那天起,他与汽车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难以描述的特殊感情。

他像往常一样仔细地端详着他的“美洲豹”,欣赏着它不

<sup>①</sup> 阿根廷的一种日报。

同凡响的气度与威仪。在看清四周无人之后，他竟然走近车身，抚弄起它来。

为了这辆车他没少破费，车内的装潢、车身的漆色，还有车里最新型的音响设备都是他亲自挑选的，为了独享这辆车，他还专门为恩丽姬塔买了一辆“菲亚特 I”，又给胡安娜和曼努埃利托两人买了辆二手或三手的旧车。如此，这辆“美洲豹”就可以归他专用了。这是他自己的车，只归他个人用。

坐到驾驶座上之后，他几乎是在发动引擎的同时打开了录音机。

不要——把——我忘——记——，因为——  
我知道——是我把你的激情唤起……  
当你寂寞难耐，当你不想再哭泣，  
……让我安慰你……

还是那间酒吧，还是那条街巷，  
但你已经不在意……是否有人等待  
请你给我信赖，我的爱情并不让人感到悲哀……  
对周围的人要小心，因为你不懂他们的心怀……

这盘磁带是胡安·曼努埃尔自己录的，里面的歌词他熟得几乎都能背下来。他听音乐时有个怪癖，跳着听。一首还没听完，就跳到下一首。胡安·曼努埃尔是个典型的急脾气，贪多图快，虽然平时看不出，但他独自一人时的某些举动会表现



出来。

查里,菲托“瘦子”,塞拉特……这些人都不再像以前那样让我感动了,他们离我的生活都太遥远了。昨天我们一家去看了《狂野探戈》,我什么感受也没有。胡安娜都哭成了泪人,曼努埃利托也被打动了。似乎连恩丽姬塔都掉了几滴眼泪,尽管她后来还掩饰说那是药物作用。

而我什么感觉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我现在是怎么了?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对一首歌、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如此麻木不仁?三年前还是五年前?我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心如铁石。从前,我看上去心肠挺硬,但那是表面上的。那时我有个外号叫“法丘”,那时候我就像是被整个世界拖着。但我的内心世界并不是那样的。现在除了身上还有一些年轻时的影子之外,我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我心里总有一种恐惧感,害怕再过那种穷人的鬼日子,害怕疾病,害怕自己失去力量,更怕孩子们出什么事……

我现在还是年轻健壮,只有三十六岁,体魄强健。一口气跑上五公里也不累,还能打得动壁球。必要时,可以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也不疲倦。还有,我还能讨到不止一个姑娘的欢心。这对于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也不容易。

现在的问题是兴趣、品味改变了,当然,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二十岁的时候,我为了马岛战争<sup>①</sup>热血沸腾,恨不能报

<sup>①</sup> 指 1982 年阿根廷和英国为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而进行的战争。

名参军去打仗；为了失踪和被迫流亡的大学同学们<sup>①</sup>，冒着风险参加抗议斗争。甚至为一场博卡队与河床队之间的足球比赛都要兴奋一阵；对社会的不公正愤愤不平。现在我的脑子里想的已经不再是这类事情了。我成熟了，沉稳老练，讲求实惠。现在，谁也不能否认我已经实现了我早就为自己制定的目标，成为一个“精英人物<sup>②</sup>”。没错，教我英文和日文的那个日本小妞儿就是这么说的。那个姑娘真不错，她不光能正儿八经地聊曼哈顿、东京的证券交易所和市场走势之类的话题，还能和我在一块儿听音乐、看录像……每次和她在一起时我总忍不住要瞄几眼她的漂亮的大腿和胸脯……她对我好像也有点儿意思，说不定已经神魂颠倒了。那天她居然说我长得像罗曼诺，尽管那家伙总是一脸晦气的样子，不过，她这么夸我还是挺中听的……现在我得当心了，千万不能把工作和风流韵事掺和到一块儿，这是卡洛斯叔叔对我的忠告。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自认为是个天才。以前在“主教”和胡利安面前我总是自惭形秽，觉得没有他们聪明。现在，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我六个月就学会用英文和日文阅读报纸了，还能简单地说了几句……当然，以前上中学的时候跟布拉斯神父学过英文。可那会儿我们什么也没学到，光跟他捣蛋来着。

现在好了，萨尔瓦多学校的神父们，你们用不着再替那个不爱念书、专门捣乱、让你们头疼的坏学生操心了。再过一阵，你们还得为曾经教过这个学生而自豪呢。我在基多大街

①七八十年代军政府曾对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进行镇压。

②原文为英文。

和蒙得维的亚大街都置下了两百多平米的房产,装修豪华,家具高档。还有一套让人眼馋的艺术收藏品,有两张波莱赛洛的画,一张佩托蒂的,三张智利人的,另外,根据胡利安的特别推荐,最近还买了一幅年轻画家拉科斯忒拉达<sup>①</sup>的作品,记得是我请他举荐的。这位画家现在正走红。前几天诺亚对他的评价极高。好像这个年轻人是这个老头子的友人之子,尽管他的作品还不成熟,但是据说有很高的收藏价值,行情肯定会看涨。要想发财就得把宝押准,我越来越理解这句话的真谛了。

对家庭,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恩丽姬塔长得还算不错,上得厅堂,坐得花床,也许稍显冷漠、贪财、固执,总的说来,还算是个相夫理家的贤内助。对她不能太苛求。再说,要不是她一直督促着,我说不定现在还在法院当小书记员或某位不走运的律师的秘书呢。

五个孩子也都健康、漂亮,个个能上《面孔》杂志的封面。对了,我得想着给自己买个记事本。胡安娜有点儿问题,这丫头总想学嬉皮士那一套,动不动就要离家出走,以此要挟我们。她主要是跟她妈妈闹别扭,其实是个不错的孩子。曼努埃利托有点儿太不成熟,总那么腼腆。他是个本分孩子,从来不干出格儿的事,和毒品、同性恋沾不上边儿,更不会触犯法律。幸亏现在已经不会发生塞巴斯蒂安那样的乱子,法孔多事件也早就平息了,切·格瓦拉也过时了。那个年代真是太乱了,人们都像发疯一样,闹得到处都乱哄哄的,乌烟瘴气。回

<sup>①</sup> 以上三位是阿根廷的著名画家。

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现在一切都平静了,犯不着老用回忆折磨自己。其他三个小家伙个个都是金黄头发,活蹦乱跳的,他们还小,看不出有什么让人不放心的。

我跟嘉斯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个人真不错,交际广、门路多,正好可以弥补我在这方面的不足。我算是交上好运了,真有意思,对我来说,还真有点儿……

胡安·曼努埃尔的思绪漫无边际,像在梦中。车载音响已经开到最大音量,但他似乎什么也没听见。汽车飞快地行驶。

来到办公室的楼下,他像赛车手一样‘唰’地把车开进了车库的大门里,把一个正往外走的老人吓了一跳。

“嗨,博士,慢一点儿,会挨别人骂的!”看车人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哭腔直冲他嚷。

“没问题,伙计……拿着这几张小绿票子,约个小妞儿乐呵一下,跟那帮瞎嚷嚷的人好好说说,让他们消消气。今天我的兴致很好,别跟我找别扭。”

“可是,博士,您这是……”

看车人还在喋喋不休,胡安·曼努埃尔早已进了电梯,不听他废话了。他又转回刚才的思绪里了。

可怜的家伙,三十大几的人了,还靠看车、擦车过日子。这个国家这么大,谁要是混不好,也只能怪他自己。如果这小子有雄心大志,说不定早就成了什么大人物了。我不也是靠自己苦干才混出来的吗。当初我爹去世的时候,只给我妈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留下布尔内斯街上那三间老房子。小时候

我们连学费都交不上，一天三顿简单的饭菜，几乎从来不变样。再看看现在吧……老太太过得比谁都滋润。她当初还想跟马丽亚·欧亨妮一起住到巴勒莫区呢。现在她住的是豪华公寓，带大阳台的，就在我们以前住的那栋连电梯也没有的旧单元楼对面。那些老邻居们别提有多羡慕了。别看她老是埋怨我不去看她，我老婆又如何如何……其实……

电梯到了二十层，他的女秘书玛丽琳已经打开门，面带微笑地等候他。

这套办公室确实不小。除了四个写字间，还有一个大接待室。与胡安·曼努埃尔共用这套办公室的还有杜琼和阿里·穆罕默德这两位年轻的经纪人。阿里是两个月以前入伙的，据说他父亲是位有钱有势的阿拉伯人，在国内外都有不少门路。

正是靠阿里，更确切地说是靠他父亲帮忙，胡安·曼努埃尔才结交了金融头面人物嘉斯顿·盖布罗瓦。这位盖布罗瓦是个法国人，几年以前和他父亲来到阿根廷。一个偶然的会，他与胡安·曼努埃尔结识，两人成了生意伙伴。时至今日胡安·曼努埃尔还在为能有这样的机会而庆幸。

盖布罗瓦自己从来不设什么办事处。他总是开玩笑说他的办公室就是雷戈莱塔区的“拉比耶拉”<sup>①</sup>。然而，他和政府当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一点很重要，极为重要。

“早上好，玛丽琳，有什么新情况？今天我有不少安排。

<sup>①</sup>拉比耶拉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著名咖啡馆

你得给我打几个约见电话，先打给玫瑰宫<sup>①</sup>的特里斯坦先生，然后再和银行的哈维尔先生通话。其他的事稍后再说。请给我准备咖啡，再把香烟拿来。”

“奇怪，您今天这么忙，要到外边吃饭吗？”

“不是的，我今天不吃午饭了。你忘了？今天是礼拜二，我得上英文课，然后还得去健身。六点钟还要出去办事。”

“您别忘了，今天要和恩丽姬塔夫人一起到法尔科尼家里聚餐。”

“我没忘。你告诉恩丽姬塔，让她自己开车去，我们在那里碰面。七点钟我有个重要约会，不能推辞，然后我直接去聚餐。”

进了办公室以后，他开始接玛丽琳转过来的电话。特里斯坦正在开会，他的助手和他通了话。股市上的助手们向他通报了行情。后来他又给苏黎士和纽约打了长途电话。两点钟，他吃了两份三明治和一瓶酸奶。两点半，他已经准备好上英文课了。

他总是开玩笑地管他的英文女教师叫“la teacher”<sup>②</sup>。她是个日美混血女孩，只身一人来到阿根廷闯天下。现在她已经被面前这位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迷住了，因为在她看来，他是那么风趣，而且特别聪明，就像海绵吸水似的，能把她教授的东西完全吸收进去。给这样的学生上课，对她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

<sup>①</sup> 阿根廷总统府，以粉红色外观而得名。

<sup>②</sup> 英文的“教师”无阴阳性之分，这里加上西班牙文的阴性冠词以示性别。

课程安排是每星期二两个小时。这次也与往常一样，先是练习会话，然后看录像阅读报纸。后来他们又在一起喝着咖啡，聊着最近首都的奇闻轶事。

胡安·曼努埃尔一点儿也没猜错，他眼前的这位女教师的确对他情有所钟。只是，和他一样，她也恪守职业的准则，从来不接受他的约会或礼物，更不想干什么越轨的事。对她而言，胡安·曼努埃尔只是一个学生，一个主顾，仅此而已。

上完英文课，胡安·曼努埃尔赶紧跑进卫生间换上了运动服，然后来到顶层的健身房。他先做了一些器械训练，又跟着教练做了一套韵律操。十五分钟的放松按摩之后，他洗了个滚烫的热水澡。从健身房出来时，他感到精神饱满，比睡个午觉还提神。今天他多耽搁了一会儿，说不定会误了约会，所以有些着急。他打电话让玛丽琳把他的衣服送到楼上健身房，他在那里更衣之后，披上一件驼皮茄克，急匆匆地奔上了大街。

下午六点一刻，老板走了以后，玛丽琳进来打扫他的办公室。以前她从来也没有留意过这间办公室窗外的景致，今天她特意向外张望了一眼。透过这扇窗，可以眺望到耸立在雷迪罗车站旁的英国塔楼，还有更远处的拉普拉塔河，河水总是那样浑浊，也许一年里只有很少的几天呈蓝色。办公室的另一面墙上还有一扇小窗，从那里可以看到卡塔利纳斯·索尔区的高楼大厦。眼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她居住的弗洛雷西塔区的面目迥然不同。后者是那么低矮颓败，死气沉沉。她和父母至今一直在那里生活。

她开始收拾办公桌。桌上摆着一些交易所的报表，还有几张胡安·曼努埃尔用一枝绿色的粗笔信手画出的裸体女人，几个矿泉水的空瓶子，巨大的烟灰缸里装满了烟蒂，她不久前端来的咖啡已经喝得见了杯底儿。桌角上摆放的银质相框里有一张胡斯托·曼西亚一家六口的“全家福”：胡安·曼努埃尔和他令人反感的妻子恩丽姬塔，还有他们的四个儿子。照片上的人都漂亮、健康，惹这位韶光已逝的女秘书忌妒。桌子上还有两个尺寸相同，颜色各异的真皮面记事本。

女秘书好奇地打量了一眼，其中一本恰好翻到七月三十一号这一页，上面用绿笔写着“18:13.B”，下边没有任何注释。

看来，她的老板并没有和她说实话。据她所知，还没有哪个和他们有业务关系的公司和个人的名字是“B”字开头的。

另外的一个记事本的真皮封面是黑色的，上面已经记下了八月十二号的安排。在这一页上有几项用勃朗峰牌水笔标注的预约：10点钟，卡塔利纳斯集团；12点和萨莫埃尔·萨克雷，15点健身。下面，又用另一种更醒目的颜色写着：“18点，阿维亚尔酒店，M.O.”，后面还有“成功的偶像”几个字，还跟着好几个大大的惊叹号。

女秘书小心翼翼地把本子合上。她什么也没搞明白，反而更好奇也更糊涂了。

与此同时，胡斯托·曼西亚正步履匆匆地走在光复大街上。一边走，一边还把新买的意大利真丝领带松开，解开衬衫



的领口。又把染过的黑头发稍微弄得看上去蓬乱一些。

他似乎有些兴奋，在做上述动作时都禁不住微微颤抖。

当他来到“麦当娜”酒吧的门前时，他已经不再是办公室里那副青年企业家的形象了。现在他看上去更年轻、更潇洒、悠哉游哉。一缕黑发垂在额前。

进门之后，他径直走向柜台。酒吧里有好几位顾客都和他打招呼。自从这个休闲场所——这是现在最时髦的叫法——开业以来，他就是这儿的常客。

光顾这间酒吧的多为男士，他们的打扮与胡斯托·曼西亚大同小异，都穿着深色西服套装，或者休闲服配蓝色或黑色牛仔褲，系着醒目的真丝领带，衬衫的领口敞着，头发也都略显蓬乱。

每个顾客都带着一部“大哥大”，桌上摊着报纸，下面盖着公文包、真皮面的活页夹还有电子记事本——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道具——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出一种时尚。

如果观察得更仔细些，还可以发现他们每个人的上衣口袋里都别着一枝高级圆珠笔。其中有一些人，大概消费档次更高一些，别着“别朗峰”或“沃特曼”。

胡安·曼努埃尔已经完全接受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个非常特殊的群体所推崇的所有这一套，只是对携带电子记事本还有所保留，因为他对任何塑料制品都深恶痛绝。

在这家地处光复大街的“麦当娜”酒吧里，可以享受到各种各样的服务。这里手艺高超的调酒师，年轻的博纳德·克鲁斯可以调出花色繁多的鸡尾酒；还可以约上几个相知相契的生意伙伴来这里找个包间看上几部色情录像，听听国内外最

好的爵士、摇滚乐队的最新专辑。也可以找几个要价不菲的漂亮女人在这泡几个小时，尽管她们对股市行情之类一窍不通而且毫无兴趣。

在几个月前和芭芭拉认识以后，每星期二光顾“麦当娜”就成了胡斯托·曼西亚的惯例。他在肯尼亚有个生意伙伴，跟他一样是橄榄球迷，芭芭拉是他的妹妹。另外，胡斯托·曼西亚还利用芭芭拉的关系做一些生意。除此之外，每一次在这里见面时他们也聊一些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话题，尤其是最近最热门的私有化进程中的一些焦点问题。正是在这间酒吧里，胡安·曼努埃尔才真正体味到了‘花花世界’的诱人之处。

他进来时，芭芭拉还没有到，所以他直接走向了吧台。

“你好！‘法丘’，家里还好吗？”

这是久别重逢时非常聪明的一种问候方式，不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你好，弗兰克，久违了，你们现在都还好吗？”

“两年前我就和太太分手了。她跟我最好的朋友私奔了。刚开始的时候不太适应，现在别提多惬意了。你的孩子们都好吧，听说你已经有六个孩子了？现在的孩子让人头疼，最好别管他们，由他们去吧。人过了四十岁就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对吗？你现在看上去可是不太快活，还跟恩丽姬塔在一起吗？……”

“没错，你知道，我是个本分老实的人。”说到这里，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弗兰克一点儿没变，还是那种盛气凌人败坏别人兴致的行家。不过，尽管他总是那么肤浅、缺乏主见，但他的话似乎

还有些道理。

就在这当口,芭芭拉来了。她身材颀长、风姿绰约。尽管看上去她的年龄要比自己所说的二十岁大一些,可是,胡安娜和她比起来,简直就像个还没成熟的孩子,甚至都可以充作她的女儿。芭芭拉留着染成棕红色的短发,完美的脸部化妆使她的双眼显得又大又亮。她的颧骨略显得凸出,鼻子也嫌大了一些,但仍然是那么妩媚动人。

“芭芭拉,这位是我小时候的朋友,弗兰克·帕迪亚。”

“好家伙 我还蒙在鼓里哪,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手。”帕迪亚说道。

“我哪么一手都没有。芭芭拉是来和我谈旅行的事。她是这方面的专家。如果你不介意,我们就坐到桌子那边去了。”

没等对方开口,他已经挽着芭芭拉的胳膊走向了角落里的一张小桌边坐下。

落座之后,芭芭拉笑着说道:“我什么时候变成了旅行专家了,而且还为你提供咨询服务?告诉你,我开价可不低,你现在还没了解我的底细呢,亲爱的。”

这时,酒吧里响起了菲托·巴耶兹的新歌。

“《爱情之后还是爱情》,这歌名不错。他挑逗地说道。

“对,我也挺喜欢的,他还有另外几首歌也很好,其他的一些歌就太压抑了。我不是特别爱听摇滚乐,太咄咄逼人了。”

“我一直都很爱听,以前还组织过一个乐队呐。虽然它不太符合我们这种人的文化品位,但我还是挺着迷的。”

“你说的‘我们’是指的什么人？”

“我们学生时代的一群好朋友，七个疯狂的小子，全是阿尔特<sup>①</sup>的狂热信徒，你知道吗？阿尔特是阿根廷的一个作家。”

“知道，亲爱的，就算我不太看书，可也不至于那么孤陋寡闻。嘉斯顿跟我说你很快就要去曼哈顿，是吗？我叔叔当领事的时候我在那儿住过十五年。那是我失落的天堂。”

“还早呢。不过，我确实想问你一些关于那边的情况。要是咱们能在那里会面就更好了。我还是头一次去那里呢。我够土气的吧？”

“我也想去那里。咱们事先约好时间、地点，然后就不再提这件事了，如果到时候真能在那里相会就太美妙了。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够不够浪漫？”

“倒是挺浪漫的，可是不太容易办到，姑娘。”

“并不是什么事情花钱就容易办到的。小伙子，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我开价不低，而且还很高呢。不过，尽管和你在一起是是非非似乎很多，我还是很喜欢你的。”

“好吧，我同意这个建议。等我确定了行程咱们就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OK。这事还得等几个月呢。你今天真漂亮，穿着这身男性化的衣服，简直跟模特似的。”

“行了，亲爱的，就算我爱听恭维，你也别太离谱了。”

“好了，我得走了，还得给托雷多打个电话。这小子真是一个有意思的歹徒，钱多得不知往哪儿花好了。你看，那

<sup>①</sup> 阿尔特（1900—1942），阿根廷著名小说家。

边有一个讨厌的美国佬，正向你招手呐。我现在把你让给他吧。”

“胡安玛<sup>①</sup>，你干什么我都不过问，你也别管我的私事。”她送了他一个临别的吻，然后摸着他的下腹说道：“你得注意点儿意了，我可不喜欢小胖子。”

临别前的这句话让胡安·曼努埃尔很失意。芭芭拉就是这样的脾气。自从他们相识以来她一直就是这样爱挖苦人，不可琢磨……可是……他也应该注意控制一下体重了。要多锻炼，少喝酒，更不能吃面包之类的东西。

### 三 塔尔西奥教士

列车已经鸣响了启动前的最后一声汽笛。这时塔尔西奥·罗布莱斯才踏进了车厢。是村子里的木匠哈辛托替他开着弗拉迪米尔送的那辆六十年代的老“奔驰”把他送到火车站的。

站台上有许多送别亲友的人。罗布莱斯每年至少要乘火车从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一次。他喜欢管首都叫作“码头城”，那里住着他的母亲、哥哥和姐姐，还有一个侄子已经被他认作养子了。还有几个和他一直保持联系的老朋友。

他那一头漆黑的长发非常引人注目，那副老学究们常戴

<sup>①</sup> 胡安·曼努埃尔的简称。

的眼镜也使他的大鼻子和酷似印第安人的脸庞更加显眼。

不了解的人很难想象得出他居然是一位著述颇丰，声名卓著的神学大师。他在萨尔塔的教堂以及他的传教方式都让传统、保守的阿根廷宗教界感到既难以容忍又无可奈何。虽然在这几年里，他曾经不懈追求过的乌托邦都相继幻灭了，他仍然不肯顺从于教会的旨意。有些人对他是怀有敌意的，尤其是在阿根廷最有影响的天主事工会<sup>①</sup>对他最为忌恨。然而罗马教廷却不想抛弃或惩罚这位年轻有为的教士。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对教会忠贞不渝，何况还有许多追随者捍卫他。

这次旅行他只随身携带姐姐送给他的一个背包，里面装着几件衣服，几本书，还有准备送给朋友们的当地手工制作的小礼品。他一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就会马上去见他们。

“夫人，您想换到窗户边上坐吗？”

“不用了，先生，您是二十排 A 号，我是 B 号。您应该靠窗户坐，我挨着过道。”

老夫人操着罗布莱斯爱听的圣地亚哥口音答道，每个“S”的发音都那么清晰。

“好吧，您自便，靠不靠窗户对我来说真的无所谓。”

“您是一个人去首都吗？各自就座之后，这位六十来岁，头发金黄，身形瘦削的老太太问道。

“是的，这一路可不太轻松呐。您说对吗？”

“是不太轻松。可尽管这回挺着急，我还是宁愿坐火车。

<sup>①</sup>天主教在俗人员和司铎组织，其成员以将自己变成完美信徒并在本职工作中贯彻天主教理想为宗旨。

飞机不是给人坐的,路途再远你也觉不出来,把距离的概念都给破坏了。我说得对吗?”

“我倒从来也没有从这方面考虑过。我总得往首都跑,坐火车就是图便宜。虽然路途遥远也没办法。”

列车已经开出,和着机车单调乏味的噪音,窗外的田野、村庄向后闪过。途中只在大站停了几次车。

罗布莱斯已经取出了《圣诗集》开始默念祷告。尽管他有许多离经叛道的思想,但在履行教士的操守方面还是中规中矩的。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说他简直是皮埃尔或者保罗六世的翻版,忠于信仰,安贫乐道,更恪守色戒。

邻座的老太太并不招他厌烦,但是,他不想与其攀谈。他知道,以他的性格而言,一旦聊起来,他绝对不好意思主动中断谈话,而他又肯定忍受不了一连几个小时的闲扯。

我真想念朋友们,好几年没见到他们了。自从回国之后就再也没见到过‘法丘’和‘爱因斯坦’。也没见过奇斯皮塔,他好像和一伙人在意大利呆过一段时间。胡安·曼努埃尔如同人们预料的一样,发了财,他成功了。但是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瘦子特里斯坦居然会从政,成了经济部长跟前的红人、总统的亲信。如果他的父母还健在,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也得活活气死。他们生前都是庇隆主义的极端反对者。他父亲好像在七十年代还为此坐过牢……我们七个人组成过一个小帮派,那时候我们刚从学校毕业。塞巴斯蒂安在我们中间出类拔萃,不是最好的就是最坏的一个。可谁想到他二十三岁就死了。胡利安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原先以为他会成为一个

外交官的，但现在成了一个无私的医生。明天我就会见到埃米丽亚了。大家都说她是个很特别的女人。但愿她能是胡利安的好伴侣，因为胡利安本人就很不同凡响。弗拉迪米尔和我一直就是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之间的相同之处就是都有些疯狂。

那么，我呢？塔尔西奥·罗布莱斯，绰号‘主教’，我是什么样的人？以前在安赫莱莉身边的时候，我只不过是个毛头孩子，现在被人称为穷人的代言人。在当今这个世道，为穷人们伸张正义，为社会公正而劳碌已经不被别人看作什么好事了。柏林墙已经倒塌了，以前那些乌托邦幻想也破灭了，甚至居然有人指责梵蒂冈教廷激进。如果我死在拉里约哈事件中，该不知会有多少人感到快意呢。不过现在我累了。我真想干一番像那位巴西的博夫神父<sup>①</sup>所做的事情。我是自由的人，为什么还要在教会里死守着那些陈规陋习苦熬呢？可我又离不开它，它就像一个让我又爱又恨，难以割舍的女人。

“小伙子，您在和我说话吗？”

“没有啊，怎么了？”

“我刚才好像听见您挺激动地说‘不行，可不能这样’。可能是我打瞌睡时做梦了。”

“不，可能是在做梦。快到科尔多瓦了吧？”

“已经过了，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就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了。”

<sup>①</sup> 一位主张解放神学的神职人员



老太太又闭上眼养神了。塔尔西奥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思绪中。

（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兄弟几个都不守常规。其实我父亲也一样，正是他给我们做出的榜样。他生前就是个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我母亲也特别热衷政治。但现在她早就不再关心国事了。我们的遭遇对她的打击太大了。她希望我们，现在也希望她的孙子们过上安定的生活。那时候，胡利亚和哈维尔不得不逃到墨西哥，我也到了西班牙。现在虽然是立宪政府，可仍然禁止上演伊格纳西奥的剧作。）

塔尔西奥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邻座的老太太睁眼瞟了一下他手里的法文版《圣诗集》。她最初还以为他是个犹太教士，现在看上去又不太像。要是新教的牧师？塔尔西奥的模样着实有些让老太太摸不着头脑。但是通过简短的交谈，她已经断定面前这位衣着朴实的人肯定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宗教界知识分子。他的目光和神态都让她想起她的父亲，一位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著名犹太教士。

“女士们，先生们，”广播里的声音把塔尔西奥从睡梦中惊醒，“还有四十分钟列车就要到达首都了，请您检查携带的行李物品，不要遗失在座位上。列车的终点站就要到了。”

“您睡得不错吧？老太太很有礼貌地问道。

“是的，睡得很好。您还好吧？”塔尔西奥一边用每次旅行吉尔梅特必定送给他的喷了香水的手帕擦脸，整理头发，一边

回答：“咱们说完话以后，我就一直睡着，再也没醒过。大概睡了六个小时。”

“是的，吃早饭的时候见您睡得那么香，我就没叫醒您。”

“我太累了。您没睡着吗？”

“几乎没睡着。我有心事，今天我儿子要动手术，我特别担心。现在我孙子达米安肯定已经来到站上接我了。”

“我祝福您的儿子手术成功。我的老朋友也要来接我，我很久没见他了。我们还要一起去维多利亚大街，离圣伊西德罗不远，您去过吗？”

“去过，我在那里有几个朋友。”老太太笑道：“我的那些朋友很有势力。您是神父还是牧师？”

“我是天主教神父。您是怎么猜出来的？我也认识不少大人物，可总的说来，我并不喜欢他们。”

“像您这么出色的小伙子为什么要当神父呢？我一般不太喜欢黑头发的人，可您跟他们不一样。您瞧，因为我是个老太太，您又是个神父，我才敢这么说的。”

“您真有意思，我虽然是个天主教神父，可并不意味着我就要像外星人似的那么特别。相反，我喜欢把自己混同于一般人中间。所以也不想让人看出有什么与众不同。”

“我明白，您是个现代派的神父。我是犹太人，我父亲是犹太教士，丈夫是医生。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可我并不太喜欢犹太教士，也不喜欢神父。因为他们都是自大狂。抱歉，请您原谅我这么说。”

“不用道歉，您不必要求自己喜欢我们这些人。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人都有。的确，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会让我们有

些傲慢,而且有些时候,我们非但没能为别人服务,反而享受了别人的服务。”

“到站了。神父,请为我儿子祈祷吧。您看,那边那个金发小伙子就是我孙子。您给我留下电话号码好吗?咱们以后可以联系。我喜欢您这样的人。”

列车已经停稳了,从小窗里可以看到前来接站的人群。塔尔西奥一眼就看到了胡利安那高挑、优雅的身影。他还是那么引人注目。

#### 四 摇滚歌手

弗拉迪米尔·佩尔泽住在圣伊西德罗区一座现代化住宅楼的二十层。他的公寓外面有一个十乘十五米的大阳台,上面装点着各种争奇斗艳的花草。从这里一抬眼就可以眺望到远处的拉普拉塔河。

在弗拉迪米尔(人送外号‘俄国佬’)的生命里,水是一种不可须臾缺少的元素。在邻海的加耶戈斯河畔度过的童年时光给他留下了一段永远也抹不去的记忆。后来,不明白为什么,他母亲带他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北区租了一套公寓住下来,在那里教钢琴课。从那时起,他就恨这座灰蒙蒙单调乏味的城市了。这里的人们也都是那样充满敌意,咄咄逼人。

他从十五岁中学毕业时起,就离家独自生活。当时这么做是一种青春期反叛心理的结果,他有上千条理由为他

的叛逆行为辩解，但他的母亲至今也难以接受他当时的做法。

他来到博卡区租了两间破烂的小屋容身。那里的河水又臭又脏，可那毕竟是一条河。在那里，他和弗雷迪、塔诺还有“和尚”三个朋友共同创立了一个摇滚乐队，从此他们就再也不能分开了。

没过多久，弗拉迪米尔便成了一个小有名气的词曲作者。由于当时国内的社会背景，他的那些卡斯蒂利亚语抗议歌曲在七十年代的年轻人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也是在那时候，他为母亲买了一套公寓。在这里，他与“瑞典姑娘”<sup>①</sup>结了婚，有了女儿萨曼塔。后来，他和瓦莲蒂娜的共同生活出了问题，而且，她也不愿再忍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生活，离开他回到了英国。他们十四岁的女儿萨曼塔情愿与父亲以及她敬爱的祖母一起，留了下来。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弗拉迪米尔开始整理衣装，准备到法尔科尼家里去做客。

（这是我在去英国认识瓦莲蒂娜之前买的第二套房子。我们的女儿萨曼塔就在这里出生，在外面的阳台学会走第一步。

可恶的丘八们搅乱了我们的生活，他们得逞了，世上所有的美好向往全都化成了泡影，美元成了法力无边的神。）

<sup>①</sup>瓦莲蒂娜的绰号。

噢——

我要痛斥，  
你这蓝眼睛  
巨人一样高大的丘八，

噢——

我要痛斥，  
你这个家伙，  
衣履光鲜，  
看到那个女孩被残害  
却如此冷漠。

他也是那个疯狂的七人小帮派的成员，但早就和其他人，尤其是和胡安·曼努埃尔、奇斯皮塔，还有在动乱年代里跑到国外、扎进书堆的特里斯坦疏远了。

我们是七个最疯狂的家伙，  
阿尔特的七个狂热追随者，  
我们不愿做饱受呵护的孺子  
要当思想文化的倡导者。  
但是，嗜，  
只能终日困坐家中，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终日困坐家中，依偎在母亲身边。  
只有一人是明星，  
我与他经常相见。

还有那个小头头，  
他身穿教士的长袍，  
代表着虔诚，伸张公道。  
一个鬢发漆黑的男儿，  
一副真诚无比的肝胆。  
他为真理而呐喊，  
而他惟一的法宝  
只不过是发自内心的呼号。

弗拉迪米尔一边穿戴整齐，一边哼着他的歌，同时回忆起往事。他想起给北区富人家的少爷小姐们教钢琴课的温柔美丽的母亲。她年轻时候是那么漂亮，学习成绩出类拔萃。但是，爱上他父亲之后就放弃了一切本来应该属于她的东西，而后者竟然毫不珍惜地把这样一个女人抛弃了。

那个克里斯托瓦尔·佩尔泽到底是什么人？是欧亨妮所说的那种梦想家？抑或是弗拉迪米尔所猜想的那种不成熟的，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没有责任心的家伙？

（他有一张母亲幼年时的照片，这张照片曾被复制成上百万件，挂在许多人家的镜框里。照片上的女孩儿一头金发，一双明眸是那样的活泼美丽。还有一张照片上是帕梅拉和他们家的牧羊犬“探戈”在一起嬉戏玩耍；还有帕梅拉在母亲的怀抱里；帕梅拉和一个满头红发、一脸雀斑、模样不讨人喜欢的瘦男孩在一起的照片，照片上那个瘦男孩不是别人，正是他，弗拉迪米尔本人。

在另一张放大照片上，一个三十多岁，相貌英俊，戴着宽边礼帽的男人，手里牵着孩子，仍然是身穿海军服的弗拉迪米尔。

拍这张照片时，他姐姐帕梅拉肯定已经夭亡了，因为照片上他父亲身穿着深色的西装，面色沉重。）

这些都是发生在六十年代末期的事情……

那会儿的年轻人都学着过一种与世无争，不假思索的生活。

首先，姐姐从生活中消失了，然后是父亲……他们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先是留下一连串让人无法弄清的疑问……而后，便归于沉寂，抑或是从记忆里永久地消失。

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加耶戈斯河畔的小村庄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回忆。这段回忆似乎已被风吹去，抑或是谁也不愿再受它的困扰，因而将它忘却了。

每当欧亨妮提到她丈夫时，那口气总像是他外出旅行，迟早会等到他回来似的。而对于弗拉迪米尔来说，这种等待却显得那么漫长。

在沉寂中等待了几年之后，忽然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是一位犹太教士，“就是另外一种宗教里的神父”。他母亲不假思索地向他解释。

“他来干什么？”弗拉迪<sup>①</sup>问道。

<sup>①</sup>弗拉迪米尔的简称。

“他带来了你爸爸的消息,他现在正在以色列,照顾那里的孤儿。”

“难道我不是孤儿?弗拉迪壮着胆子说。

妈妈狠狠瞪了我一眼,口气严厉地回答:“弗拉迪,向这位先生问好,谢谢他带来的礼物。”

一堆用带漂亮花纹的包装纸裹着的花花绿绿的礼物:什么电动火车、小汽车和跑道之类,还有一本希伯来文的《圣经》。弗拉迪当时还是孩子,但他并没有为这堆礼物动心。

我的根到底在哪里?为什么给我取“伊万·弗拉迪米尔”这么个俄国名字?爷爷不是说过我们是天主教徒吗?他是我父亲的父亲呀,而且他从来也没撒过谎。

绰号‘俄国佬’或‘弗拉迪·泽尔’的伊万·弗拉迪米尔·佩尔泽迈着英国猎犬似的大步,朝老火车站方向走着。

我曾经爱上过卡塔丽娜。我这一生也没见过几个像她那样漂亮迷人的姑娘。可她却把自己关进了修道院里,靠念经、祷告打发光阴。

在中学毕业并投身音乐之后,他开始转变了。先是迷上了外国的摇滚乐队,最早是‘披头士’,他们的歌曲是在已有些过时后才开始传到阿根廷的,然后是‘滚石乐队’。后来他就和‘岩洞’和‘波西米亚乐队’这样的阿根廷本国音乐人混在一起了。由于军政府的压制,这些人都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他们个个披头散发，眼睛里泛出年轻人特有的光芒。从那时起，他变得性情暴躁，行为乖张，结交了一批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朋友。

与这些朋友一起，他经历了生活中另一个放浪不羁的侧面：酗酒、吸大麻……这些嗜好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当时，他最好的朋友胡利安曾经劝阻过他。后来，连他自己都不得不跟父母到欧洲去继续他的学业。

星移斗转，物是人非。正如菲托的歌词中唱道“爱情之后还是爱情”。他也曾体验过成功的滋味。他和国内外许多著名歌星成了朋友，自己也被列为国内最好的摇滚歌星之一，受到青年们的爱戴和崇拜。他是查里·加西亚、斯皮内塔，乃至克莱普顿这些国内外红歌星最得意的门生和挚友。在巡回演出时他结交了许多这样的大牌歌星。弗拉迪的优势在于他能同样流利地用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演唱。

目前，他正处在演艺事业的低谷，总是找不到感觉，缺乏艺术灵感。他曾亲眼看到过许多摇滚界的朋友们因为意志消沉而江河日下；还有一些人的境遇和他完全不同。他自己则对别人靠兜售他的形象牟取好处深恶痛绝。他已经失去了个人隐私，他对此感到特别厌烦，在别人眼里却被看作成功。

他已经多年没有见到过老朋友们了。这次相见，聊一聊，或许会有点儿意思。

在圣伊西德罗车站里，好几个年轻人见到他之后就蜂拥过来要求签名。弗拉迪米尔这才发现，尽管今天他身穿黑色长裤，羊毛衫，头上扎着小方巾，穿戴和平常不同，但人们还是

能够认出他来。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他的大高个儿和长头发就是他最明显的招牌。

他赶紧跑到卫生间里，摘下大耳环，扎起头发，从口袋里掏出一顶贝雷帽戴在头上。现在看上去就大不一样了。等他重新妆扮妥当，出来之后，已经开过一班车了。

他只好等到八点半才上了下一班车。

在车厢里，弗拉迪差点儿被一个躺在地板上，身上又脏又臭，没盖任何御寒物的三十来岁的病人绊了一跤。他抽出几张钞票扔到这个人摆在地上的帽子里，而这个受到恩惠的人却似笑非笑，表情呆滞地盯着他。弗拉迪与他错开目光，撕开了这一天里的第三包香烟。他现在的烟瘾极大，似乎是想用香烟来摆脱对镇静药的依赖。自从上次演出结束之后，他就下决心不再用药了。因为服药后他在演出时感到特别不适。目前他还没有打算戒酒，他似乎喝再多的酒也不上脸。

一个染着金发的漂亮的中年女人来到他这节车厢。看到他吸烟，投来了厌恶的一瞥。另一个身穿高档牛仔裤和运动衫的商人却对他报以微笑。

他略微与之打个招呼，就坐到了他遇到的头一个空位子上，打开刚买的报纸，头也不抬地一直看到九点钟，列车驶到雷迪罗站。

下车以后，他又上了一辆出租车。几分钟之后便到了国防大街，在法尔科尼家的门前按响了门铃。这是自从法尔科尼一家回国后他第一次来拜访。

在门前，他突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彷徨，甚至自问到底是什么驱使他接受了这次邀请

## 五 “爱 因 斯 坦 ”

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普通居民区。除了一座古老但说不上漂亮的教堂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景致更能引起人们兴趣了。早年间这里的富人们为躲避瘟疫逃到了城北。他们留下的一片惹人注意的老宅，似乎还能显示出这里曾有过一段值得炫耀的历史。

从波士顿回到国内以后，特里斯坦和安娜贝拉就住在这个区里。现在他们也打算换地方了。

实际上，他们二人都想改变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对此，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想法，而且谁也不准备跟对方说。

“特里斯坦，快把早餐吃了，要不然，等它凉了就别想再叫我给你热。”

“我根本就没想让你给我热。我得把报纸看完。看看今天又有什么人在《金融界》和《第十二页》上对我们恶毒攻击了。现在的报纸越办越差，除了登那些犹太人无事生非、吹毛求疵的无聊文章之外，没什么真格儿的东西。”

“我前几天也翻了翻报纸，没觉得像你说的那么糟。当然了，那些人是不容忍阿拉伯人<sup>①</sup>在台上当权的。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要真能这么想就好了。我得赶紧出门了，部长十点钟

<sup>①</sup> 阿根廷总统梅内姆为阿拉伯人后裔。

要见我呢。尽管你们家有几个有钱有势的大官儿，但他们从来也不会跟我讲情面。”

“特里斯坦，你今天可跟女儿们约好一起吃午饭的。”

“对，我们约好了。她们放学后，在‘拉比耶拉’和我碰头。你来不来？”

“别犯傻了，亲爱的。她们只想跟你单独在一起吃饭，好告我的状。什么没去参加她们的家长会，周末不放她们出去跳舞之类的。什么青春期不青春期的，我十六岁的时候比她们老成多了。而且，她们也太不知足了，我就不能有一点儿自己的时间，干些自己想干的事情吗？我可不想四十岁的时候变成一个失败的女人，我离这个岁数也不远了。”

“行了，我自己去就是了。我可没有跟你闹别扭的兴致。我带弗朗西斯卡和克拉拉去吃饭，然后让司机把她们送回家来，行了吧？我觉得咱们应该搬家了。住在波埃多这地方对我的应酬来说实在太远了。”

他一口喝干了杯里的咖啡，出门进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汽车。

回国之前，特里斯坦从来也没想过从政。他原先研究经济学，是个整天和数字打交道的书虫。后来在他的内亲们，乃至总统本人的游说下，他参与到制定和实施社会经济改革的计划中来。最初，他并不适应这项工作。他自己的许多观念与改革计划的宗旨和举措都格格不入。他认为这个所谓改革计划中的许多政策，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如果真正实施就会更加拉大贫富差距，会导致取消免费高等教育等等。当初要是没有免费高等教育，他和他的许多朋友，包括部长和总

统本人都根本不可能上大学。他一直自认为是虔诚的基督徒,愿意给别人提供和自己同等的机遇。但是,安娜贝拉的那些亲戚们,还有所有在台上执政的阿拉伯人硬是让他昧着良心赞同了这项政策。事实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项取消免费高等教育的措施根本不会使国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任何改观。

他曾经面临两种选择 要么甘于清贫,重新回到自由自在轻松浪漫的学术生涯中去 要么投身政界飞黄腾达,代价是与当权者同流合污。他以前就曾经为此和安娜贝拉有过多次争吵。她的亲友们对他施加了很大压力,尤其是在伊格纳西奥生了病之后,他才发现自己穷得连住院费都付不起。

现在,尽管并不心甘情愿,甚至还要忍受一定精神折磨,他还是选择了从政。与失去一个十二岁的儿子的可怕后果相比,这点精神痛苦又算得上什么呢?

他们也想过再回到美国,重新过他们以前那种安逸温馨的日子。但是,正如阿拉伯人笃信的那样:命运总是捉弄人。这些人对他许愿说让他成为一位部长的得力干将,而这位部长是总统的亲信。

开始,他还不太适应生活中发生的那些变化:高级会议、社交活动、在杂志上频繁亮相等等。后来,他就喜欢上这些了。实际上,是一次与老友胡安·曼努埃尔的重逢让他真正下定了决心不让这从天而降的机遇随便溜走。

和往常一样,今天到了部里之后,他顺着楼梯大步流星地来到四楼的办公室。

一进门,女秘书森德诺就告诉他,总统一大早就打电话找

他,让他在内阁会议之前给总统官邸‘橄榄园’回电话。

“真麻烦,肯定没什么好事。更要命的是部长现在正在休假。”

“您的朋友胡斯托·曼西亚也打过电话,说有要事找您。”

“给我接通胡安·曼努埃尔的电话。这小子神通广大,肯定能帮我的忙。再给法尔科尼去个电话,告诉他我今天一定参加他们家的聚会,不过可能晚到一会儿。安娜贝拉就不去了,她要去开家长会。”

“先生,家长会昨天就开过了,太太没去。”

“我知道。你说我应该怎么跟他们说?难道告诉我的朋友,说安娜贝拉早就烦透他们了,尤其是腻歪塔尔西奥和弗拉迪米尔?碧碧<sup>①</sup>,你怎么跟萨丽塔一样啊?脑子就是不开窍。”

“好了,明白了,我会把这事办好的。而且还会以您夫人的名义给你们派送一束鲜花呢。”

“这就对了。我夫人现在可不想随随便便与什么人打交道。别忘了,人家可是总统大人最宠爱的侄女。”

“那您就是总统的侄女婿了,而且还是他的智囊。我听别人这么叫您。”

“只要我那个阿拉伯女人别闹腾,我就万事大吉了。她现在可是气焰万丈,不太好惹呢。如果有一天她要是再找上一位,把我一脚踹开,我可就只有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份儿了。”

“先生,您可别让她干出这种事来。您那么有学问,风度

<sup>①</sup>特里斯坦的女秘书贝亚特丽丝·森德诺的昵称。

也很好。您照镜子的时候没看出来吗？”

“您真的这么认为吗 那么,咱们以后得找机会好好聊聊这个话题了,尽管你是卡门的好朋友,我得对你负相当大的责任……噢,对了,碧碧,帮我给‘金色时光养老院’打个电话——一个上等养老院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告诉他们,我明天要抽空到那里去看看我们老太太。再要不去就太不像话了。每次和里桑德罗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心里就发虚,好像说话都没底气。”

“您看了发表的那些关于您那位主教朋友的评论了吗? 他今天也要参加你们的聚会吧?”

“是的,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到来,我们才要聚会的。传教士们三十一号要在圣米盖尔教堂集体静修。人们是怎么评论他的?《第十二页》肯定不会说他的好话。”

“哪儿啊,正相反,他们还替他辩护呢。您别忘了,那也是个有名的赤色刊物。”

“以前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我在波士顿的时候还到西班牙去看过他好几次呢。那可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估计他肯定会对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感到惊讶。他们到底是怎么评价他的?”

“他们说桀骜不驯,难以驾驭,和教会不睦。另外还提到了他以前发表过的那些引起过争论的关于贫困问题的看法。还说总统不能接受任何人跟他唱反调。奈乌斯达德也是如此,昨天他发表评论,称塔尔西奥·基哈诺为堕落的共产主义分子。”

“那个蠢货懂什么。就凭他那点儿学问,给‘主教’提鞋都

不够资格。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当今的社会里，塔尔西奥活得太纯朴、太天真了。以前我也相信过人类是可以创造出一个孩子们不再忍受贫困与痛苦的、平等、公正的社会。我甚至崇拜过切·格瓦拉这样的冒险家。但是国内外有那么多利益各不相同的群体、集团、阶层，你根本无法改变目前的现状。‘如果你不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世界上那些有钱有势的家伙就会生吞了你’，这可是咱们部长大人的名言。”

“是的，但我问您一句，博士，咱们这位部长大人有脑子吗？我看他简直是个机器人。”

“你错了，姑娘。他不是机器人，而是一个机器人的拙劣仿制品。与机器人相比他还贪财，喜欢在加勒比海的小岛上消暑，而且迷恋女色……好了，说这些干什么，我不也揽在这里边吗？说实话，有时候我真是不自在。”

特里斯坦开始不停地咳嗽起来。

“您怎么了，博士？这几天您总是咳嗽得这么厉害。”

“我烟抽多了，有些不太舒服。我应该把烟戒掉。要不然，我那阿拉伯女人就该成为让人惦记的守寡的小富婆了。”

“您特别爱您的太太，对吗？”

“我曾经特别爱她。我们结婚时非常相爱，但是回国之后，尤其是伊格纳西奥出事之后，加上她的那些亲戚等等原因，她改变了不少。现在她的野心越来越大。”

“是她，还是您们俩……”

看到埃切戈因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快的苦笑，女秘书赶紧把话收住。

即使她是特里斯坦妹妹最好的朋友，而且正是由于有这



层关系她才能到这里来工作,刚才这番话也过头了,尤其是从她,区区一个女秘书的嘴里说出来就更不恰当。

“碧碧,我现在要去巴尔卡塞,或许还要去看看我妹妹,顺便在她们医院里做个透视检查。不过,劳驾,别跟任何人说你的上司身体状况不太好。”

“我不说,博士。您得好好保重,这里有好多人都爱戴您呢。顺便问一句,用不用我打电话告诉养老院说您要去?”

“好的,在到法尔科尼家之前我先到那儿去一趟。帮我准备一张支票带给他们。现在的人没钱办不成事。反正我已经是孝之子了,就干脆大方一点儿。别让老人在物质上缺少什么。对我们兄弟姐妹来说,她非常重要。你想想看,她三十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和她离婚了。”

“对不起,博士,请问您父亲还健在吗?”

“在美国芝加哥。我在美国的时候去看过他两次。跟你那位记者朋友一样,他也娶了个比他小三十岁的女人,不过他娶的那位更聪明或者说更有本事,还给他生了个儿子,名叫约翰·保罗。她把老头管得服服帖帖的。现在那个孩子也该有十五岁了。我父亲也是学经济学的,出版了好几本专著。不过,对我,或者对我们来说,他只不过是个名字而已。”

“您办公桌上的那张照片不是他的吗?”

碧碧·森德诺意识到她又太冒失了。她想把手收回来时,已经太晚了。

“是的,贝亚特丽丝·森德诺,我桌上的照片上那位风度翩翩的先生正是我父亲本人。不管怎么样,他毕竟是我的生身之父,何况他还是一位成功的男人呢。你说对吗?”

## 六 在法尔科尼的家里

进入九十年代的土著白人暴发户们无时无刻不忘夸耀自己的财富；他们想方设法在各种公众场合抛头露面，挤到那些头面人物的跟前去，哪怕只是打个招呼也好。他们孜孜不倦地追赶新潮，刻意效法时尚；即使是走旁门，哪怕是走佣人的小门，他们也要跻身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去。可惜的是，他们身上的那股进口香水的浓烈气息、过度张扬的穿着打扮，还有他们对‘大哥大’的过分迷恋，都会把他们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他们只不过是这个暴发户的国度里的一群暴发户而已——人们一眼就会看出端底。

今天在店里举行了一个社区集会，有个家伙对金融投资之类的问题夸夸其谈了一通之后，就草草收场。一切都进行得快速而有序。容不得半点时间来探讨和阐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有个先生走来为自己预定一张餐桌。给了我一笔可观的小费之后，他告诉我说，他将点两瓶葡萄酒，但要退掉第一瓶，钱照付不误。这样做的目的只是向同伴们显示一下他是个品酒的行家里手。）

“我以前也是个挥霍奢侈的家伙，什么都经过见过。要看清骄奢淫逸的生活有多么无聊，就要亲身体验过才行。什么‘劳力士’、奔驰车、高档服装之类，我全让它们

见鬼去了。没钱的人才把钱看得那么重呢。幸运的是我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工作，而且一点儿也不害怕再当一回穷人。”——这应该是奇斯皮塔的自白。

因为总有大批移民源源不断地到来，所以阿根廷一直就是个充斥着暴发户的国度。

“胡利安的日子好像过得挺惨的呢，他带着五个孩子住在弗洛雷斯区<sup>①</sup>，开的还是七十年代的旧车。他唯一的成就是当上了教授。可是，他早晚有穷死的那一天。原来我们还把他当成天才，一直认为他会发迹呢。”

“别说了，胖子。住在弗洛雷斯区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我爸爸是大夫，妈妈是教师。这并不是什么让人难堪的事。我们的房子特别漂亮，现在里卡尔多还住在那里呢。怎么啦，你也变成势利小人了吗？”

“别说傻话了，克里斯蒂娜。你也知道，我爸爸也只不过是那个在佛罗里达街上开布料店的，而且卖的也不是什么英国开司米之类的高档货。但那毕竟是过去的阿根廷了。我那时候在学校里和其他人一样，并没觉得低人一等。人要顺从社会的变化。要不然，怎么我们以前的总统都是意大利后裔，而现在是阿拉伯人当权，第一夫人还是个穆斯林呢？你说说看？”

“从实际效果来看……哎，有人按门铃，特里斯坦来了，他总是第一个到。”

<sup>①</sup>布宜诺斯艾利斯一百个区之一。

“把那两条小狗看好了。那个阿拉伯女人可不喜欢狗了。你还记得吗？”

间隔不到几分钟,胡安·曼努埃尔、特里斯坦、弗拉迪米尔跟胡利安和埃米丽亚他们几个都陆陆续续地到了。然后是塔尔西奥。恩丽姬塔迟到了一个多小时,安娜贝拉推说开家长会不来了。

故友重逢,互相之间总要热情问候。他们中有些人好多年没见过面了。

这些人走到餐桌旁。那里已经摆好了克里斯蒂娜亲手制作的烤肉饼。

“克里斯蒂娜,我已经好长时间没吃到你做的美味佳肴了。我怎么也忘不了上研究班时吃过的你做的面食。最初我还以为是你妈妈做的呢,直到有一天亲眼看见你和面,我才相信那是你的手艺。”

“行了,神父,别捧我了。”克里斯蒂娜笑道。

“趁你在这儿,为我们祷告吧。”马里亚诺说道,“你们知道,我当过兵,所以一直挺虔诚的。”

“我说,马里亚诺,别胡说了。不光是你,我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愿意吃饭前有神父做祷告。”恩丽姬塔应声答道。

“咱们再玩这一套是不是有点儿太老了?”弗拉迪米尔带着厌烦的口气,半真半假地说。

塔尔西奥环顾了一下周围的人们,以一种坦然的腔调念道:“愿耶稣祝福我们这顿朋友之间的晚餐,保佑在座的每个人以及我们的家庭。感谢您赐给我们的食物,感谢您赐给我们忠贞不渝的友谊,赐给我们休戚与共的手足,使我们和睦团

结，让主赐福给我们。尽管我们各不相同，请让我们相互尊重，共同生存。”

所有的人都用赞许的目光看着他，齐声应道：“阿门！”

“主啊，无论您在哪里，也不要让我们忘记青春的寄托，每天清晨都仰望上苍。”弗拉迪米尔双手合十，扮着一副怀旧的怪相，半开玩笑地加上了这么一句。

“说到‘上苍’，我还真是把天空都忘了。只是有时候出去航海时才发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上空一片蔚蓝。”胡安·曼努埃尔带着他特有的微笑说道。

大家随随便便地坐在大厅里一边吃着各自盘里的饭菜，一边七嘴八舌地聊着。

“行了，弗拉迪米尔，别再发哲学家的感慨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儿。现在我们每天都看到的天空和二十年前的不一样了。”

“恩丽姬塔说得有道理。现在的空气污染和那些高层建筑让一切变了样儿。现在出门走路应该看的是四周。别让车撞了，还得小心扒手。再说，现在街上到处都是漂亮姑娘，不好好看她们几眼也怪亏的。特里斯坦刚才一直没发言，现在来了这么一段论述。他有点儿兴奋，接着叫道：“奇斯皮塔，再来点儿酒。我的杯子早就空了，没有酒润嗓子，这么干聊太没劲了！”

“这是你说出来的话吗？特里斯坦，你看上去和以前没什么变化，还是书生气十足，古道热肠的样子。我发誓，真不敢相信你居然能说出刚才的话来，我都觉得滑稽。刚才的话就像是有人用录音机替你说出来的。要么就是你现在离那些大人物太近，使你变化这么大。你现在在玫瑰宫里当差，是

吧？现在咱们大家的状况让人觉得有点儿超现实主义的味道。看看以前咱们在南方时照的那些照片吧，那会儿咱们才二十出头，刚长出胡子，头发长长的，和现在一比，好像已经过了不止十五年而是一百年。真不知以前的熟人现在还能不能认出咱们来。肯定不会认出我来。而且，我所有的梦想都已经破灭了。”塔尔西奥这么说着，还用手拍拍自己的脑袋。

“塔尔西奥说得没错。在西班牙胡利安跟我说起你们的时候，我心目中你们的样子跟现在不一样。我说不上是比现在好还是坏，反正就是不一样。也就恩丽姬塔和奇斯皮塔的样子还有点儿靠谱。当然，我以前见过弗拉迪，来到这里之前也见过了塔尔西奥。”

“我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傻？恩丽姬塔的问话与其说是咄咄逼人还不如说是傻里傻气。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只是……”

“好吧，我也觉得所有的人都变化很大。我不是想让大家扫兴。但还是要说，自从毕业之后，咱们的那些激情、理想就早已被埋葬了。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恰好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

“塔尔西奥，拜托，”胡安·曼努埃尔的声音里带着不快，“柏林墙早就倒塌了，教会也跟着时代的脚步在前进。所谓‘第三世界主义的教士’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教皇是个了不起的人，因为他明白‘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理。今天的年轻人只为摇滚乐疯狂，传媒上的大量信息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你能让我们一成不变吗？你是最先打破陈规俗套的，现在却反过来被变革吓住了……”

“我完全反对胡安玛的说法。但是咱们还是要干了这一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不管别人的死活,先拯救自己再说。大家举杯,为元首干杯!感谢他带领我们挤进了第一世界。”除了胡利安这个左派知识分子,别人谁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别歪曲我的意思,我并没说不管别人死活。可是为什么不想办法让生活过得更美满呢?其实,抛开过去的事不谈,咱们现在谁也没资格抱怨日子过得不好,这才是最主要的。这就是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总统自己也转变了,因为他是个识时务的人。我觉得他是个天才,而且他该的确应该转变。现在,什么传统、姓氏、家世之类的东西早就失去价值了。眼前的例子还少吗?”

“你是在说我吗,胡安玛?你是在说我,一个小店主的儿子,现在也居然住上了大房子,社会地位也提高了。是这个意思吗?不过,真巧了,告诉你,目前的我根本不是什么时代的产物,我父亲就更不是。我之所以能爬到上层来,首先得感谢我的爷爷和父亲,他们那时候拼死拼活地干,又赶上了好时候。再说,我本人也不像你举的例子那样。最初我是打算当兵的。马岛战争失败后才退伍,后来开的这家实实在在的买卖,也是我们长辈留下来的。”

“奇斯皮塔,我不想得罪你,更何况你和刚才那些让人不快的话题没什么关系。我是指塔尔西奥和弗拉迪他们。我了解他们。还有胡利安,他从来就看不起我。我现在还记得那时候他总说搞不懂为什么要把我也拉进这个小帮派里来。你们还记得他说的这些话吗?胡利安伯爵,咱们现在能平起平

坐了吧？’

“‘法丘’，咱们七个人小的时候没什么不同。现在已经各奔前程了。大家能混到今天这样子，每个人都付出了很大努力，很大代价。阿根廷的发展史确实是非常可怕的。”

“劳驾，别总把我当做教士，我也是跟你们一样的凡夫俗子，满脑子装的都是问题和焦虑。我再也不是理想主义的单纯的高中生。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残酷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有悖于基督教义，而且是彻头彻尾的自我毁灭。它不仅在毁灭着我们，更残害着青年一代。不管它看上去有多美妙，也只不过是许多道路中的一条，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没有兴致来争论这么严肃的话题。”

为了缓和气氛，克里斯蒂娜给大家端上来一盘甜点。她丈夫早就跟她说过，这些朋友们现在的地位、立场和观点全都大相径庭了。因此，她不想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吵起来。

马里亚诺·法尔科尼明白其中的奥妙。他打开音响放起了轻松的音乐，试图让人们激动的情绪冷静下来。

“你们看了伍迪·艾伦最新的那部影片了吗？胡安·曼努埃尔接过克里斯蒂娜递过来的甜食，试图改变话题。

“现在我对他那种一成不变的心理探索影片已经有些厌倦了。当然，他的片子还值得一看。”

“我没看。我讨厌这个艾伦，现在他又出了丑闻，就更烦他了。他太丑了。我跟‘法丘’带孩子们看了一场《心灵阴暗面》。这部片子还不错，不过有些情节也挺可笑的，什么雕塑家对一个妓女爱得那么深……而且还引用了那么多的诗……，，



胡安·曼努埃尔赶紧想法打断了他妻子的话。每次看到妻子与比她更有学问的人争论，而且总是露怯时，他的心里就特别别扭。

“恩丽，咱们该告辞了。胡安娜不是要来找咱们带她到圣伊西德罗去吗？”

“是呀，可她现在不是还没来嘛。这孩子，才二十岁就越来越有自己的主意了。”

二十岁，  
谁能再回到  
这金色的年华。  
又有谁能，  
带着四十岁的成熟  
回到那美好的花季。

“如果你们同意，我可以带你们的宝贝女儿去圣伊西德罗。我顺路。我郑重承诺要像绅士一样对待她。不过这个承诺只有二十四小时的有效期。”

“你认识她？”

“那天我在一个现在叫‘迪厅’的地方遇见她了。当时的情形挺有趣。那家‘迪厅’请我去演唱，可那天我嗓子不好，没唱。现在我已经老了，得自己保养了。后来你女儿就上来跟我打招呼，还给我介绍她的朋友们。她还以为我是个老摇滚乐手呐，好像我跟玛杜萨伦同龄似的。她当时的样子挺招人喜欢的。特别漂亮，简直像个模特儿。”

“没错,虽然我是她爸爸,但也不能反驳你的说法。胡安娜的确是个漂亮姑娘,而且讨人喜欢。这一点好像不太随她爹妈。”

“胡安玛,你真讨厌……”

我和胡利安还有塔尔西奥是最先告辞的。

户外的寒风让我们感到了七月的寒意。而且,这个冬天出奇地冷。

我们的老式雪弗莱汽车停在一个街区之外。我们要回弗洛雷斯区,在此之前要先把塔尔西奥送到维多利亚街的家里。

和塔尔西奥聊天总能让人增长不少见识。这个人有超乎常人的智力,而且思想特别敏锐。这一点在普通人中已经很少见了,作为一个教士就更加难能可贵。

我们一路上都在谈论他在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的经历;谈论国内外的贫困现象。他有六个月没有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了,所以对这里的一切变化都感到惊奇。

他还谈到了他的家人和吉尔梅特。我们在欧洲见过她,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八月份的头一个星期他要到圣米盖尔教堂做静修。我们相约在他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一起到吉尔梅特家里吃一顿饭。

## 七 聚会之后

“你这辆车的确不错,可惜暖气升温太慢,比我那辆还差。

我都快冻出尿来了。”

“你不抱怨点儿什么就活不了,是吗 是不是不愿意把你的车借给弗拉迪,让他带着胡安娜去玩儿?”

“不是的,胡安娜已经懂事了,干什么都行。她是弗拉迪的疯狂歌迷,看她刚才那样子,都乐晕了。弗拉迪真的没怎么变,头发还是又密又长。到了咱们这个年纪,他那样子就显得不太正经了。不过这回他还算能控制自己,没像上次聚会那样拼命喝酒,乱开玩笑耍活宝。幸亏今天有罗德里格斯跟他们俩在一起。那孩子虽然有点儿懒,游手好闲,但他爸爸可有钱啦。他本人教养也不错。你没瞅见他盯着胡安妮<sup>①</sup>的那种眼神吗?可是,那丫头真是不像话,作为女人也太各色了……”

“我看胡安娜是个好姑娘。”

“对。我就知道你总是宠着她一个。我也没说她不好,就是有点疯疯癫癫的。说什么要和朋友们一起去马托格罗索<sup>②</sup>……我昨天没好意思问她,那地方不是在非洲吗?”

“什么呀,我说恩丽姬塔,你怎么那么不学无术啊。你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怎么兴趣反倒越来越窄了。除了那些无聊的杂志你什么都不爱看。有的时候你简直让人失望到家了……”

“拉倒吧。你还不满意啦?你也不是什么大知识分子。你看,今天安娜贝拉故意没来,这个阿拉伯娘们儿的架子已经

① 胡安娜的昵称。

② 巴西地名。

端起来了。不过，将来还不知道什么样呢。你没看见特里斯坦跟克里斯蒂娜两人眉来眼去的样子吗？马丽亚跟我说过，有一回在圣特尔莫区的小酒吧里看见他们俩在一起来着。我看这不是瞎说，无风不起浪，而且，马丽亚跟他们俩都挺熟的，不会认错人。”

“别乱嚼舌头。再说，特里斯坦从来就不喜欢克里斯蒂娜那种女人。他更倾向于找没什么文化，带点儿风情味儿的女人。要想玩知识分子的那套把戏，他自己就足矣，何必再找个同样的女人。更何况，我们这个七人帮到什么时候也是好朋友，有自己的一套传递信息的方式。你们外人明白不了。”

“我看也是这样。你和特里斯坦是最有涵养的……”

“你对此有什么特别不满意的吗？”

“没有，一点也没有。可我觉得，只有你和特里斯坦干出了些成绩，剩下的那几个，除了穷鬼就是法尔科尼这样的暴发户。”

“我不清楚你是否知道，基哈诺主教现在是教会里的重要人物；弗拉迪米尔是头号摇滚歌星；胡利安也是个很有名望的医学专家。告诉你也没用。”

“行了，我不想聊这些了。已经到家了，我得上床睡觉了。那些重新修复的老宅说不定也不错，但我是不会放着现在这套基多大街上带暖气，又舒适又方便的公寓不住，到我不喜欢的小区里安家的。另外，那些老房里还留着那么多旧东西，什么装饰、油画，这些人的出身随处留有印记。”

“我跟你正好相反，我特别钟爱这些东西。我很愿意和他们这五个人见面。我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胡利安、弗拉迪和奇

斯皮塔了。看起来他们都不错，挺顺心的。反而是我的感觉不太好，有一种成功之后的孤独感。我老爹现在要是还活着看到我这个样子也不会满意的。恩丽姬塔，你不觉得咱们应该见好就收吗？像这样不停地挣钱，无休止地花钱，像一架机器一样太可怕了，真不知将来会是什么结果。我倒觉得咱们住在以前住的那套不带暖气的四十平米的二楼小单元房的时候反而挺快活的……”

“可是，亲爱的，此一时彼一时。那会儿咱们还在客厅的地板上做爱呢，现在？……”

“没错，咱们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裂痕。好了，换个话题吧。曼努埃利托给你留了一个纸条，看看说些什么。”

“老妈，我今天晚上住在马利亚诺家里，明天再回来。”

“这孩子，总是不着家。我看你以后还是少出门，恩丽，孩子们需要您。”

“你也太精明了，什么事都推给我。他们也需要父亲。不过，你放心吧。但愿胡安娜的事情能有个结果。我认识戈约一家。他们家的人不错，有地位又有钱。他们好像也跟盖布罗伊斯认识。我听梅梅说的。她是那个有名的胡利亚的堂姐……”

“那个玛丽亚·胡利亚不就是那个和涉嫌贩毒的坐着飞机到处跑的大人物有牵连的女人吗？”

“哎，胡安玛，你老是怎么保守。贝尔尼说过，只要一个人品质清白，就应该多宽容他。她一直就这样，挺正经的。问题是她现在的丈夫比她还年轻十岁，又漂亮又有钱，好像还是英国人。你知道吗？是他让她有点儿发了疯似的……”

胡安·曼努埃尔把外套甩掉,几乎是在吼:“对,不计任何代价。只要能成功,不惜任何代价。是吗,我亲爱的夫人?”他发出一阵怪笑。

他妻子呆若木鸡地看着他。她越来越不明白丈夫的心思了。明天得找她的朋友玛丽亚·露西亚说说这事,因为他的这些变化让她有些害怕。

在打开车库的大门之后,我们看见门厅的灯还亮着。

我以为是胡利安的弟弟哈伊梅忘了关灯。他也是大夫,现在住在我们这儿。

可家里空无一人,孩子们也和胡利安的妈妈住去了。

大狗‘和尚’又讨厌地一蹦一跳地跑来迎接我们。

我喜欢我们的这所老房子。有一个院子,铺满黑白相间的砖块,还有胡利安的姑姑种的两棵茉莉,这房子都快有九十年的历史了。

外面很冷,一进大门我们就赶紧钻进了门厅。

“你瞧,孩子们好像看到办公桌上的这些照片了,并且都翻开看过了。多奇怪,这张照片我好像从来没见过过……”

“噢,这是一次期末庆祝会上的照片。颜色都快掉没了。快二十年了。你还能认出上面的人吗?”

我试着辨认照片上那些在操场上围坐成半圆的人们。

“这个像个绅士似的人肯定是胡安·曼努埃尔。他还没变,穿戴总是那么整齐,带着诱人的笑容,露着整齐的牙齿。”

“没错。那会儿他总露着那口又白又整齐的牙,我们都叫他‘高路洁式微笑’。他现在留了小胡子,可还跟那会儿一样

爱漂亮。”

“这个又高又瘦,留短发的是谁?”

“你肯定认不出来,这就是弗拉迪米尔。他的变化太大了。虽然他的头发现在还是红的,可留长了以后让人认不出来了。这个又瘦又丑,戴眼镜的是谁?”

“啊,是爱因斯坦。他现在完全变了,看上去有五十岁,而且改戴隐形眼镜了。”

“你现在和以前一样。这个搂着你肩膀的人是谁?”

“是塞巴斯蒂安。你知道的,他失踪了。我当时不在国内,具体经过也不清楚……听说他曾经在一个贫民窟里工作。现在我和哈伊梅也经常去那个贫民窟。塞巴斯蒂安是个心理学家,米吉卡和马约尔的学生。我出国的时候本想叫上他一起去的,可是他不愿意。他可真是特殊人物。”

“这太让人难以接受了。当年那么多青年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追求现在全都付诸东流了。”

“是的,我们想在塞巴斯蒂安生活、工作过的地方给他立一块碑,可现在这个民主政府居然不同意。他的妹妹也失踪了。我以前爱过她,而且爱得很深。她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你在想什么?”

“虽然我也为安娜难过,可我还是嫉妒她。如果她现在还在的话,我不可能与你相遇。”

“埃米丽亚,每次你和我说这种话的时候都像个热恋中的小女孩……”

“我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可的确还在热恋中,这有什么不

好吗？”

“在当今这个时代，所有乌托邦式的想法都没有好处，热恋也是一种乌托邦。你不觉得陪在一个月薪只有一千比索，在公立医院工作的默默无闻的疯子身边是件蠢事吗？格拉谢拉不就抛弃哈伊梅走了吗？……”

“格拉谢拉是个可怜虫，满脑子胡思乱想。再说，你和哈伊梅也大不一样……”

“哈伊梅人挺好的……”

“是的，可他不应该当大夫，更不应该当四个孩子的父亲，他最好做个神父。”

“得了，我也有三个孩子呢。”

“这不一样。因为我爱你，所以才不一样的。你是怎么从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儿变成今天这副灰胡子、黑头发的法国知识分子样子的？……”

“和那个罗伦佐·基沙德法官一样。他的头发全都白了。几天前见到他差点儿没认出来。我们以前特别好，可现在，他好像走了另外一路。我并不在乎什么，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偏见，可他好像挺在乎这些的。说说别人吧。我这些朋友，你最喜欢哪个？肯定是弗拉迪米尔。”

“其实我看，最有才华、最敏锐的还是塔尔西奥，当然，有的人都不错。但很明显，胡安·曼努埃尔和特里斯坦已经在当今的社会里迷失了。比起我父亲在这里当大使那会儿，布宜诺斯艾利斯已经有了很大变化。”

“是的，不过伪善的东西越来越少而实在的东西越来越多。人们也不再假惺惺的了……”



“这倒是真的。现在是胜者为王的哲学当道,人们都在为钱发疯。无论男人女人都不愿虚度光阴。没人关心老人,也没人做什么温情的善事。好像这一切以前都在西班牙发生过,这是一种残酷无情的文化。”

“电话铃响了吗?”

“哈伊梅,你在哪儿 在干什么呢?”

“我马上给特里斯坦和胡安玛打电话。他们在政府里有门路,胡安玛的叔叔是个法官。我马上去。这群警察越来越混蛋了。没事,别担心。埃米丽亚,哈伊梅现在被抓到警察局了,他想阻止警察用大棒痛打一个小孩儿。我得去把他弄出来,哪怕是动刀枪也得救他出来……”

弗拉迪把胡安娜和她的男朋友送到了迪斯科舞厅。一种说不清楚的愿望把他也拉了进去。他跟胡安娜跳了几支“慢拍”的舞,但是由于两人之间没法交谈,只好告辞出来。

回到住所以后,他的脑子里还是不能把胡安娜,这个大眼睛,步态优雅轻盈得像小猫一样,跟他女儿一般大的二十岁姑娘忘掉。他总是琢磨她跟那个与她在一起的小白脸跳舞时会是什么样子。那小子除了长得漂亮以外一无是处,说话语无伦次,满脑子浆糊。他爷爷和爸爸只不过是卖冰棍起家的暴发户。他还总是傻笑,无聊地傻笑。所有这些,都让他一想起就不舒服。

他觉得头有些疼。那个小姑娘真是让他惦念。他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过这样的感觉了。难道说他爱上她了?可他们俩才见过两面而已。

他走到酒柜前，给自己倒上一杯威士忌。今天发生了很多事。他很累，但又睡不着。是不是像他母亲说的，他脑筋出了什么问题？他可能又该到特拉帕去住几天了。在那里，有特里斯坦当修女的姐姐康塞洛的帮助，他可能会好受一些。

他关上灯，尽力让自己睡着。

渐渐地，他进入了梦乡……他在和一个又高又漂亮的年轻女人说话。她离得那么近，几乎可以触到她，可他不敢这么做。她用一种他听不懂的语言和他说着什么……那个年轻女人在一条船上，戴着一顶洁白的帽子。他认出了这是在日内瓦的莱蒙湖。她和一个面目长得和他父亲一样的犹太教士在一起。他睁开眼，以为刚才只是服用大麻之后产生的幻觉。可他已经有三年没碰大麻了。他感到害怕，怕这一切会重新开始……

他开着自己的汽车来到了吉尔梅特的家。这幢一尘不染、门窗镶着黑色栏杆的白房子今天显得比以往更温馨宜人。

如果现在她在家里等他该有多好啊。可是他自己也知道不会这样。

他有钥匙。开门进去之后，只有小猫咪跑过来欢迎他。书桌上的灯亮着，录音电话里有留言：

“塔尔西奥神父，明天您要到圣米盖尔教堂去见大主教，别忘了。我八点来接您。”

“塔尔，咱们电话里说的事挺让我担心的。明天我想在你姐姐家见你一面，要么，我请你在圣伊西德罗吃午饭。给我回电话，伊凡和罗西奥都想见你。”

“神父,明天神学院有个会,请务必参加。”

他边听边想,怎么每次来布宜诺斯艾利斯都这么匆匆忙忙的,几乎没有一点儿空余时间。但他还是想见吉尔梅特和她的孩子,还有兄弟姐妹们和他侄子佩德罗。

还有一个电话留言:

“神父先生,我是您在火车上的旅伴。我的儿子已经死了,我想让您来为他祷告,也安慰一下他的妻子儿女。我们是犹太人,可他不想采用希伯来仪式。我们的地址是阿尔马格罗区,波埃多街三四三号。”

他走进厨房,从冰箱里拿出果汁,倒在杯子里一饮而尽。然后到卫生间里洗了把脸。

冲湿了头发。擦干之后,拣了一件深色厚外套,准备出门。

这时,门铃突然响了,把他吓了一跳。来的是吉尔梅特和他侄子佩德罗·列斯科。

他让他们陪他一起去阿尔马格罗区的波多夫斯基家。

## 八 爱情的章节

胡安娜正在专心致志地读着一篇刚刚发表的题为《弗拉迪·泽投入摇滚的热情》的访谈录。

十五岁时,让她崇拜的哈维尔舅舅送给她一张‘王子’的唱片。从那时起她就迷上了摇滚乐。那时候她对弗拉迪·泽知之甚少。但是,在听过他的几次演唱会又买过他的几张专

辑以后，她觉得他简直是一位天才，并且开始崇拜他了。

有一天，她爸爸跟她说，他跟弗拉迪两人是中学同学，而且是好朋友，后来因为各自所选择的生活道路不同，才有些疏远了。她还想再问一些其他的情况，但是被她妈妈止住了。

现在她已经是二十岁的学古典音乐的学生了。弗拉迪成了教她们现代音乐的老师。她一直在找机会跟他接近，可是他的身边总是围满了人，使她无法与之靠近。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有一次在她跨进她每个星期五都要去的‘天堂迪斯科舞厅’的时候，一眼看见那个人群簇拥中的衣着整齐但神态癫狂的成年男子正是那个出现在大街小巷的宣传画上的，让她牵挂的弗拉迪米尔，她便惴惴不安但又神色镇定地走到他的跟前去问候。

胡安娜就是这样一个朴实自然又直截了当的女孩子。

她走上前去，自我介绍说她是胡安·曼努埃尔·胡斯托·曼西亚的女儿，他的忠实歌迷。弗拉迪则礼貌地向她致意。第一次交往仅此而已。

她现在正在阅读的这篇访谈录上还有一张弗拉迪米尔在他圣伊西德罗的顶层公寓里的照片。照片上的他足登便鞋，身穿紫色衬衫、黑色外套，坐在一张深色玻璃面的桌子上。

在这个国家里，人们每天都把自由挂在嘴边，但是，一旦出现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他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因为他们对他怕得要命……

“这句话虽然不是我自己独创出来的，但我把它当成自己

的心里话。因为这是一句实话……”

访谈录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

“弗拉迪,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你一定是在有意为自己的生活蒙上一层神秘色彩。你是阿根廷人吗?你的名字是杜撰出来的化名吗?你会不会介意我说你是犹太人的后裔?”

“我很可能是犹太人,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能肯定,因为我自小受的是天主教的教育。但是,尽管他们从来就不告诉我实情,我还是可以肯定,我是俄国人的后裔。我刚刚去世不久的母亲是瑞士人 我父亲现在七十岁了,他很多年前就到以色列去了。在我十岁的某一天,他抛弃了我们母子俩去寻他的根了,从此就再也没回来过。我后来在欧洲见过他。”

“你有什么偶像或崇拜什么人吗?你似乎总是特别以自我为中心的。”

“非常令人惋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偶像和崇拜越来越失去地位了。但我要承认,许多作家的作品都对我有影响。比如尼采,现在我觉得他的破坏力很强,乔伊斯、兰波,在阿根廷作家里阿尔特和博尔赫斯。小时候我也对聂鲁达的一些诗歌如醉如痴。当然,科塔萨尔和惠特曼也让我着了一段迷。

“在音乐人里,有查里·加西亚、尼托、斯皮内塔和莫里松……第一次听他们的音乐,我就喜欢上了。然而,有几个人,尤其是莫里松和卢卡·普罗丹的命运让我恐惧。他们都英年早逝,那么快就被毁灭了。我和卢卡很熟。他是个让人着迷的小伙子,可是被毁了,这太可怕了。

“摇滚乐是一种很特殊的东西。虽然它有一种难以驾驭的暴力倾向，但是它能深入人们的心灵。我一直在不断地思考，但实际上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摇滚乐的真谛……”

“你好像不承认所谓系统教育的价值，那么，你这么高的音乐素养从何而来？”

“当然不会是与生俱来的。尽管我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我说过上千次了，我受到过许多人的影响。另外，在家里，我们总是听瓦格纳、萨蒂、彼德尔松，听披头士和皮佐拉的音乐。我母亲是音乐家，我父亲是教授兼记者。我祖父开过一家报社，他涉猎极广。另外，我也很崇尚那些民族音乐家。我现在也非常喜欢听梅塞德斯·索萨和苏珊娜·里纳尔蒂的歌。我和他们是好朋友，而且他们的歌也能表达我的感情。”

“以前我从来也没想到你会喜欢探戈。好像里纳尔蒂在巴黎时也对您有很高的评价。就您的形象而言，为什么您唱的是硬摇滚，而外表却没有那么‘冷峻’除了头发长之外，您总是穿戴整齐。另外您在唱歌时也穿着茄克衫，打着粉红色领带，而且很讲究礼仪。您和其他的摇滚乐手不同，有时我甚至觉得你就像个英国或俄国的贵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的穿着打扮的确有些独特，这是在刻意模仿我父亲的样子。我是在成人之后才认识父亲的。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很讲究礼仪。他讨厌杂乱无章、凌乱不整的样子，我也不喜欢……”

这时——记者写道——我们觉得泽一米九的大个子开始变小。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副墨镜戴上，我们感到现

在这位传奇式的摇滚歌星以这种方式在我们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这样他就不让他的那双深紫色的明眸再吸引我们了。这双眼睛可以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他的内心活动,热情、愤怒,或者像现在所看到的,厌倦。他点燃一支“巴黎人”牌的法国黑烟丝香烟,开始以一种看上去很紧张的姿势抽烟。

泽已经想结束这次采访了。但是如果我们就这样与他道别会感到遗憾。因为还有无数需要问的问题没有诉诸笔端呢。

能通过朋友介绍和他约好进行这次访谈,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件能扬名的大事了。大家都知道他很讨厌媒体,而我却把刚刚开始记者职业生涯当作赌注全押上了,我的主编又是个有名的坏脾气,我特别怕他。

然而,弗拉迪·泽毫无保留,非常热情地与我合作。他谈锋甚健而且和蔼可亲,甚至对我完全敞开了心扉。

“我已经察觉到你想结束这次访谈了。”我鼓起勇气说,“可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再问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从昨天起,都盛传你在恋爱,是真的吗 弗拉迪?”

“是的,”他爽朗地笑了,毫不迟疑地答道,“我恰恰在十五天之前遇到了一个梦中情人。我现在可能和克拉普顿一样。尽管我是个善良的大恐龙,她可能还是会怕我的,因为她太年轻了。其实我很温柔,从来不想,也不会做对任何人不利的事。”

“你没和我们开玩笑吧？”

“朋友,怎么我说实话时没人相信我。为什么?一位三十五岁的歌星就不能再爱上什么人了。好吧,米盖尔!”他回头叫他的秘书“把这位小姐送到门口,采访结束了。我还有一封信要写完。谢谢您,以后再见吧。认识您我很荣幸,总有一天您会成为大记者的。”

胡安娜·胡斯托·曼西亚仔细地品味着这段采访。她与弗拉迪恰好是十五天前相见的。当时他曾半开玩笑地说过要给她打电话,可从来没打过。后来他又一次送她和戈约去舞厅,他也跟了进去,和她跳了舞。他难道这么放肆,当众拿她开心。要么,他所说的姑娘不是她,而是别人?

她忍不住想知道这里的真情,决定给他打个电话约他今晚见面,迫不及待地想把情况弄清楚。

接电话的又是录音机,真是要命,现在这个城市录音电话泛滥成灾了。

“这是 743—8899,如果没吓着你,就请留言。”

“你在哪里,温柔的大恐龙,我找不到你。”胡安娜鼓足勇气说道。

三个小时以后有了回音,有人托门房送来了礼物,一只淡紫色的玩具恐龙,还有一张弗拉迪写的卡片,请她一起吃晚饭,约好九点钟来接她。

她不明白他是如何听出她的声音,又是如何搞到她的地址的。这一切使她感到很新奇。她从来也没和比自己大二十岁的男人约会过。但是,她还是迫不及待地翻箱倒柜挑今晚



要穿的衣服去了。

她先给女朋友玛赛拉打了一个电话，取消了今天与她共进晚餐的约会，然后她又给另一个女朋友胡利亚打电话，告诉她正在发生的一切。

她打开的一个乱糟糟地记载着她平生所有大事的本子，翻到七月二十七日这一页，写上“与漂亮的大恐龙相遇。”旁边还画上一只笑模笑样的恐龙，随后注道：“他送了我一只紫色小恐龙，以后会怎么样呢？”

“胡安娜，在法尔科尼家聚会看到的那个和你在一起的孩子有多大年纪？”

“他不小了，二十三岁，可还像个孩子似的。他是我同学，也是你的学生。你也看到了，他长得不错，是吗？”

“我觉得他傻乎乎的。”

“行了，你用不着这样。他是个好男孩，比别的孩子强多了。最可笑的是我妈妈，她怕音乐学院里那些蓬头垢面的男生，却偏偏喜欢这一个。因为他门第高贵，头发修理得整齐，还会打马球。”

“没错，可他除了聊马和他老爸的庄园之外，甚么也不懂。”

“你和我老爸真像，我自从认识你就和我妈说爸爸有一个天才朋友，和别人都不一样，脑子里有好些新鲜的想法。不过，我敢肯定你跟你女儿在一起时不是这样……”

“萨曼塔还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和她在一起时会是什么样，可是……”

“我看过《危机》杂志上发表的访谈录以后对你的了解才

稍微多一些，就是这篇文章促使我打电话的。”

“如果我要是不理你，你不怕难为情吗？”

“我算了一下，我们恰好是十五天前认识的……”

“对，可这一切看上去都挺可笑的。问题是……”

“我知道问题是什么……或者说是你有什么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你肯定猜不着。”

“是不是想我想得发疯？”

“胡安娜，我们那时都是男人向女人求爱。”

“胡安娜，我们那时候……弗拉迪，那是你们那时候。现在咱们是在雷克莱塔的这家高档餐馆里一起吃饭呢。再说，你也别太自命不凡了，我刚才才是说你在爱我，并没有说我爱你呀？”

“胡安娜……”

“有话请讲，先生……”

“胡安娜，你就是太阳，我的太阳，难以抗拒的太阳。你到底怎么想的？你把我当回事吗？你是否觉得我太老了，或者已经没有朝气了？”

“弗拉迪，我把你当回事，特别当回事，那又怎么样？”

“那咱们告诉你爸爸，咱们马上就结婚。我已经是成熟的男人了，知道如何分辨我的感情。一见到你，我就知道你是我遇见的最好的女人了。”

“你女儿的妈妈呢？”

“她只不过是女儿的妈妈而已。我也曾经爱过她，尽管她有她自己的生活，并且是个好女人，但我发誓，这次跟那次完全不一样。另外，我们一直也没有结过婚。”

“像你这样超脱的人还需要结婚之类的繁文缛节,岂不是不可思议了吗?你既然和她一起生活了十年又有了一个女儿,你当然是已婚,实实在在的过来人。”

“要真是那样的话,恩丽姬塔知道了,非气死不可。她肯定不会答应你和一个所谓‘离异’的男人结婚。”

“弗拉迪,我敬重我的父母。不过,尽管我才二十岁,我已经完全能为自己做主了。”

自从我见到你以后,就有一种对你说不出的特殊感情。但是,我觉得咱们得慢慢来。”

“胡安娜,我可能赞成这样的建议,但我也不能再装成个孩子似的,虽然你可能喜欢这样……我不知道,我现在脑子乱得很,咱们一个月之前才见到,刚刚认识……”

“今天晚上睡觉以前,你打开录音电话,在那里会有我的答复。”

“你不敢面对面地说吗?那就让我亲你一下吧,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吻过太阳了,亲爱的。”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sup>①</sup>中开篇写道:“幸福的家庭都大致相同。”我们也可以说:“相爱的情侣都大致相同。”胡安娜和弗拉迪米尔也和普天下的有情人一样,尽管他们的年龄相差悬殊,生活经历迥异,但是,他们之间用的是世界通用语汇来向对方倾诉着衷情与爱恋。

弗拉迪恋恋不舍地把胡安娜送到她的家门,然后自己回到家中,打开录音电话。

<sup>①</sup>原文如此,应为作者笔误。

“我是西西里亚,你怎么回事,我的好人儿,上星期五你为什么没去吃午餐?”

“弗拉迪,醒醒,明天你要到贝尔格拉诺街二号去排练。”盼望的消息一个也不来。

“弗拉迪米尔,昨天我做梦以为是星期二,与你在一起……”

“今天不就是星期二吗?弗拉迪米尔惶惑地想着;我已经让她走了。”

他给胡安娜打了个电话,但回答他的又是冷冰冰的录音:

“这是 801—007……如果愿意请留言。”

睁开你小猫一样的眼睛,为我打开阳台的窗门,我急切地想知道你在闺中的情形。从日落开始,我会整夜都让你听到我的歌声。

“胡安娜,你有一双无论颜色还是形状都像猫一样的眼睛。和你约会的那些毛孩子肯定和你说过许多次了吧?”

“现在的小伙子已经不习惯说这么动听的话,也不习惯用情专一了。他们只是想索取,观望,在男女关系上总是那么歇斯底里。”

“你让我感动,你那么像我的女儿,但你仿佛更聪慧。我什么也不明白,我也曾生活在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女儿的到来对我有所改变,不过并不太多。”

酒吧里的人们渐渐散去,  
只有我在自语,

小心啊，伙计，  
你已经陷入了爱情。  
你的手指在我的背上  
画出了一颗心。

“小心，弗拉迪，你现在已陷入了爱情……红灯警报。”当弗拉迪爱抚着她并伴着萨碧娜的歌声唱起来时，胡安娜温柔地说道。

“你真有趣，我的小太阳。可惜咱们现在不是在海边小村，而是在一条脏兮兮的河边。我不能，也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一直得不到你一个正式的许诺。我发誓一定要带你到我小时候的那座小村庄去，那是个不同一般的村子，那里的一切都与众不同。”

萨碧娜的歌声停了，胡安娜用她的纤手在弗拉迪米尔的衬衫上划出了一颗想象中的心。他也报之以爱抚，两个人相互爱抚并拥吻起来。

他们之间互相倾诉着那些相爱的人们说的甜言蜜语。这些浓情蜜意如果让外人说出来或写在纸上，会让人感到有些做作可笑。

不知道怎么回事，萨碧娜的歌声又响起来：

在一个海滨的小村  
我想与你共枕，  
你也不想独自安寝  
我们相拥相伴度过了

一刻刻美妙的时光。

入夜时分，新月弯弯。

尽管弗拉迪米尔想尽办法让这爱情的进展得更加优雅，更精神化、理性化一点儿，但他的心，他的灵魂，或他的不知什么东西，让他枉费了心机。他现在已经和胡安娜在他圣伊西德曼的公寓里共枕同眠了。

她醒来时发现弗拉迪米尔早就起床，在阳台上备好了早餐。

胡安娜——弗拉迪米尔的太阳，身上穿着他的真丝睡衣。这件睡衣对她来说有些太大，但还是清晰地勾勒出她富有曲线的身材，看上去那么清纯、美丽。

电话铃响了，是萨曼塔打来的，她要来看他……

恋爱的浪漫与温馨，往往会因日常琐事而大打折扣。然而，后来他们对我说，事实却并非如此，胡安娜以主妇那样的从容，走进卫生间洗漱更衣，然后和她的爱人共进早餐。

我们相拥相伴，  
度过一刻刻美妙的时光。  
过了午夜，过了凌晨，  
我们见到了明净的月亮。

他们心心相印，要不惜任何代价捍卫这看似寻常，却是他们生命中最精彩，最难以割舍的爱情。

## 九 去纽约之前

温度计上显示出七摄氏度。对于九月的天气来说，今天有些冷。

沐浴之后，胡安·曼努埃尔套上了一件长袖圆领衫，然后再穿上一件干净平整的天蓝色衬衫，打上阿玛尼牌领带，外面套一件深灰色西装。这身打扮又暖和，又整齐，不用穿大衣。能显示出他经常锻炼的健美身材。

尽管被芭芭拉从午睡中叫醒之后，一直感到头痛，但他还是觉得最近是他的双子星座的吉利日子。他和盖布罗瓦的合作事业蒸蒸日上，和芭芭拉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他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生机勃勃。

他正在给恩丽姬塔打电话，想含糊其辞地蒙骗她，说他正在巴勒莫区参加一个已经报了名的空手道训练班。同时打开一个小窗想换换空气。接电话的是曼努埃利托，说他妈妈已经和玛丽亚·保拉出去了。

儿子的回答更让他心里不痛快，不过他准备不再想这些事了。他走进卫生间，在洗脸池里放满热水，洗了脸，又把头发润湿，擦干后打上些英国发蜡，在脸上抹了些剃须膏，仔细地剃着胡须。

广播里说今天交通状况不太好，所以他打电话叫女秘书为他叫一辆出租车。这样路上走起来更方便、快捷。

阿尔维亚大酒店离他在基多大街的公寓不远。可现在他

是在地处老巴勒莫区阿罗兹街的另外一所公寓里。他讨厌在旅馆里开房间幽会，一年前买下这所公寓来专门为和芭芭拉用。现在他还在这里与格拉塞幽会。反正都不是什么正当关系，所以根本就没什么忠诚可言。

他跑着从二楼下来，刚出大门就看见一辆最新款式的漆成灰金属色的汽车在那里等他。

“您好，博士。您的秘书让我六点钟到这儿来接您。”

“对，我七点钟有个会见，必须准时，所以不想在路上耽搁时间。”

“放心，咱们不走解放者大道……再说，开着‘沃尔沃’，谁也挡不住咱们。”

一坐进车厢，他就打开一个皮面记事本，上面写道：

“十二日，星期四，阿尔维亚大酒店前厅。（高个子，留着小胡子的先生，身穿讲究的粗花呢西装，典型的英国人。）

“注意事项 此人西语说得不好，但他表达很明确。他是嘉斯顿妹妹的‘朋友’，与欧洲、美国的大人物都有密切关系。烟瘾大，但讨厌别人在他面前抽烟，更讨厌别人批评他的这个嗜好。他讨厌犹太人，对阿根廷的上流社会有好感。

“形象要求 衣着整洁，最好喷些高档香水，举止要稳重；

“少说话 要显露出机智 她已经听说胡安·曼努埃尔·胡斯托·曼西亚出身阿根廷上等家庭，少说话，多听。”

尽管已经三十八岁了，又有十年的职业生涯，胡安·曼努埃尔对这次赴约还是有些惴惴不安。盖布罗瓦和芭芭拉也认识这位奥吉尔维，他们给他的忠告让他产生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路上很顺利，没耽搁什么时间。他十八点四十五分就到酒店，先到卫生间洗了手，然后回到了大厅。他心里默念着戒律，不能抽烟，更不能说粗话。他自问道，这位约翰·奥吉尔维要和他谈什么事？他能告诉他自己没去过美国，还怕坐飞机吗？

这时从他背后传来低沉的嗓音吓了他一跳：

“年轻的曼西亚，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啊。”

“奥吉尔维先生，认识您非常荣幸，嘉斯顿常向我提起您。”

“嘉斯顿是个好小伙子，可就是有些急性子。做生意得慢慢来。咱们去酒吧坐坐。”

这位老人拽着胡斯托·曼西亚的胳膊就走。人们对这位商人的描述一点儿都没错，他就像一位英国爵士，甚至连装束都如此：缀着珍珠纽扣的深灰色马甲，典型的英式本色牛皮靴。

入座之后，侍者跑到奥吉尔维跟前招呼。

“给这位先生来点儿威士忌尝尝，我和平常一样。”

“想要些什么酒菜？”

“这儿的‘卡呼’栗子不错，味道很好。”

这个人目中无人颐指气使的劲头儿让胡安·曼努埃尔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清他的脸。但这个英国人的年龄肯定不小了，至少有六十岁。他时不时摘下那副时髦的眼镜擦一擦的动作，使他看上去像哈佛大学的教授。

侍者端来酒水。他们拿起各自的酒杯，不慌不忙地啜饮起来。奥吉尔维开始仔细端详着面前的人。

“这么说,你对国际关系和外贸感兴趣。”

“是的,先生。我的公司主要从事本国证券交易,现在新成立了一个外贸部门。”

“你在这方面有专长吗?”

“是的,我在贝尔格拉诺大学学过外贸研究班的课程。”

奥吉尔维眯起的双眼,露出一丝狡黠,胡斯托·曼西亚有所觉察,问道:“你对哪种产品的贸易有专门的研究?”

“实际上,研究班的课程是针对所有品种的产品设立的。主要是学如何搞到产品,然后进行进出口操作。”

“很好,很好,我看得出来,你准备得很充分,我喜欢你这个人。你结婚了吗?”

这时一个身高一米八,双腿修长,梳着波浪式黑发,长着一双蓝色大眼睛的漂亮女人走过来打断他们,吻了那老人一下。

“这就是那个好小伙子吗?①对不起,我的西语说得不好,差极了。”

“这位是曼西亚,这位是梅,我密友。她来陪我们一起吃饭,还要谈一些这次旅行的具体细节。对了,你还没回答我你是不是结婚了?”

“是的,先生……”

“你可以叫我比尔。‘先生’是仆人们叫的,你不用这么叫。我亲爱的,你高兴吗?你喜欢布宜诺斯艾利斯吗?②”

“是的,爹爹,城市美丽,小伙子也漂亮。”

① ② 原文均为英文。

尽管胡安·曼努埃尔懂一些英语，他还是给弄得晕头转向。他不知道他们是在正经说话，还是拿他开心。

“你还没有告诉我你的婚姻状况呢。”

“是的，比尔，我结婚了，有五个孩子。”

“你看看，就是这样你也还是想去旅行，是吗？你爸爸是大法官，你还有个叔叔是刑事大法官，对吗？”

“对，我也是律师出身，但现在从事证券交易。我更喜欢这个职业。”

在这两男一女一起吃饭的一个半小时里，他们并没有谈生意上的事。只是到了喝咖啡的时候，奥吉尔维才用一种几乎道别的口吻说道：

“你要独自外出旅行一个星期。到那边之后，机场有人接你。你会和我们的人接上头。那边我已经疏通好了，你要小心行事注意保持谨慎。我们做这样的国际贸易已经有十来年了。这次你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先把这件事办成，其他的事以后再谈。

“你回来的时候，我也正好从埃及回来，那时咱们再见，同意吗？小伙子。①”

“同意②，和你见面很高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您的女朋友非常漂亮。”

“漂亮还得可靠，这才是最关键的，对吗③，梅？”

这两人把胡斯托·曼西亚送到了大门口。司机已经在那里等他了，他们向他挥手道别。

① ② ③ 原文均为英文。

上车之后,胡安·曼努埃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看了看表,九点钟。他已经在阿尔维亚酒店呆了两个小时。

他让司机把他送到光复大街的麦当娜酒吧。他闭上眼睛,不知怎么想起了多年以前的一个七月二十日。那一天是他十六岁生日,费德里克舅舅带他去了弗洛雷斯塔街一个有好多“女朋友”的地方。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描着红嘴唇、染着让他讨厌的头发的姑娘,叫琦琦塔。是她诱发了他青春的欲望……

他吸了一口气,睁开了双眼,感到头发胀。他又深吸了一口气,回家之前需要好好喝点儿什么,再和芭芭拉呆上一阵子。

## 十“法丘”在纽约

汤姆·多纳特利把胡斯托·曼西亚带到了曼哈顿一家相当高档的餐厅里。进门之后,引座员立刻认出了多纳特利,赶紧礼貌地迎上去。一边小心打着招呼,一边把这两位年轻人让到一张僻静的离门很远的桌子边。

落座之后,侍者接过这两位的大衣。他们便开始仔细研究起桌上摆着的菜谱来了。胡安·曼努埃尔早就听说过这个餐馆肉做得好,因此要了一份烤牛排加炸土豆条。多纳特利则更为老练地为自己点了这里的拿手菜。

侍者走开之后,他们开始谈论起天气、寒流、美国的经济衰退、人们都在期待着的经济复苏,诸如此类,但很少关于阿

根廷的话题。胡安·曼努埃尔也有意避免面前这个人提出这方面的问题。

胡安·曼努埃尔还没有摸清这个人的底细。他平时是喜欢揣测别人的。这个人是出身高贵还是贫寒？是暴发户，还是个精明的骗子，要么，是个老实本分的人？他一脸雀斑，脸色苍白，举止做作。手上涂着的指甲油令他作呕，但他尽量掩饰着。另外，此人的穿着打扮也不协调，虽然上身是制作精良的意大利西装，可却是天蓝色的，里边衬着一件深蓝衬衣，打着扎眼的领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家伙手里掌握着大把的钱，不知是他自己的还是替别人保管的。刚才付出租车费时，胡安·曼努埃尔看见他钱夹里有好几张信用卡，外加一大把现钞。

他说起话来也挺怪，英文和西班牙文说得都很流利，但总带着中美地区口音，而且西班牙文里老是掺杂着不少英文单词。让胡斯托·曼西亚听着很别扭。

这时，他好像要打断眼前这位阿根廷人思路似的发问：

“你看了这两天的《纽约时报》了吗？”

“没有，说实话，我看英文还挺费劲呢。”

“那太遗憾了，我先得告诉你，要想在这个世界混出名堂，首先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英文是必不可少的。你要是看了这两天的报，我们就可以聊聊戈蒂和他们家族的故事了。还有保罗·卡斯蒂亚诺的死。他就是在这家餐厅门口让人打死的。现在整个曼哈顿都在谈论这件事。”

“谁是卡斯蒂亚诺？”

“我先得跟你说清楚好些事。戈蒂是这座城里一个大家

族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现在被一个‘耗子<sup>①</sup>’供出来了。你明白吗？小伙子<sup>②</sup>。‘耗子’，一只恶心的耗子，用你们的话应该怎么说？’

“好像是一个‘雷子’，不对，是告密的……”

“正确，被一个告密的给告发了。卡斯蒂亚诺就是被戈蒂下令干掉的。戈蒂原来是他师傅，也是朋友，可卡斯蒂亚诺想单挑，想盖过戈蒂，这是不允许的。家族势力不能容忍任何人另起炉灶。哈哈……他真疯了<sup>③</sup>，竟然想单挑。’多纳特利用手指着太阳穴说道。

“那为什么有人把这事供出来呢？”

“在这个国家只要和‘雷子’们合作，总会捞到便宜。有时甚至可以免刑。所以就有个倒霉蛋把戈蒂给供出来了。他只供出了卡斯蒂亚诺的一些事情，根本没想到能引出后来这么一大堆麻烦。”

胡安·曼努埃尔的问题听起来有些天真无知。尽管多纳特利耐心地解释，但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要谈这些，多纳特利跟他说这件事的用意是什么。

然而这个中美洲人好像没有看出眼前这位阿根廷人的心思，还在喋喋不休。

“卡斯蒂亚诺正从这间牛排餐馆出来，就挨了两枪，唏嘘，’他连说带比划“完了，一命呜呼<sup>④</sup>，彻底完蛋了。’又是一阵让人难受的怪笑，接着他又说：‘我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我正和一个朋友在这张桌子边上坐着。我那会儿已经为穆尼

① ② ③ ④ 原文均为英文

尔·克勒做事了。这事出在八五年。我有一个同乡叫贝鲁托，他正巧和卡斯蒂亚诺混在一起，也被打死了。总之这两个小子干了件愚蠢的事，想自己单干，这太危险了。你信不信，小伙子？”

尽管这段故事挺吸引人，但胡安·曼努埃尔听了还是有些不舒服。

“你说的是什么家族？那些人是亲戚吗？”

“不，小伙子。是黑手党。这个家族以前特红火，他们有自己的开山鼻祖，要想入伙还得经过勇气考验，有一整套宗教般的规矩。他们主要是意大利后裔，在老家都有根基，有渊源。现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开始接纳美国佬了……哈哈，他们都是种族主义者，到现在也不肯接受黑人入伙。我们这伙儿人里没有黑鬼，只有一个布莱克<sup>①</sup>先生。这挺有意思，妙极了<sup>②</sup>，是吗？当然，有拉美人 and 犹太人。要不咱们也进不来了，对吗？”

“我可不属于哪一伙，你干吗要对我说这些事？对那些本地人来说，这些事可能有意思，可我与这些不搭界……”

“OK，小伙子，我并不想吓唬你，可你得明白你现在干的是什麼，另外，阿根廷也有黑手党，你连这都不知道，亲爱的？”

“可是，我昨天见到的那位博士也和你说的这伙人有关系吗？”

①英文“黑”的意思。

②此处原文为英文。

“哎,可怜的布莱克,说来话长了。女人真是祸水,不停地要钱花……要钱,总有一天会让你倾家荡产……他就找了这么一个相好的。伙计,找了一个特年轻的。一开始当然什么都 OK,我爱你,你爱我,可到后来,就完了,惨了,这位大心理学家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了。”

“多纳特利,你和我说的都是真话吗?要知道,我可是个律师,现在做生意,做融资。为此,我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盖布罗瓦合伙,也就是和穆尼尔合伙了。我刚认识奥吉尔维不久,不想惹上太大的麻烦。”

“OK,博士,别怕,这里边没坏人。你也是个本分人,一个好小伙儿。所有这些人都是好小伙子。你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个完美的小伙子。别怕得要死,孩子,我们做的都是好买卖。我这个人有些疯疯傻傻的,好吹牛,可只不过是一个打工仔而已。你就不一样了,你形象好,有地位,出身名门望族,还和大人物有交往。总有一天你会成大气候。毫无疑问,你会发大财,你会成为名人,对吗?现在这个地球都是靠那些绿色的票子才转动的。昨天我看见你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在一起,是你的女朋友?”

胡斯托·曼西亚听到这话很惊诧,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地说:

“你是说芭芭拉吗?她只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朋友的雇员。我们从小就认识。”

“你们阿根廷人可真是热情,和女人那么亲密。这没什么不好,而且她也特别温柔可爱。”

“你监视我们来着?”胡安·曼努埃尔的语气已经有点儿失



控了。

“监视？怎么会呢！我难道就不能上迪厅去轻松一下了吗？你和那些南美佬有什么过节儿吗？小伙子，这纯属巧合。我也是个年轻人，对不对？我是个小伙子。<sup>①</sup>”

胡斯托·曼西亚一语不发，自从这时起，他已经觉得盘中的食物变得难以下咽了。

除了葡萄酒之外，他什么也咽不下去。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又害怕，又觉得肮脏。他想赶快完事，好回到旅馆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公室打电话，然后再打个电话找他的朋友贝尔特朗。因为看起来这次施行中所发生的事，有些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

临别时，他骗多纳特利说第二天就要走了。其实，他还要在这座以前曾让他向往，现在却变得有些让他害怕的城里再呆上两天。

贝尔特朗和胡斯托·曼西亚在三马路和五十七街岔口见了面。天有些冷，对九月来说，太冷了。

在贝尔特朗的眼里，胡安·曼努埃尔和以前比没什么变化。身材健美，头发光亮，一身典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的打扮。

然而，胡安·曼努埃尔所看到的贝尔特朗却大出其料，尤其是他那身不太考究的穿着打扮。

以前，贝尔特朗最让胡安·曼努埃尔佩服的就是他的机智

<sup>①</sup> 此处原文为英文。

和善于处理各种麻烦的本领。可这次，他见到的贝尔特朗却与以往完全不同。

他早就皈依佛门，正准备长途跋涉去印度朝圣。

胡安·曼努埃尔决定不再向他说出这里发生的任何事。他又一次失策了。

## 十一 在 机 场

胡安娜到得正是时候。当她迈进机场大厅时，广播里刚好在通知，从纽约来的班机正在降落。她赶紧跑到卫生间去整理好路上被风吹乱的发型。

她是偷着把妈妈的车开出来接弗拉迪米尔的。除了弟弟曼努埃利托之外，家里再没有别人知道她和他父亲那位危险的朋友之间的关系了。

一天以前，她与弗拉迪通过电话，说好今天要和一个女友一道来接他的。他在电话里告诉她说，为了不让那些歌迷认出来，他要好好乔装打扮一下。他甚至对经纪人盖尔特也撒了谎，说他得再晚一天才回来，因为他一想到要被一大群记者包围就受不了。他只想见到胡安娜，不受打扰地拥抱她，和她亲昵。

伟大的弗拉迪·泽在曼哈顿的演唱会出了问题。她已经听他说过，后来又从报上看到了消息。他不得不一度中止演唱，离开舞台。

“怎么会这样？”胡安娜焦虑地想着；是不是压力太大，不

会有很大问题吧。’就在这时,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出现在她面前的一位头发几乎被剃光的举止端庄的绅士竟然是弗拉迪。

“弗拉迪！我都认不出你来了，你看上去好像老了一百岁。干吗把头发剪了，天呐，我都想去死了。”

“可是，亲爱的，不就是头发吗，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已经腻烦留长发了，所以全剪掉了。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脑袋里有个……这也是我不同凡俗的一个方面。’弗拉迪笑道“能和你拥抱真是太美了。这次巡回演出太可怕了，我感觉不好，声音也发不出来。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现在不在最佳状态。生活不规律的后果全暴露出来了，不过，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转的。你好吗？这几天表现好吗？又跟那个愚蠢的橄榄球手约会了吗？’他一边搂着、抱着、亲吻着胡安娜，一边问了这一大串问题，引得好奇的路人不住地打量这对奇怪的情侣。

“你看，我是一个人来接你的。”

“我看到了，你妈妈知道吗？”

“她知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弗拉迪，你比一般人想象的硬派摇滚乐手要规矩一些。你想我了吗？我这二十天可是度日如年啊。”

“胡安娜，亲爱的，你太让人着魔了。我太想你了，想你的肌肤，你的眼睛，还有你的笑容。可是你知道我最想念你的什么吗？’你别笑话我，我最想你的声音，弗拉迪，弗拉迪……’他模仿着爱人低沉而稚气的嗓音。

“你没有行李？”

“我为此旅行时只带一个包，其他的物品都随身携带。我

讨厌等行李。”

“你知道吗？我以前从来也没像现在这样，没心思打扮，也不能安心干任何事。玛卡莱娜说我中了魔法。我胸口上确实出现了一条蛇形斑纹。在这儿，在里边，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好像是忧伤的征兆。”

“我也一样，我现在想结婚了，咱们住在一起共同生活吧，没理由再拖下去了。你和你爸爸谈过这事了吗。”

“弗拉迪，那不是我爸吗？”胡安娜的一双大眼向贵宾出口望去，那里有一个人在别人的簇拥下正往外走。

这几个人都步履匆匆地往前走，不看任何人一眼。

“爸爸！”胡安娜不由自主地喊出来。

胡安·曼努埃尔惊异地停住了脚步：“你在这里干什么？我本以为明天才回来呢，所以没告诉家里人。只有办公室里的人知道我提前回来……这几位先生是嘉斯顿派来接我的。”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

“我和弗拉迪米尔在一起。”她也含糊不清地回答。她被眼前的情形搞糊涂了。

“博士，咱们得抓紧时间了。别忘了，有人在等着咱们呢。”

这种粗暴的命令式口吻让胡安娜很反感，但她不想替爸爸找麻烦。

“你别担心，爸爸，咱们以后再聊，我是开妈妈的车来的。”

胡安·曼努埃尔还想说些什么，可话到口边又咽了下去。

这次交谈就这么陡然中断了。

弗拉迪米尔和胡安娜都没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他们脑

子里闪过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马上又回到了恋人之间那些柔情蜜意的言语和爱抚中去，那种预感也就打消了。在车上，弗拉迪米尔把一个小礼盒送到胡安娜手里，里边装的是他在纽约专门定做的戒指，上面镌刻着他们两人名字的头一个字母。他们悄悄地谈着知心话，谈着今后的打算。

胡安娜在弗拉迪米尔家大门口告辞了。她急着回家去看看爸爸出了什么事。她向他保证当天就和家里人谈他们订婚的事，而且要正式邀请他上门。

然而，那天夜里她父亲开完会很晚才回来。她没见到他，更没和他谈话。恩丽姬塔告诉她说这次旅行收获很大，有好多做大买卖的机会。他没提到他们在机场相遇的事，胡安娜当然更不想告诉妈妈这件事。

## 十 二      法 院

一位身着干净整齐的深灰西装的金发年轻人正从庄严的法院大门前的台阶上顺阶而下。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那原本金黄的头发颜色已经有些暗淡，一副宽边的流行款式的眼镜，使他的面庞看上去更具活力和睿智。

由于缺乏锻炼，这位优雅潇洒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律师的体形显得过于纤长，还有些驼背。这使他的魅力略微减色少许。

好几家报社的记者们都认出这位就是罗伦佐·塔德奥·罗布莱斯。他现在如日中天，凭借自己的才华、诚实、廉洁和刚

正不阿，刚满三十六岁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人物。他是审理最近多起与政界有关的走私、贩毒和洗钱之类腐败案件的法官，也是首都几个联邦大法官之一。另外那几个大法官，要么是早已把锐气消磨殆尽的老朽，要么是靠着迎合政界巨头才爬上来，并没显出执掌法律的真才实学的女流。

上个月，他作为司法界新生代的代表，被‘新时代’和另一个由格隆多纳主持的电视节目请去作嘉宾。虽然这两个栏目有所不同，但那两位主持人（他们最初共同主持一个栏目，现在分道扬镳了）都不是那种让罗布莱斯特别敬重的人。然而，被这两个栏目请为嘉宾这件事本身却说明了人们对他的评价。帕特里西亚也劝他接受邀请，因为这有利于树立形象。

在法院门口被记者认出来后，他有些腼腆地向他们致意。一个留着乱蓬蓬的金色短发，穿着大号 T 恤衫和不甚整洁的牛仔褲的女孩向他问道：

“法官先生，没有什么要发表的吗？我是《第十二页》记者。请问涉嫌洗钱案的是政府里的大人物吗？请您说几句吧，我从六点就在这儿等着您了。”

“小姐，”罗布莱斯笑容可掬但语调坚定地答道，“您是了解我的，我不是那种好在媒体面前发表讲话的人，对这桩案子就更不会多说什么了。因为它太复杂，而且与许多重要人物有牵连。”

“是政府要员吗？听说总统府里也有人和这桩案子有牵连，真的吗？国外同行都已经把这些登到头版上了。”

“小姐，别再刨根问底了。我已经说过无可奉告，请让路，我要走了。”

他的态度如此坚决，所以人们也不再坚持发问了。

他上了汽车，司机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恩特雷里奥人，叫莫伊塞斯·克莱恩。是他上任后给他派来的。

“快点开，莫伊塞斯，得快点躲开这群烦人的家伙。我太讨厌他们了。”

“没问题，您知道，这我最拿手。您就放心吧，听听我给您买的这盘磁带，这是我为您的生日准备的一份惊喜。”

路上堵得厉害，现在正好是孩子们放学。街上汽车太多了，他无法很快赶到母亲的家里。

今天罗伦佐感到特别累，自从早上六点来到法院就一刻也没闲着。他平时也这么忙，但今天工作特别棘手，因为他接手了一个与老同学胡安·曼努埃尔·胡斯托·曼西亚有关的案子。一大清早他就接到了特里斯坦从总统府打来的电话，后来‘俄国佬’佩尔泽也打来电话。两人都要见他，也表示对‘法丘’的担心。

或许他应该回避这个案子，因为从法律公正的角度来说，回避是正确的做法。但是他不想这样做。从他已经掌握的资料和朋友们所说的情况来看，他那多年未见但记忆犹新的老同学胡安·曼努埃尔与其说有罪，还不如说是个被一个势力雄厚且与政府要员有密切关系的国际团伙愚弄了的牺牲品。

他已要求在这个月十五日进行第一次听证会。明天他就要平生第一次处于与胡安·曼努埃尔的对立面。

这时，他回想起了他刚到萨尔瓦多学校的情景。他的父亲不到四十岁就患晕厥症死去了。也就是在父亲去世的当天，他母亲决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去投奔她的弟弟卡洛斯，在

他的帮助下生活。他当时是一个法庭的书记员。这次搬家，对他们孤儿寡母五个人来说，真是痛心、悲惨。

他每次回想起这些事的时候，脑海里的记忆都非常清晰……那幢离广场两条街的大房子、火车站上前来送行的人们。他们中间有祖父祖母，家里的亲朋，还有亲手把他带大的保姆胡安娜太太。

他们是在七月的一天出发的。八月一日他就要到学校上中学二年级的课程了。到那时为止，他和村里别的孩子一样，都在国立圣路易斯中学念书。

可是，现在他要到一所与修道院相仿的地方上学了。那里的建筑是封闭式的，没有花草树木，也看不到街景。一个穿黑袍的教士把他带到教室里去。在那里有四十只‘野兽’正半坐在课桌上用捉弄、讥讽的眼神盯着他。

在他的记忆里，当时的场面简直可以和《包法利夫人》头几页描写的那个戴着让人发笑的怪帽子的乡巴佬出场的情景相媲美了。

他马上就敏感地察觉到，他的那身穿戴和同学们都不一样。他还没有买到校服，而现在身上穿的裤子显得太短，上衣又太长。裤脚下露出的那种灰色袜子连他都觉得尴尬。

校长把他介绍给大家。这时，一个健壮的、身材微微显矮的漂亮小伙子面带诱人的笑容走到他的跟前说道：

“欢迎你，老朋友，你是圣路易斯人吧？你别以为我们都是你想象的那种‘牲口’。”

“‘博士’，您睡着了吗？司机打断了他的思绪。

“没有，我在想心事呢。莫伊塞斯，我自己去俱乐部就行



了。你把这封信带到帕雷拉街去交给埃切戈因博士，你认识路吗？”

“认识，有一天是我送他去吃饭的。然后我到圣伊西德罗去接你？”

“不用了，我的朋友帕戈，他会带我去的，他也是法官。你直接回法院好了。”

到了阿拉俄兹街，罗布莱斯下了汽车，他刚进了电梯就把领带拽开了。

他母亲的家是少有的几个能让他感到轻松自在的地方之一。

“您好，老妈，您在哪儿？”

“儿子，我太高兴了，我都等急了。今天你来晚了。你在法院的时候上电视了。我四楼上的朋友说了。你现在负责的这件贩毒腐败的案子特危险，和好多重要人物有牵连，是吗？我真为你害怕呀！”

“别害怕，格拉谢拉听风就是雨，特别爱传小道消息。您儿子出不了事，今天路易莎的女儿们回来吗？”

“欧亨妮刚走，等一会儿何塞菲娜要来吃午饭，这两孩子总这么来去匆匆的，你姐姐就更甭提了。”

“别抱怨了，妈妈，我们都忙点儿，有工作干不是好事吗？孩子们也都挺用功的。等何塞菲娜一毕业，我就让她到法院跟我一起工作。那里的薪水很高。”

“今天真奇怪，有一个叫帕特里西奥的男孩子打电话找你。我问他姓什么，他说姓吉哈诺，是你同学的儿子。是不是那个‘主教’啊，可他不是当神父了吗？”

“他往这儿打过电话？真奇怪。可他已经不是孩子了。他是罗伦佐的侄子，是他那个当医生的哥哥的儿子。现在是我的学生，所以给我打电话，如果他再打电话来，就让他今晚到我家里去取书。”

“那个吉哈诺可真是了不得的小伙子，现在好像已经当上主教了。你知道吗？”

“听说了，我们好长时间没见过面了。我现在和佩尔泽见次数还多一些。就是那个摇滚歌星，您记得吗？”

“记得，你那些侄女儿迷他迷得都疯了。可我怎么觉得他有点儿娘娘腔？”

“娘娘腔 妈，你好像都不止有六十岁吧，人家就要结第二次婚了，还有一个女儿。”

“知道，可他头发那么长，还戴个大耳环。有一天欧亨妮在电视上指给我看来着。他妈妈要看见他这副德行非死了不可，可怜的女人。我就不一样了，对你们几个都特别满意。你们六个都是我的乖孩子。其实我也挺开化的，但就是接受不了现在到处都有的同性恋……你怎么不说话？我什么地方说错了？我的女儿们都嫁给了好人家。你呢，才三十六岁就是个有名的法官了。我那些朋友的女儿们，就连孙女儿们都动你心思呢。”

“行了，妈妈，我愿意独身。我已经和法律结婚了，别的什么也不想，更不需要别人指指点点。”

“那卡塔尔娜的事儿怎么办？你不是和她好吗？我要是看不见你成家，死也闭不上眼。”

“那我就不敢保证遂您的愿了，我现在烦心事多，没工夫

找女人。”

“可格拉谢拉说,有一天看见你和一群朋友在舞厅。”

“看见我啦?……哎哟!……何塞菲娜,你来的正是时候,老太太正绕着那个老话题和我纠缠呢。”

“肯定是催你结婚。”

“没错,可现在我离这条自取灭亡的道儿越来越远了。”

何塞菲娜用一种同谋者的眼神瞟了他一眼说道:“姥姥,罗伦佐现在这样挺好的,您还不知足吗?有这么个儿子疼您。你是不是在审理胡斯托·曼西亚的案子?这家伙真倒霉,让人家涮得够戗。”

“你从哪知道的?”

“法院里今天到处有人议论这件事。只不过我讨厌别人说你们是老同学,你应该回避这个案子。”

“我是不会回避的,我们十年没见面了。另外,那个女法官是个废物,什么也干不好。如果她办这个案子,非判他死刑不可。他们正好想找替罪羊呢……”

“你说得对,我要是你,也不会回避,关键是别有人挑刺儿。”

“何塞菲娜,我说什么也不回避这个案子。你了解我,虽然我们小时候是同学,但我会正确处理。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在胡安·曼努埃尔背后肯定还有大鱼,他们都想逃脱。我非把这些人查出来不可……”

罗伦佐·罗布莱斯把思绪转到帕特里西奥·吉哈诺身上。这是一个好小伙子,他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他最初是作为系里的一个学生开始与他接触的。但他们两人都察觉到他

们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不同的是他已经三十六岁了，而帕特才二十二岁。

他们接触过几次，那时这个小伙子已经闯入了一个罗伦佐熟知但又十分厌恶的世界中了。

极少有人知道他是同性恋。

他的姐姐和外甥女儿何塞菲娜是这少数的知情者之一。

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同性恋的迹象，而且无论对待短期的还是固定的性关系都很小心谨慎。

他是在刚满二十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的，当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后来他遇到一位他父亲的朋友，比他年长许多。在他的关怀下，他才正视了现实。然而他自己对那些所谓的‘二性子’也不能宽容。在他眼里，性生活是非常隐秘的事，甚至连他都认为自己的这种情结违背自然，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认识帕特里西奥之前，他只是在外出旅行期间才稍稍放纵一下自己的情欲。但是，现在情况开始有了变化。他和帕特里西奥之间有许多相像之处。他想要像对待儿子那样爱他，保护他。尽管这个小伙子也和他一样，心里充满焦虑和矛盾，但还是不顾一切地投到他的身边。在发现自己的这种情结时，他甚至想自杀。

吉哈诺就是如此珍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因为一旦别人听到任何风声，他就会变成一个有短处的人，成为被讨厌的媒体和政治利益所利用的工具。

罗伦佐的母亲对此一无所知，还以为自己的儿子是她那些女友的闺女们最合适的结婚对象呢。

与母亲一起喝完咖啡之后，他出去找他的朋友帕戈去了，他是个有势力的企业家，也是同性恋。他们要一起到 S.I.C. 餐厅吃饭。

### 十三 在圣伊西德罗的谈话

这个地方是塔尔西奥选的。一间坐落于大教堂对面带有殖民时期风格设有小桌的咖啡馆。这是一个阳光明媚、令人神怡的四月天。在这样的天气里，找这么个‘中立’地点进行一场特殊的谈话是再合适不过了。

多年以前，他们这两位有着如此不同生活的人就已经相处得这么密切了。虽然塔尔西奥是一位主教大人，而吉尔梅特只是有一点点相信上帝，而且这位上帝是属于哪种宗教，她并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是有着真挚的友谊。

他们是在西班牙相识的。那时塔尔西奥刚流亡到那里，而她也刚刚与沃尔夫冈——一位精神不正常的奥地利人分居。她已经与这个人有了两个小孩，伊凡和罗西奥。他们是在拉丁人——其中大部分是智利、乌拉圭和阿根廷人——的一次聚会上经人介绍相识的。

在西切斯，吉尔梅特没什么朋友，但由于自尊心的驱使，她并不想再回到巴黎的家中。她的家人属于贵族、富人和上流社会。她不愿向他们承认失败，因为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一个有着天使般面孔的十八岁姑娘要背叛他们，跟一个在巴黎街头弹吉他卖唱的乐人一起生活。他没有名气，半疯半癫，

像个嬉皮士。

她曾经非常爱沃尔夫冈,但在分手之前的几个月里,与他共同生活已经很困难了。他们总是在不停地争吵,一天到晚,永无休止。

而和塔尔西奥一相见,吉尔梅特就好像感到心被爱情之箭射中了。在她面前的这位南方人,头发像夜色一样漆黑,有着印第安人的脸型、伟岸的身材和让人敬慕的人格,风趣又充满自信。

她一开始就知道塔尔西奥是位教士,为什么耶稣会把他派到远离故土的地方来。

然而,就吉尔梅特所受的教育和信仰来说,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塔尔西奥是个有魅力的青年人。她可以毫无顾忌与他发展一段情感。然而她也知道,她所谓的这段情感并不被面前这位被她称为“男子汉教士”的人放在心上。所以,问题是在这个男人一方,而吉尔梅特的原则是不能为了自己的幸福打破别人的安宁,虽然这样会让她承受牺牲与痛苦。

无论怎样,他们还是经常见面。在两人之间有一种理解,相互敬仰,相互尊重,心心相印。

在国外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活,尽管是自己选择的,但还是痛苦的。这就使他们结合得更紧密。

吉哈诺利用在西切斯的那几年博览群书,专心写作。她为他提供帮助,尤其是帮助他从事德文和法文的翻译,正好这两门外语是塔尔西奥最头疼的。

他们总是在一起散步,一起去马德里或欧洲其他地方旅行,村里人对此毫不见怪,他们觉得她像一个翻译似的陪着神

父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九八五年，塔尔西奥·吉哈诺被重新派回阿根廷，来到土库曼省的一个土著社区工作。尽管他的教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且致力于研究工作，但他从来也不愿放弃传道的生活。

他回来还不到一年，吉尔梅特就出现在圣地亚哥城边的小村落里了。她和伊凡只带着很少的行李来到此地。她说只是来看看他的。到了第二年，她又带着孩子来了。而且在圣伊西德罗，更确切说是在维多利亚街住了下来。塔尔西奥的家人，还有她的一个和阿根廷人结过婚的瑞士同学就住在那，她们都帮了她不少的忙。

她很快就找到了教法文的工作，而且生活也有了保障。最初她想住在圣地亚哥，但塔尔西奥觉得那样不合适，而且对吉尔梅特的孩子们也不好。

“奇怪啊，”吉尔梅特刚坐在这间咖啡屋的桌边，还来不及问候就直截了当地说道，“直到现在，从来都是我找你帮忙。今天，如果我估计错了的话，好像主教大人需要鄙人效劳了。”边说边挤眉弄眼，带着微笑。

“首先，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叫我‘主教大人’。你知道，我受不了别人的抬举，就是我的信徒也不行，更别说你。我现在很累，吉尔，你别误会，我这是头一次心里有一股邪火，心里感到恐惧。我已经厌倦了那种毫无意义的努力。我有点儿傻，就像堂吉珂德斗大风车似的。我从不认为自己永远站在真理一边，可我从来都力图做一个忠实的教士，至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但是现在我才发现上司对我缺乏理解，这让我

很苦恼。你知道我最近新写的一本关于性问题的书出事了吗？”

“听说了一些，可我没觉得这本书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可是，我们教区的大主教把我叫去了。好像是书里关于同性恋的那一段描写引起了他们的不快，而且他们要让我大删大改之后才能发行。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侮辱，盲目屈从可不是我的强项。”

“你是不是在书里有什么过激的言辞？你是不是认为同性恋是件好事？”

“不，我又不是白痴，但我写了关于教会对那些肉体罪孽大加挞罚，过分追究，反而淡化了《福音》里其他更重要的内容。我一直坦率地认为，基督并没有过多地在性问题上纠缠，而我们现在这么做却让我们把更重要的问题和价值观念丢掉了。在关于同性恋的那一章里我写道：一位教士面对一个同性恋者的坦白和忏悔时应该做到忠实，宽容，带着仁慈之心，把对方的事作为最隐秘的私事来看待。直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无力解决这类问题。一个人发现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该怎么办？自杀？我们装傻，对他们的问题避而不谈。我在书里已经写了，而且也这么认为，如果有这种问题，那么这个人只有一个办法克制他的欲望，这是一条出路（看看我们这些英勇地捍卫着贞操的神父们）。但不能剥夺他们爱的权利。难道我们不是男人，不懂爱吗？我们不能与人保持友谊，不能动情吗？当然，除此之外，有一条必须恪守的戒律，就是避免做出伤风败俗的丑事或者破坏戒条。我认为这是目前最大的罪



恶。另外,在我们的社会里还存在着许多伪善的东西,比如禁止使用保险套,等等。总之有那么多的事情……”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认为你说的这些都不对。我看你的想法合情合理,而且是正当的。只要有些头脑的人都不会与众人赞同的事情作对。现实中丑恶的东西不仅仅存在于同性恋这样的事情上。”

“当然,你也知道,我并没有站在不偏不倚、完全中立的立场上。”

吉尔梅特又惊又怕地看了他一眼。塔尔西奥明白其中的缘由,哈哈大笑。

“你用不着这样,别担心。不是我,是帕特里西奥。所以对我来说这也是关乎自身的问题。他是我的外甥,我像对亲儿子一样爱他。几个月前他失魂落魄地独自跑到土库曼省来找我。那时他想自杀,他当时真不想活下去了。因为他是个心灵非常美好的孩子。更要命的是他爸爸是个军人,一个严厉的大男子主义者。这孩子恰好是在准备进军校,子承父业的时候,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他觉得自己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喜欢一个朋友,以前他从来也没察觉到。当时他都快疯了。他逃离了军校……那又怎么样?……我再也不能中立地看待同性恋这个问题了。我以前从来也没感到这个问题离我这么近,而且教会肯定会知道这件事。我要帮助他,而且也费了很多心机,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甚至得到了我姐夫的理解。后来我就想,我如果只顾他一个人而不帮助其他的人,就太虚伪了。”

“塔尔西奥。”

“什么事？”

“你干吗要当教士？我不明白。你太仁慈了。”

塔尔西奥对她用这样的语调和他说活感到不快，他说：

“你用这么严肃的神情跟我说这种话的时候真是太美了。”

“阁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从您嘴里说出来的甜言蜜语，真是受宠若惊。”

“我以前害怕你，咱们刚认识的时候太年轻了。”

“行了，我又没有发誓保守贞节，尽管我的孩子都十岁了，可我刚满三十五岁。”

“对，不过我觉得比以前更能把握自己了。”

“是不是现在让你爱上什么人更加困难了。”

“不是，我懂得什么是爱情，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样，与某人在一起时感到快乐是什么滋味。在我们的一生中总要不断地作出选择，有的选择并不十分合理，但是要知道如果你已经选定了一个目标，那么你就只有一条路可走。我的路已经选择好了，虽然走起来并不容易，甚至有时我自己都觉得荒唐，但我仍要坚持走下去。”

“塔尔西奥，”吉尔梅特恢复了平时的庄重，说道：“本来是想让我来帮助你的，可除了给你添烦恼，什么也没做。”

“吉尔梅特，我今天见到你特别高兴，现在我又有力量和大主教斗争了。对我来说，爱情并不仅仅是性。”

吉尔梅特一语不发地看了他一眼。塔尔西奥，年近四旬，头发很短，也白了不少，而且明显地稀疏了许多。但他还是那个她在西切斯认识的来自土库曼省的青年教士，并没有什么

变化。看到他眼前的样子，她真不知是忧还是喜。

他们亲吻了脸颊相互道别，这一吻似乎与以往不同。

至少对塔尔西奥来说，这一吻非比寻常。

## 十 四 弥 撒

塔尔西奥面对圣坛主持晚弥撒。

胡安·曼努埃尔进入教堂双膝跪地行了礼，然后在后面几排找了个座位坐下。

塔尔西奥身上的那套教士装扮胡安·曼努埃尔并不陌生。只不过这身打扮使他跟那个让人怀念的卡亚俄六人乐队的成员和朋友——“主教”，看上去大不一样了。他不记得以前看到过他这身打扮。

胡安·曼努埃尔吓了一跳：怎么眼前的塔尔西奥与以往不一样了，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似乎根本不是那个他失魂落魄地跑来找他寻求理解和安慰的朋友了。

在履行宗教职责时，他的朋友也像其他教士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他以前遇到过许多教士，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对他们都失去了信任。虽然吉哈诺以平易近人和谦逊而著称，但毫无疑问，此时此地，能受到众人的敬仰，他肯定很得意。他现在是这群衣履光鲜、骄横傲慢的有钱人瞩目的中心，一个胡安·曼努埃尔尚未完全跻身其中的社会阶层的导师，看着他们骄横不可一世，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地度过一生。这些人穿的高级皮衣，名牌皮鞋，优质面料制成的裤子，他也已经开始

享用了。

胡安·曼努埃尔第一眼就明白看出：尽管这些来望弥撒的教徒们都规规矩矩遵守着宗教礼节，但大部分人并不十分投入。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一项普通社会契约而已。甚至还能听到他们闲谈和窃笑的嘈杂声。

“兄弟姐妹们，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我主上帝的声音。”塔尔西奥高举着《福音》说道……

“赞美上帝！”众人齐声附和。

结束了简短的仪式之后，塔尔西奥从神坛上的三级台阶下来走到教民与神坛之间，用一种抑扬顿挫的语调开始了布道演说：

“今天我们读到的如此感人的《福音》，并不是我自己选的——我知道有时候有人以此来控告我——而是恰好适于这个星期天的一段。耶稣又重新谈到了一个让许多人听了不自在的话题，关于穷人与富人的话题。这一点让人们感到不舒服，尤其是那些并没有忍受贫苦的人们，那些每天都得到温暖，甚至是锦衣玉食，能掏得起钱到每人五十美元标准的地方吃饭，穿得上至少价值八百美元的套房，上千美元一件的大衣的人们。

“如果我们不是对这段《福音》置若罔闻，它就会让我们感到愧疚。这一段就是要使我们感到羞愧。在这段《福音》里我们只知道那个穷人，那个悲惨的人的名字。他叫拉撒路，这个名字在《圣经》里，有着极为丰富的涵义。《圣经》里也提到了有钱人，可并没有指名道姓地记载下来。在我主的眼里，他们只不过是许多富人之一，优裕富足，脑满肠肥，什么也不缺，也

就不配再留下名字了。

“我们把这个话题引回到今天来吧。我们之所以每天都重复这个话题，就是要赋予它切实的意义。正如教皇约翰二十三所教诲的那样，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的信徒应该‘正视’这个话题，要设身处地，而不是‘泛泛空谈’。今天，那些没留下名字的富人已经成为在印制精美的杂志上抛头露面的显贵，人们心目中的明星，年轻人效仿、敬仰的偶像。证券交易、外汇投机就是今天正在上演的一出为了金钱而出卖良心的活剧。城里的那些豪华住宅和更华丽的、一年只住一个月而空闲十一个月的别墅，让人们狂癫，想方设法不劳而获，不冒风险，不为任何人创造财富就能一夜致富是金融投机之车。

“‘无论代价有多大，必须成功，要当大赢家。’这是在座的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心声。‘这样才能开上黄色的美洲豹汽车，姑娘，它会把我们带到天堂，我们向往的天堂。’

“有钱有势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没有皱纹，他们没有痛苦，永葆青春，或许还能长生不老呐。我们何必替古人担忧？

“七十岁的老人带着十岁的孙女，他的女儿也是这个年纪，他的新婚妻子二十六岁，多么温馨的场面。这是让人看了心情舒畅，又不难理解的新时尚。

“看到那些比亚福拉的孩子们因为饥饿奄奄一息，或者更近些，那些阿根廷的退休老人们为了一份难以维生的养老金而大动拳脚的可怕场面时，我们会把电视关上……

“在港口地区流行霍乱，脑炎，有害气体肆虐。可这能怪谁？或许只能怪那些遇难者自己。谁让他们那么肮脏？资本

主义神通广大，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教皇说过资本主义是野蛮的，但人们反驳他的观点，质问他：您说资本主义什么地方野蛮？我看得出来！

“人们在我的小教堂前排起长队等我给他们祛病除灾。他们都说我有法力。可是他们不明白，这些法力在那些富人身上。周围的穷人和那些因为家里的孩子在忍饥挨饿，或正在病中却没钱就医而舍下脸皮企求加薪的可怜人比比皆是，我主把治愈创伤的能力全都赋予了那些富人。而那些医生们，为什么区别对待富人和穷人？难道我主不是为了治病救人造就了医生？

“信仰基督的兄弟姐妹们，基督正在用他纯洁的心召唤我们打破所谓‘正常’的价值观念。

“是的，兄弟姐妹们，现在人们的观念与基督对穷苦大众的爱心是不相符的。上帝钟爱的，是为了抚育孩子们饱经磨难，年仅三十就已早衰了的母亲们。基督并不是一个自虐狂，但他确实要求自己，也要求我们保持节制。如果出于某种缘故，我们已经成了富人，我们并不需要再把自己变成穷人。然而，我们有义务用我们的财富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无论我们是否情愿，也不管我们如何感到羞耻，只有那些卑贱的人才能接受你们每次望弥撒时都在企求的耶稣拯救。或许我主基督今天就衣不蔽体，卑微谦逊地生活在一个贫民窟里，被人们蔑视，被当成疯子，只有极少的人能慧眼认出他来。

“基督从来没有把人区分开，他拯救所有的人。他可以是富人、税务官们的座上客，也能与病人和妓女平起平坐。后

来,据记载,是那些最弱者,聆听并遵从了他的教诲。

“并非所有的富人都丑恶,所有的穷人都善良。但资本主义也并非那么美轮美奂,而某些社会主义的思想确实是很正确的。有些人会说 可是,基督已经太落伍,太迂腐了,情愿为穷人劳神。他为了什么?因为基督代表上帝,我的兄弟姐妹们,他必须公正,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予一些人,而让另外一些人一无所有。让那些并不十分奸猾的,也没有把良心出卖给财富,而是放弃了所有的一切,义无反顾地追随着我们这位伟大导师的人们一无所有。

“每天在忏悔室我都可以听到:‘神父,我想当一名圣徒,我想作一名教士,但我不能割舍现在的一切。我觉得现在的一切都很好,为什么让我放弃 我想结婚,但又不愿为此做出牺牲。婚后我会失去现在的安逸生活。我父母不想……’

“兄弟姐妹们,我们的宗教就是这样一种遵从一个人的教诲改变全世界的宗教。按照那个被现在的年轻人称之为‘瘦子’的人的旨意改变世界。这个人曾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破除了曾被奉若神祇的所有的价值观念。而直到一九九四年的今天,他仍向我们传递着同样的信息……

“我也见过一些很好的年轻的少男少女们被改变了,对,被改变了,他们并不是被毒品和酒精改变的,而是被一些强烈的难以承受的语言改变了。但这会把他们带到一个永远也不可企及的和平与安宁之中。在这样的和平与安宁中,这些从小就被玩具包围着,长大后对什么都不会满足的孩子们得到他们久已期盼的和平和人们对他们宣扬赞美的幸福,那里就是天堂。

“据说我们国家里已经消除了贫困。听到人们谈论贫困，政府就要大发雷霆。但是，我们骗谁？是在骗自己，还是在骗外国人？”

“笃信基督的兄弟姐妹们，我们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每一个人都应该尽力所能及的义务。我们到贫民窟看看，我们到平原地区走走，别再高高在上，养尊处优了。否则，那些穷人总有一天会光顾我们的宅邸……我知道凭高向远的心情很愉悦，但我们不能永远高高在上而要正视现实。如果想作上帝的子民，就要与下层共同生存。十诫中的第二条和第一条同样重要。它要求我们爱别人如同爱自己……这是我主在世时对我们的教诲，他也是这样为我们做出榜样。

“让我们鼓起勇气，投身于我们的事业，也为塔尔西奥祷告，愿他同样献身事业。他现在已经升为主教。我的上帝，无私奉献，永远和需要帮助的人们在一起是何等神圣啊！让我们祈祷吧，兄弟姐妹们。”

塔尔西奥转过身去，背对众教民面向祭坛。这些人也站起身来发出一阵低语声。

胡安·曼努埃尔感到一些不悦。布道词他并没有全听进去，但还是觉得有些话就是冲他说的似的。什么不惜一切代价只要成功，什么财富之类……都让他回想起了几个月前在法尔科尼家的那次谈话。那么，现在他为得到的一切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说不定要坐牢，但是，为什么偏偏轮到他？

他还想到了恩丽姬塔。

“胡安玛，你怎么总是自寻烦恼，难道有钱不好吗？你又



没干什么坏事,不会出任何事。别再自寻烦恼了。”

那天他们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想把所有的事都告诉她。

“我们的弥撒结束了,兄弟姐妹们,周末愉快,祝大家平安。”

胡安·曼努埃尔清醒过来,从椅子上起来向教堂的门厅走去。塔尔西奥正在那里和人们打招呼,看到了他,惊奇地喊了出来:

“老伙计,你怎么到这来了?你不是住在市中心吗?”

“对,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塔尔西奥立即意识到他的朋友有了大麻烦。

“我马上就和你走,想到我家里去吗?”

“你住在哪里?”

“我这就告诉你……”

塔尔西奥花了半个小时收拾做弥撒用的圣器,又打点了一些小事。

“我现在可以听你的吩咐了,老伙计。我看你现在不太好,出了什么事了。”

“有人要抓我,我得躲起来。”

“谁要抓你?”

“明天法官签署的逮捕令就要下来了,警察要抓我。”

“因为不同政见吗?”

“不是,我倒希望这样呢,是更糟糕的事。我卷进了一桩操蛋事里去了,待会儿告诉你。”

“咱们先找加布埃尔,让他开车送我们到吉尔梅特家里。到了那,你就踏实了。谁也不会打搅你,然后,要是你愿意,可

以和我说说。”

“谁是吉尔梅特？”

“一个法国女人，我的好朋友。”

尽管处境危急，可胡安·曼努埃尔还是忍不住笑着打趣：

“你可别跟我说像你这么伟大的神学家也有个相好的。

听了你把那些信徒吓得够戗的布道讲演之后，再看到你也是个凡夫俗子，心里感觉特别好。至少今天晚上，你那些教徒们都睡不安稳。”

塔尔西奥也笑着分辩：

“吉尔梅特可是很好的朋友。虽然表面上看着是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但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我是在西班牙认识她的。她是个很好的女人，对我帮助很大。现在最要紧是你的事，她处事谨慎，会帮助我们的。”

他们上了加布埃尔的吉普车。这个沉默害羞的小伙子把他们送到离圣伊西德罗区不远的维多利亚街的一幢房子前。

“到了。塔尔西奥，我是把您放在这儿，还是在这儿等着，然后带您去做星期天的家访？加布埃尔问道。

“你等我一会儿，我把这个朋友安顿下来。你要有事就先去办，半小时后回来接我。”

他们走进了一间温馨舒适的小客厅。胡安·曼努埃尔跌坐在椅子上，絮絮叨叨地说了起来。

“主教，这回可要坏事了，你知道吗，我都支撑不住了。我太贪心，也太傻，结果惹了麻烦，成了罪犯。我被一群有势力的毒品贩子给控制住了。”

塔尔西奥听到这些话非常吃惊，但还是不动声色。

“‘法丘’，你不应该让我失望，你一直很有勇气，乐于助人。现在，无论出什么事，你都能挺过去。你应该毫无保留地依靠朋友们。你知道，我说的不是客套话，而是出于真心。我先带你到一间舒服的房间住下。吉尔梅特不住在这里，但她九点钟肯定会来。我也来。即使我不来，你们也会很快熟悉起来。她特别漂亮，你又特别会讨女人的欢心。是吗？”

“可你走之前得告诉我，你对我的事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

“一点儿也不。”

塔尔西奥毫不迟疑的回答使胡安·曼努埃尔踏实了许多，居然站起来找出一瓶威士忌自斟自饮起来。

“我得和家里通个电话，告诉他们别担心。不过，最好是打，我担心电话已经装上了窃听器。”

“好的，给恩丽姬塔打吗？”

“别，给她哥哥赫尔曼打。这样更好一些，因为他知道一些情况，给恩丽姬塔解释起来也方便。你知道，这个女人很特别，我怕她会做出什么过分的反应。”

塔尔西奥打完了电话，又出来对胡安·曼努埃尔说道：

“好了，你的事办妥了。我本来不应该让你一个人呆在这儿，可我有两个朋友病得很重，他们每个星期天都等我给他们送圣餐，再寻求一些慰藉。这次我也不想让他们白等。我叫加布埃尔在这儿陪你，这样方便一些。他会给你弄一些吃的，然后领你到房间里去，一直陪你等到吉尔梅特回来。”

塔尔西奥出去之后，加布埃尔把胡安·曼努埃尔带进房间。

看不出这间房间平时谁住，由谁来收拾。

这里的墙被涂成了灰色，一个粗糙的书架上面装满了书籍。有一张简单的铁床。一张宽大桌子摆放在夜光映照下的窗前，再加上一把扶手椅子，就是这间屋子的全部家具。

这间是吉尔梅特还是塔尔西奥的房间？要么是一间客房？这位神秘的吉尔梅特到底是谁？上次在法尔科尼家的餐桌上就提到过这个名字。胡利安还拿她和塔尔西奥开玩笑呢。除了听到塔尔西奥骗人或虚伪以外，塔尔西奥干出什么事来都不会让他感到惊愕。从小时候他们相识的那天起，塔尔西奥就是一个诚实的人，有时候诚实得让伙伴们生气。因为他也调皮捣蛋，但事后又总是如实招供。这就让他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头。正是因为他诚实而且学习成绩总是全班第一，才得了“主教大人”或“主教”这个绰号。多年以后，他真的当上了主教。在问到 he 到底为什么献身宗教事业时，他好几次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抱怨说，是那个外号让他作出的选择。

又过了一会儿，威士忌开始发挥作用了。胡安·曼努埃尔松弛了一些，觉得至少目前很安全。他和加布埃尔说要躺一会儿，然后关上卧室的门，脱下黑皮茄克，只穿着牛仔裤和粉色鳄鱼牌的T恤。他打开电视，拨到一个动画片频道，然后被也不掀，一下倒在床上。

## 十五 卡亚俄街的酒吧里

两位朋友一见面，就都想起了他们上次在学校对面的这间酒吧里聚会的情景。那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的一天，在弗

拉迪米尔被迫流亡前不久。

现在，这个咖啡店与以前那个小酒吧完全不同了。那个小酒吧曾是他们放学之后或逃学时经常光顾的地方。那时候，这里的老板是个叫保利诺的西班牙人，能叫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

在这里，他们曾经争论过许多重大的事情，比如匈牙利的革命是否必要，实际上依利亚<sup>①</sup>到底有什么事做得不好，是否存在腐败，等等。

几年之后，他们谈论的是阿兰布鲁<sup>②</sup>被绑架和他的死因；博卡队的教练与河床队的那位大师相比是不是个臭大粪？

“你怎么会相信上帝能容忍那些有钱人看着穷人倒在他家的大门口而开怀大笑？”

“你们真是一群傻瓜，现在人们需要的是温饱，不是福音书。基督的信息是发给穷人们的。福音书上唯一的真理就是让人们站在穷人一边。因此基督的信息对穷人有号召力。”

那是一段充满乌托邦理想和朦胧的但总是黑白分明的幻想的青春年华。

切·格瓦拉与披头士的混合物成了六十年代的偶像。然后是几位解放理论的开山人，博夫、希门内斯、穆希卡<sup>③</sup>——

有多少青春的幻想和激情都溶解在千万杯咖啡里，随着那些没有功课又缺少爱情的夜晚而流逝。那些英雄主义的幻

① 依利亚（1900—1983），阿根廷独裁者。

② 阿兰布鲁（1903—1970），阿根廷临时总统。

③ 这三位均为推崇解放神学的教士。

想又曾经成为多少人的憧憬和向往……

现在，一切全变了。那间小酒吧也变成了一间豪华餐厅。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咱们那会儿没有。你还记得那些潜水员吗？胡安娜说我已经无可挽回地变老了。你知道我和胡安娜的事吧。”

“知道，‘俄国佬’，我看除了可怜的胡安娜还蒙在鼓里之外，全世界都知道你们俩的事了。你听说他碰到的倒霉事了吗？我就是为这事才给你打电话的。”

“太可怕了，我真想帮他做点什么，我觉得他落到这步田地真是不可思议……”

“这是我给你打电话的原因之一，罗伦佐说你 and 媒体关系密切，这是罗伦佐告诉我的。你记得罗伦佐吗，那个漂亮小子？”

“记得，那可是个人物，我好长时间没见过他了。”

“他是负责这件案子的法官之一。他告诉我你和新闻媒介的关系密切，当务之急是别让胡斯托·曼西亚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

他们坐在一张僻静的几乎是藏在角落里的桌边。因为特里斯坦想，他们在这里被人看见不合适。

如果这时他们两人的熟人进来，会发现他们都与以往大不一样。特里斯坦已经不是那个无忧无虑的理科学生的样子了，老气横秋，眼眶发黑，才三十八岁就长出了许多白发。弗拉迪米尔反倒显得年轻，有活力，而且穿戴整洁，谁也不会把他同一位名噪一时的摇滚歌星联系起来。他还是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只是左耳垂上挂着莎曼塔的妈妈送的那个耳环，让人觉得特别怪异。

“以前没有这个餐厅。这里原来不是阿玛丽约酒吧吗？你还记得吗？以前每次下课，咱们总是到这里来要六份咖啡外带一份羊角面包。现在竟然变成了红火的豪华餐厅。意大利人雷纳托和雷莫把它从西班牙人路易斯手里买下来了。这几个人都不错，在这儿能吃到可口的通心粉，而且总有些有趣的人光顾，可以偶尔来换换口味。再说，这地方也不惹人注意。”

“光顾这里的人确实有趣，你瞧那个绿头发的妞儿。这路货色，我已经看腻了。”

“真有意思，我现在倒成了现代派，你反而保守起来了，不可思议。你记得小时候吗？那时候你们就老是因为我严肃、穿着规矩挤兑我。还因为我总是不和你们出去玩儿，又没有女朋友，就说我弱智。其实我是要陪我妈妈那个可怜的老太太！阿拉伯妞儿是我第一个爱上的女人。好了，咱们先点酒喝。随你挑，来点儿有劲儿的刺激一下。不知为什么，‘法丘’的事让我这么难过。”

“那是你讲义气。咱们点伏特加吧。这种酒喝下去就像谈恋爱那样让你爽快，让你忘记一切。”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

“对，另外，一般来说在做爱之后你总是感觉不错。可是，喝完酒之后……从文化角度来说，也有很大区别：一种是美的感受，另一种是酒精作用。”

“说得对，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幸福，飘飘欲仙，我告诉你，

现在要有一杯威士忌，我能更清醒一些。我现在感到压力特别大，老是喝酒。你别认为在这样一个疯狂的政府里做事，我就也跟着成为疯子。”

“我个人认为……”

“我知道，你和你的朋友们的经历，我知道酒和毒品毁人，要自我节制，但有时你没别的办法。”

“我不清楚，你自己明白。我的生活与你们的正好相反。我十五岁离家出走，那是第一次离开家。什么都经历过了。现在我要说，我回归了。我现在正体味着一次真正的爱情。我认为爱情是能够永恒的，我甚至动了结婚的念头。”

“对，老伙计。所有的人都知道了。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这样。不过，拜托了，别装出一副老顽固的样子。行了，咱们吃饭前点些有劲的酒刺激一下。我发誓，‘法丘’的事让我很难受。我们之间除了以前的友谊之外，最近的交往也很密切，无所不谈。可我无论如何想不到他会卷到这种麻烦里去。”

“‘爱因斯坦’，你对书的那种痴迷一直就让我嫉妒。我一见到书就恶心。对我来说，只有音乐才有意义。可能是我厌烦了自己那种纯粹的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一看你学习的样子，我就对胡利安说，你总有一天要得诺贝尔奖，我自己也一直那么想。可现在，你好像在走另外一条路……”

他们啜饮着杯中的酒，跑堂来到了他们跟前，面带忧虑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是佩雷斯·德尔维索博士吗？”

“什么事？”

“有您的电话，是吉哈诺先生打来的，说有急事。”



“吉哈诺 是塔尔西奥,肯定是‘法丘’出事了……”

特里斯坦焦虑地站起来。他不明白,也不理解,怎么有人能猜出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不出弗拉迪米尔所料,是胡安·曼努埃尔的消息,很坏的消息。塔尔西奥简要地告诉他,现在胡安·曼努埃尔已经被送到特立尼达医院,情况紧急,好像是出了什么意外,很严重。

特里斯坦面白如纸地回到桌旁。

“怎么啦?弗拉迪米尔问,一面猜测着他的回答。

“‘法丘’进医院了,咱们得快去。我不明白,谁能知道我在这儿。”

“特工呗,兄弟,别忘了你是政府的人,要严加控制。咱们付了账赶快走吧。”

“坐出租车吧,这样快一点儿。”

他们路上一语不发,来到了巴勒莫区这所豪华医院。急救室在四楼。到了那里,看见恩丽姬塔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穿着一尘不染的军装式上衣,短裙下露出漂亮的双腿,用真丝头巾扎起一头金发。从她身上看不出一点儿出事的样子,连哭过的痕迹都没有。

在另一个角落里,她十五岁的大儿子曼努埃利托坐在地上,双手掩面,絮絮叨叨地自语。

“怎么会这样,爸,你干吗要这样……我不明白,你不能死……我爱你,我爱你。”

弗拉迪米尔过去搂住他,安慰他。特里斯坦和恩丽姬塔说话:

“出什么事了,他去过什么地方。现在怎么样?”

她语无伦次地回答。

“我也不清楚。特里斯坦,你是他的朋友,我不想让他死,没有了他,我可怎么办 他给你留下了一封信,是刚才他的女秘书给我送来的,就是在那儿哭的那个姑娘……”

“他是自杀吗?”

“看上去是,他正和一个女人在老巴勒莫区的餐厅吃饭,进来了一些记者想给他拍照,他想躲开,结果掉进楼房的天井里了……”,

恩丽姬塔开始伤心地哭起来了。

“我真不明白,这老头子,”她继续声调稚嫩、表情呆滞地说;“今天中午我们还按他的吩咐,叫孩子们一起吃了饭。他告诉我们说他中了别人设下的圈套,他很害怕,因为要被判罪。不过有人会保护他。他让我们别信报纸上的话。他要出去几天,我当时什么也没察觉出来。胡安娜也在场。”

“可是,大夫是怎么说的?弗拉迪米尔走过来问道:“还有救吗?”

“他是四度昏迷,大夫说已经不可逆转了,除非出现奇迹他才能醒过来。塔尔西奥刚进去,他们昨天晚上在一起来着,我看现在就是塔尔西奥也不相信会出现什么奇迹了。请告诉我,他不会死……”

特里斯坦和弗拉迪米尔都不知跟她说什么好。弗拉迪米尔点燃了他的烟斗,特里斯坦转身去悄悄看那封信。

“胡安娜在哪儿 你们通知她了吗?”

“没有,乡下没有电话,我们没办法通知她。”

“对了,我真蠢。我可以和卡塔的哥哥去接她。洛沃斯离

这儿不远。”

“走之前你得去见见我爸爸，他昏迷之前叫过你的名字。我来的时候，他呻吟着说要见你。”曼努埃尔托说。

弗拉迪米尔想，肯定是胡安·曼努埃尔已察觉了他和胡安娜的事，要么就是胡安娜告诉他了。他一星期以前还去他的公寓找他。塔尔西奥抽噎着从急救室出来之后，弗拉迪米尔二话没说，穿上必须穿的罩衣就进去见他的朋友了。这时的胡安·曼努埃尔好像在安睡。既看不出一丝生机，也没有死亡的样子。他的呼吸很微弱，四周有许多医疗仪器，用管子和电线连接在他平躺的身体上。

弗拉迪米尔轻柔地握住他的手，推想着胡安·曼努埃尔的死亡，也想起了他从纽约回来后对他所说的话。他曾想去看他的公寓。他对刚去过的那座城市表现出热情，但也同时为陷入一种他自己也无法看清的境地而表现出担忧。他还说过盖布罗瓦不太清白，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于他与胡安娜的事他只字未提，只是说胡安娜是一个完美的女人，与她妈妈很不一样。恩丽姬塔也不坏，可是太不成熟，而且贪心。结婚以后就不断逼迫他，提出各种要求，对什么都不满足。但他还是一直爱着她，也怜惜她。她从小吃过不少苦，所以胡安·曼努埃尔很迁就她。

这时，弗拉迪米尔突然觉得眼前这个生命垂危的人握紧了他的手，脸上似乎显出一丝笑意。他低下身来，俯在他耳畔轻轻说道：“我会替你照顾好她的，‘法丘’。我不是坏蛋，而且爱她。别担心，朋友，我还会照顾你的家人。”

他出来时心情很不寻常。候诊室里已经空了，人们大概

都喝咖啡去了。

他出了医院，准备开车把胡安娜接来。

## 十 六 结 局

亲爱的“爱因斯坦”：

我自作聪明害了自己。我真蠢，让盖布罗瓦耍了，也让金钱迷惑了。

现在，我不知如何是好，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我被判有罪，我将无颜见我的孩子，也忍受不了囚犯的生活。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还有其他的朋友，六人小乐队，都可以帮助我。实际上，你们也已经在这么做了。我和塔尔西奥谈了许多。正如你平时对我所说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不像一般的教士。福沃尔卡德神父肯定会说他是异端了。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的话，请你们帮忙照顾一下恩丽。她现在还像一个小姑娘似的。另外，请关照我的孩子们。我知道胡安娜还有塞巴斯，就是那对双胞胎中的一个，已经懂得怎样生活了。曼努埃利托就懦弱一些。真是奇怪，我在他这个年龄时也成了没有父亲的孤儿。命运真能捉弄人……让人难以琢磨，你只能相信这就是上帝安排的“难以忍受的卑微的一生”。我觉得自己就像“一片风中飘摇的落叶”。

现在是凌晨四时，恩丽、姬塔、胡安娜、曼努埃利托、塞巴斯

蒂安·弗拉迪米尔、胡利安·奇斯皮塔还有恩丽姬塔的母亲都在大厅里等待消息。

“胡斯托·曼西亚的家属在哪儿？”

曼努埃利托走上前去用他十五岁的童音坚定地答道：“我是他的长子。”尽管他浑身打颤，但还是想尽量表现得成熟一些。

所有的人都跟他站在一起。

“孩子，我很遗憾。太太，我不得不告诉您，尽管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但曼西亚先生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他去世了，非常抱歉。”

这些礼貌周全但言辞冰冷的话宣告了一桩大事件的发生。他们的丈夫、父亲、朋友，一位三十几岁的男人与世长辞了，或者说的不愿忍受生活而选择了死亡。

胡安·曼努埃尔·胡斯托·曼西亚，这位漂亮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人，一个从年轻时就立志通过不懈的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男人，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成功的男人消失了，变成了一段记忆。

胡安·曼努埃尔死去六个小时之后，医院把遗体交给了他的家属，让他们准备基督教的丧葬仪式。弗拉迪米尔亲自办理了所有的手续，订购了棺材。然后，按胡安·曼努埃尔的遗愿把他运到基多大街的公寓。在那里守灵几小时之后就出发，用特里斯坦的小卡车把他带到首都几公里外的静安陵园。

胡斯托·曼西亚曾表示过愿望，愿葬在这座陵园里，和他的父母，还有二十岁就在东方角车祸中死去的唯一的弟弟巴布洛葬在一起，不进恩丽姬塔家在雷克莱塔的墓地。

塔尔西奥和弗拉迪米尔以前都没来过这座按照新的社会习俗建造的新式富人墓地。这里很空旷，视野开阔，花木繁盛，比起那种传统公墓要温馨得多，真是让人安息的好去处。

由灵车和十辆小轿车组成的送葬车队一直开到小教堂。在那里，人们把简朴的灵柩抬出来，摆在前面，为死者做最后一次弥撒。仪式由三个人共同主持：塔尔西奥和他们的另一位神父朋友尼古拉斯，还有一位知识渊博令人敬佩的耶稣会老教士何塞·玛利亚·雷奎那。他曾经是他们的老师，现在也还是其中一些人的忏悔师。

“今天我们为一个曾经做过我们父亲、朋友或学生的人送行。胡安·曼努埃尔生前是一个善良、有尊严的人。为此，我们要永远记住他……”

小教堂里挤满了亲戚、朋友、孩子们的朋友和最近一段时间与胡安·曼努埃尔有交往的人。

仪式后，人们抬起棺材，准备把他送到预定的墓穴。

抬灵的人中有曼努埃利托和他弟弟塞巴斯蒂安。他们身着深灰色礼服，打着黑色领带，看上去是两个无助的金发男孩。与他们在一起的有弗拉迪米尔、特里斯坦、胡利安和恩丽姬塔的一个哥哥何塞·玛利亚。他们抬起灵柩快要走出教堂时，嘉斯顿·盖布罗瓦冒着被人赶走的风险，脸上带准备决斗时的表情走上来，抓住了棺材上最后一个没人抬的把手。在这种场合，谁也没有心思跟他挑起事端。

葬礼上有些陌生人的面孔，无疑是某些杂志和小报的记者。可他们谁也没敢作采访，甚至没敢问盖布罗瓦任何问题。

看着眼前这个人，胡利安想，这个时代里，盖布罗瓦这种

人太多了。这是本世纪最后十年里在阿根廷大量孳生的一类人的典型。这就是那些来到此地就扎进最豪华的酒店，不打算为这个国家作丝毫贡献而只求发财的新移民。他们是迪塞波略<sup>①</sup>的那首老歌里唱到的‘胆大妄为的坏蛋’。

据说,没有哪个星期,这位盖布罗瓦和他父亲不上《人物》或者《消息》或其他更无聊的消闲杂志的。上面总有他们带着漂亮女郎出现在各种娱乐场所或者是一些引起轰动的绯闻和传奇之类的照片和报导。人们就是通过这些才了解他们的。说不定还对他们享用的美餐、名师精制的衣服、娱乐场所、娱乐方式和与之同眠共枕的性伴侣艳羡不已。或许,这些人高薪聘请公关班子炮制这些东西,再花大价钱买下报刊杂志的版面刊登出来,公之于众,用以兜售他们健康、漂亮、慷慨大方的正派企业家的形象。但是,他们对关在精神病院里的儿子,还有那位因为与已经陨落的拳击明星私奔而被取消继承权的女儿却讳莫如深。对他们为了降低汽车生产成本而压榨可怜的残疾人一事,更是缄口不提。

这位嘉斯顿的真实底细是:他是意大利和法国混血儿让·皮埃尔·盖布罗瓦的长子。让·皮埃尔六十年代与他的三个兄弟一起来到阿根廷,然后靠着巧舌如簧,不知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大发其财。在当今的私有化的进程中更是如鱼得水,成了半个阿根廷的主人。人们都在议论他们到底有多少钱,十亿美元?二十亿?还是三十亿?只有天知道。

现在,这位老盖布罗瓦与他的第一任意大利籍妻子,嘉斯

<sup>①</sup> 迪塞波略 (1901—1951),阿根廷著名的探戈演唱家。

顿的母亲离婚后，正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女模特儿姘居。尽管他已年过七旬，仍频频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他的保镖和跟班儿们为他排除任何人的打搅，帮他保持成功人士不可逾越的崇高形象。

嘉斯顿则比他父亲略富一些人味儿。他的小女儿斯特凡妮曾被绑架，为此他要付大笔赎金。数额之大，甚至于当人们知道他要筹集赎金如数交给绑架者，换回女儿时，连美元的汇率都涨了几个百分点。他与人们的关系也更亲密一些，甚至还入了阿根廷籍。

每个抬灵柩的人都各怀心事。在外人的眼里，他们神色悲伤而坚毅。只是塞巴斯蒂安，这位正值青春期的男孩，显得有些孤独、凄楚。

把棺材放进墓穴之后，每个亲朋都添了一锹土或扔下一朵花……

人们开始散去。

太阳出来了，把光芒洒在他们身上。

“好像不应该在这么好的天气里埋葬胡安·曼努埃尔，真搞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就像我妈妈说的，‘死去的人在这里该有多么寂寞’。”

“他们唯一能指望的就是来世了。”

“可在咱们的世界里，胡安·曼努埃尔还能存在多久？”

“我看一个人可以存在到他的名字在所有知道他的人的记忆里消失为止。胡安·曼努埃尔会活在恩丽姬塔、孩子们和我们心里。我们不该忘记他。他是我们中间第二个离去的人。”



“对，塞巴斯蒂安是第一个。现在是胡安·曼努埃尔。他是个了不起的朋友，我们要不惜一切让他永远活在记忆里。”

“星期一，也就是出事的头一天，爸爸给我往乡下打电话，我就觉得有些异常。他不像以前那么爱说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他只说，不要相信听到的流言和见到的照片，那都是记者们凭空捏造的，要么，就是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仇人陷害他。

“他告别时的话也很蹊跷。他说‘胡安娜，我爱你，非常爱你，你要相信爸爸……’

“爸爸决不是自杀，他热爱生活，笃信宗教，勇敢坚强。我看他是为了不让别人拍照，自己太不小心，干了件傻事，想从房顶上跳过去。就是为了不让别人拍到照片，毁了他的婚姻，也怕我们伤心。他从来都不愿作伤害别人的事，他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出事两天之后，我去过他的办公室，那里什么都没变样。桌上还摆着文件，打开的记事本上还有他画的图画……我最初什么都不敢动，总觉得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进来，还像从前一样，迈着优雅的步伐。帕特里西亚只是不住声地哭。她也想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已经和爸爸一起工作十年了，特别了解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爸爸是自杀身亡的说法。

“外面流言太多了……但是爸爸和妈妈从来也没有分开过。所有的传闻都是鬼话。他去世的前一天他们还在一起吃过饭。爸爸从来都是诚实的人，别人利用了他的天真和善良。他自己从来也不会干这种事的。他知道我们爱他，曼努埃利

托爱他，我的小小弟弟们也爱他。曼努埃利托因为他的事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爸爸一直是个有责任心的父亲，为全家操劳，毁了他自己。这全怪那帮利用他做自己生意的法国佬。他们利用了他的清白身世，利用了我们这个清白家庭掩人耳目。传媒的报道很虚假。法官断定这是个意外事故，使得许多更深层的政治背景被掩盖了，没人说得清楚了。他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爬上那面墙？为什么要从房顶上逃跑？他考虑过危险吗？他想自杀？他以为一张照片就可以毁灭他的婚姻，损害他的家庭？

“芭芭拉也处在孤独痛苦的自责之中。在出事之前她曾和胡安·曼努埃尔一起呆了两个来小时。他们的确谈过他的案子和他的苦闷。但是他会自杀吗？那个摄影记者走进‘麦当娜’酒吧时，正是他们决定永远分手前的最后一次会面。胡安·曼努埃尔很惊恐地看了记者一眼，像机器人似的一语不发。我还以为他去了卫生间，可是过了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我听到了一声惨叫，酒吧的那个洗盘子的黑人看到他趴在楼下住户的车库顶上。

“一个星期之后，一家杂志报道说：‘他的家人和朋友们都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他们还不想说什么。’”

“任何事也损害不了胡安·曼努埃尔在我们心目中的父亲、丈夫、朋友的形象。他在我们记忆中仍然可爱、可敬。”塔尔西奥一字一顿地说道。

胡利安对他的朋友们说道：

“无论胡安·曼努埃尔的死因是什么，他的死是为了爱，为

了不毁灭,其他的全是胡说八道。”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思绪、疑问、悲伤和惶惑。

恩丽姬塔一语不发,挺着身躯走着,没有一滴泪水。她的孩子安帕罗、嘉斯顿和塞巴斯蒂安伴在身旁。

胡安娜被弗拉迪米尔挽着胳膊,跟在几步开外,她看上去出奇得美丽。

鼓起勇气,我们与你同在,直到永远。

六人帮余下的五位成员都举起手齐声喊道：

阿 门！

# 红色庭院里的白玉兰

赵晓鸣译



致我亲爱的良师和朋友何塞·多诺索。

\* \* \* \*

致智利的圣地亚哥,致那里的人们,致我最亲密  
的朋友们,致那里的山脉和街道,那里的树木与花  
草,还有格拉米斯和阿尔坎塔拉的家,这部小说就是  
在那里产生的。

\* \* \* \*

我要感谢胡安·克鲁斯·埃斯特拉达·比希尔在  
计算机方面给我的无法估量的帮助。

我们每个人，我们之中的每个人毫无例外都是无限的；我们每个人，男人或女人，都被地球永恒的设想所接纳；我们每个人，都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神圣。

——沃特·惠特曼

我不知道罗萨斯<sup>①</sup> 是否像祖父们所说，只是一把贪婪的匕首 我以为他和你我一样，是每天生活在历险中的事物之一，它将他人的犹豫引向兴奋与痛苦。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 从 前

不，今天，这个故事应该这样开始 我认识一个家伙，他的朋友都管他叫修道士。他个子很高，头发乌黑，他那明显的印第安人相貌使他非常与众不同。尽管我身高 1.68 米，但在他身边，我仍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只小蚂蚁。

我们是在一家非常独特的高尔夫俱乐部相识的，那里不

<sup>①</sup> 罗萨斯(1793—1877)，阿根廷独裁者。

用消费卡,那‘菜谱式消费卡’意味着至少消费五百法郎。

我一直没有弄懂修道士在那里干什么,也不懂为什么我会接受那类让人无可奈何的邀请。

首先是一轮握手与介绍,按照这座城市特有的礼节,总是这样说:‘某某,国内最好的高尔夫球手’;某某夫人‘本城最可爱的女士’;不是说‘最漂亮的’就是‘最聪明’;外科医生巴斯多尔·阿莫兰迪·阿拉斯门迪’。轮到了我:《巴黎时报》的阿古斯蒂娜·雷卡德夫人,优秀记者,虽然带点红色。(赞同的笑声)。

尽管才晚上八点半(宵禁迫使居民们养成新的习惯,并且早早入睡),人们很快给我们上了一种美味的‘乌埃尔皮斯科酒’,我们很快就走进餐厅。

那是一个有三扇大窗户的房间,窗帘用波尔多天鹅绒制成。墙上挂着英国国王、王后及王子们的画像,每幅画像都有漂亮的木框装饰。这是令我不快的第一点:画上的这些男士和女士们在这里干什么?这个国家甚至连英国的殖民地都不是,我想起一个外国朋友开的玩笑:‘这里所有的下层人都想成为中层人,所有中层人都想成为上层人,而所有上层人都想成为英国人。’原因就在这里。

我准备找一个座位,离那些权贵们远一点。我想找个不那么一本正经的人为伴。

有一个人跟在我身后,他正是我要找的人。虽然我不那么容易跟得上他的大步,我们还是一同走过了五六张铺着洁白台布、上面架着银质枝形烛台、烛台上插着深蓝色蜡烛的桌子。



突然，我那位临时伙伴对我说话，严肃得令人忍俊不禁：  
“您没有答应和别人坐在一起吧？”

我把这个提问看作是一种邀请，并且允许他为我放好椅子。

以这样非常轻松的方式开始的谈话，在整个用餐时间持续着，我们几乎没有顾及同桌的另外四位用餐者。

我觉得修道士说话很有趣。我喜欢他那缓慢的、大幅度的手势。他的嘴唇奇特地动着，声音坚硬，但对我说话时就变得柔和。

幸好他没有扮演征服者的角色，这是全国流行的游戏。

“不久前我刚回来，才四个月，我在奥地利流亡了很长时间。那一段经历非常不幸，我丢掉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朋友，家人，房屋，职业，甚至我的女人。”

“你是在奥地利分居的吗？”

“我们不能共度那种日子，对我们双方来说，那太艰难了，我们必须分居，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但最糟糕的是，我没有重新开始干点什么的愿望……首先是失去了回国的幻想，失去了与我的城市，与我的儿子卡特列尔，与我的朋友们重逢的幻想。我现在甚至都在怀念维也纳了。”

“你这样讲话，就好像你是个老人。”

“这可能就是我的问题，然而我却浑然不觉。我都 42 岁，不再是孩子了。”

“那么，你以前的朋友呢？你不再重操旧业？”

“获得医生资格之后，我到阿根廷去了两年，专攻外科。当我回国时，赶上一个新当选的社会党政府。那时候，尽管我像

很多人一样,属于寻求公正与平等的理想主义者,但还没有卷入政治。就是在那个时候,友人邀请我同古铁雷斯老师及其班子一起工作。这位老师是总统的朋友兼私人医生。后来发生了政变,您对这一切是很了解的。于是我就成了嫌疑犯,共产主义者,社会治安的敌人,被人追查。”

他突然沉默了,他把自己的事放在一边,想让我也说说:

“我让人讨厌,一钻进这个问题就出不来,只顾无聊地自言自语 现在我想知道一些关于你的事情。”

我顺从他,说了起来。先谈到圣路易斯,那古老的房屋,有一座红色的院子 and 一棵巨大的玉兰树,树上开着白花,那棵玉兰是我爷爷种的 然后谈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那条使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声调显得强硬而气势汹汹的莱昂纳多河。

“我父亲是法国人。他 1945 年来到阿根廷,具体地说,就是来到圣路易斯。你知道它在哪儿?”

“当然知道,在门多萨附近,我没去过那里,但是,有很多人跟我谈到过那儿的风景。你父亲远离祖国,到那里去干什么?”

“去教书。我父亲天生就是个教育者,他和另外几个法国人一起,在圣路易斯建立了法国联盟。他在那里认识了我母亲,就再也没回法国去,他是一个在‘圣路易斯抛锚’的法国人。”

“从你讲话的方式来看,我还以为你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呢。”

“不,15 岁时,我随全家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是我第一次搬家,后来又搬了很多次。”

我也打住了话头，不想再说自己了。

后来我们谈论了一些并非个人的话题，比如，关于时局的话题，关于最近几天所发生的事情。

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观点一致，但我的看法更带有激情，更加乐观，而修道士则显出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极端怀疑的态度。

当这种痛苦和我们的失望从桌面上反映出来时，一个长得很帅的小伙子走了过来，他端着几只大黑盘子，盘子里的黑色奶油上撒着欧芹，在欧芹的映衬下，一条填馅鲑鱼骄傲地闪着亮光。另一个小伙子则给我们的杯中斟上一种美味的白葡萄酒。所有这一切，甚至连侍者的微笑，都是纯正的“新嫂”风格。

我感到愤怒。我经受了一种打击，那就是有人揭发我们与一种生活同流合污，而我们却仍在想指出这种生活的虚假。

那条鲑鱼变成了一种威胁，它可以抹煞任何快乐。

在我身边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如此相同、又如此不同的穿制服的人。他们是新的祖国的捍卫者，他们把祖国的模式强加于人，他们撒布恐惧，在我们人民中间制造失踪者。

从这方面来讲，这是最杰出的军国主义，他们镇压的人可以分成黑头发的或黄头发的人，打领带的或不打领带的人，生活在富人区的或贫民区的人。

他们在那里实行封锁的借口是发生了狂暴的武装游击战，而在这里的则借口有人试图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我没有做任何评论，修道士也没有，但是在吃鲑鱼前，他似乎想要站起来，他差不多喊叫着说：

“您贵姓？”

我又惊又恼地看看他。我可是记住了他的名字的：巴斯多尔·胡维纳尔·阿莫兰迪·阿拉兹门迪。

“我已经知道了,您不用说了,阿古斯蒂娜,”他带着微笑重复了一遍阿古斯蒂娜,好像要将它大写一样;现在我必须走了,但我们还会再见面。”

就这样,他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桌子,留下一个长得白白的、虚泡囊肿的小胖子来作我的谈话对象。据此人自己说,他是个金融家,支持现有的社会体制。

为什么我要写这种回忆,写了它又会怎样?是为了二十年后阅读它吗?是为了把它作为一段传奇,留给我的孩子,并且让他们以这种方式认识我,好像我和他们在一起时不知这样表现自己一样吗?

我刚满 37 岁。我相信他们会认为,我是那种满头金发、个子高挑、相貌并不完美、人也不再年轻、但却带着差不多是幸福的表情的女人中的一个。

有一次,有一个男人,我对他并非无动于衷,他对我说,他忘不了我金色的头发和褐色的眼睛。也许他说的是真话。到了生命的这个阶段,就像我觉得自己像惠特曼一样,我同样觉得自己健康,并且想唱一支纯粹的歌。

托尔斯泰 37 岁时写成了《战争与和平》,而普鲁斯特开始写《追忆似水年华》时也是 37 岁。

是的,这真是个好年华,正是可以开始干些什么事情的时候。

建立一种决定性的关系,进入一家佛堂,或者从一种智慧

疗法开始,试图去掌握个性,此举将有益于未来,并将伴随你走向老年。

看来,我的选择是写小说。这个念头很久以来就在我脑海中反复多次了。题材可能就是写我现在所处的地点,并且与拼命寻根的结合。我已经不是 25 岁了,我知道,生活并不像我从前想象的那样容易。从什么时候起,一切都改变了?可以指出一个时间,一个日子,是 1976 年的三月?或者更早几年?是从绑架了阿兰布鲁将军,而我正在伦敦散步的那天开始的吗?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在某一时间分析阿古斯蒂娜这些年是怎样生活的,他们将带着主观的重负来分析,但可能会缺少一些激情。

1976 年 10 月 23 日,这个日子标出了我生活的从前和以后。我同表姐安娜和保莉娜正在我们租的那个小单元里念书,那天下午天气炎热又潮湿,窗户都开着,想借点微风,可是连微风也没有。

保莉娜正在高声朗读《应用哲学》中的一个章节。

突然传来了嘈杂声和喊叫声。我们探出头,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辆漆成那种不易混淆的绿色的法尔孔牌汽车停在门外,从车上下来了几个人,他们既不想掩饰他们的到来,也不想隐瞒他们是干什么来的。

我们惊恐地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我们感到自己是有罪的。两天前,我们在一份抗议书上签了名,对教室的缺乏表示不满。

无可否认,这份声明包含着更实际的抗议 我们的同学进了监狱或者失踪了,一些作品由于被认为具有颠覆性与危险性,被列为禁书,比如恩格斯、弗洛伊德、马克思、尼采、萨特等人的作品,甚至包括台拉尔德·夏尔丹的。

除去恐惧与害怕,我们不能做出任何反应,只好听天由命地等待事情的发生。

但是电梯并没有停在我们这第三层,而是又上了一层。

“开门,混蛋,要不我们打破门了 共产党 游击队!”

“狗男女,你们要杀了我们!”

那声音听上去痛苦万分。只听得脚踢声,枪托击打的声音,还有喊叫声。

“我们是医科学生!”

“我们干什么了 你们不能把我们带走,给我们看看法律手续。”

“见鬼去吧,你们这些混蛋,最好别吭声。”

“姑娘们,请打电话,5523081 ,通知米尔塔,那个瘦瘦的女人。妈呀……”

看门人卡尔梅罗·塔索一声没吭,我们也没有。

以后有好多次,回想起那次我所持的态度,我觉得自己非常胆小。

住在第四层的两个小伙子也是学生。他们是学医的,已经快获得证书了。一个名叫坦波里尼,是个脊背宽宽的矮胖子,像个橄榄球运动员。只要在客厅或电梯上遇上他,他就会讲上几句令人愉快的恭维话来迎接我。

“哎,你留这种发式真好看 我喜欢你这件衬衫!”

另一个是斯特科尔尼克,一个瘦瘦的,更显得腼腆的俄罗斯人,带一点巴罗哈式性格,我和他很少交谈。

尽管那天我才 23 岁,我还是作出决定,要远远地离开这个国家,躲到随便哪个地方去。到百万公里以外,远离这种恶梦。

我弟弟塞巴斯蒂安,他与反对派组织有牵连,罗德里格参加了激进党,而克里斯蒂娜正在攻读心理学。在那些日子里情况很危急。爸爸心中茫然,不知应该提些什么忠告。妈妈唯一的希望是我们都离去,要不惜任何代价以挽救自己。

但是只有保莉娜和我走了。我的兄弟们和安娜都留下了。

当我在埃塞萨<sup>①</sup>的那个时刻,就要上飞机了,我很羡慕,觉得那些留下来的人更勇敢。就是这使我羡慕。

放弃一切并不容易,但是毫无疑问,这样风险更小。

就这样,我在法国过了十五年。

电子计算机的声音使我失望。

我感到孤独。

我把自己所得到的一切都留在了巴黎:那使我感到幸福的伙伴关系 那份有趣的、令我开心的工作 那对绝妙的孪生子女——现在十二岁的克里斯蒂安和米歇尔。

但是我的狮子座的性格损害了我,这种性格,从我降生之日起,就像借助了风力的火焰一般猛长。我喜爱非常艰难的事业,我会为之激动 但是我又反复无常,缺少恒心,一天早上

<sup>①</sup>埃塞萨,阿根廷的一座城市。

起来,会全力以赴去于点什么,而另一天,情绪又会大大低落。

当然,我没有圣女贞德、切·格瓦拉或甘地等人那样的志向,或者仅仅是想一想,具有那种志向。然而,我来到这里,来写一些我写不来的事情,来重新经历一次没有必要的冒险。

我害怕,我总是在哭泣,感到可怕的孤独 更糟糕的是,我不能将这一切归咎于任何人。我做了这样的选择,是我自己选择的。

不,我抛弃了一切,作为《巴黎时报》的记者,来体验这种历险,是为了打破单调的生活。

如今我所在的地方风景非常美丽,有群山环抱。这座城市生活质量良好,人们都很热情,他们有闲散的时间,有谈话的时间。

这个国家目前所经历的情况,在我们南美洲已经重演了多次,以至大家都懒得一一列举了。

少数人,在他们的利益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支配着一支军队,控制着政府,他们援引了很多理由,比如 文人执政者无能,或者任何其他类似的重要理由。由一名丘八头子来发号施令,大家全都臣服于他,因为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恐惧。他一个人,既是独裁者、大元帅,又是祖国之父。他成了绝对的主宰者,过着一种不真实的生活,觉得什么都不对头。他带着恐惧,变成了绝对的主宰,他全部时间都带着这种恐惧。我认为他对这种恐惧片刻都不能适应。

离开巴黎才二十个小时,一切重又像不久前一样了。皮埃尔、孩子们、壁炉、地铁,想怎样就怎样,不必多说了……啊,有那么多的东西!



电脑的响声又开始烦人了。它是有意的。我想整好上面的那些键，它都帮不上忙。另一件事，就是将我无序的疯狂、梦想、资料 and 痴迷都输入机器，让它们成段成段地出来。

“谈话失去了活力，伯爵夫人和蔼地微笑着看看公主，她毫不掩饰自己并不为站起来走开而感到遗憾。”

“他记起人们的梦属于上帝，他记得，迈依莫德斯曾写过，梦中的话是神圣的，只要这些话是各不相同、明确的、而又不知是谁说的。他穿上衣服，两名士兵走进牢房，命令他跟他们走。”

加好逗号，添上标点，把握适当的节奏。总而言之，要明确、完美、无可挑剔。

这一切都以萨选音乐或类似松贝格的音乐作背景。我奶奶评论这种音乐，认为它同我们的狗撒切尔（我发誓，二十年前是这样叫它的）发出的声音一样，不过我听著顺耳。

必须跟那些人物较劲儿，不能将他们放在舞台上，让他们孤单地被神奇的力量降伏。

菲莉希塔丝，18 岁的智利姑娘，山脉另一侧的拉布恩塔的首领，比她年长二十岁。第一章应该是婚礼。年轻的贞女同阅历丰富的圣路易斯长官的候选人结婚。他受法律复兴者、著名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直接保护。

我不得不找到情调，然而必须有军人的金线袖饰，夫人们，特别是应邀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夫人們的珠宝，还有来自圣地亚哥的家庭，而拉布恩塔的社交界很简朴又普通。

下午七点。

对着我的窗户一些木制的框架开始升高，它宣告了一座

新楼的诞生。这就是这种社会制度的诱惑，它的油彩掩饰或覆盖了八十年代的阴暗现实，福利与进步是这种独裁的特有的神话。

我紧紧地闭上了眼。

我观赏着太阳，太阳用山中一些变幻的黄色，将阴暗奇异地描绘出来。

波涛汹涌。波浪拍打石头的声音催我进入菲莉希塔丝的世界。

大海是想象出来的，但是我需要它。

## 婚 礼

我的婚礼是拉布恩塔镇这些年里最为重要的一次婚礼。仪式将于下午七点钟在教堂举行，我家的朋友堂曼努埃尔·奥维多主教将为我们主持婚礼。

我看到大家都在为我忙碌，女裁缝为我上过浆的绸衣做最后修饰。

女厨师们在厨房里做糕点，装点菜肴。

三百名宾客接到请帖。半夜后，大门就向人们敞开，请大家都来分享节日的快乐。安东尼娅，我忠实的安东尼娅为我穿好衣服。

这胸罩太紧，这衬裙像是纸板做的，让我简直透不过气来，我几乎动弹不得。

二十多个人在侍候我，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成为

大家注意的中心。

大家希望我是所有新娘之中最美丽、最快乐的一个。

人们这样对我说，人们这样对我重复着，我也这样重复着。我想快乐、无限地快乐。

然而我害怕，我恐惧。

哪有什么文学中所写的那种疯狂的、激动人心的爱情？哪有什么弗朗西丝卡与巴勃罗、但丁与贝阿特里齐丝、罗米欧与朱莉叶？

我刚刚认识文塞斯劳，他对我也不了解。

我没有感受到奇妙的激情，也没有什么火热的感觉，我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永恒的爱的宣言。

然而再过几小时，我就要有一个主人，一个绝对的主人。我将把自己交付给一个男人，我将只属于他。

我必须把所有的坏兆头都从自己的脑海中驱散。只留下美妙的想法，不要使这一时刻暗淡下来。

我的父亲，我可怜的爸爸！尽管亲爱的妈妈的去世给他留下了痛苦，他仍然把一切承担起来。嫁妆全部来自欧洲，在门多萨订制了最精美的蛋糕，还有栽种着茉莉花和最惹人喜爱的玉兰花的教堂。

这种绸缎和我身体接触时，我的感觉是多么惬意呀！既柔软，又洁白，抚摸着这丝绸真是妙极了！文塞斯劳将抚摸我柔软又娇嫩的皮肤！文塞斯劳！这名字有多难听！要是他允许，我就管他叫文奇，我想他会喜欢的，文奇，听起来更亲热。

我的男人是那么严肃，每时每刻都沉浸在自我之中，

他的前额有皱纹，而且几乎从不露出笑容。

乌黑的小胡子使他显得更加老成。

他经常向听他指挥的人喊叫，这使我害怕。可是我父亲也喜欢抱怨，并且也留着小胡子，但他对妈妈和对我们都很好。

我希望自己幸福快乐，但是首先我应当是一位圣洁的妻子，就像那些修女们所说的一样。我要做一个我丈夫的好女人，而不像这里的蠢女人，她们整天就会嚼舌头。我想要孩子，要有好多个孩子。

我想，当母亲一定很美妙。

但我想保持廉耻、纯贞和圣洁。有很多圣洁的母亲。

到底会怎样呢？

我什么都不想问，我不想让自己像个无知的小姑娘似的。

由于文塞斯劳使用手杖，在餐桌上我问他，是否腿有毛病时，我已经丢脸了。

“我的儿子是瘸子？”莱昂诺尔夫人叫道；“你要习惯于这一点，我们雷依纳菲家族的人是完美的，不论是身体方面还是智力方面。”

当然，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提到我经常在仆人的院子里看到的那个小傻子。没有人提到他，但有人说，他是文塞斯劳的叔叔，也就是说，他也是雷依纳菲家的人。仆人们叫他诺尼多，他总是在笑，要不然就总是想躲藏在门后或者柱子后面。

哎呀！安东尼娅怎么这样使劲地揪我的鬃发？她肯

定想把我的念头揪出来。尽管我没在和她说说话，如果她知道我在想象裸体的文塞斯劳，知道我正在想着的事情的话，她准会大惊小怪。

上帝救救我吧！我不想让文塞斯劳看到我穿着短裤的样子，幸好那些睡衣很长。

我和贝尔纳尔迪塔、哈维埃拉一起取笑了一会儿文塞斯劳的大肚子、白头发，还有他走路的姿势。

婚礼后，第二天，她们就要回去，这真是一种悲哀。我将感到很孤独。

大家都说，我应该很高兴，我要结下一桩好的姻缘，都说，与老一些的男人结婚比较好，他们已经不再做蠢事了，他们像对待女儿一样，教育和娇惯自己的妻子。但是我有我自己的父亲，不想再有父亲。（总之，让上帝帮助我吧）。我已经准备好了，我看起来很漂亮，裙衫突出了我的纤腰，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但事实是，我一点都不丑，高挑的身材，配上我祖母那样的浅蓝色的眼睛，浅得几乎透明的眼睛同我黑色的头发形成了美丽的对比，还有我的鼻子，和谐的嘴唇，我的微笑。你看起来真漂亮，菲莉希塔丝·戈伊戈切亚。

但他们已经来找我了。我必须放下面纱，举止端庄。

直到仪式结束，人们才能看到新娘的脸庞。

哎呀，安东尼娅，我在发抖！我的花束在抖动，好像念珠要掉了下来。祝我有好运吧。安东尼塔！圣母保佑我吧，所有的守护天使，请保佑我吧。

我的爸爸，他总是大大咧咧的，但愿在我下车时，他

别踩了我的裙边，那将是一场灾难。

我在办公桌上摆着太多的东西，如果有个外人来分析，或者被皮埃尔看到，他们会觉得那都是些不必要的、没意义的东西……

首先是我的三支钢笔。

一支老式派克笔，那是二十年代的东西，是我去巴黎前，我父亲送给我的，我很喜爱它。

那一支瑞典笔，非常现代派，是我在斯德哥尔摩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买的。

还有一支，是巴斯多尔最近送给我的。

还有很多细笔芯，有中粗笔芯和粗笔芯的黑铅笔，至少有十块橡皮。

除了纸张还是纸张。有些是白纸，另一些是杂乱的、记着各种各样笔记的纸张。

最后是一张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sup>①</sup>的圣像，这是克里斯蒂安在我来这里之前送给我的。画像很漂亮，我想是南斯拉夫的。奇怪。圣弗朗西斯科在南斯拉夫？我不知道我儿子是从哪里搞到这张圣像的。他总是送很不一般的礼品，并且总能找到带有异国情调的东西。我想，这是我写字台上唯一的装饰物。

每天，我在办公室前坐上几个小时，有时我喜欢那里显得

<sup>①</sup> 圣 弗 朗 西 斯 科 · 德 阿 西 斯 (1182—1226) 是圣方济教派的创始人。

干净而空旷。但它总是满满的,这使安东尼娅感到失望,在巴黎时,皮埃尔对此也感到失望……

我的工作并非杂乱无章。写给报社的文章,我是放在活页夹中的。我还有一个照片档案夹。

我不喜欢让任何人来清理我的写字台,我总想扔掉一些纸张和手稿,但是从这一角度来说,我能做的事情不多。我从来决定不了应该扔掉什么,或者是哪一本书应该离我远一点。

我总是这样,在某个无聊的星期天,我在家里待上一上午,不想构思小说,不想阅读任何东西,什么事都不想做,于是我决定收拾东西。我很想像我父亲告诉我的那样:每件东西有个位置,每件东西都在它的位置上。在这些特殊的日子,我正是这样做的。可这样的日子不多,但那是我一生中的重要时光。我排列好铅笔。我买了自动铅笔的备件,又买了几令纸来写作。

我突然发现了一些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写的东西,例如:  
“我应该找到了各种气味,不冷也不热。有一个壁炉,木柴在燃烧,但缺乏热量。”我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我正在想自己此时此刻所遇到的事情,我找不到热量,使自己深入一个“不完美的故事”。我便不再整理东西。稍后吧,在别的时刻,我自言自语道。过了几天,桌子上又摆满了东西。有时我发现一个小咖啡杯,或者我没有倒空的、某位来访者使用过的烟灰缸。

我肯定,是由于某些事情,由于某种原因,那些东西留在了那里,而不仅仅是由于疏忽大意。

我工作室中的其他东西就更没意思了。一张我坐着写字

的转椅，和放在桌子对面、以便我厌倦了这张椅子时用的另一张转椅。

窗旁的一张躺椅是我最喜欢的。还有一盏挺现代的立地灯，在我读书时为我照明。

还有一把小台几，上面摆放着一只花盆。盆里有没有花朵，那花朵新鲜还是枯萎，全都取决于我情绪的好坏。

我是否让奇格蒙德进来，同样也取决于我情绪的好坏，我让它躺在马布切地毯上。

我喜欢在小说中加入一些我曾祖母的故事。

那个女孩，我以为是她的祖母，在保姆的叫喊声中被一个印第安人模样的女人抢走了。

“有人抢走了我的小女孩，有人抢走了我的小女孩！”

保姆拼命地跑着。在她的喊声中，几个吉普赛人把小女孩扔在了过道里，就这样，小女孩得救了。

还有一个关于曾祖父的美好故事。他抛下他的妻子，长期流亡在智利。过了十五年，有一天他心安理得地回来了。他丝毫不怀疑他的妻子一直在等着他，在同一幢房屋，同一个地方。

保莉娜，我的表姐，将这件事写成了一部小说。

我在想，那些年代里的旅途会是怎样的？

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圣地亚哥之间的往来一般是走公路。

那可怕的道路啊，那里有大风和寒流在扫荡，穿越这种大风和寒流，从来都是不可想象的历险。

菲莉希塔丝就是通过这样一条公路到来的。她大概是在门多萨略作停留，然后到达了圣路易斯。



如果乘船而来,会显得更加浪漫,但可行性更小。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首先就要穿越麦哲伦海峡。此外,这样的穿越,本身就会构成一部小说。

不,她父亲在智利是个有钱人,他派来了一辆专门准备的马车,还有相当数量的骡马,以及旅途中使用的供给,至少够用十五天。她姐姐哈维埃拉和表姐陪伴着她。还来了一些亲戚和一个叔叔。

这些大概与前几章脱节了吧。我应该调整好自己的位置,写一写那里的贫困和气候。

## 小 镇

圣路易斯镇,看上去显得忧郁而悲伤。那里没有什么起眼的东西。广场上有秀美的树木,教堂的门面并不很华美,却非常大,有一所女子学校,另一侧是男校。镇政府的府邸是一座殖民时期的、风格简朴的房屋,建造于本世纪初。镇上没有主要街道,有一些普通的杂货铺,什么都卖一点;菲莉希塔丝在那里可以得到任何物品,从美丽的荷兰花边到一口袋土豆。那里也没有娱乐场所或其他生意或旅馆。公墓、监狱,那些被看作险恶与不祥的东西,都远离被称为镇中心的地方,人们要是不乘车或骑马,都到不了那里。

社交活动都在家中进行。下午,女人们聚在一起缝纫或纺织,孩子们在保姆的监护下,在大院里那结着串串

果实的葡萄架下嬉戏。菲莉希塔丝觉得这一切都很乏味。她差不多还是个少女，与她的女友们不一样，特别是与她的姐姐哈维埃拉和表姐巴斯瓜拉不同。

她的保姆安东尼娅发着牢骚，她能够理解菲莉希塔丝。

他们把这里叫做城镇。但这里只不过有一些建在土马路街道旁的房屋，风刮得叫人没法走路。这里没有林荫道，没有河边小路，没有剧场，没有跳舞晚会。当然，我是不会去这其中任何一处场所的。我，一个死无安身之地的乡下老太太去干什么呢。但我的小姑娘早先是要去的，她那时候过得很好，很开心。

哈维埃拉小姐就要和一个庄园主结婚了。据说，她就要去欧洲。

我一点也不喜欢拉布恩塔，我想我的小姐也一样。尽管她像她的母亲，像那故去的堂娜伊西多拉一样坚强。

愿上帝让她留在天堂。

看来那个老头很爱她，送她礼物，带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他又丑又老。他和我同龄，42岁，比她大20岁，整整差一代的岁数。要是堂娜伊西多拉活着，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相信这位小姐会高兴，她什么也没对我说，但我有好多遇到她在哭。

因为她不得不容忍堂娜莱昂诺尔这个老妖婆，她是那么丑，那么坏，她头发乌黑，眼光像乌鸦的一样。福哉！这个女人不喜欢我的小姐，她唯一感兴趣的是堂塞雷东

的财富。当然，我的小姐会给他生个好孩子。哎呀，糟糕的是，从举行婚礼到现在，已经有一年了，她什么都没生。哎呀，圣拉蒙，让我的小姐赶快怀孕吧，我弄不懂她为什么什么都没有！

我听到人们在议论纷纷。我是有点无知，但我不至于愚蠢到什么都觉察不到。而堂文塞斯劳呢，他整天搞政治、去旅行。很多很多天他都不在家。

幸好阿雷霍少爷来了。菲莉希塔丝小姐和他在一起玩，他们一起打牌。菲莉希塔丝弹竖琴，他很喜欢，他也教她法文。

猫头鹰又叫了起来。你用不着害怕，有人对我说，在这里这是很普通的。但我怕它们。它们每一次出现都会有坏事发生。就在伊西多拉太太死的那天早上，我看见在厕所里有一只巨大的猫头鹰，当时我正要回去睡觉。凡是碰到这种情况，我都按照普里玛维拉夫人的指点去做。我在院子里摆一座十字架，在上面点上蜡烛，祈求所有的圣灵，祈求镇里的保护女神，祈求圣女。但是没有用，魔鬼战胜了我，第二天，伊西多拉太太病情恶化，这个可怜的人死了。亲爱的主啊，但愿别发生什么，但愿我的小姐很快怀孕。要不然人们会看不起她，说她毫无用处；当然可能是他不中用，但在这个男人的世界没人会承认这一点。

我的小姐多么可爱，我什么也不必对她说，帮助她是我的义务。这可怜的人高高兴兴地走过来了，她的鬈发随风飘动，带着和她母亲一样的微笑。

我的小姑娘就是一个女王。

## 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位小姐发育良好，大家都羡慕她。她苗条的身影引人注目，还有她那眼睛的颜色。她比一般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女人要高些，这就很引人注目，哈，哈……”

在挑选我的小母马的时候，我没有搞错。她有点落落寡合、情绪不佳，但是我一定要驯服她。在帕勒莫的舞会上，连堂娜玛丽亚·约瑟芬·埃斯库拉都对我夸赞她。

她指出，是这样的，从她的头发上就看得出，她没有遗产，我忽视了这个细节。文塞斯劳·奥古斯多·雷依纳菲，这不能原谅，未来拉布恩塔的市长！不可原谅！

幸好我考虑到了莱昂诺尔，把她连同她最好的衣服带来了，而且在这里给她买了些东西。应该让她开心，愉快，使她投入到其他琐事中，而不会问些没头没脑的问题。但是看来，她比她那类人更加好奇。

市长也极力称赞菲莉希塔丝，他说我非常幸运，说她非常可爱，而且和蔼可亲。

我想她也喜欢他。当她发现，原来罗萨斯是个长得很英俊的金发男子时，她很惊奇。因为有人对她说过一些事情，也许她还以为会遇到一个无足轻重的黑小子呢。

遗憾的是，我们还不想要一个儿子，因为要是请罗萨斯赏光，为雷依纳菲家族长子当教父，那肯定是一着好

棋。当然，现在离那个初夜才四个月，而且，这些姑娘们太单纯。

那个人显得很自信，而且，对发生在圣路易斯的事情很感兴趣。据说他把可能的起义估计得很严重。当然这匹小公马也不傻，他可能已经知道拉瓦列和其他人正在组建军队这事了。

如果有了他的帮助，我当省长就有把握了。菲莉希塔丝的角色很重要，她必须和堂娜埃斯库拉、堂娜曼努埃丽达以及罗萨斯身边其他拉皮条的人保持良好关系。一句话可能意味着信任，要么适得其反，从而被实行专制，或者被剥夺公民权，反正差不多。

为了等候阿雷霍，我们要再待一个星期。他和与他一起出走的小伙子们一道，将乘下周五的轮船到达。我希望他在法国的三年对他能有所帮助，使他变得强壮些。我这个兄弟总是很虚弱，不能行武，也不能进修道院或者学习法律。可拿他怎么办呢？当画家。那是多么女人气十足啊。在智利，有一个叫鲁赫恩达斯的人，他是阿雷霍在欧洲认识的，他现在是叛贼萨米恩托<sup>①</sup>的朋友。我希望他别和那些人一起来。我将把他带到圣路易斯去，因为我害怕他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这里正在发生的关于青年，以及与他们思想自由化的所有事情，我都感到害怕。

<sup>①</sup> 萨米恩托（1811—1888），阿根廷总统（1868—1874），教育家、作家，于1852年推翻独裁者罗萨斯。

他可能会让菲莉希塔丝高兴。他只比她大一点，也喜欢音乐，诗歌及这类傻里傻气的东西。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个姓雷依纳菲的人呢？但他毕竟是我兄弟，哪怕是为了这个姓氏的荣誉，我也应该保护他。

但愿菲莉希塔丝没有什么机会，去阅读那些来自蒙得维的亚的、严厉批评罗萨斯的书籍、报刊和信件。

如同那个萨米恩托在智利所做的一样。向她解释清楚为什么我要和罗萨斯在一起，以及在这种局势下怎样做才合适，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她多次问起我玉米棒子党<sup>①</sup>是什么，为什么人们害怕下午出门，为什么必须把一切都涂成红色，而且男人、女人孩子都同样系着红带子。她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她真像一个爱发问的小女孩。因为必须这样，不为别的。妈的！这是必须的。我当然没有这样答复她，我否认了一切，但是，如果轮船迟到的话，继续隐瞒下去就不容易了。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千万不能让任何人怀疑我的绝对忠诚，对我兄弟的忠诚也同样不能怀疑，而这些问题或评论，最终可能会成为不合时宜的言论。

无论如何我都应该满意了，我的小女人是所有女人中最漂亮的，她将学会保持沉默，并且跟随她的丈夫一起执政。当我回到圣路易斯时，必须处理中国式的难题，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sup>①</sup>玉米棒子党，即罗萨斯的信徒们的组织。

亲爱的哈维埃拉姐姐：

最近两个月来，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奇的，婚礼之后我们曾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旅行。关于婚礼情况，连这里的日报《商业信息报》都报道了，同样，在我们可爱的圣地亚哥的《信使》报上也有报道(这是多么奇怪呀！)让我抄给你看吧：

“我们收到来自圣路易斯的消息：为庆贺智利优秀的女士堂娜玛丽亚·菲莉希塔丝·戈伊戈切亚·格罗伊萨尔，她同堂文塞斯劳·奥古斯多·雷依纳菲——我们兄弟省份杰出的卓越的社会活动家拉布恩塔市最著名家族的成员——喜结连理而举行了宴会。十一月初，我们的城市将接待这对杰出的夫妇，在那里他们将成为最尊贵的州长及家庭。”

你不为你的妹妹感到骄傲吗？你有什么感想？

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大城市了。旅途很艰苦，我用了十四天完成旅程，这完全是一次探险。乘车旅行的人中还有一对可爱的门多萨夫妇、一位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看望儿子的夫人，以及一位在“拉博拉耶”，或发音差不多的地方下车的乡村教师。

你准会感到激动，我们甚至遇到了一次印第安人的袭击。我从没离得这么近地看过印第安人，除去那不多几个在家里服务的不算。

我为什么要给你说这个大村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呢。

它比圣地亚哥大一百倍，那里有铺石头的路面，夜晚街灯闪闪发光，非常动人。

昨夜我们去了“复兴者”<sup>①</sup>的家。他给我很大震动：他的仪表、他那如此湛蓝的眼睛，他那有教养的举止。

姐姐，我要告诉你这里流传着的关于他的各类故事，他有供他消遣的小丑，他下令绞死某人，这非常不好。我什么都没见到，但他非常奢侈，而且对我很客气。

我们正在等待文塞斯劳的弟弟阿雷霍乘坐的轮船，以便同他一道回到圣路易斯去。

我在这里是如此的愉快，文塞斯劳为我买了帽子、衣服，甚至还有珠宝。

但是我要回去了，这就是生活！哈维埃拉。好景总不长久。

一个永久的真挚的吻！

你的妹妹  
菲莉希塔丝

## 相 遇

正如我一开始想象的一样，我同巴斯多尔·阿莫兰迪在那极为特殊的日子的相遇绝不只是偶然的相逢。

星期四，他打电话到报社，他请我吃午饭。

<sup>①</sup>“光复者”指罗萨斯。



我不加思索,也没有特别激动,立即回答说,我接受他的邀请。

这一次,他选了一个对于我们,或者至少对于巴斯多尔更亲近的地方,那里有他喜欢的奥地利特色名菜。

那是一个奥地利饭馆,叫莫扎特—加斯托夫,巴斯多尔是那里的常客。

我们把刚好十五天前在那家高尔夫俱乐部中断的谈话继续下去,为那天配着黑色黄油的夹馅鲑鱼笑了很久。我抱怨他把我丢在那肥胖的、肌肉松软的金融家身边而他自己却走开了。他好像是为了调解似地解释道,埃米利奥·路易斯·马斯特德·奥尔蒂斯是个不幸的可怜人,从未在任何事上赢过,现在他试图通过拉斯普廷<sup>①</sup> 控制政权的方式拼命来为童年的失败复仇。

我对他说,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应该对他小心。

巴斯多尔发出了他那非常特殊的大笑,对我说,他不相信摩菲斯特<sup>②</sup> 式的人物,即使有这种人存在,也根本不要惧怕他们。除了他第一次对我说的,我对巴斯多尔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坐在一把匈牙利式的椅子上,一勺、两勺、三勺糖,加进一种美味的咖啡,这杯咖啡只好被毫无经验的我吞进去了。

雪总是雪 白色的雪、灰色的雪、阴暗的雪和肮脏的雪。

① 拉斯普廷(1865—1916) 俄皇宫中的一位宠臣。

② 摩菲斯特,即魔鬼。

维也纳。有多少回忆和没有实现的心愿。有多少次失败。我们寻找的简朴世界,可能它与我们擦肩而过,而我们却未曾注意到。当我在那个十月二十日到达福鲁格芬机场时,我连用德语问一声‘早上好’都不会。一个奥地利人,或者确切地说,是个维也纳人,他代表国际红十字会,在机场迎接我。后来我证实了,他好像是从玛丽亚大街的橱窗中被抽出来的。他个子胖,头发金黄,身穿灰绿色的衣服。在他的帽子上也插着羽毛。

我的第一种感觉是非常恐惧。

我一个人在那里干什么?气温零下15度。一场大雪,我以前总是认为美丽的大雪,现在看来是咖啡色的,很可怕。它是又一个敌人。

成千个问题向我涌来,我为什么要逃跑呢,面对监牢,甚至死亡,不是更好吗?我周围的一切都开始变得奇怪了。那天空,那房屋,还有我们穿过的大街。

我根本认不出旅途中我的邻座,那位和蔼的太太向我描述的一切关于那座美丽的、无可比拟的城市。那位太太是来维也纳看望她的外交官女儿和几个外孙的。所有事物的相对性都一目了然。

一小时后,我到了一个由可怕的橙黄色楼宇构成的建筑群,更要命的是,这里的人们管它叫卡尔·马克思。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由于马克思的缘故,才不得不流亡在外。那时候,我以人类原始的感情在仇恨他。这种产生在一个南美人心中的仇恨不难理解,这个南美人的名字,在他死去百年之后,重复着近代历史中许多人的命运,背井离乡。

但是并非一切都如此悲伤。大约一年半以后，我对奥地利和它的人们已经相当习惯了。

我喜欢那所大学,喜欢 39 路有轨电车，还有那个开电车的胸部发达的金发女人。每当我早上八点准时乘车时，她总是在那里。

我喜欢达斯格拉本大街,大教堂,那些完美的图书馆,那是一座真正的修道院，那里收藏着我们这些国家的作者的图书，比南美洲最好的图书馆的收藏还多。

很多朋友与我处境相同，也有几个阿根廷人，特别是胡安·米格尔。我们叫他埃尔·古亚，我和他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迷上了维也纳那些具有探戈风味的咖啡馆。特别是那一家叫做‘莫扎特’的,它在我喜爱的那所歌剧院旁边。它有一种令人喜欢的神秘感，那里有任何人都看得出的共产党的间谍,他们从这张桌子串到那张桌子,把冠币和卢布兑换成先令和法郎。

我还迷上了非常出色的、金发的奥地利女人。

我对于那种语言一窍不通，这一点对人们也有一种吸引力，再说我在那里还是个流亡者。

一开始就是这样。后来我开始隐瞒我的真正情况，甚至把它变成一种秘密,因为不然的话,在交往中总有一种让我不愉快的、做作的开端。

萨拉和我儿子的到达也完全是个失败。她回去了，但卡特里埃尔和我呆了三年。现在他更喜欢和他妈妈一起生活，说他妈妈比我更需要他；有时候这些孩子们真聪明！但是他大错特错。我珍爱他，非常需要他。他是个漂亮、聪明、热

情的孩子。人们说他长得像我，我很高兴他能承认这点，可能他在相貌上真的有些我的特点，尽管与他爸爸相比，他没那么缺乏风度，他更有活力，但不那么健壮，而他也没那么多情。

巴斯多尔在一个村里的急救站工作，他曾经带我去过那里。

他在那里的工作艰苦而困难，今天治疗一个孩子的疥疮，明天为一个阑尾炎患者开刀，或者医治一位绝望的母亲，她儿子几天前被陌生人领走了，目前尚未找回来。

第一天我发现有一群人，大约有十多个人，围在一张桌子旁。他们在开会，我觉得是一个政治性或宗教性会议。有点这样的迹象。

第一个站起来和我打招呼的是保罗·波卡特，一个法国牧师。从那一刻起，我就觉得他是个为人和蔼、内心充满力量的男人。

巴基塔，身上系着白围裙，出现在诊所里。她是个大约25岁的姑娘，带有印第安人的特征，她有一双美丽的黑色眼睛。她带我参观了诊所，那是一间土木结构的大房子，简朴，然而十分洁净。

我还认识了卢卡斯·奥尔特加，他在诊所里，作为护士，帮助巴斯多尔。后来巴斯多尔对我说，他使这个小伙子加入了共产党，他有点像圣雄甘地或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sup>①</sup>。对我来说，今天的所见所闻印象深刻。

<sup>①</sup> 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1182—1226)圣方济教派的创始人。

这个团体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小故事，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注重实利与自私自利的时代里，他们都相当不简单。

我想从第一刻起，我的出现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荒唐的。一个外国佬，资产阶级，记者，在这里能干什么？（这一职业在诊所里完全没有用处）。但是，从星期四起，我已经去过了好几次，我们开始渐渐地互相理解了。而同这些高尚的、正在奋斗的人们的接触，也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丰富了我自己的阅历。

这个团体被政府看作是可疑的。这是一些回国的流亡人员，一些外国修道士与修女，他们不待在富人区，而在穷苦人的村庄里工作。

巴斯多尔·胡维纳尔·阿莫兰迪是所有这些人的无可争议的领袖，这不能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他身边我并不感到很舒服，他的慷慨与智慧令我困惑。我突然觉得，在他面前自己像一只老鼠。

今天我向他说出了这种感觉。我觉得，与其说他像个朋友，还不如说更像一位老师。看来，这使他不高兴了。

我向这位巴斯多尔亮了红灯，我发生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我认为有些危险……

渐渐地，我觉得巴斯多尔的生活好像一个谜，显得支离破碎。

他的生活有很少一部分是他亲自讲给我听的，其他则是他的朋友们说的，特别是我曾经和加夫列尔谈过话。他们从很小时起就认识，他向我讲述了巴斯多尔那非常难以置信的生活的开始；巴斯多尔是她母亲 20 岁时同他父亲——探戈·

阿莫兰迪·巴斯多尔之间‘一种激动的爱情的结果’。探戈·阿莫兰迪是一个著名部族首领的儿子，当时他父亲在为阿拉斯门迪家族工作。那个家族在南方拥有大块领地。这件事在当时看来是件大丑闻，尽管事情的细节没人清楚地了解。对此，巴斯多尔既不隐瞒也不谈论。看来，事情是以探戈奇怪地死去和巴斯多尔的母亲嫁人的悲剧形式而结束的。两年以后，她嫁给了现在的丈夫，他也是个有势力的农夫，他们又生了三个孩子。

从他的父亲那里，巴斯多尔只继承了他母亲不允许他更换的姓氏，以及那些印第安人的面部特征。

自从认识了巴斯多尔‘枯燥’这个不愉快的幽灵，对我来说就不存在了。没有一天是与另一天相同的，要么是我去参加一个陌生的世界，从而有了新的经历，要么就是我们去剧院或电影院，或者我们只是呆在家里，或是在某个咖啡馆、餐厅里聊上几个小时。

我们聊些什么呢？我们的交谈当然不仅是关于政治或社会的。巴斯多尔对我的生活、我在法国干什么都感兴趣，他问起我的孩子和皮埃尔的情况。

另外，由于我们都喜爱阅读，我们就进行文学方面有趣的谈话，但是我们几乎从来不一致。他为所有的俄国人激动，特别是托尔斯泰。他还对萨特、加缪感兴趣，而我则试图使他对拉丁美洲的作家产生兴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鲁尔弗、多诺索等人。他并不为自己辩解，他太了解这些国家的现实了，用不着别人，特别是作家来向他描述。

由于这个家伙，我正在发生变化。我担心，如果有一天他

不给我打电话了，我会问自己为什么苦恼。我希望他看到我漂漂亮亮的，我买了几件东西，一件黑色绒线衫，一件非常漂亮的纯绿色大衣，几条我喜欢的裤子。此外，我还去了两次理发店，这对我来说很不寻常，因为坐下来等着让人服务，同时看着那么多女人为了更漂亮，或者试图让男人感觉更美而做出的可怕的丑态，对我来说这“讨厌极了”。这是对我不赞成或者说过去不赞成的大男子主义的一种让步。总之，我不能对巴斯多尔无动于衷，甚至当他哪怕是偷偷地看另一个女人时，我都会产生醋意，尤其是在我认为那个女人比我漂亮的时候。

我也认识了他儿子，加特里埃尔，他很像他爸爸。满头长发而不显累赘，黑眼睛，目光柔和而天真。

阿雷霍长得像他。瘦弱、和蔼而优雅。他已经在故事中出现过了，就是在新婚夫妇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旅行中，但我还未描写他。他应当是那个时代典型的青年。有点像马尔莫尔<sup>①</sup>、埃切维里亚<sup>②</sup>、阿尔维迪<sup>③</sup>，他既不能服务于军队也不能服务于教会，他被父亲派往法国，想让他做点什么，不管是红与黑<sup>④</sup>，他带来了那里政治的和文学的新闻。他按欧洲习惯穿着，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讶。他读过维克多·雨果、拜伦、大仲马的，以及被称为浪漫主义时期的所有作品。他还带来了肤浅的新事物，如舞蹈和沙龙游戏等。

① 马尔莫尔（1818—1871），阿根廷作家，小说《阿玛丽亚》的作者。

② 埃切维里亚（1805—1851），阿根廷作家，小说《屠场》的作者。

③ 阿尔维迪（1810—1884），阿根廷政治家，曾因反对罗萨斯独裁而被流放。

④ 红与黑，红指军队，而黑指教会。

拉布恩塔的年轻姑娘们都喜欢他，特别是文塞斯劳的表妹安娜，但是看来，阿雷霍并没有看中其中的任何一位。他只愿和菲莉希塔丝散步、做游戏，另外他和她同样对马有很高的热情。

突然我有了灵感，能加快小说的进展，谁也阻挡不住我的灵感。

然而另一些时候，这些人物则消失了。我被这里发生的一切或者我正在经历的一切所困扰，连一页也写不下去了。

然而，我定了一条自以为会产生效果的规矩，要么上午闭门写作两三个小时，要么下午，或者更确切地说晚上，闭门写作一两个小时。

在任何方面都要进行自我约束，这一点很重要。从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就这么想，因此，我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有很大的自由，我必须自己把握分寸，道德上的平衡，精神上的限制，要发现一些对我来说是好或坏的东西。现在我想，我所预料到的与巴斯多尔的这种新关系也必须受到约束。

不知因为什么隐秘的原因，我开始有了一些被我称之为宗教性的忧虑。有一天，我竟然不知不觉地走到了礼拜堂，它是保罗修建的，就在诊所附近，我想背诵一篇祷文。除了“我们的在天之父”，我已经什么也记不得了。如果说我曾经真的接近过教堂，那也早已是少年时代的事情了。

那时我不接受限制与局限，特别是在脑力发展方面的局限。我喜欢阅读所有的东西，在电影院或剧场里，我什么都看，不允许任何人禁止我做任何事情。我看到了加夫列尔、保尔、特里尼达，我突然很羡慕他们，对我受过的不可知论与自



由化的教育有些反抗了。

巴斯多尔不是一个做礼拜的信徒，但是他相信一个他曾多次求助过的好上帝。在他的宗教信仰中，激情多于理智。是一种被我称为宗教的野蛮形式，它与另一个严肃、智慧、沉默寡言的巴斯多尔毫不相干，或者什么都有一点。

## 卢 卡 斯

我经常和卢卡斯·奥尔特加在大街上相遇。

我原先不知道报社的办公室离他进修四年级课程的医学院很近。

前三四次我看到他和别人在一起，一个大学同学或者一个他带着相当庄严的神情说的‘事业’上的同伴 每次他这样说，都会引起我的柔情。

我们打招呼，但他从来都不把他的伙伴介绍给我。

可今天，就他一个人，他站住，请我喝一杯咖啡。我们去了一个地方，那里从店主到老主顾，全都认识他。

开始下雨了。雨下得很大，尽管现在差不多已经是夜里十点了，仍然在下着雨。

也许因为正这样，我才心情不佳。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就这样，卢卡斯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谈：

“我害怕，我的心情很忧郁。”

“为什么，有什么坏消息吗？”

“以前平静了的政治迫害，现在又加剧了。”

他已经得知了最近一周的‘宇航员’行动和‘太平洋’行动……我觉得这些有点蹊跷。

“你和巴斯多尔谈过这一切吗？”

他不敢那样做，因为巴斯多尔会由于看到他很多疑而不高兴。但正是他的害怕使我确信，他不是为他自己害怕，而是为巴斯多尔。

这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如果他发生什么意外，那将会多么可怕。他注意到了巴斯多尔是我们最重要的支柱吗？他还讲了关于他个人的很多事情，以及他是怎样加入共产党的。他父亲在两年前已经死去了，那是个老共产党员，在一家发行量不大的日报工作，撰写一些宣传鼓动性的文章，捍卫人民，激励他们的斗争。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他把这种精神世界完全传给了他唯一的儿子。这个老人不在乎斯大林的真面目被揭露，也不在意揭露出来的斯大林时代的迫害，在那时，很多最优秀的人死于清洗运动的审判中。同样，卢卡斯对古巴革命、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被毁灭也不持疑虑；让他痛心的是农村的景象、社会差别、机遇的匮乏，由于在医院缺乏健康护理而死去的人们，以及在街头乞讨的孩子们。

他的理论很简单，他希望看到幸福的人们，他们生活在属于大家的土地上。他相信现世的王国，除了革命之外，他看不到其他能产生变革的方式。

卢卡斯很腼腆，看来他是那种怕给别人添麻烦而克制自己的人。他很有热情，这种热情是此地人们的特点。但是当谈到什么使他感兴趣的话题时，他就变了，就变得放开了。甚至连人都显得更高，更年长了。

这个小伙子是如此可爱，充满了美好的激情，光明磊落。我几乎没问他什么个人情况，无疑，由于某种充分的理由，他故意将这些隐去了。

我对他说，我的孩子已经 12 岁了，他们很快要来看我，我很高兴让他认识他们。

他是一个和他同龄女孩的未婚夫，但他们希望很快就一起共同生活，因为女孩的父母是‘富人的仆人’；他们一点都不想了解他，并且对他相当反感。卡塔莉娜，她叫这个名字，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幸运的是，她也聪明。

喝完第一杯咖啡，我们又吃了一盘面条加猪肉，是我请卢卡斯。我想继续和他交谈，但是我感到他饿了。

我没搞错，从前一天下午起，他就仅仅喝了几杯咖啡，早上吃了一一份夹了一点奶酪的三明治。他们家里正过着清贫的日子，他母亲是位助产士，但由于她死去的丈夫和她的儿子加入了共产党，她就被解除了工作，现在只能加工女式运动裤。他的两个妹妹，一个 12 岁，一个 10 岁，也帮不上什么忙。除了在诊所里工作能挣点工资以外，他还在一个富人区为人们注射、量血压、教数学和教卡斯蒂利亚语。巴斯多尔为他找到了一些教课的工作，也送给他一些衣服。

他穿一条灰色的裤子，一条领子也是灰色的运动衫和一件羊皮外套，那是巴斯多尔的弟弟胡安·路易斯·拉腊斯蒂亚的。从整体上看，他显得洁净、整齐。

由于他留的头发式样和蓄的短胡子式样，他可以毫无疑问地被人们看作一个中产阶级医科学生，一个嬉皮士。

这个小伙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是如此地值得信赖，

如此透明，就像他如此简单的经历一样，他的经历同许多人的  
一样简单，他以这种方式确定了他的生活。

我想起了我弟弟塞巴斯蒂安，自从我去法国起，到他失踪  
的最后几个月里，他的情况会是怎样的呢？我想，可能和卢卡  
斯的一样。我们属于一个小资产阶级，甚至更高阶层的家庭，  
可是，我和塞巴斯蒂安、米格尔、保莉娜、胡莉亚以及许多其他  
人，我们都认为变革是可能的、必须的，而且我们能参与到这  
种变革之中来。那么多人都是为了他们的信仰死去了，如此徒  
劳地毫无用处，我这么认为。

我也想到了卢卡斯·奥尔特加，他的未来、他的幻想又会  
怎么样呢？想到他为什么会参与这一切时我感到有点恐惧与  
悲伤。

但是，让我们继续说说罗萨斯吧，我总为他人格的不同侧  
面着迷。他与别的当代暴君有相同之处，这些人并不都是阿  
根廷人。他们是如此黑白分明，自相矛盾。

我想起在学校里的一次讨论会，那时我正在修大学四年  
级的课程，我为罗萨斯辩护，而另一个同学充当检查官。陪审  
团由同学们组成，由历史教师来宣读判决。

这很有意思。按照逻辑，对他的判决是不可能减轻的，因  
为历史老师是个强硬的反罗萨斯主义者、自由派、萨尔米恩托  
主义者、米特雷<sup>①</sup>主义者以及谁知道什么人士呢。罗萨斯被宣  
布为暴君、凶残的人、叛国分子、没有道德，也许他们搞错了吧。

但是，一个人若是阅读他的传记，有上千种之多，那给人

<sup>①</sup> 米特雷（1821—1906），阿根廷总统，曾与罗萨斯独裁进行坚决斗争。

留下的印象是,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既粗鲁又细致、既野蛮又凶残,可以从事最精细的工作的人。

罗萨斯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大家族。他的先辈们历经几代艰辛,在拉布拉塔河上定居下来。因此他属于名流,不仅因为他的门第,也因为他的财产。

罗萨斯受他母亲的影响最大。他本人年迈时承认:“我没有一天不回忆起母亲,不为失去了她而神伤,而且为我没有像自己希望的那样多陪陪她而难过,因为各种杂务妨碍了我那样去做。”

关于他外貌的描述,也是互相矛盾的,他那个时代的人们谈论他,可他们并不认识他本人时,都以为他是个壮实的矮胖子,然而堂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是个金发碧眼、面目清秀的人;但是他却穿着高乔人的奇利帕<sup>①</sup>、领子系得紧紧的衬衫,带一条红色领巾。大自然赋予了堂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一副结实的体格和指挥者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条件。

## 终于会见了

“您知道,小姐,人们总对伟人发表很多令人不快的议论。某个人,人们把他看作独裁者,但是,人们不强迫他长时间地回报他成长其中的社会,他曾被某个记者评论为‘像加勒比腐化堕落者一样残酷,像腓尼基人一样具

<sup>①</sup>奇利帕,阿根廷高乔人典型的套裤类的服饰。

有亚洲人的贪婪，像猴子一样淫荡’。这一切都发生在人们点头称是、随波逐流的形势中。然而他热爱自己的民族，就像我热爱自己的民族一样，我希望看到他们一天天好起来，变得自豪，而没有极端主义分子的子弹在他们的大街上和林荫道上呼啸。

“尼禄、拿破仑、庇隆，但是我的姓氏同他们的姓氏并不押韵，哈，哈，哈，

“我知道有些人称我是暴君，而不把我称为诚实的人、爱国者、宪法之父，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之前，这个国家是个什么样子？那时候是个小国。现在，它改变了，已经将整个地区甩在了后面，甚至在其固有美德方面，把美国也甩在了后头。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我们只需要一些朋友，他们理解我们的使命，并且出于不同理由而站在我们一边。我们最坏的敌人是那些身穿道袍的人，尽管现在他们不再穿道袍了，但他们可能是魔鬼。他们为什么仇恨我呢？我只是带来了创造和平的剑，把和我在一起的所有的人变成了真正的兄弟。我有一项使命，上帝向我微笑，夜里在梦中，一个天使把我高高举起，我到了至高点，我就是耶稣，要清除毒麦，使它不再萌芽，而我的海军准将们、我的将军们、我的海军上将们，还有，特别是我的两刃剑，是我的右手。他们知道，一旦我撒开这只手，一切都会像地震中的裂缝一样陷落。我是一个现代人，我的政府不能被人当作一座大香蕉园，我的政体是独裁，然而有效率。我不卷入讼棍的争辩，不同过时的政客争吵，以此来消磨时间。我尽管 80 岁了，还是比我的

任何一个战士都更强壮更富有活力，而且每天我都在证实这一点。我是一个军人，我不会拉选票。开门见山，如果必须斩断，就斩断，如果必须说服，就说服。

“我知道，我的典型人物并不完美，否则他们永远都不会倒下，也不会被战胜。但是我想象过，如果他们不像所做的一样，为他们的人民服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希特勒实际上是个例外，他确实完美，如果没有他，我们都要变得像黑人那样，变成一个迟顿的，不爱劳动的种族，或者变成犹太人，他们是高利贷者，充满偏见，他不具备被现在的博士们称为“后现代主义”的那种毛病。可能我是个坏大学生，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为什么要改变这种事实呢？面临书籍和命运，我选择了命运。

“因此，我赢得了所有的选举，我难道不是每五年搞一次选举吗？这样我就封住了那类人物的嘴巴，因为事实上他们从未满意过。

“小姐您笑了吗？

“看看您是多么自由。您可以这样做，而没人会因此而砍掉您的脑袋，或者像传说中我命令所做的那样烫伤您。

“确实，没有我的操纵，这个国家的人会一动不动，但事实上我是个仆人，一个慈父，当孩子们犯错时，特别是为了避免他们受诱惑时，我惩罚他们，以避免他们变得淫荡。当夜晚开始响起宵禁号时，大家都要睡觉；丈夫们要回到妻子身边，而不要躺倒在卖淫者的床上；孩子们在黎明也没有时间拜倒在酒精、毒品或同性恋的脚下，我甚至

不允许他们留长发和胡须，留胡须是危险的，容易混淆。随着清洁运动的进行，妓女们不得不移往他方。实质上，我们是杰出的外科医生，非常仔细、整洁而细心，双手强有力，我们使一切秩序井然，直接除去病根。您看到公路、公共园林、拱廊和可与天比高的建筑物了吗？您听说过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吗？这种设想就是建造类似金字塔似的建筑，而且，让最美丽的鲜花从那里垂下来。难道您没有注意到，我是怎样把大自然变成一个伊甸园吗？

“我们应该拼命工作，而人民应该理解，参加到我们的服务中来。

“因此我决定开创这个特奥非洛<sup>①</sup>运动，以使那些坏人犯错并受到谴责。而在人民和我之间，我是代表。

“外国人，当然你也包括在其中，由于不知道怎样看待问题而搞错了。你们在毒害我们，希望在这块土地上唤起你们认为唯一可行的制度，唤起民主制度的政治激情与陋习。

“孩子们都追随着我。14岁时已加入了祖国的民兵组织，种种传说都是谣传，说什么绑架啦，不让孩子们回到父母家里啦，还让他们去说不定是什么地方，对他们进行野蛮教育，好让他们在社会上也变得像野兽一样。

“我的崽子们都朴素自然，留着非常短的头发，穿着一件漂亮的、闪闪发光的制服，就像教士们穿的法衣一样，而现代的异端浪潮中，经过第二次梵蒂冈教务会议的

<sup>①</sup>特奥菲洛（生卒年不详），希腊法学家，希腊宪法起草人。



篡改，已经允许教士们不再如此穿着了。我年轻的民兵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变得强壮，高尚，服从命令至死不渝。这就是一切，没有什么秘密。‘精神健康的人身体健康’他们进行能使人精疲力竭的体育活动，做很多锻炼，连对他们的营养都应当注意，以避免进食过度并产生幻想。

“我热爱完美，但是我在世界上工作，并不因为只从事了一些艰难的工作，我就成了上帝，我做的是凡人的事，我丝毫没有削弱他的形象。

“这是我的责任，我为此而出生。我不能放松，如果我一放松，人们就会骑到我头上，因为他们听惯了军人的语言，而不是那种软弱的、松懈的下流语言，就像某个修士所说的一样，他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我的部长们也应该有同样的特点。他们在上任前发表一则简短的演说。有时我对他们宽松一些，允许他们留长发，或者有其他弱点，但这是必要的让步。

“关于妇女在这一新秩序中的作用，她们崇拜我，因为我给了她们表决权，而且她们总是以我的妻子为榜样。

“卡桑德拉·杜尔塞。

“我说她的一切都是多余的，因为您肯定知道她的工作，看到她分发食品，看到她对穷人的关怀。穷人的存在是必然的，但他们必须尽量少受罪。

“这里没有特权阶级：大家都有同样的义务。权利，确实是受限制的，但是如果不知道怎样使用权利，并且把事情搞得复杂，权利又有什么用处？

“确实，我们的控制监视设施什么都知道。比方说，请允许我开个玩笑，我知道，我们清楚地知道，您现在的男友是谁。您曾和那个法国人在一起。

“巴斯多尔·胡维纳尔·阿莫兰迪要是不改变的话，他的末日就要到来了。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告诉他。

“我们随他去，是给他母亲的家族留点面子，您知道阿拉斯门迪是开创这个国家的家族之一。他可怜的母亲和兄弟们！我们也正在玩捉狐狸的游戏，就是要在狐狸的爪子伸进了圈套后，想用头来摆脱圈套的时候再抓它。现在有个调解措施，请您去对他说，您可以对他产生好的影响，而又并不是帮我们的忙。我们可以原谅他，甚至可以口授一份赦免令给他。

“我是绝对的首领，因此，我想做的事都会实现，而且我可以对迷途的羔羊宽宏大量，请您告诉他，省得他将来后悔莫及。

“告诉我，小姐，为了对那些说我是一个清洗教派的头领的人做出回答，这里有些非常微妙的文字游戏，它们在和平世界中不会杀死任何人，您不认为这有点像亨利八世的所做所为吗？当时罗马是扎在亨利八世脚跟上的一枚刺，于是他建立了圣公会，以便使自己家里恢复秩序，并且赶走了那些寺庙中的商人，难道现在的共产党人不是另外一些寺庙中的商人吗？根据情报部门对我说，您是一个聪明的女孩，您一定会明白。我用比喻的方式是为了我们能更好地互相理解。确实有人说话放肆，说我有成千上万公顷国家的土地。他们撒谎，因为这些土

地属于国家元首，而不属于我，国家元首既是个法律实体，又是我个人。我怎么成了土地的主人呢？

“我很高兴，因为您让我讲话，让我体面地向您展现我的原则，没有像那个法拉奇<sup>①</sup>一样粗暴无礼。您认识她吗？您不是意大利人也不是共产党，这很好，但是，姑娘，您要小心，您看看那个可怜的法拉奇疯狂地爱着的游击队员的事情吧，连点燃火柴发出噼啪一声的时间都没有，他就不复存在了。

“我想您会理解我，我是一个人，和大家一样，当然，我很坚定，总是在避免超出界限。

“我的使命还没有结束，坦白地对您说，刚刚开始。您知道不存在什么政治犯。这个国家已经过了清扫，一些人被判死刑，另一些人被流放了。侵蚀这个社会的恶性肿瘤已被连根拔除了。但是那些梦想着放荡、淫秽的瑞典，眷恋着俄罗斯的大草原和红色歌曲的人们又怎么样呢？他们想回来呢？为了回来，他们敲打领事馆的大门，像歇斯底里的女人一样哭喊。是的，他们想回到我们的天堂。

“而您在这里干什么？您看，我不是接受您的采访了吗？我已经毫不隐瞒地谈到了一切。我很尊重地对待您。您爱着那个印第安修道士，这多令人遗憾呀！您最好好像有人比喻的那样，您在热带‘睡着了’，这样对您更有

<sup>①</sup>法拉奇，意大利著名女记者，采访过许多世界著名要人，以其锋芒毕露的采访方式出名。

利。您要是回到法国去更好，为了您，也为了您的孩子们。

“在这里，人们应该非常小心，因为我控制不了我的力量，有时我的小伙子们逃避我的控制……”

“在那些照片登出来之前，我喜欢先看看。有时好像有意给我画上些皱纹，让我的下巴凹陷，篡改我的面貌，或者让我的腹部突出。”

“我想我们会相互理解的，您看，我并不像反对派所描绘的那样，是一头嗜血的猛兽。”

我带着一种奇特的感觉走了出来，一方面，他确实无所不谈，另一方面，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恐惧，害怕有人在出口处等着我，从而将不再有人知道我的消息了。

我继续做着关于罗萨斯的笔记。关于他的书籍、关于他的不同侧面的书籍有那么多，以至于我可以利用几个月的时间来阅读书本，写那位上个世纪上半叶出现在阿根廷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人物。他的统治持续了二十年，其中某些阶段是血腥的，连他的赞颂者们也承认这一事实。1840—1841年这一年，被称作恐怖年。那一年在消除了拉巴耶将军的前进所代表着的威胁后，独裁就更强硬了。为了推翻罗萨斯式的军阀们，拉巴耶将军在本省的北方创立了军队，而军阀们在库约地区是强大的。

这种恐惧总与很多的命令结伴而至；外国人由于他们在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享有的安全以及经济利益而感到很高兴。”

“罗萨斯使用了很多引诱的手段,特别是针对那些同独裁者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寻求地方色彩的英国资本家,残忍与野蛮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对采访他的人或村镇中的某个人,罗萨斯经常使用的另一种迷惑手段,是讲述他还是高乔人,当庄园管家时,他在边境同印第安人战斗时度过的岁月。”

当我给巴斯多尔念某一段我的笔记时,他被吸引了。他注意到,在那个遥远的独裁者与这个他们现在还不得不忍受的独裁者之间,竟存在着相似之处。在罗萨斯二十年的统治期间,同样是血流成河,同样有砍头和绞刑。

“要公正审判这位准将,必须要考虑到那个产生了他的革命形势,那些将残忍不仅当作一种统治手段,而且当作一种政府行为的嗜血习惯。”

“罗萨斯准将非常清楚,如果他放弃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再也回不来了,因为一旦丧失了他力量的威望,各个地方将涌现出最残暴的敌人来消灭他。因此,他宁可接受任何条件,也不愿冒被赶出首都的风险。”

“任何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瓦勒夫斯基这样写道,这位波兰伯爵在他那本杰作《拿破仑一世的女儿在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的统治下的拉布拉塔河国度》中这样写道。

“对拥护中央集权的野蛮人(罗萨斯准将非常注意,将他所有的敌人与他想掠夺的人均冠以这种评语)之外的所有人都平等公正,为其查抄平民的财产开脱罪责。

尼禄、拿破仑、斯大林、罗萨斯及那么多其他的人,那些最近的、最当代的,平民百姓,人物不同,却非常相似。权力,这个使人疯狂的撒旦的失控,使他们自认是永恒的,是上帝的使者。它使得他们一时间成为巨人,并且使他们忘记了泥污与死亡。历史,以及别人的经历,都与他们无关,这种为权力而产生的狂热,在巴尔加斯·略萨的书中被描写成迷人的能力,尽管现在他本人也加入了为获得这种能力的游戏中去了。据说,和情爱相比,权力所产生的激情更强烈。”

也许他们没错。

我并非傻瓜。我知道那种种严刑拷打,那种种对人权的粗暴践踏,那些不能返回祖国的人,以及自由的缺乏。每天我都在写这些。而且,每当我靠近巴斯多尔和他的朋友们时,这一现实就更加显而易见。

但在这几个月中,我已经习惯了在现政权建立的秩序与平静中生活,干干净净的街道与公园,见不到弄脏墙的政治宣传性广告,没有电视辩论,也没有反对派的日报,只有几本被追查的杂志,以及一些秘密的私下谈话。

我曾经以为自己对恐惧做好了准备,但是昨天我才注意到,虽然我生活在一个我与之保持距离的世界,我只不过从中穿过,而不受它的影响。

我去机场同居依·杜切努瓦告别,他是我们通讯社的社长,对拉美几个国家访问后,他要回巴黎了。我用我的标致牌汽车把他送到机场,克劳迪娜陪着我,她是我的一位法国朋

友。回来时我走错了路，警察不让我从那边过。有很多警察。

“为什么？我问；发生了什么事？”

“您是谁？警察问我。

“我是《巴黎时报》的记者。”

“您最好快开走，您不会看到什么令人愉快的事。”

我继续开着车，并试图藏在一座小山后面，那里长着茂密的树木。

我不知自己为什么留在那里，在那种时候，一个人会不知道害怕，也缺乏理智。

我不认为自己是出于勇敢，但我不能心安理得地继续走我的路。

当我到达通讯社的大厅，并试图讲述我刚刚看到的情景时，一种混杂着不相信、恐惧与疯狂的奇怪的感觉产生了。

让·奈特，一个不久前刚来的同事，此前她在中国呆了几年，她开始哭泣，像个歇斯底里的女人一样，她哭个不停。

塔德奥找来一瓶威士忌，非让我喝了它不可。

堂·克里斯多瓦尔，通讯社的一位老职员，开始用他70岁老人特有的粗嗓子祈祷、唱赞美诗。

是我，阿古斯蒂娜·雷卡德，我看到了。我是目击者，而不是别人对我说的。我看到了那些拼命奔跑的小伙子，因为他们身上着了火。

一开头，我已经打算从藏身处出来了，因为我以为那是一起事故。但是，当我看到有人把这些小伙子裹着毯子塞进一辆卡车，并且用枪托击打少数几个敢于靠近的人时，我想到，我这样做真是玩命。我想起了那一天，居民们呼吁举行一次

游行，这就可以解释清楚了。

“在……天早晨,由……号召进行总罢工的前两天,两个年龄分别为 19 岁和 20 岁的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一队身穿制服的武装警察巡逻队队员给活活烧死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看到。通讯社发送的海底电报也不会签上我的名字。

这是一条命令。他们不希望有更多的牺牲品。如果不服从，我应该立刻离开这个国家，返回巴黎的时报总社。

我看到了恐怖。我只想休息，不会有任何下一个目标。我想独自一人。不想看到任何一个男人，一个女朋友，一个孩子。我不想去电影院，也不想听音乐。

我一本书也不想看。我再也不想当记者，也不当作家了。我想消失，但我不想死亡。

二十年间他首先统治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是整个国家绝对的主宰。

直至今天,阿根廷人仍带着强烈的感情,分裂为罗萨斯主义者,和我们这些带有鞭尸愿望的反罗萨斯主义者,分裂成支持或者反对将他的遗骨从背信弃义的英格兰移来的两派,分裂为具有同样真正激情、不分时代与时间的萨尔米恩托派和反萨尔米恩托派。

不论祖籍,不论属于哪个阶级或经济状况,理论上都产生影响的重要人物,但有些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专制主义者是第一代移民的后代。



我的国家真奇怪。

我想，对聪明的社会学家来说，分析这种现象也不容易。在同一个地球的其他部分，能简化事物的归类划分，在阿根廷好像就行不通，或者说，要以其他形式通行。

难以置信！我以为即使不是这种情况，我也能认出他来。

红头发，火红的头发，比他爸爸的头发更红，比他爸爸个头更小，但长着同样神情紧张的眼睛和大大的鼻子。

我通过兄弟们知道他的存在，但甚至没有在照片上见过他。

他出生在塞巴斯蒂安被害前几个月，从那时起，就和妈妈安德莱娅一起生活，她是柯连特斯省的物理老师，那是属于阿根廷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个省。

他叫克鲁兹，就这样干脆。这是个漂亮的名字，和神奇的马丁·菲耶罗的朋友<sup>①</sup>一样。也许，选择这个名字有某种宗教意义，因为无论塞巴斯蒂安还是他的妻子，他们都信教。

这个克鲁兹现在来了，要和我待一段时间，打破我的孤独，并使我重忆过去有过，而现在从某种方面来说已不复存在的生活片段。尽管看来，这些片段又以某种方式出现了。他很有趣，而且极有幽默感，尽管有些腼腆与沉默。

他现在的志向，与我亲爱的兄弟在他这个年龄时的志向没有多大关系，他研究物理，喜欢音乐，擅长所有技术性的事

<sup>①</sup>即克鲁兹，《马丁·菲耶罗》是阿根廷民族史诗，何塞·埃尔南德斯（1843—1886）著。克鲁兹是这部史诗的主人公马丁·菲耶罗的朋友

情,比如计算机,我管那叫控制器,他对我简化事情的精神感到很开心,接受了我的简要精神。他正好是上星期六到来的。我正在小客厅,当他出现在门口时,我正好要吃饭,他步履轻快而坚定地向我走来,并微笑着对我说:

“我是克鲁兹·雷卡德,塞巴斯蒂安的儿子。您有地方吗?可不可以让我和您一起住几天?我立刻拥抱了他,感到他很可亲。看到他,这使我很激动,尽管我深深地呼了口气,仍止不住哭泣。

他看着我,除了他目光中一束特殊的光芒以及嘴上的一个没掩饰好的表情之外,我察觉不到他有任何悲伤或痛苦的特殊感情。

我请他帮助我使用计算机,我在计算机运用方面仍有问题。我不是丢失文件,就是出错。

他乐意帮助我,于是我战胜了‘技术上’的困难。对我来说,这些困难是不可战胜的,而对他来说,则不足挂齿。这个克鲁兹真是好人,看不到他曾经受过伤害的痕迹,他也从不怨天忧人。我要把他介绍给卡特里埃尔,我想同他在一起,他们将会多么情投意合呀。

我们交谈,他问了我很多关于我们家庭的生活问题,他爸爸是怎么样一个人,他是否开心,是否喜欢体育、音乐。他有什么的穿着爱好。

昨天他认识了巴斯多尔,巴斯多尔喜欢这个孩子。克鲁兹也认为他棒极了。但是,巴斯多尔不愿意我把他带到诊所去,他劝我不要对克鲁兹讲那些我们在那个时期经历的事情。

“他已经受过太多的苦难,不能再经受类似的情况了,在

可能的情况下，让他在这里生活得尽量愉快些。这里的生活可以抵销一切。”他带着些许苦涩补充道。

这是事实，我以为，也许，一个人可以生活很长时间，而觉察不到任何事情。

“夫人，要问您一个幼稚的问题。是这种红色，确实是这种红色。塞巴斯蒂安为什么这么瘦？你从哪儿来？”

非常洁白的雪，然后变得非常肮脏的雪。很多雪，也很冷。

“塞巴斯蒂安，你冷吗？”塞巴斯蒂安笑了，他常常笑。

“我一点都不冷，而且我要让你惊喜，算是一个礼物吗？”

“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

“他叫什么？”

“红红，红红，他叫红红。”

他是个漂亮的孩子，长着红色的鬃发。

“来吧，姑姑，我们到公园去玩，我想跑跑，看看那个湖。”

“不，湖水不流动，河水更干净，我们去河边吧。”

“又看到你真好。我真高兴。你一点儿也没变样。”

（塞巴斯蒂安蓄着胡子，留着红色长发，穿着白色郊游灯笼裤和一件黑色斗篷。塞巴斯蒂安微笑着，就像那野生洋李树一样，他还带着他漂亮的儿子红红。）

我记得，几个月前我就有过这样的梦。当我醒来时，

这些形象总是既清晰又丰富。也许，这与我目前的孤独有关，也许，因为我少了些压抑。

## 生 日

昨天,10月29日,我们去巴斯多尔家,给他过生日。

奇怪的巧合,皮埃尔也在同一天过生日,两个人都是天蝎座的人。

他想庆祝生日,这使我们所有这些最亲近的朋友都感到吃惊,因为整个这段时间,我们正经历着这样的时刻,他显得比平常更忧虑,更沉默寡言。

当我赶到时,迭戈和卡门已经在那儿了,还有他的兄弟路易·菲利佩。后来塔德奥和特里尼达也来了。卡特里埃尔带着他的女朋友,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年龄不超过17岁,金发,面色有点苍白,但是很有活力,好像她使他很高兴。

巴斯多尔亲自开门迎接我。他听到汽车的声音,猜到是我。我看他有些疲劳,他的黑眼圈像以往一样,使他减少了那双眼睛的魅力。然而,尽管他显得很疲惫,眼睛仍闪闪发光,这种闪光已经开始使我感到亲切了。它们减轻了他的忧虑与痛苦,并且表明我的到来使他感到喜悦。

“你多漂亮啊,我喜欢您穿红衣服,”他一边靠近来吻我,一边说。

“你对我这样说,我真感到幸运,因为,我差不多耗费了一个小时,来选择穿什么衣服才能让您喜欢。”我撒娇地回答。

他哈哈大笑。我喜欢巴斯多尔响亮的发笑方式。他接受了我带给他的礼物，一本保存得非常仔细的《阿德里亚娜回忆录》。巴斯多尔的法语、德语都讲得很好，英语和俄语也相当好。我想，在他身上也许还保留着印第安的智者和翻译们的某些特点。他的祖先们知道那么多的事情，以致于尽管有西班牙人以及他们的武装力量，这些知识仍然能使他们生存下来。

人们总是不断地为巴斯多尔感到非常吃惊。

他知道一切，而且了解得很深，但是他并不狂妄，或者卖弄学识，也许我有些盲目，以至于我至少没能察觉到。相反，当我对他说由于他有这么多知识，使得我灰心，或者对他说，他具有智力上的天赋时，看上去他想请求我原谅，并且想抹去他的优势，而不是借此自夸。

我们登上了平台，大家在迭戈和曼努埃尔的帮助下，正在那里准备烤肉。那一夜很炎热，天空看起来特别美。

巴斯多尔居住在这个城市的高层地区，没有一点儿烟尘。

我取笑他们做烤肉的方法。由于我的沙文主义观点，他们认为我是“难以忍受的阿根廷女人”。

实际上，唯一重要的是看到巴斯多尔近乎满意的严肃模样，为此我甘愿吃一块烤得相当糊的肉。

后来我们躲进书房，这里简直是巴斯多尔的庇护所。

这间房屋与家中的其他房间分离，整幢房屋面对着一座生长着柠檬树的院子。

开始，当他拉开灯时，屋子里好像一片混乱。但后来我仔细地看了看他的书架，那里有很多书，按照题目和国家井然有

序地摆放在那里。南美作家的著作很醒目，有政治类、经济类，但是也有科塔萨尔、奥克塔维奥·帕斯、博尔赫斯、圣胡安·德拉克鲁兹的书。

我是个对读书要求甚严的图书爱好者。在我看来，这简直太妙了。

“缺少女作家，你别搞你的大男子主义。”我评论道。

“这归咎于你们没有出书。等你出版小说时，我保证会把它放在最醒目的地方。怎么？我们不在这里待一会儿吗？远离尘世，来聊点什么，好吗？”

“他们会叫你的，今天是你的生日，卡特里埃尔也在，你另外的几个兄弟大概也会来的。”

“不会的，我对我母亲和对他们都说我要出门。到庄园里来添乱可不好。尽管我母亲很想认识你。我觉得你有些沉默寡言，你在想什么？”

“灯光太亮了，这倒挺适合于阅读。”

“但是对你和我待在一起却不太适合，是吗？我同意，我很高兴你说了这样精辟的话。”

“看来我有很多东西让你喜欢。”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我都喜欢，你别太狂妄了。我喜欢你的眼睛，喜欢你走路的样子；我不喜欢你的腿，但是我喜欢你的手。”

他一边说，一边开始抚摸我。我也让他抚摸。

“还有你的大嘴巴和你的鼻子，要不然你就太完美了。”

“我喜欢你的印第安人的肤色，你的骨骼突出的手，还有和熊一样的身高。”

“这只熊会拥抱和接吻。”

就这样,开始了一切。

“看来,你们想单独待在一起,但是今天我们可不让你们这样。”曼努埃尔不合时宜地打断我们,点亮一盏招人烦的灯。

“我们只谈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去和大家呆在一起。”巴斯多尔回答说。

这是巴斯多尔的爱情宣言。他甚至没提及他所遇到的麻烦,我喜欢那样。

“我爱你,我喜欢你,我不能想象,要是没有你,我的生活会怎样。”丝毫没有这些话,没有探戈,也没有博莱罗舞曲。但是,巴斯多尔以这种强烈的方式做了表白。

晚些时候,我们又单独待在了一起,甚至跳了一支探戈。他对我说,想和我一起生活,但我没有说话。米歇尔和克里斯蒂安,还有皮埃尔,他们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巴斯多尔尊重我的沉默,我们手拉手地出现在大厅里。

“我从来没遇过一位像阿古斯蒂娜的女人。”他突然叫了起来。

“我们从未想到。”其他人也很高兴。

我感到特里尼达的那双大眼睛正在注视着我的眼睛。

“没有,从来没想到。”他继续说,“她花了一个小时,用来选择穿什么衣服来祝贺我的生日。而最糟的是她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我。她对她的东西,她的衣服,她的衬衫,要么是喜爱,要么是仇恨。”

“以前没有这种衣服,我真不知道自己怎么能生活。”

“‘切,你不觉得……’‘这条裙子和这件衣服好极了,真是

漂亮”——他模仿着我，学我带点法国腔，又带点阿根廷腔的讲话方式。

我喜欢听他讲这些表面的东西，肤浅的事情，谁都可以说的事情。我喜欢看到他放松而愉快。

## 散 步

尽管快到黎明了，我们都为要去山上散步的主意感到既清醒又愉快。

幸好我得到了堂娜莱奥诺尔的准许，因为文奇不在（他什么时候才能免于参加政治郊游，或者不参与那些可怜的穷苦人的斗争啊！）而她这位掌实权的女人并不觉得我适合参加这一活动；因为那会引起流言蜚语。

更有甚者，安东尼娅对我说，文塞斯劳总不在这里住，而我呢，我总是单独地住在这里——更糟糕的是，我和阿雷霍一起上法语课，要么就一起骑马散步——这已经成了镇上人们议论的话题了。当然，我从不独自出去，我们要么和塞尔米莉塔与约瑟芬，要么和卡洛斯、胡安、哈科沃或者其他表兄弟中的一位一起出去。他的表兄弟多得很，比起跟女人，我和男人比较容易沟通，除去塞尔米莉塔，她是个例外，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我受够了流言蜚语，我祖母说，小小的镇子是大大的地狱，我觉得她挺有道理，在圣地亚哥时，我的感觉就不一样。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但在这里每天



都这样过：一些人谈论另一些人，而这样做的不仅是女人，还有男人，甚至还有孩子。

当然，我们这些女人过得更糟糕，因为圣路易斯是一个女人的村镇。男人们总是忙着去战斗，不是同印第安人打仗，就是在搞阴谋诡计。

这里的人们议论说，丈夫们去驻宿营地时，他们就找些女人，并且，在那里的那段时间内与她们姘居。难道这是真的吗？我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也有人对我说起，有一个什么契娜，好像在文塞斯劳与我结婚前，她曾同他生活在一起，甚至还有儿子或者女儿。要命的是，我还没有怀孕。怎么会是这样？难道我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吗？

嗯，其实是我没那么多机会。看天意吧。

阿雷霍留着精心护理的长发，这看上去有多好啊。他开始蓄着的长须也让我喜欢，特别是它的颜色。有点发红，尽管应该说，阿雷霍的头发更偏向于浅栗色。

仆人们使我忽然想起了蚂蚁，他们运来装载午餐时用的成篮的丰盛食品。他们将乘一辆特殊的载客大马车，而我们，女人与孩子们，将乘坐一辆专门为堂娜莱奥诺尔运来的漂亮马车。

阿雷霍朝我走来。他对我总是很殷勤，现在他送给我一支白玉兰。他知道这是我喜欢的花。

我很浪漫，依我自己的说法，那是一种无聊的浪漫。面对一朵白玉兰花我会叹息，面对一颗钻石也许我会僵硬，就像那天，面对文塞斯劳作为给我 19 岁生日的礼

物，他送给我的那件极其昂贵、人人都很赞赏的首饰一样。但是，我觉得它太大了，特别是在我得知它是堂娜莱奥诺尔在她最近一次旅行中挑选的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我们来到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岸边，我从来没来过这里。

我们坐在地上，仆人们把名贵的大马士革地毯铺在了地上。

他们带来了煮熟的鸡、鸡蛋、各式沙拉、自制面包，还有装在小口大肚瓶中的葡萄酒和橘子汁。

大家都称赞我的新发型。安东尼娅给我编了一条辫子。

和年轻人在一起，紧靠着河边，谈论着大自然，这有多么美好。阿雷霍和其他表兄弟们到附近的一个水塘里洗澡去了。他们不让我们去。我抗议，全因为我是女人。我酷爱在河中洗澡，毫无束缚地游泳。

要是我是个男人，我会干什么？我想我会是个水手，是的，是个水手，那样我就不会被迫在某个地方抛锚。自由，自由。自由，这是个一天比一天离我更远的字眼。

大家都为我的出行而感到高兴。莱奥诺尔希塔嫉妒地看着我。她不喜欢我系上阿雷霍的腰带，以此来证明谁的腰更细。虽然我的腰从结婚那天起已经变宽了一些，但仍然是最细的。这个阿雷霍很有趣，他也对我这么亲热。

好像是 … …

我很早就起来了。

我坐在写字台前写作，我总算学会了不太费力就能点燃火炉，靠着壁炉中木柴燃烧的热量，抵御这气候反常的七月的寒冷。<sup>①</sup>

这是再完美不过的时刻了。

一首我喜欢的乐曲陪伴着我。突然，听见有人喊：“号外，号外”。上午 9 点钟的新闻报道打断了我的宁静，而我听到了我不想听到的东西。尽管我全力抵抗，这个国家，通过那子虚乌有的开场白，意外地侵犯着我的生活。

“在一个套间中，发现三个捣乱的共产党人的尸体。那里只留下残缺的家具、碎玻璃和散落的纸张。据推测，他们是在制造一颗炸弹时死亡的，那炸弹是准备投放在某个重要地段上的。”

“政府正在追查一个医学专业的青年学生，他姓奥尔特加，他在安全部门的警察赶到之前的一刻，逃离了出事地点。”

没有任何其他解释：女播音员播报了其他最重要的事情：“今天 16 点，尊贵的总统夫人为一座名为‘反共胜利日’的桥梁举行了落成仪式。18 点，总统先生将为一条命名为‘反红色战斗日’的公路举行开通典礼。”

<sup>①</sup> 在南半球，七月份正值隆冬。

我有几分钟毫无反应。后来，我站了起来，找到一件大衣，朝我的汽车走去。我以非常高的速度朝应该是事发现场的地点驶去。

那是一个属于中下阶层的社区，离我所住的街区很远。

愤怒，一种可怕的愤怒与一种愚蠢的同谋感，那就是我发现的情况使我产生的感觉。只见一幢设有几套简陋房间的建筑物的残骸；花园前庭有一具年轻女人被烧得半焦糊的尸体；她旁边是一个男人，大约 25 岁，头发金灿灿的。在那里有几个外国通讯社的记者，他们试图查看在地上发现的那些公文包与文件，看能否辨明他们的身份。两位警察允许他们这样做。

我在一个钱包——显然是那个头发颜色非常浅的男人的——里面，发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和一个也很年轻的女人，还有两个很小的孩子，他们都穿着节日服装。另外，有一张聘书，证明他是小学教师。

愤怒之后有一种肉体上的剧痛感，这是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这是动荡即将来临的某种特别感觉，就好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我们看到闪电的光亮，听到远处的雷声后，大家都知道，尽管天很蓝，而且表面很宁静，暴风雨就要来了。那些身穿制服的人重复着我在电视上听到的内容，他们正在追查一个叫卢卡斯·奥尔特加的人，此人大概就是这个恐怖组织的头目。

我必须通知巴斯多尔。怎么办？这时候他肯定在诊所，那里没有电话，我想起了法国大使馆的政务秘书，他有一部私人电话。

我用一家被打动的邻居提供的电话给他打了电话。

毛里瑟·贝努瓦特建议我回通讯社，不要同任何人说起此事，要使自己平静下来。他将密切注视这些事件，寻找卢卡斯·奥尔特加，并且将同我们联系。

我有些失望地挂了电话，但事情是发生在独裁制度下。我是外国人，不能过多干预。对此，我知道得很清楚，尽管这次我并不清楚该怎么办。

但是我并没有回通讯社，而是去了诊所。

帕基塔带着她通常的那种微笑迎接我。我立刻发现她对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

“巴斯多尔在吗？”

“是的，他正在看病。发生了什么事？你的脸色像死人一样。是关于卢卡斯的事吗？”

她猜到了。

巴斯多尔穿着白大褂，从另一扇门里走了出来，他已经听到我进门了。

“卢卡斯，卢卡斯·奥尔特加。”我喊道：“广播里说，人们正在追查他。”巴斯多尔感到吃惊而不安，他注视着我的眼睛，等着我继续解释。

长着清澈的天蓝色眼睛、卷发、带着新鲜花露水味的卢卡斯·奥尔特加，他正在被追查。他会在哪儿呢？

我们打开了电视。国家的辩护者，给人的印象是由于电视机没调好，他的面孔变形了，厚厚的嘴唇，浑浊的眼睛，他惯于将低声细语转化为斩钉截铁的话语，也许这是他在审讯中学会的，他开始解释。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但是现在他给

我的感觉是，他好像患了某些人说的“情绪不良综合症”。他  
人长得很白，头发近乎金红色，戴着一付方形深色眼镜，头发  
像被砍刀削过一样，说话时没有抑扬顿挫。他说：“邪恶在窥  
伺，要当心，不要怜悯。这是在猎取一群马克思主义的狗，这  
些披着羊皮的狼。他们明天，先生们，明天，女士们，他们不会  
同情你们的孩子。如果我们不无情地、带着石首鱼般的凶猛  
与坚定去攻击他们，这种毒物就会进入中学、大学甚至修道  
院，在那里，已经可以看到萌芽了。你们每个人的财产都凝聚  
着您个人和您的前辈的努力，现在它们正处于危险之中。你  
们不要忘记，土改，偷窃和混乱正在涌向我们神圣而清洁的社  
区。不要被迷惑，民主不适合我们的国家。它在其他世界是  
美好的事物。帮助国家继续走上已经描绘好的道路，这是每  
个公民的义务，不能使政权的进步产生有害的偏差，这种进步  
最终也将是国家的进步 和平、诚实、共同利益、社会公正、保  
护每个人都知道保留的其光荣祖先留下的神圣财产。那些赤  
色分子，还有那些伪装起来的人，他们只想掠夺你们的一切，  
破坏法制，并强迫你们接受平等。在这场战争中，只有一项义  
务，那就是追捕他们、告发他们并检举他们。为此，你们每一  
位男公民、女公民，所有的年轻人都应该合作。

“他们存在于各个地方。你们不应该搞错，尽管有时他们  
会是您的一位朋友，一位亲戚，甚至是一个儿子或者是一个兄  
弟，你们也不要降下旗帜。报告就是爱国主义行动。”

“你们可以信任我们，我们领导你们已经二十年了。政  
府知道以军人特有的严格来进行审判。让温和派们受到审  
判吧。”

立刻开始播放被追查者的肖像和特征。那位女教师已经出现在死者中间,很快开始播放一个被追捕者的画像,而且他的形象在画面上出现一次、两次、五次、十次,他处于地下状态,是危险的敌人 卢卡斯·奥尔特加。我们笑咪咪的卢卡斯,不几天前我还和他在一起喝过咖啡……

卢卡斯·奥尔特加,头发卷曲,清澈的天蓝色的眼睛,好像从电视荧屏上在看着我们,并且请求我们的帮助。

怎样才能帮助他?哪里才能找到他?

巴斯多尔向我伸出了他那瘦骨嶙峋而有力的手,我把手交给他,没有抵抗。

整整一天,我们从一个警察局跑到另一个警察局,想找到他。法国大使馆的活动也没有什么结果。

其他的朋友只是在事发前的那一天看到过他。像每个下午一样,他去诊所工作,并且说,他已经上了特务部门的名单。

也是那天上午,他的狗巴甘——是我送给他的,并给狗取了名字——被吊死在他家门口一根电话线杆上,还挂着一个字牌,上面写着:“对你做同样的事情是很容易的,婊子养的……”

我们去了卢卡斯母亲住的地方,她对我们说,头天晚上卡特莉娜也被捕了,并且被带到一个女子监狱里,尽管她身怀有孕,已经七个月了。这位夫人绝望地解释说,卡特莉娜在一间理发馆工作,而且从未卷入过政治。

我们接受了教区神甫菲德尔及法国大使馆的一切帮助,但卢卡斯没有出现,而他的女人仍被关在监狱里。

保尔每天都去看望她。他非常伤心,说在城里一直有人

在夜间私闯民宅，居民们缺乏安全感。

巴斯多尔受到了极大震动，没有什么信心。为了安慰我，他就对我肯定说，卢卡斯应该已经离开这个国家了，已经在阿根廷或乌拉圭了，那里有他的一些表兄弟。

每周二和周六，是探监的日子，这是我们带给卡塔莉娜的一点安慰。

但是有些时候巴斯多尔会更开放一些，他对我说，他也感到恐惧。说他害怕最坏的情况发生。他说政府的手段已经是众所周知了，当他们多次谈到正在追捕某人时，实际上是因为已经拷打过他了，或者，是那人快要死了。然后就会说什么在一次对抗中，这个人自杀了，或者说，有人在保加利亚或古巴看到了他。巴斯多尔不甘于卢卡斯已死的想法，那是一个多么活跃的小伙子啊，怀着无限的理想主义，又是他的朋友和学生。他回忆着卢卡斯种种平凡或重要的事情，例如我生日那天，他们为我烹制烤肉。他通过轻松的回忆来发泄一下，就像发生了如此突然的事情时，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他对我说，现在他要‘深入’地干预下去了，已经无可选择了。我明白那意味着什么，而他看到我忧虑的面庞，就微笑了一下，对我解释说，他要为过去曾和卢卡斯一起工作的“友协”人士服务。我犹豫不决，战战兢兢，我不想让一切成为过去。

听到巴斯多尔的决定，由于权衡利弊，也许由于爱情，由于怕失去他的恐惧，我感到很难过。

另外，很多记忆活生生地重新浮现在我眼前，布宜诺斯艾利斯、塞巴斯蒂安·胡安·巴尔德斯、曾当过大学校长的弗龙迪奇被踢死、那些爱尔兰牧师在睡觉时被谋杀、事后发现的集中



营、海军上将哈布鲁奇尼的女儿,等等,等等,那么多,那么多的其他暴行。

是哪些鬼神把巴斯多尔·胡维纳尔置于我人生的道路上。在弗洛斯单元事件以后,我已经有很长时间在试图逃避所有这一切。

在这一切疯狂中,是很难写我的书的。然而,可能会出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的艺术家、创造者和诗人,这倒是好事。

“我已经步行了两个小时。我已经相当平静了。”

然而我的故事将是一个激越的爱情故事,带着纯朴的浪漫主义。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更好是不公正的,如果觉得这个国家里的青年应当想象他们在战争中,在一颗又一颗炸弹之间将怎样欢笑、歌唱、游戏和做爱,这样做不应当,也缺乏公正。也许他们正在等待世界的燔祭,这也是不公正的,更不应该这么想。

认为现在的人被提前判决是不公正的。

我拒绝接受这一点。

## 到 达

皮埃尔和孩子们来了。我发现孩子们长高了,而且很漂亮 特别是克里斯蒂安变化很大。米歇尔好像更矮了,也许是由于她祖母菲莉希亚的原因。又是塔德奥陪我去接他们的。我看到皮埃尔非常好,一副无法否认的杰出的法国人与知识

分子的仪表；我喜欢重新闻到他烟斗的味道，听到这熟悉而亲切的声音。

一开始是无尽而无序的问题,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你们期末怎么样？爷爷、奶奶好吗？”“妈妈，你喜欢这个国家吗？这里真的有印第安人吗？您有好朋友吗？”

皮埃尔惊奇地看着人们,看着我们走过的街区,看着高处建着小房子的山丘。以前他从未到过一个南美国家，我觉得他相当吃惊。

我觉得自己处于守势。毕竟我也是南美人，出生在与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没什么不同的阿根廷，虽然我持法国护照。

我们用卡斯蒂利亚语交谈，就像我同皮埃尔从第一次相遇时养成的习惯一样，但我注意到克里斯蒂安和米歇尔这样做有一定的难度，而且说话中夹杂着法语。

又是一个矛盾点,我觉得这是一种背叛,尽管是我撒开了他们不管。

我们马上谈到了安全问题，报纸和外国大多数刊物上所说的是确实的。塔德奥说了很多，并且澄清了所有未完结的报道,而我什么都不想说。

当我们到家时,这个法国人赞扬了所有的房间,但他还是禁不住要发挥他的才能，立刻向我提出一些批评，和可行的修改方案。他那建筑师的脑子从来就不会让他安静。

米歇尔被奇格蒙德迷住了，它好像觉察到了，蹦着跳着，总是跟在她身旁。相反，克里斯蒂安则琢磨开了花园、游泳池、存放着自行车的车库,他骑上我的自行车,到街上兜了一圈。孩子们立刻意识到那些在巴黎是亚洲式的奢侈事情，在

这里很寻常。同大自然的接触,女佣人,还有好吃的水果。安东尼亚为他们做了家庭自制的饼干,这些饼干和一种美味的巧克力一起供我们享用。在一个非常的隆重仪式上,我们一起享用这些美食,以此来庆祝团聚。

“阿古斯蒂娜,我旅行很累,最好你和米歇尔和克里斯蒂安一起住,目前先这样,而我住另一个房间。”

皮埃尔以自己特有的、我几乎忘记的精明,解决了从他们通知我要来时就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问题。

我很难过,但是我明白皮埃尔能理解,九个月的分离已不算短暂,是会发生点什么的。我用一个微笑感谢他,我觉得塔德奥和安东尼亚也会心地对视了一下。

前一天巴斯多尔才在家里吃过饭,并一直待到半夜。

塔德奥走时答应,第二天我们去看特里尼达和她的孩子。我们同皮埃尔坐着聊到很晚。

无所不谈,平凡小事、重要的事情。开始谈我不在时的情况,比如每个人是怎么过的。皮埃尔很不习惯,我也很不习惯,另外他还有孩子的负担,要为他们负责,解决问题。我们认为,对于他们来说,六个月没有妈妈的时间太长了,但这也许起到了促使他们成长的作用。

我也承认自己曾经有过孤独、痛苦与恐惧的时刻,还有我找到的朋友们,他们帮我度过了这些时刻。

我们谈到了巴斯多尔,我和他经常出去,认识他很重要。

皮埃尔立刻回答了我,把巴斯多尔的重要性减到最小。在六个月中,找个人作伴是相当符合逻辑的——我认为必须向他澄清,在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但面对我几乎‘坦白’的

话,他表现得很老练,他对我说,他有兴趣认识巴斯多尔,就像有兴趣认识我在这里的其他朋友一样。

巴黎?巴黎既美丽又不可忍受。雨水比任何时候都丰沛,文化生活多得叫人喘不过气来。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点安慰,因为皮埃尔知道,我应该满足于一支可怜的交响乐队,因为,由于“国家”的原因赶走了组建这支乐队的指挥。电影院只有美国佬的影片,和被认为危险性小一些的影片;两三家小书店中也没什么新书。这是典型的文化停电,在“第三世界”的各个国家中反复发生了多次。我们计划访问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不敢独自回去,也不敢回圣路易斯,那里对我的菲莉希塔丝是很重要的。

自从皮埃尔和孩子们来了以后,日子过得更轻松了。他们旅游了很多地方。我们去了几处风景有差别的海滩,也去了山上。天公作美,因为10月间气候十分理想。另外在这里离哪儿都不远。我那重大的故事没什么进展,可我又坐不下来写点什么,不能写这类日记或思考,也完不成我的报刊文章,为写这些文章,我请了几天假。我也放弃了阅读和骑马散步,因为皮埃尔不喜欢这些,我还放弃了独自在海边的长途步行。

在孤独了六个月以后,我觉得自己被家庭侵犯了。

而我需要孤独。需要长时间地进行自己的思考,没有喧闹,不用听别人说话。如果没有米歇尔和克里斯蒂安,我不能生活,但在14岁的年龄,他们是那样烦人。

他们独揽大权,占有一切,有时我感到精疲力竭,想重新成为自己绝对的主人,就像三个星期以前那样。但是今天大

家都出去了，包括善良耐心的安东尼娅。

有人邀请我们去几位法国朋友的庄园作客，那是皮埃尔家的朋友，他们很久以前就住在这里了。我决定不去，就自己留了下来。我穿着我写作时穿的制服。那是一条暗灰色的羊毛裙子，一件我妈妈给我织的绒线衫，由于它是那么旧，所以柔软而适体。一双厚厚的长筒袜和一双中国鞋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写作时，我就喜欢这样穿着。自从我到这里来后，我就注意到，这是坐在写字台前的一种先行仪式。

巴斯多尔的名字又回来了。卡门，她是巴斯多尔一位当心理医生的朋友，她打电话通知我说，她做了一次政治巡游，定好了今天下午来看望我。我鼓不起勇气对她说，因为我想知道一些关于巴斯多尔，和我抛下的那个团体的事情，尽管上个星期六我刚带皮埃尔认识了我最亲爱的朋友。

陪卡门一起来的那个人，打一开头就让我觉得他既有趣又可爱。他不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标本。他无拘无束，非常自然、幽默。他有点像一个发胖的老嬉皮士，戴着一副大眼镜，身体羸弱，身高不超过 1.60 米。一开始，我以为他是个医生或政客，但从他不够庄重的举止和看待事物不礼貌的做法，我发觉我想错了。他让我很高兴。

他是一位犹太作家，名叫莱昂·梅尔金斯基，已经出版了几本书，获得过一些大奖和一些我不太熟悉的奖项。

对我由于没读过他的小说而表示的歉意，他表现得很客气。可是不知为什么，我想给他念一念我正在写的小说。

他觉得我写得好，他被上个世纪的那个阿根廷省份迷住了，那时候政治骚动，国家由罗萨斯统治着。

我们约好再见面,以便他能再多读一些我的小说,也是为了把他介绍给皮埃尔,因为他也在纽约待过一段,也像皮埃尔在认识我之前一样,曾经有过相似的乡村生活经历。七十年代、披头士、木石乐队、长发、反叛一切现存的东西。

这真是令人吃惊,因此,我不喜欢对任何事情作出判断。我以为,一个像莱昂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做那些事情的,可是他做了,而且,他在与别人一样的环境与空气中生活、呼吸并且创作。他不是政客,尽管他不赞成现政权,也不隐瞒他的想法;他从未想过要离开这个国家,而且说,他不能生活在此地不同的其他地方。

他很了解巴斯多尔,至少用了十五分钟谈论他这个人。他认为巴斯多尔是个很特殊的人,他相信一段时间后,几年之后巴斯多尔应该是阿莫兰迪修士<sup>①</sup>,该由他来掌管这个国家的命运,他是唯一可以拯救这个国家的人。

“他具备所有的条件,他只是缺乏一名完全的政治家所必备的邪恶,他太纯洁了。但我觉得克服这一点并不难。因此,你要做好准备。”

“我 我与此毫无关系。我已经对你说过,我有孩子,而且我要向你介绍皮埃尔,我的丈夫。”

“你想和你丈夫回去吗?”卡门用探询的语气毫不客气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辩解说,“但我不喜欢政治,更甭说当一名政治家的同路伴侣了。需要有特别的志向,或者有色情受虐

<sup>①</sup>阿莫兰迪修士,一位有名的神甫,实有其人。

狂的爱好,才能接受南美洲,可是我没有。”

对话就这样突然中止了。莱昂说,时候不早了,他的女人等着他一起吃饭,于是他们俩就走了。

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回到了家庭生活。孩子们赋予这个有点波西米亚情趣和洗衣盆式的小家庭以另一种色彩。现在家里已经被他们弄得到处都是玩具和杂志,还有我一点儿也不反感的皮埃尔的烟斗味道到处弥漫,尽管我不抽烟也不喜欢抽烟的人。对这一点,心理学家会说,这与俄底浦斯情结有关,这是因为我的父亲抽烟斗,我喜欢这位高个子好老头,他为教书的乐趣而教书,但是对美元的行情却毫无概念。

安东尼娅为这种新的局面感到高兴。她由于那对孪生姐弟而感到开心。他们的卡斯蒂利亚语已经有所长进,同时还结交了些在街区和英语学校里的朋友,他们是为了不忘掉已经学过的东西而进英语学校的。

米歇尔像以往一样,在同年级的学生中名列前茅,然而克里斯蒂安只对他的体育和音乐感兴趣。尽管他只有 12 岁,吉他却弹得很好了,而且他还作些小曲子。我在这里给他找了纳尔多·佩雷斯,他是一名‘单纯’而强壮的民间吉他手,克里斯蒂安跟他上课,学习田园音乐。

我们的朋友认为,孩子们与其说是法国人,还不如说更像阿根廷人。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讲卡斯蒂利亚语时,用的是阿根廷方式,但我并不认为还有什么其他更多的东西。

当然,他们可不是来‘征服美洲’的欧洲人,他们感受到了自己的拉丁血统,并享受了这些国家美好与奇妙的事物。特别是这个国家,它的人们,尽管他们不很喜欢阿根廷人(对此,

我们也许有责任),有些我搞不懂的东西,但令人热爱迷恋,让我放弃这一切,那将是很困难的。

我注意到,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包含着让孩子们多待些时候的想法。皮埃尔只能待几个月,但我想让米歇尔和克里斯蒂安留在这里,修下学期的课。有一所很不错的法语学校,那样,他们的学业就不会有大的损失,而且会获得重要的经验。

皮埃尔想让我们都回去,他说,这对于我已经足够了,我已经冒了很多风险,而且,孩子们将得不到照顾,理由有成千个,但是我不能放弃所有刚开始的东西。巴斯多尔也存在于我现在的的生活之中。

皮埃尔和巴斯多尔相互认识了。皮埃尔觉得巴斯多尔很聪明,但却非常狂热;这个词对他来说,绝对是个否定的措辞。

会面时巴斯多尔沉默不语,我看得出他的态度中有些心绪不佳,这种心绪不佳在这里被描绘成印第安人的特点。尽管他曾在欧洲待过,但在他身上没有丝毫欧洲人的东西,尤其是在他与一位妇女的关系方面。会面是在一家饭馆中进行的,因为我不想让孩子们认识他,更不想在家中会面,巴斯多尔已经几次去过家里了。皮埃尔完全平静地讲话,他总是提出问题,非常自然。巴斯多尔回答问题,却很少提问,他在那里看着我,并且微笑着。他没有谈到我们每日的相会,也没有特别表现出他是我的朋友。

对于我来说,这可不是一个令人舒适的场合。

这是一个奇怪的场合。我觉得我属于皮埃尔,但我希望



他别那么像“外国佬”，而且在某些事情上显得那么天真。我觉得巴斯多尔更强大，更像个胜利者。

据说，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他们在选择配偶时总是犯老毛病。这种情况虽然还不能说是配偶，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巴斯多尔与皮埃尔。肤色、高度、脸部特征，皮埃尔有浅色的眼睛，罗马式的鼻子，留着金色长发，一副知识分子的外表，抽着烟斗，戴着一付伍迪·艾伦<sup>①</sup>式的眼睛。他的动作很讲究，很柔和。然而巴斯多尔却留着很短的黑发，可留着大胡子。他的举止更加强硬，更加男性化。也许我这个人太肤浅了，我喜欢他们的穿着方式，因为他们都穿着好衣服，现代而又考究。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注意到的他们之间唯一的相似之处。

我想，这是我 38 岁以来第一次在同一时间感受两个男人。当然，同皮埃尔在一起时一切都不一样，我们十四年的共同生活中，总是有孩子住在一起，然而巴斯多尔出现了，这使我烦恼，我连睡觉时都不得安宁。

“我是年轻人，正在一条宽阔的大街上，相当宽阔，我以为它叫做七月九日大街，尽管我没有看到那座有名的尖顶方碑。我在一辆停在这条林荫大道中央的汽车上。这是一辆法国车，一辆带活动天窗的标致牌轿车。我看上去很漂亮。头发披散，穿一件丝绸服装，它接触到我的身体会产生令人愉快的感觉。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打扮得很整齐的先生，我看不清他的脸。”

<sup>①</sup> 伍迪·艾伦，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和演员。

“我不懂为什么,为什么他正看着我,并且请我和他一起走。我看看那边,看到了田野,仍然是田野,在田野的那一边是山,还有作为背景的海。当我准备走时,一只有力的手阻止了我,他的皮肤的白皙引起我的注意。他不想让我走,于是我开始喊叫,但是他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回答我,有混合的语句,有些俄语,日语(我一点都不懂)。这个梦重复了好几次,我想它可能与我目前的不安有关。”

生活、人物与爱好的选择。当我做这个梦时,做这个带有一种不忠实的感觉的、色彩模糊的梦时,总是突然醒来。

我的天数,甚至我的秒数,都被皮埃尔、克里斯蒂安和米歇尔占有。然而某些早晨,我试图写小说。

我没有中止我在创作间里的工作,这很有帮助。写作也是一种必须学习的职业。

我给皮埃尔读了前几章,整个第一部分他都很喜欢,但是,当我读到菲莉希塔丝和阿雷霍之间可能发生的、被禁止的罗曼蒂克故事时,特别是读到几封信时,他不高兴地皱了皱眉。我没有继续读下去,因为我了解那副面孔。

## 幸 福 的 出 生

“有这些孩子该是多么幸福呀!我没做过什么事情可以与之相比,这就是我和造物主一起参与的这个奇迹。这些小家伙出生了,是我们两个生出来的。”

文塞斯劳也很高兴,他的目光变得不再骇人,眉头不

再皱紧。我想，双胞胎这一事实更加神奇。

女孩是先出生的，她叫玛丽亚·德·洛斯安赫雷斯·特雷莎。我的姑娘真漂亮，她那象牙般的洁白与她头发的暗栗色形成对比，这令人愉快。她出生时 3 公斤重，现在已经 6 公斤了。

男孩随后出生。3.5 公斤，他叫弗朗西斯科·哈维埃尔·曼努埃尔。他个子更大一点也更长一点。他拥有三个名字，像一个王子，文塞斯劳这样说。他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非常骄傲，没人能比他做得更好了。弗朗西斯科甚至还长着一些暗色的绒毛；当他出生时，这些绒毛还只是像小鸡雏的一样，但随着他渐渐长大，这些绒毛变得越来越黑了。

他们俩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玛丽亚·德·洛斯安赫雷斯的眼睛是透明的、绿色的，而弗朗西斯科的眼睛是深蓝色的。

关于我婚后能否达到完全幸福的一切疑问，现在已经被打消。我很幸福，非常幸福。每当我先给一个孩子喂奶，再喂另一个孩子时，我感到一种完美，这是不能用到目前为止我感到的任何事物与之相比的完美。

男孩长得像我，特别是他的眼睛和脸型，都很像我的；安赫雷斯像文塞斯劳的妹妹塞尔米丽达，她非常美丽。

文塞斯劳讲话时，就好像弗朗西斯科是个大人。他想象着弗朗西斯科在战斗中，在政治派系中，像他一样行事。这使我很难过，我可怜的儿子，但愿他过上另一种生

活。一个人生孩子不是为了打仗。如果我们女人执政的话，就不会有战争，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他现在显得如此脆弱，我简直不能想象他穿军装是什么样子。

那些派来帮助我的佣人是多么温柔呀，她们为照顾好婴儿尽心竭力。更不用说忠诚的安东尼娅了，这改变了她满脸不高兴的样子，即使和堂娜莱奥诺尔在一起，而这是需要耐心的。

这个傻女人原来还以为（其实我也怀疑过）她的智利姑娘不能生育，从而她会被雷依纳菲家族休掉。

哈维埃拉给我寄来了一套衣服，包括镶花边的系带女帽、婴儿套服和她手织的小坎肩。

这对双胞胎的洗礼完全变成了圣路易斯的一件社会新闻，庆祝活动在夜里 12 点结束。统治者罗萨斯和他的女儿玛努埃丽达，作为男孩子的教父和教母，他们派来了代表。

全镇都为如此尊贵的客人到来感到异常兴奋，关注着他们如何穿着、他们的行为举止，以及他们赠送的礼物。

安赫雷斯的教父、教母不那么显赫，但是更加可爱而亲近，他们是阿雷霍和哈维埃拉，为了参加这一活动专程从圣地亚哥赶来……

“我们大家一起在中央院子里，在圆桌旁喝茶。哈维埃拉又一次和我们在一起了，但由于她和一个智利人，帕特里西奥·伦特里亚，一个在库约收购畜群的商人结了

婚，所以她可以不断地来来往往。这一次她带来了女儿卡米拉，她是个漂亮的金发女孩，尽管只有 3 岁，但是她和孩子们常玩在一起。我的孩子们已经 5 岁了，他们长得强壮而健康，感谢上帝。

这时，他们带来了那匹矮马费德拉尔，那是送给弗朗西斯科的礼物，让他骑着在院中散步。孩子虽然只有 4 岁，但他非常清楚怎样才能骑好马。女孩子哭了，因为她也想骑马，而堂娜莱奥诺尔看着我说，女孩子不应该骑马。我顺便让埃拉迪奥带她们散步，先是卡米拉，随后是安赫雷斯。她们很高兴，我想，她们比弗朗西斯科还要高兴，也许是因为这带有品尝禁果的味道吧。”

现在米歇尔和克里斯蒂安和我在一起，我的小说中需要有孩子们。

孩子们。到处都是孩子们。他们做得有多好。

我好像找到了书名。我曾为这本书取名为“一个不完美的故事”，但现在我找到了一个既不那么文绉绉，又更有意义的事物，那就是白玉兰。对，这样更好，也更有意义。

菲莉希塔丝、文塞斯劳、阿雷霍、孩子们，小说没有按我喜欢的节奏进展。我认为，或者希望认为，过错在于这个国家，有时我热爱这个国家，而有时我又憎恨这个国家。

我生活在这里麻木不仁，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找理由。我不需要大量令人愉快的平静来进行写作。巴尔扎克写作时，人都快冻死了；普鲁斯特写作时生着病，而且最后也几乎接近死亡。另外一些人，物质上运气更好

些,却被多诺索<sup>①</sup>式的内心中的成千上万个魔鬼折磨着。

平静的阿古斯蒂娜,你是一个享有特权的人。我的境遇还属于比较舒适的资产阶级,尽管皮埃尔走后我会调换房子,住到一个比较贫穷的街区去,那里更符合我目前的不安状况。有一点像带黑奶油的鲑鱼,有一种我不能克服的揭发。

“我不能几年都停留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平静时代之中,它对所有雷依纳菲家的人,特别是对于菲莉希塔丝·戈伊戈切亚与文塞斯劳及其子孙,都非常幸福平静。就在生下双胞胎两年以后,正如你们猜中一样,第三个孩子又出生了,是一个女孩,叫赫诺维瓦·玛丽亚·德洛斯拉格罗斯,她的出生也是很幸运的。

孩子们健康地成长,受到家人的宠爱,这对全家来说是一件快乐的事,对菲莉希塔丝来说更是如此,她带着真正的激情,一心扑在培养孩子们上面,并以这种方式弥补文塞斯劳一次比一次更长久的出门在外。

菲莉希塔丝像福音书所说的那样,越来越美丽、聪明、成熟。她已经不再是于遥远的 1840 年同文塞斯劳结婚时的那个小姑娘了,她现在是一个完美而成熟的女人,在她身上突出的是清秀的面目与和谐的形象。

阿雷霍,雷依纳菲家中的小弟弟,也已经成熟了,而且成了一个年轻而富有激情的革命者。

连圣路易斯的人们都已经开始听到起义者,或主张

<sup>①</sup> 多诺索(1924—1996),智利著名作家,著有《污秽的夜鸟》等长篇小说。

政治统一的野蛮人的名字了，例如萨米恩托、米特雷、乌尔基萨，或者更年轻的马尔莫尔、埃切维利亚、阿尔维蒂<sup>①</sup>。

然而没有什么事物预示着将在那不太遥远的年代，这个拉布恩塔传统家庭的不同成员，会过一种既不宁静也不幸福的生活。”

我又独自一人留下了。

星期天皮埃尔走了，而克鲁兹到恩特雷里奥斯去了。

当然，其实我并不孤独，因为米歇尔留下来和我在一起，至少几个月。这是一个协议。我们同皮埃尔认为，让双胞胎分开一段时间，这并不坏，然后，他们俩再回来，或我们俩一起回巴黎。

我在这里度过的这一个月里，皮埃尔表现得很好，这是一次美好的相逢。与其说我们是一对伴侣，还不如说我们更像是朋友，尽管我总是取笑这种老一套的宣言。

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去见识了这个国家美丽的南部地区，我们还去了圣路易斯。

去寻找自己毫无疑问的最深层的根基，这对我来说是重要而艰难的。

我们住在了我妹妹克里斯蒂娜的家中，她丈夫莱奥波尔多在拉布恩塔行医。我们同他们一起，去参观了我祖母住过的房屋，那里也是我们儿时曾经住过的房屋。

<sup>①</sup>这里提到的人物都是罗萨斯独裁时期阿根廷的反对派政治家或作家

房屋仍然是老样子，现在已经属于一个女子学校了。第二天我又单独去了一次，我请求他们让我再游览一遍。

我看了每一个房间，那带壁炉的大饭厅，在那里我们有一张坐十二个人的桌子。我看了我曾经坐过的地方，就挨在我妈妈身旁，还有塞巴斯蒂安、克里斯蒂娜、罗德里格坐的地方。妈妈的写字台。种着玉兰树的红色院子，尽管那棵大树显得有点凄凉，但仍然耸立在那里。我抚摸着大树，我需要这样做。紧里边的那座花园里种着葡萄。

然后，我去了上个世纪的广场，去了文塞斯劳和菲莉希塔丝在那里结婚的那座教堂。

那座圣路易斯镇，如今更现代一些，然而总是令人思念，令人感到悲伤，尽管我对它总是有一种亲切感。

我家里没有人和我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们认为，这座小城并不优美，建造时的构思有点飘忽不定，正像皮埃尔所说，没有什么城市规划。

我感到只有米歇尔觉察到，此时，一股激情的洪流正控制着我。

从所有这一切中我得出结论，生活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我生活中的困难加剧了。一些如此不同的事情在揪扯着我，肢解着我。甚至有两个男人在这样做。这太过分了。我该怎么办？会发生什么？

如果能够把心取出来的话，我大概会平静一些。我恨不得自己理智一些，少一点人情味。我充满了带有弱点的幻影，我充满了激情。我时时刻刻都具备过剩的生命力，它们不能像花朵一般自由开放，我却不明白，这种生命为什么被封闭。



被自我封闭,然而我不愿放松这种生命,即使在小说中也不愿意放松。我重读了某些段落,注意到与我真正想创作的东西相比,生命是如此狭窄,如此可怜。内心的创作与我通过写作隐约表现的东西之间的星际差异有天壤之别!

我属于狮子座,如果占星学灵验的话,我富有激情,富有极度的激情,但是我受到节制,受到束缚,如此带着夫人风范地进行写作,我不会让自己被任何现实的疯狂所左右。

## 另一片的海滩

巴斯多尔打电话来邀请我,简直可以说,是强迫我陪他去海滨过两天。他将在四个小时后来找我,而我只需带上衣服即可。

我像着了魔似地出去买一件新的游泳衣。我并不知道自己在俱乐部游泳池中穿的那些游泳衣有什么毛病。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挑了一件整身的游泳衣,是漂亮的法国蓝色的,这种颜色对我相当适合。

我不知羞耻地对安东尼娅撒了谎,说我必须参加一个将在海滨召开的国际会议,而孩子们,其实就是迈克尔一个,将和她在一起。她要是上学的话,事情就简单了。12点,巴斯多尔开着一辆从他弟弟胡安·埃米利奥那里借来的跑车到了。

好像一个“奥拉”杂志式的完美开端。

我们在公路上跑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其间我们很少说话。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从那里我们乘一只木筏过海,来到洛斯西

斯奈斯。我常常听人们说起那有名的地方，但从未到过那里。

巴斯多尔说，他因私事必须去那小岛，而且他将顺便休息两天。

他认为最好由我陪伴他。

我们来到了他母亲的老屋，屋里的墙上挂着大马士革壁毯，那里有个花园，还有一片达拉斯式的丛林，自从我们一来到这里，我的巴斯多尔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他改变了一贯的声调，他开着玩笑，出字谜，力图忘记或者埋藏起那种被跟踪的气氛。过去，我们要是去哪里吃饭，他总是选择一处靠近墙壁，而且离窗户较远的地方，并保持警惕。此外他还仔细观察是什么人在邻桌吃饭，注意那些开来或者离去的汽车，他总是低声说话，显得不太自如。

在洛斯西斯奈斯，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好像人间的苦难、独裁的幽灵、尚未解决的卢卡斯的失踪等等，都远在千里之外。特别是巴斯多尔的态度不同了，尽管他对允许自己这样休息一下，或者对他生活与事业中的这一中断好像带有负罪感。

我们去的洛斯西斯奈斯，用庇隆主义分子的话来说，那是地方寡头政治最珍贵的堡垒之一。

这是一个私人小岛，上面的住户不超过五家，新鲜的血液在岛上绝对是绝对受谴责的。没有被授予的明确许可——这种授予是极少的——就不可能建造任何东西。不允许旅游者登上这小岛，明令禁止在这里开设旅馆。就像住在北部街区的一位阿根廷夫人所说的那样：“闲杂人等不得前进”，这种标志耸立在各个地方。

我突然看了看巴斯多尔，为自己所看到的一切感到惊奇，试图猜出他在想些什么，此时他正坐在一把路易十六的扶手椅上。他也看了看我，微笑着对我说：“我不能把您带到一个贫穷的村镇去，尽管现在那样更符合我的境况。在这里我们会感到很安静，被美妙的自然环绕，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很高兴，我喜欢这里，喜欢和你来到这里，而没有别人”，我加重语气说：“这让我激动。”

“你和我单独待在一起，你不害怕？”

我看了他一眼，笑了，巴斯多尔就是这样，令人难以预料。

我们放下几件简单的东西，就去了海岸，那里的海水美丽而透明。砂粒洁白。在一座长满松树和我从未见过的灌木的小山周围，疏疏落落地建有几座豪华的住宅。沙滩不大，而且几乎是封闭的，我们单独在一起，尽管天气有些凉，我还是脱了鞋，开始了一段长长的漫步。

当我们回来时，餐厅里已经备好美味的康吉鳗和各种沙拉，而在一张更小的桌子上，有一瓶白色葡萄酒放在有冰块的银钵中。

“让我们为有一个很好的开端而干杯，”巴斯多尔说：“有你我在一起是我现在唯一的愿望。”

我什么都没说。我们吃饭，像少年一样谈论计划、生活，好像我们是自由的，好像我们两个人没谁有什么其他问题。

我选择了一首我喜欢的塞拉特<sup>①</sup>的乐曲。我觉得那曲子适合于我们两人。

<sup>①</sup>塞拉特，当代西班牙的一位著名歌唱家。

我想，在一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不要一开始就失败，尽管此时我对自己说，这没什么关系。

但实际上是有时候，一个人在一种爱情关系中，计划好的事情并不出现，而有些男人需要一杯咖啡，一支香烟或者吃一块巧克力。比如皮埃尔，他就需要音乐，这对他是根本的。

实际上，我们这回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不需要任何手段。我们开始谈话、沉默、自然，我们相互抚摩，我们去睡觉。

这是一次完美的相遇，尽管我害怕，感到自己有罪，这种感觉并不是不存在。

一开头，他还想澄清一下事情，但是我用一个吻让他沉默了，那是一个没有暴君、死者、失踪者的长夜中的初吻。

“现在，我在梦中对你说的话，可能是我们清醒时我要说的，”在我的双眼开始闭上，臂膀开始消失时，我来得及对他说。

“我们在海里，在一片不同的海水里，它不如我习惯的海水那样清洁。在布满岩石的海岸上，有许多我觉得奇怪的动物。那是一种感觉。那气氛很沉重。动物在相互斗争，特别是一只老虎和一只狮子，在其他动物中显得很突出。突然，一只美丽的长颈鹿，还有很多看来更年轻的长颈鹿，它们在为这种争斗而哭泣。博尔赫斯出现了，他蓄着白胡子，但是他的面孔依旧，洞穴般的眼睛，他说了些我听不懂的东西，用他的手杖把狮子和老虎分开，然后，他又读些我也弄不懂的东西安慰动物，我看见他带着微笑离开了。”

巴斯多尔还在睡着,我却醒了。那时天色一定很早,因为能看到太阳的第一线光芒。山峰巍峨耸立,大海波涛汹涌。我觉得,再也不会有如此美丽的一刻了。

我看了看巴斯多尔,看到他在我身边,我有些奇怪。他面部安详,好像一种完美的宁静陪伴着他。

看到他如此安详,我感到愉快,就在昨夜他还对我说,几年以来他一直就没睡过好觉。

但是,已经 11 点了,他仍然非常安静。可能我们待在一起对他起了作用。我不敢动弹,但突然他开始不安起来,嘟哝着一些意味着某种痛苦的词语。有点像求助的呼喊。他被吓醒了,带着微笑,抓住了我的手。一种苦涩的滋味涌上我心头。地狱并未消失。

“阿古斯蒂娜……”

“是,巴斯多尔……”

“你为什么喜欢待在黑暗中?”

“因为那更加浪漫……”

“你后悔了……”

“不,我爱你。你相信我吗?好像你很难理解这件事。”

“没关系,我很愉快,尽管有时我注意到你有点心不在焉。”

“你见过月亮在怎样地闪光吗,只有在不点灯时才可以看到。”

“但它已经开始被云遮蔽了……”

“阿古斯蒂娜。”

“哎。”

“我喜欢你的头发，你的皮肤……”

“巴斯多尔……”

“哎，亲爱的……”

“你是我生活中的第二个男人。”

“你曾经非常喜欢皮埃尔吗？”

“是的，但我不愿意你现在提起他。”

“那时候你很喜欢他吗？他那么重要吗？你那时喜欢他，胜过现在喜欢我吗？”

“你真傻，疯子，疯子。你知道，没有任何事物是一样的。难道我问过你关于萨拉的问题吗？让我们就按应该的样子生活吧。”

“还在下雨，但是我们最好去吃点什么，已经 12 点了，我弟弟可能来接我们。”

雨仍旧在下着，已经下了一夜，还有整整一早晨。路况很糟糕，我们计划好那天回去，但已经不可能了。

我给特里尼达打了个电话，而且差不多告诉了她实情，求她在家为我的迟到随便找个什么借口……

我也给米歇尔打了电话。

“妈妈，你怎么样 我听不清楚。”

“我这儿有点远，我明天下午到。”

讲法语我感到舒适，不知道为什么。

当我回来时，巴斯多尔已经准备好了他的一杯威士忌和我的一份加酒的可口可乐。他穿着羊皮裤子，和将领子按纯粹披头士风格翻上去的运动衫，他看起来是那么俊俏。我穿

着合身的牛仔裤和灰色线衣。我体验到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好像闹着玩的感觉。为了与这种感觉配套，我在一台老式的音响设备上放了“钮扣与猴子”。

“我不知道该怪哪个魔鬼才没有早点认识你。我害怕。觉得你不会总待在我身边。我一直在等待着你。”

“撒谎，你不可能想念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一个人和你在一起是不会感到厌烦的。你照照镜子看，没有人比你更漂亮、更聪明了。而我如此不起眼，怎么能想到可以追上你呢？”

“我们结束这个游戏吧，你别说了，你别说了，这样更好些。”

“按铃的应该是我母亲。”

“你母亲？”

“我想让你认识她。”

“你怎么想到这个。”

“她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你会喜欢她的，我可以肯定。”

（我想巴斯多尔是疯了，彻底地疯了。但现在我不能逃避，怎么也不能装蒜了。会怎么样呢。）

我一辈子没见过比玛戈特·阿尔特巴拉辛更美丽、更文雅、更殷勤，同时也更温柔的 70 岁的女人。

事实上，我从未想过认识她，更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中认识她。实际上，从第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对她有好感。

“你是有名的阿古斯蒂娜，巴斯多尔常对我谈起你。他很爱你。”

我一言不发，只是微笑着。

“你看,我儿子并不是一个轻浮的人,但是看到了你,我就明白了很多事情,你很美丽,你自己明白这点。”

就这样,简单而自然。

“谢谢夫人,但您相当夸张。可您确实是一个漂亮的女人。”

“我不习惯于夸张,另外,听说你既很能干又很敏感,这在法国女人中并不普遍。”

我并不把这当成一种伤害,但是我不能回答些什么。

然后,我们坐下来谈了谈其他事情,她今天和她妹妹一起,利用一个长周末来洛斯西斯奈斯,她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胡安·埃米利奥什么也没对她说。

“是这样的,我们本来想昨天离开,但是下雨了,这使我们没法走。”巴斯多尔解释说,“等我知道您今天要来时,我就想让您认识一下阿古斯蒂娜。你们看,我没弄错,你们都喜欢对方。我叫哈辛多给我们准备午餐。”

巴斯多尔在他母亲面前更像个孩子。很多成熟的男人,在他们的母亲面前都是这样的。看起来他们更幼稚了,但同时我看到他很高兴,也很放松。他为我们的相会而感到高兴,因为看来这与他的期望相符。

我恢复日常的习惯已经有几天了,但我不能不想那第一海滩和那第二海滩。

这是我的第一次不忠诚。这是一次奇妙的约会。

巴斯多尔的忌妒,回顾往事的忌妒,巴斯多尔知道对于我来说,我所做的献身意味着什么吗?不,我想,所有的男人都以为,我们女人没有我们实际上那样严肃。为此,我早先在与



皮埃尔的关系中曾向他献身。

我不会让他荒唐地参与到我如此隐秘的内心世界之中。

过去的岁月只属于我个人，我不想与任何人分享。

我为什么接受了一切？我的感受如何？如果我能够做到真诚的话，我想，我很需要再次被爱，带着激情。伴侣的伤害可能是很残酷的，因为人体中包含着伤害热爱它们的人的过去时光，因为人体中积累着已经抹去的回忆、快乐与愿望。但这些，对于欣赏他的身体，并按时间顺序延长着他爱着的身体的人来说，是很残酷的，他会感到忌妒，甚至想毁灭这一身体。”

无疑，我过去的时光仍然折叠在我的内心深处，稍有机会，它就会浮现在记忆和感受之中。

以前我想，除了皮埃尔，不会有任何男人能唤起我的爱情。现在，面对一种明显的吸引，或者至少现在我称之为强烈的激情，我应该认输。

## 第 一 封 信

菲莉希塔丝：

这第一封信，是我在一辆载着我和另外五个人的大车上写给您的，我们一起去迎接将军。

这很不舒适。但是，我为我的前途和祖国的前途感到急不可耐。

我的旅行伙伴，包括所有的人在内，甚至那些您不久

将知道的种种事件中的精英们，没有一个能想象得到我所写的东西，或者此时正从我脑海中闪过的东西。

那天夜晚，在我妹妹家见到您之后，我再也未能找到您。我把见不到您归咎于文塞斯劳的插手，因为有人对我说，是他把您带到了乡下，让您远远离开。这也是我不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与您辞别的原因。

这次应我的请求，我们在忠诚的埃拉迪奥处的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我们什么也没有说，但是，您很痛苦，这一点我可以清楚地看到。

## 第 二 封 信

菲莉希塔丝：

我向您坦白我的重大秘密的时候到了，也许您已经猜中了。两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发生了不幸的情况，由于这种倒霉事，此时我才敢于这样做。

我不会让自己被那些迫使我们流血牺牲的荒唐的社会规范所制服，我也不允许这种荒唐地强迫人们作出牺牲的生活为所欲为。自从那个夏天我们相遇起，自从我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那个坏蛋暴君的家中时，我的生活就改变了。我知道，我那疯狂而愚蠢的心，直到那时才装下了一个人，我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她的身上。

尽管我还年轻，您也很清楚，我认识过其他女人和情

人，但是我从您那里得到的是不同的、美好的感受。我可以毫不羞涩地向您坦白，在那天的乡间散步中，我的手仅仅摩擦到您娇嫩的皮肤，从此以后，没有一小时、一分钟、一天一夜我不在思念着您那天蓝色的眼睛、您那纤细而灵活的腰肢、您那柔和的声音、您那令人迷恋的自然。

亲爱的菲莉希塔丝，尽管您才十九岁，但您更具有女人的风韵，与我认识的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夫人相比，您更能唤醒我的爱情与激情。

原谅我的坦率，它可能伤害了您文雅的耳朵。

我的生活和我参与其中的暗中活动，或者说像儿童的玩捉猫游戏，在这个时刻实在是太关键了……

### 第 三 封 信

我挚爱的姑娘：

我不能控制我的情绪和我的激情。尽管我尚未发出这封信，也不知道我是否敢于这样做，但我可以向您肯定，如果说，直至今天我一直按照血缘关系、家族荣誉强加的义务来行动的话，我已经决定说一声‘够了！’

您很了解，我在政治方面是光明磊落的。

我最近在解放者身边的活动，已经被我家知晓了我的兄弟温贝托给我派去了各种说客，想让我打退堂鼓，但我已经作出了决定，因此，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什么家庭关系了。我要战斗到底，为了我挚爱的祖国，要去做

我认为必需的、公正的事情，为了重获我们早已知道怎样去获得的自由，就像我们神圣的国歌中的那一段所说的那样。

罗萨斯已经疯狂，他只对权力和阿谀奉承感兴趣，如果说，他以前还想到过国家的命运，那么，他现在变了，他现在变成了我们这块大陆上不幸盛产的暴君中的又一名。

我的姑娘，我们一起谈论了那么多次所有这些事情，而且我知道您是一名爱国者，虽然您抱怨身为女人，这使您无所作为。

所有这些都会因为我向您提出的请求而改变，我知道放弃一切而跟我走，将是一个重大的牺牲。跟着我，一个年轻的疯子，前途未卜。还有那些孩子们，您的宗教原则，我承认这些原则是真正的、坚定的。

为了得到您，我准备奋斗，给您一切，我挚爱的神圣的人。我确实感到了一种动力，那是被我的爱国者朋友们所感染，也是从您那里，从您的善良与纯洁的青春中学到的动力。这种动力告诉我，为了我的祖国和我的爱人，我应当冒一切风险，不然，死亡与怯懦就会得胜。

## 第 四 封 信

亲爱的菲莉希塔丝：

收到您的信，辨认您的字体，阅读您书写的我的名字

是一种巨大的快乐。

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是一种悲伤。我看到您不愿打破常规，您的责任高于一切，而更糟的是，我看到对我哥哥的恐惧使您麻木，使您不能凭您的心灵自如地活动。

您的信到来时，正是我最困难的时刻。

我感到恐惧，我们正在为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做最后的准备。

我身边随时都有目无军纪的士兵、污垢和死亡。每天都有死亡，这不是一种幻觉，而是一种残酷而可怕的事实。

我正经受的恐惧是一种我不习惯的野蛮的恐惧。

唯一使我的生活有所不同的是想念您，但现在我想，连这也对我不起作用了。

我也对我母亲悲惨的死亡而感到悲伤，我深感遗憾，虽然我们不和。

乌尔基萨将军对所有的人都有分寸而沉默寡言。他对我很热情，总让我待在他的身边，待在萨米恩托身边。因为我是这里为数不多的识文断字的人，我帮助他写战报和书信，这使我离现实更近。伙伴们不了解我，他们嘲笑我的穿着、我的举止、我的谈吐方式。您应该记得我是在什么地方，而大部分战士是恰卢亚印第安人。

菲莉希塔丝，我希望您考虑一下。您只有二十来岁，您今后在一个像文塞斯劳这样的男人身边的生活，这会让您越来越难以忍受，而且今后情况会变得更糟糕。

在您试图使我丧失全部希望的同时，您给我的信，对

于我来说，好比写完了一曲交响乐献给我，我的一生可能是悲剧性的，命中注定要在 24 岁时死去。您对我说再见时，那是一种深深的哀怨。

我 24 岁可能被注定要死去，这是悲剧性的。

因为除了我经历的和我对您讲述的危险之外，这里度过的每一天都更糟，如果您抛弃我的话，只有一个更可怕的死神在等待我。我不对您说谎，也不打算吓着您，但我要向您坦白，我甚至想过自杀，尽管我认为自杀是一种疯狂。

菲莉希塔丝，我爱您，我要求您考虑考虑。

我可怜的母亲的死亡可以使事情简单些……

这信还没写完，因为公共马车就要出发，而我希望您尽早得到我的消息。

不要剥夺我的希望，我需要它们。您的阿雷霍。

## 疾 病

我能感到山上有风。我甚至感觉到太阳很明丽，它给所有这些景色以一种奇特的、美妙的色调，但我觉得自己离所有这一切，有上百万公里远。

我的风是人工的，或者是不自然的，我的感觉很遥远。

一个非常干净，非常洁白，非常凉爽的房间。一张矮矮的外科用床，我躺在上面，有一张小桌，上面放着一只陶罐，里面装着很难吃的果汁。这是医院里的果汁，这就说明了一切。

我感到悲伤,非常悲伤。然而我希望感觉重新好起来,我要与病痛做斗争,重新进入健康人的世界,而不是滞留在这个苦涩的病人的世界。

我感到自己精力充沛,我并不虚弱。

我向我的朋友要那些谈论欢乐的书籍,或者,怎样使这种该死的疾病或者死亡(如果它到来的话)具有意义的书籍。

给我带来的任何东西,没有一种适合于我的。

整整六天前,这场恶梦开始了。

7月21日,星期五。我去看医生。那是巴斯多尔的一个朋友,或者是他认识的一位妇科医生,我去做例行检查,那种我们女人应该接受的可怕的测试。

由于那天我在通讯社比较空闲,我先去理发店剪了头发,随后买了一些家用物品。

我提前十五分钟到了诊所,开始读一本很旧的杂志,就像在医疗所或者其他诊所中常做的一样,那杂志怕有几千年了吧。

那是另一个时代,1970年,一种超现实的形势,同样一些面孔,但是更加年轻。几乎没有军人,没有英式婚礼,也没有皇家的出游。

突然响起一种典型的声音:

“轮到您了,小姐。”

医生放写字台的诊疗室与我一生中去过的其他诊所一样。

“您是阿古斯蒂娜·雷卡德,是巴斯多尔·胡维纳尔的朋友吧?”

“是的，”我的回答既简短又紧张。

“我是巴斯多尔的好朋友，我们是同学，他是一个杰出的人。”

“请问您的年龄。”

“我刚满 39 岁。”

“您现在的地址。”

“埃尔美西亚斯，37 号。”

“职业。”

“记者。”

“您是独身吧。”

“不，我有两个孩子。”

“分娩时有过什么问题吗？”

“没有，他们是双胞胎，是顺产。”

“双胞胎，多好啊。（当一个人说她有孪生子女时，总会有某种评论。）

“您曾注意使用过什么措施防止再怀孕吗？”

“是的，几年前。”

“性生活正常吗？”

在回答他之前，我犹豫了一下。他知道巴斯多尔的事吗？他应该知道我在这里独居了二十个月。

“是的，当然正常。”

“月经正常，或者有什么不舒服吗？”

“正常，我每年进行检查，只是现在已经有两年没做过检查了。”

“好的，我们来检查一下，请您换一下衣服，躺在小床上。”



赫尔特鲁蒂斯小姐,请帮帮我。”

“稍微再放松一下。向前伸臂。就这样,好,您坐起来吧。”

“这里不舒服吗?”

“有一点。有什么东西吗?我低声问道。

“没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小肿块。但您别担心,在您这个年纪的妇女中,这是很普通的。您给您的孩子哺乳吗?”

“不,只喂了十五天。”

“当然,您是法国人。”

(我立刻明白了医生所做的联系自由的、解放的法国女人。不对,我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当有人对我讲了塞巴斯蒂安的事之后,我的奶水就没有了,这就是一切。)但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没有继续检查。

“您现在穿上衣服吧。”

“发生了什么,我看到您在担心。”

“别害怕,明天我们拍个乳房成相,之后我想在洛斯·萨乌塞斯见到您,我在那里做手术。”

“做手术,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东西要尽快摘除,没有必要冒险。”

我一句话没说,穿上了衣服,带着这个命令或者说判决迷茫地走了出来。我首先想做的是,去国际电话公司,打电话到法国,和皮埃尔通话。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朝我停着的汽车走去。插上钥匙,并发动了汽车。

我看着过往的人们同往常一样。没有人用特别的方式看

我,没有人知道我此时正在经历的事情。世界依旧,外表应当一如既往。有人在靠近我的车子时,对我说了一句奉承话,另一个人对我按了一下喇叭。

我一团恐惧,我想到了所有可能保佑我,使我不受可能的侵害、节制、意外和不幸的人,想到上帝、咒语、许愿,还有女巫。

我想到了特里尼达,想到了让,这可以帮助我的神父。我艰难地开着车。我突然减慢车速,深深陷入沉思之中,拼命想做出种种荒唐的解释。

可我时而又加速到底,极其危险,到了危险的极限,一种信念,一种我从不认为它存在的信念羞涩地出现了,就是这种高速度可以把我从自杀、痛苦、侮辱、惊惶、不安和恐惧中解脱出来。

“怎么可能?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在我 39 岁的时候?”

我被一种可怕的困惑支配着。我健康地走进来。就在昨天,我还骑马几小时,今天上午我去了理发店,跟大家一样去买东西。只是出于谨慎我才去看医生,但现在我已经到了极限。我的自我经历了 90 度转变。

医生是没法隐瞒的。这个故事我听过那么多遍。一切都是从乳房上的小疙瘩开始的,而后一下子,变成癌。接着是急救,上断头台。而后呢?

在别人看来,也许我已经不年轻了,但是我有自己的孩子,我的生活中还有上千个计划在前面呢。

我从来都不习惯于恐惧。这不公平,但我能跟谁去抱怨呢?

我想起了耶稣基督,想起了我妈妈和她的小神坛,她需要单独思考和祈祷。

我通过车上的镜子突然看了自己一眼。同样棱角分明的面孔,被人们认为美丽的眼睛。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对自己挤了挤一只眼,我笑了。这独自一人的笑有些像马戏团的小丑。没人能忍受一个爱哭的、令人失望的女人,更不用说我的孩子们了,他们不习惯这个。我也不相信巴斯多尔能做到这一点。我走过一家糕点铺。我戴上太阳镜,好掩饰我哭过的双眼。

我要了一个巧克力蛋糕,那个最大、最好的蛋糕。我要胜利地回到家里,应该无人觉察什么。我应该保持仪态。人们总是教我憎恨歇斯底里的反应。在这方面,我父亲是个十足的法国人,而我母亲却非常印第安人化。

“一个完美的巧克力蛋糕,不要带裂口。”我不太友善地提出要求。

“我们这里总是把蛋糕做得完美。小姐对以前的商品有什么不满意吗?这可怜的售货员莫名其妙。

我到家时,巴斯多尔已经坐在起居室里了。

“我提前离开了医疗站。今天我们没有小组会议。”

他比平常来得早,这证实了我所有的怀疑。接待我的医生对他讲了,告诉了他我遇到的情况。巴斯多尔还在试图掩饰。他对我谈论政治、谈论卢卡斯和选举获胜的可能性。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了,我只想待在妈妈或爸爸的怀里,就像我小时候那样,穿着那种柔软的、能护卫我的裙子。我想让他们照料我,制止我的恐惧。而且他们还会向我保证,你不会有事的,你将继续活下去……活下去。

“请你不要再装了,让我们结束这场闹剧吧。我知道,那个可恶的医生什么都告诉你了,我得了一种癌。他不能沉默,这是缺乏道德的,我没有让他说出来。”

“你能做什么来帮助我 只能同情我而已。”

“阿古斯蒂娜,你要理智,不要歇斯底里,亲爱的,你听着,一切都会好的。”

“当然啦,你来扮演英雄、拯救者。可我要活下去,我不想死去,这就是我现在最关心的,而不是这个狗屎国家,不是它的矛盾,也不是你为之奋斗的人们。我关心自己,你懂吗?”

“我非常理解,让我来帮助你吧。你既年轻又强壮,你不会出什么事的。你并不孤单。你有我,有你的孩子,有你的朋友,有你的家庭。”

米歇尔进门打断了谈话。

“妈妈,我的卡斯蒂利亚语得了一个7分。你不觉得棒极了 我太棒了!你在哭,为什么?”

“不,亲爱的,这是让烟给熏的。城里有一种可怕的、让人没法呼吸的空气,我从那里来。”

“为了这个7分,我要一件礼物,今天晚上我要给爸爸打电话。”

“好的,等到我们吃饭的时候吧。”

“好,你们愿意的话,我请你们都去吃麦当劳。他们会看到妈妈穿这件大衣有多漂亮。”

我对一切都回答“是”。因为一切对我来说都一样。晚餐过程我表现得相当平常,当我们回家以后,巴斯多尔留下来睡觉。我不想独自度过那个夜晚,我也不在乎有孩子在场。

我感觉到那个跳动的肿块，随时偷偷地抚摸它。那就是死亡的标志，鲨鱼的牙痕。那是一个把我和另外一个我不想去的世界钉在一起的钉子。

我无法入睡，尽管服用了准备急用的五毫克莱克索。<sup>①</sup>

最荒唐的念头从我脑海中闪过。

谁会为我的死亡感到更难过呢？是皮埃尔还是巴斯多尔？米歇尔还是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更坚强一些，但是米歇尔对我来说则意味着某种如此特殊的东西。另外一个女人将取代我。我将请求皮埃尔，别让她立刻就来，至少要等两年，那时孩子们已经 14 岁了。我的病情将在什么时候恶化？我能察觉到吗？

第二天我住院了，中午做完了手术。是良性肿瘤。不必给我做辐射治疗了，只是部分切除了乳房（为我增光的乳房），而不是全部。然后立刻找到了解决办法，一位整形外科医生解决了问题，而且什么也看不出来。

大概像很多遭受类似不幸的人一样，为了不沉溺下去，我不认为这痛苦只属于我一个人所有，我应该为生活而斗争，别让自己被打垮。心理医生说，想活下去是关键。

我不懂，与意想不到的遭遇的对抗，是否是由不公正的上帝，或某个邪恶的魔鬼所造成的，或者仅仅是我进入了一个陌生的自然界的游戏，在那里出生和死亡都很自然，并无很大差别。但上帝对我这个不信教的人很善良，通过特里尼达，我得到了帮助，她给我带来了一群信徒。第一天，他们走近我，和

<sup>①</sup> 莱克索是一种镇静剂

我说话。然后,他们给我读赞美诗,或是读《圣经》片段,这些对我来说,头一次变得有意义。

现在他们每天都来。我领了圣餐,也进行了忏悔。

我很平静。

皮埃尔来了,我发现他很悲伤。他不会掩饰,我们谈了很多,很多。

克里斯蒂安和米歇尔吓坏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逃遁到宗教信仰里对我有好处,能使我坚强,我感觉自己变了。

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在这里我感觉好多了,有时候甚至忘记了发生的事情。

可怜的巴斯多尔几乎没有再露面。他每天都打电话,大部分时间是同皮埃尔谈话。

皮埃尔照顾我,宠爱我,吻我。而我和他在一起时,我敢于表现出自己是软弱的,我哭泣,对他说我害怕。

我也对他坦白了一切,包括我和巴斯多尔发生的不忠。一切一切。

## 出 发

当我要回忆在这个国家度过的岁月时,真要命,那些记忆总带有选择性……我的情况仍然如故。早晨在我的书房工作之后,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漫步,我去办公室,在那里重新开

始我的正常生活。

我曾与死神擦肩而过。也可以说，我差不多已经死过一次了，但是我没有那些幻觉，人们曾向我断定的另一世界的奇妙幻觉，要么是一个正在等我的上帝，要么是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会遇到我认得出的塞巴斯蒂安，或是我的父母，或是卢卡斯·奥尔特加，或者还没有出现的卡特里埃尔。

可是，我感受了一段信仰宗教的经历，这对我帮助很大。信仰仍在我心中，但是其形式现在不同了，然而总是很强烈，非常强烈。

最近这些天，我生活在这个国家，这三年来它对我来说，既亲切又重要。这个国家的人们相互对立，他们带着极乐世界的肥皂泡，也有的人是来自泾渭分明的社会阶层的、特别有价值的人物，同样，也有生活在贫穷、苦难的下层社会的人们。

也许由于我生病的原因，我开始觉得一切都不同了。巴斯多尔试图帮助我，尽管我相信，为了这样做，他作出了巨大牺牲。但是，像我在我们关系开始时所预料的那样，他是为了干大事而出生的，他的目的，与我感觉自己来到这个奇怪世界的目的，是非常不同的。

我总是对他说 我没有当烈士的志向，更不用说去当什么烈士的伴侣了。不尽的等待，说不定什么时候的到来，这都叫我受不了。我需要一些最起码的规律。我喜欢伴侣之间享有更多的平等，要有相同的兴趣，但也要有一定的自由 巴斯多尔为他自己要求独立，尽管他没有用言语把这说出来，可这独立并不是为了我。每天他都要多占一点我的世界，进入、打断、征服我的世界。我的癌症是一种理由，这暗示我，叫我放

弃工作,让我们一起去城外生活。也许我应该重新画画。“世界是可怕的,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来,太严酷了,我很乐意保护你。”他这样向我保证。

但是,无论如何,我喜欢生活在这个可怕的世界,我讨厌大男子主义立场,虽然这并不是一种极端女权主义的宣言,我也不认同极端女权主义者,因为那使我厌烦。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必须有一个终结,那个红色的院落也必须有个终结,很凑巧地,没有经过分析,就走到了它的冰点。那两个年轻人私通之后会怎样?会有决斗吗?会宣判死亡吗?会自杀吗?此时,我问自己,我和巴斯多尔之间的事不算私通。法律上的回答为不是,而我同皮埃尔的结合总是有着稳定的意义,我们有孩子,一起生活了十四年。但这种关系现在也是不明确的,带有“故障”。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要走了,我需要有孩子们的生活,他们今天回到了父亲身边。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需要皮埃尔,不知道我是否需要巴黎,但是,回到他的身边,回到巴黎,这些并不叫我烦恼。

我不无幼稚地欺骗着自己,放弃深切的情感,永远地放弃巴斯多尔,放弃特里尼达,放弃还在狱中带着女儿米拉格罗斯的卡塔莉娜,这些令我非常痛苦。甚至还要放弃阿拉梅达林荫大道、大海、山丘、我的文学作坊、手工揉制的面包,还有我的鲜花、我的树木,以及这三年来我积蓄起来而又不能带走的所有的普通物品。我把很多家俱留给了善良的安东尼娅,书籍和图画留给了班恰,我和她终于成了最好的朋友,并且开始一起工作。



亲爱的：

有那么多事情我还没有说。

但我已不是原来的我，您也不是我一年半以前认识的您了。

我们曾求助于命运，但上帝，某人或有些事情介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权利成为幸福的人，也没能彼此相爱。

我们的爱情是被禁止的爱情，不仅是人类的常规，还有很多现实的介入，这妨碍着我们共同构筑些什么。

您的祖国召唤着您，而那是您的事业。您更属于祖国而不属于别的，您这样对我说，而现在的境况将更加证实这一点。

我懂得，我只留下了我们相会时的那些美好的时刻，那些不能忘记的日子，我们共享的亲密关系。

您的温柔，您以如此多样的形式表现出的亲切，是我永远不能淡忘的。

我曾分享过您的雄心，您的生活，但是，在另一边，我有自己的位置。

在某段时间内，当阿古斯蒂娜·雷卡德想回忆她生活中如此特殊的几年时，那可悲的、有选择性的记忆，可能会扫去她的历史中最悲惨的时刻，将仅仅留下她的家、长着白玉兰的美丽院落、她曾经走过的街道、小岛上砂粒非常细的长长的海滩、还有那骑马散步的时刻。也许，由于她的自省，可能会出现巴斯多尔，以及与他有关的人们。还有一个已经淡化了的

暴君，也许连在历史教材中都不会提到他。

今天她和安东尼娅与西格蒙德一起去旅行，他们乘坐一辆出租车前往那个小机场。

自从那天她在离开‘戴高乐’机场二十个小时，到达这个机场起，已经过了三年。在穿越公路和法老式的桥梁时，她回想起当时感受到的恐惧与兴趣。只有特里尼达和塔德奥代表《时报》来接待她。啊，还有《巴黎时报》她的前任古斯塔夫·伯努瓦，没过几天他就自杀了。现在她在琢磨，他果真是自杀吗？报社不想继续调查，没过几个月，他姐姐来了，但是什么也没得到，虽然很多人想帮助她。是个可怕的孤立事件。“阿古斯蒂娜，你要小心。你的申请很有吸引力，但这也是与不祥为伴的。”

机场很小，没什么特殊之处。她没告诉任何人，这个星期二，10月29日，她要走，因为她受不了离别。也许，这是她生活中的又一次逃遁吧。

“请注意，请注意，法航的旅客请到9号候机厅……”

她像个机器人似地交了行李和机票，还有小狗西格蒙德，它被装在一个为它特别准备的笼子里。她亲吻和拥抱了安东尼娅。她们都哭了，她们相互许诺写信。又等待了十五分钟左右，她登机了。

奇特的感觉。一切都使人以为，这是她一生中上千次旅行中的又一次。已经在舷梯上的她看到了巴斯多尔，他像疯子一样，从平台上对她喊着：“阿古斯蒂娜，回来，我等着你。”她进了机舱。“您好，夫人。您的号码。19号。在左边。”

她坐下，略微安顿了一下，使自己坐得舒服些。

起飞几分钟后，有人为头等舱的旅客上了一杯香槟，然后……

| 菜 单                              |
|----------------------------------|
| 午餐<br>茶或咖啡<br>羊角面包加果酱黄油<br>覆盆子蛋糕 |

阿古斯蒂娜戴上了耳机。“巴黎，我爱你，我为你歌唱，你的诗，巴黎……巴黎，总是巴黎……”

萨巴亚尔 1987 年

智利 圣地亚哥 1989 年

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时报》)今天，1989 年 10 月

1 日,阿根廷国家总统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博士,作为国家元首接受了前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长堂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少将的遗骨,他于 1877 年客死在英国。他的尸骨是从南安浦顿的墓地运抵本港的,此次行程,曾在罗萨里奥的战旗纪念碑作了停留,最后在他的家族位于雷克雷塔的墓室结束。



# 为了养活他的那个她

段若川译



# 为了养活他的那个她

—— 献给劳尔

“ 匆匆结婚的那天，那个穿法衣的家伙说，男人要永远养活他的那个她。”

——探戈歌词

好吧,要说使劲抓住的话,我也使劲抓了,至于运气嘛,可没有运气。一切都怪卢乔,可我已经够本儿了。法官先生,您也知道关于好样儿的胡里安的事,是的,现在卢乔有了这好汉从前有过的一切,好吧,法官先生,现在我尽量把我想得起来的关于那唯一的一次旅行中的事情都说给您听。是的,那个星期六。星期五卢乔他老娘给他捎来一封短信,说她星期日就要到了。先生,就是上星期日。

您知道,他们是乡下人,离里约瓜尔多挺近,……法官先生,这您是知道的,他们是阿契拉斯人。卢乔挺小的时候就从那儿出来了,那时他才十四岁,他们那时候穷惨了。您知道阿



契拉斯在哪儿吗？不知道，我就晓得您不知道，老实对您说，这对您不重要了，可我们都知道，先生，堂埃尔南先生，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法官，他每年夏天都去。

是呀，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八年，有了三个孩子。

帕蒂不是卢乔的女儿，可她也和我们一起住在村子里。好的，我说出村名，卡尔利多斯村，在下贝尔格拉诺，有很多小公共汽车从那里过，这就要到哪儿去都不远了。当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卢乔对我说，我们在那儿不会待太久，先生，这是因为我从没有经历过那么穷的日子。我老爹在河口开一家鱼店，我老爹是一个意大利绅士，我不富有，但也是有教养的，可我们住的那村子脏兮兮的。我不是爱慕虚荣，也不是自以为是，可那里的生活太差了，但是我的屋子干干净净，我还养着花，油漆得好好的。

可是不行，那里有歹人，这特别对帕蒂不利。她 13 岁了，那样就构成了一种危险。甚至有人说那里有毒品贩，有警察干涉。肯定有这种事。有些半大小子叫人害怕，就是雷伯特的那群小无赖，他们奸淫……我不知道还干过多少坏事。不，法官，我们没有告发，因为我们总是害怕……咳，律师早就跟我说要少说话，只回答别人问的，我肯定又说蠢话了。怪不得卢乔说我信口开河，可怜的卢乔，现在他拿孩子们能怎么办呢？他甚至还得给他们做饭，幸好帕蒂能帮帮他。上帝啊，霍内夫人会怎么说呢？她知道这件事了吗？对不起，先生，问题是我总信口开河。得，我接着说。那一封信寄到了，是的，就是我给您看的这一封，霍内写不好信，村里的药剂师，只要给他几个小钱就代写急信。这封信当然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不

是接到这封信,要不是有人告诉我们她要来,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我也就不会丢人现眼了。

得了,那天晚上,那消息传来以后,我们争吵了很久。住在这村里真是倒了邪霉,我们连一个小钱也没有,我在孩子们身上花销很大,帕蒂该出去干活了,因为她长大了,可他呢,任什么本事也没有,很少出去干活。

是的,他是机械师先生,不是说说而已,他在本行里是个“行家里手”。说实话,我挺可怜卢乔,我觉得自己挺不幸,想帮他点忙。

不知道跟您说了没有,我是当女佣人的。现在都叫服务员。其实,我是贝尔格拉诺一家人的钟点工,那儿离村子不太远,当然,那是个富人区。我只是上午去,因为我喜欢孩子们从学校回来时我在家,此外,我也不喜欢帕蒂孤孤单单的。上帝保佑我,别让那里的那群无赖对她干些什么!有人对我说让她去当女佣人,我也不乐意,我愿意她干点什么别的事,哪怕是当女理发师呢,或是别的,可是千万别去替别人洗脏污;为了这个我才作出牺牲,您说是不是。

是的,我又走板儿了,可是,先生,这是神经紧张。得,那天早晨,那个星期六,我坐小公共汽车去我干活的地儿,乌桑迪巴拉斯家,荷塞芬娜夫人是我的东家,她很信任我,我有这家的钥匙,当然也有储藏室的钥匙。每到星期六,他们就去别墅区,去那儿之前先买上一星期的东西,总是在超级市场买,离家相当近。我坐车的时候就想着这一切。我挺幸运,我要解决卢乔的问题了。先生,他们买的所有的东西,有好吃的东西 奶酪,酒,甜食,饼干,咖啡,还有肉,鸡,有好多肉,好几只

鸡。我的东家很有钱,先生,他们有两辆汽车,有音响设备,还有天知道多少家用电器啊,还有超级市场的发票,我总是读读,每个星期要花两百个奥斯特拉尔<sup>①</sup>,这样,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霍内夫人就会想,我们过得还不错,卢乔对他们撒了谎,这是最糟糕的事,说我们住在一套有燃气和暖气的公寓里,说我在当售货员什么的,得,我先下了楼,和瘦子罗德里格斯交涉好了,他是超级市场的听差,他帮我的忙。我们乘一辆出租车……当卢乔从雷迪罗火车站接回老太太霍内夫人时,桌子已经摆好了,甚至还有鲜花,我做了一盆土豆炖鸡,沙拉,还摆上了优质的奶酪和酒,我打开了彩色电视机,这可是我们自己的,18寸。

先生,您要是看到卢乔的那副面孔,更不必说霍内夫人的表情了,先生,您这个人很严肃,您肯定也会高兴的。

现在您,法官先生,您没看到卢乔的面孔,您可以不疼不痒地对我说,饭做得不怎么样,但是那真让人高兴得想跳舞。这有什么不好呢?先生,您说呢?我的良心坦然得很。上帝会讲话的,当然,您也会讲话,但是先生,您得解释解释,人们认为,生活公平地对待所有的人,难道这话就白说了吗?法官先生,您问我是不是后悔了?说实话,我不后悔,因为如果在这世上没有公正,在别的世界会有的,卢乔和霍内夫人还有孩子们,他们会说,在这糟透了的世界,他们有一次曾经抓住了一点小小的快乐。

<sup>①</sup>奥斯特拉尔,阿根廷货币名称。

## 两个半球上的三个人

在这里我们没有几个特别亲密的朋友。但是却有过不成功的节庆，是由于这种那种原因所造成的。要么是谁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要么是出了点什么差错，或者是，不该下雨却下了雨，破坏了花园里的鸡尾酒会。要么就是由于某种原因，教皇的代表辜负了我们的盛情。或者更糟糕，不论是外长还是卡尔，还有我，我们都处得不融洽。然而，一切表面上看去倒还十全十美。我看书，看了又看，任凭记忆又做开了游戏。我读着自己的姓氏：“奥托·苏尔·德林，我的一位祖先，在纳慕尔围城中表现突出……至于我嘛，由于实施酷刑和犯了杀人罪，将被枪决……所以我自然会想念我们的先人，我就在他们的荫庇之下，不管怎么说，我是属于他们的。”

我无法集中精神念书。因为我必须精心准备菜谱，还要有古老的俄国旗帜的颜色。“亲爱的，劳驾，这个细节也不得疏忽。”

我忍气吞声,跟自己过不去,因为我总得讨好卡尔。只要他脸上稍微有点不高兴的表情,我会一整天都不舒服。

(布宜诺斯艾利斯,那已经是从前的事了,我认识了卡尔·舒马舍,他个子高高的,有运动员般的身材,人品出众,成功总是伴随着他,他的年纪比我的大得多,这就使只有 19 岁的我对他非常着迷。)

我们马上结婚了,并且搬了家,卡尔挺会疼人,他送给我好多礼物,但是把他的家庭、朋友、他的语言,甚至他的爱好也强加于我。然而那些对于我来说那么重要的家庭、祖国、我的父母、朋友和我的表兄们,也是那么重要吗?

(在乡下,那位于特拉比切的屋宇以及我的祖父,对于我们,以及对于所有的人来,是一个神圣的神话。我、本哈明,还有胡安,我们是他最疼爱的孙辈,这使得大家既羡慕又嫉妒。)

“我的眼睛从你的眼睛里得到灵感,我想进入你的眼中,愿你的嘴唇近在我的嘴旁。”我还记得本哈明为我写的诗篇。骑马散步的时候,他骑着那一匹最好的小白马,总是走在我身旁。还有那天下午,在那一棵棵垂柳下的初吻。

(本哈明决定去旅行,他对我说,他必须去。我恼了,然而我去送他,我们俩都哭着,我现在好像还看得见那列火车,他从车窗里探出那一头红发的脑袋,他咧嘴笑着。家里人闭口不谈他走了的事,我领悟到有点什么秘密。我去问艾莉莎姑妈,她就是他的母亲,可她不回答,而本哈明也不写信。)

“夫人,有个年轻人找您。”

“一个年轻人 是奥地利人吗?”

“不,不,夫人,是个阿根廷人,说话带着‘切’<sup>①</sup>……”

“可是你没跟他说,让他有事明天到大使馆去吗?”

“不,他说他是您的堂兄本哈·萨……”

“本哈明……我那红头发的堂兄。”

我们亲吻,我们相互看着,又拥抱起来。

可是我们怎么办呢?

“本哈明,大使,也就是我的丈夫卡尔,不能让他看见你,你藏起来吧。可这些创伤是怎么回事?你的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战斗打得很激烈,可现在没事了,因为有你在我的怀抱里……,,

“把这一切都忘了吧,本哈明,我结婚了,我不能走。”

“亲爱的艾米莉……”

“本哈明……”

“艾米莉,艾米莉,对不起,原谅我,你的堂兄已经死了。”

(他突然这样说,可我并没有从楼梯上滚下去,没有叫喊,没有哭泣,也没有昏倒,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

“本哈明死了?我的堂兄死了?什么时候死的?那个吉列米娜,她在哪里?孩子们呢?是谁杀死了他?”

“就是我们在大剧院见过的那家伙,你还记得吗 那个令

① “切”是阿根廷人常用的口头语,意为“老兄”或“老乡”。

人愉快的人,他每天都送女儿去上学,他是这次行动的首领。”

(本哈明死了,几分钟前我还在想念他,我在他那强劲的胳臂里,他那胡子,他那红头发……他穿着一条灯笼裤,扎着带银扣的皮带,身披一幅红斗篷。你和我还在一起,本哈明,带着你那悠长的笑容,野李子般的笑容。)

“我亲爱的艾米莉,你必须镇静,你不要哭,我们现在正在设宴。如果你认为有必要,你可以去布宜诺斯艾利斯。可现在正是你尽职的时候。别忘了,教皇的代表只喝矿泉水,蜡烛要离我们的武官远一些,省得晃着他的玻璃眼珠;法国大使吃素,必须单独给他上菜。这一切你都记住了吗?对不起,艾米莉,政治就是政治。”

# 荷 塞 芬 娜

——献给卡门·奥莱戈

那时候,我们住在“ 洛斯·多明尼科斯 ”。我家在一条泥土铺成的死胡同的紧里边。周围尽是一些李子树、苹果树、还有各种小野花,甚至还有一棵“ 戈碧微 ”——智利国花,那是拉腓尔

的骄傲。

我们找到这个地方,可真没找错。啊,这一切是于 1986 年的那个 7 月开始的。

我坐在客厅的壁炉前,等拉腓尔来。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要把作业交给老师的学生。我想把《荷塞芬娜》的第一章讲给他听,念给他听,好长时间了,这部小说让我不得安宁。我得把它“ 揪出来 ”。小说的主人公吗?巴勃罗,一个有天才的画家,具有浪漫气质 荷塞芬娜,一个原始部落的女人,简直带点野性。

在一个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下他们相识了(巴勃罗



在一座雪山脚下画画儿，突然看见从山顶上滑行而下一位少女，跌落在他的脚下，当他正要扶她一把时，看到她那双像猫一样的眼睛，还有那修长苗条的身躯。）

我略去了一段细节描写，因为那使我很不舒服，此外，荷塞芬娜的鼻子略大些，巴勃罗的手略长些，这些对小说有什么关系呢？

打一开头，拉腓尔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也觉得满意，对自己的作品很起劲。

（荷塞芬娜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美女，然而她成了山中风景的一部分，她与大山互为补充，没有对方，二者就不成其为自身了。）

荷塞芬娜大概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她既不是个金发女郎，也不带一点和谐的特征。此外她大约是个文盲，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气质，她不热爱艺术，更谈不上爱好文学了。

巴勃罗使我觉得有点不一样，我把巴勃罗和拉腓尔搞混了，有时候我不能区分想象与现实。

一开头，拉腓尔和我开玩笑，讥笑我想创造一个和我如此不同的人，但是我们渐渐习惯了这些人物。

第一天的朗读以后，我们又朗读了好多次。我上午写作，晚上就逐步把这些东西念给拉腓尔听，有时候读得很多，有时候读得很少，有时候一点儿也不读。

我们欢笑，我们悲伤，讨论着每一页。

（由于荷塞芬娜有过孤独的童年，几乎没怎么上过学，后来，少女时期，在冬天，她的生活几乎完全投入滑雪，而夏天，则用来编织或是制作甜食。荷塞芬娜天生就是为了疯狂地爱

别人，或者被别人爱……)

拉腓尔有时从大学回来得早一些，这样的一天，他很起劲地对我说，他已经答应继续给他的学生们多读几章小说。

我不高兴了。我开始感到一切都有点不真实，可是荷塞芬娜倒像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我有一种被排挤的可怕的感觉，或者，这仅仅是出于妒忌？但是，我干嘛要妒忌一个并不存在的人，一个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人呢？妒忌一个不现实的人、一个无形的人呢？

我分析着，这一切好像既荒谬而幼稚，但是我就是这样感觉的，这种感觉渐渐把我摧垮。

每天都有什么东西横插在我和拉腓尔之间。

当然，星期二那天发生的事情把我的忍耐力耗尽了。我在书房正修改我小说的一部分，这时拉腓尔进屋来，特别起劲。

“你喜欢我的画，你认出她来了？”

“可那是荷塞芬娜，是我的荷塞芬娜！”

那是比我的那一个更美的荷塞芬娜，她倚靠在一棵巨大的柏树上。

拉腓尔从来没有给我画过一张像！更要命的是，据他自己说，他仇恨画肖像。可现在他给我看一幅“荷塞芬娜”的画像。我觉得太可怕了。

那天夜晚可怕又漫长。我睡不着觉，然而只不过是这个从我手中逃走了的生灵在折磨着我。

“索莱达，你在哪里？你钻到哪里去了？”是拉腓尔的声音，他差不多喊了起来。我照着卧室里的镜子，尽量整了整乱

蓬蓬的头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下了楼。

“你 没 在 写 作 ？ 那 你 在 楼 上 干 什 么 呢 ？ 我 的 荷 塞 芬 娜 呢 ？”

“ 我 终 于 写 完 了 我 的 小 说 。”

我朝壁炉看看,拉腓尔随着我的目光望去。火,比任何时候都炽烈，在木柴旁的是已经变红了的乱哄哄的片片纸张。

# 来访者和雨水

—— 献给劳利托

从太阳刚刚照到圣路易斯州的座座群山时算起，我们已经在路上跋涉了六七个钟头。那一带只有我和我那匹马是活物。连一只飞鸟、一只兔子都没有。没有一丝风。已经是黄昏了，即将来临的是可怕的恐惧心理和乡间夜晚的鬼怪。寒冷、晚风，八成还要下雨。

我决定休息一会儿。我坐下来，将自己裹在斗篷里，从热水瓶里倒出水，给自己预备一点马黛茶。

孤独现在变得叫我越来越难以忍受了。这种压抑的感觉使我很不舒服，令我痛苦。我想，当初并不是我去寻找孤独的，所以现在我也不受她的气。

（那个蓄胡子的红头发的人在图库曼大街的那栋小公寓里说：“应当罢工。”我们不能被人欺负，这是唯一没说出来的指令了。”但是，我们在宣言上签了字。”然而，最重要的是，

我的名字出现在那上面。”听到那声音了吗？赶快到窗户那边看看！”是一声该死的枪响。”你们跑吧，我来掩护。从平台跑吧，快点儿跑，曼努埃尔！”你们被包围了，不许动！开门，这群笨蛋！”然后是飞快地奔跑，一开头是上平台，然后上了屋顶，在一座院子里面，一些人掩护了我们，然后，我们上了大街。“咱们最好分开吧，我走了……”谁要是有可能，就给党组织打个电话。”然后，到十一号车站，登上开往多萨的公共汽车。）

几天过去了，我找到了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对这一带比较熟悉。我认出了这条河，我觉得它现在变窄了，我还认出了那棵条纹康达木，还有那棵柳树。已经开始有一些小山羊、小绵羊了，还有两头驴子。我寻找的那座小小村庄突然出现了。那里有四五栋农舍，有一栋比较好的土坯房，它有红色的瓦屋顶，有一根旗杆和一面旗帜，那是一所小学校。一盏小小的灯照耀着校门。我不假思索就敲了门。

我知道那位女教师是独居的。她向我问好，好像她正盼着我来临。她把我带到一个相当大的房间里，那里有一扇窗户面向群山。一张桌子，一张简陋的床，一盏油灯，还有一张粗糙的书桌，桌上有几本书，这些就是全部家什。

“您不是把自己的房间腾给我吧？”

“不是的，这是阿尔丰索神父的房间。每隔一段时间他来一次，这是他母亲和他兄弟的一些照片。”

“最后一次他是什么时候来看您的？我装做很随便的样子问道。

“您别担心，这个星期六他刚走，要到下个月才会回来。

旁边是洗漱间。我住在学校的另一头，我想您会很舒服的。”

“学生们呢？”

“他们早已习惯了，不会多问。您可以算是一位访问我们学校的视察员。您要在这里待很长时间吗？”

我们在厨房里一问一答，她请我在厨房里喝了味道很好的咖啡，吃了烤玉米饼。

“您尝尝，这是我自己烤的。”她微笑着说。

于是我看看她，她不过才 25 岁。可是她的面孔并不显得很年轻，眼睛大大的，很明亮，皮肤黝黑，是那种非本地人，经过风吹日晒才变得那么黑的肤色。

“我走了，我得去改学生作业，然后到小镇去买东西，咱们 9 点钟吃晚饭。”

“我叫普林斯格，当然不是厅里照片上的那位普林斯格。”我对她说。

“您真有意思，我叫梅塞苔丝，可不是圣马丁<sup>①</sup>的夫人梅塞苔丝，我姓维多亚。”

她又笑了，我也笑了。她的嘴很大，很性感，这叫我喜欢。我还想问点什么，可是，如果我问了，她也就有权利问我了。我宁愿不吭声。

她走了。我脱下靴子，把斗篷放在床上。我整理一下自己的东西，进了洗漱间。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记在一个本子上。我发现感觉好多了，不那么焦虑了，心里也更踏实了，正如博尔赫斯所说：“当一天结束时，我可以说，我是双重的幸

<sup>①</sup> 圣马丁（1778—1850）阿根廷人，伟大的民族独立领袖。

运。’我找到了住所,又遇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女教师。

从身后的窗户望去,我发现夜幕已经降临,不知不觉,我逃亡在外已经三天了。

雨声使我醒来。一股特殊的气味从窗户钻了进来。我本能地拿起放在桌子上的书,我保持着在床上看书的习惯,等着塞西莉娅来叫我去吃早饭。

我发觉不会有塞西莉娅了,于是就起床。从窗户往右,我遥望到学校的教室。女教师在给孩子们上课,刚才我没有听到他们来上学的声音。现在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请听,镣铐被打碎的声音……请听。普通人,听那神圣的声音(所有的这些‘声音’都是用大写字体写出来的,就像我在小学时学到的那样……)”

“挺直腰板,唱的时候要坚定,就像一个小兵……”

“自由,自由,自由……”

“发音要准确,别停顿……”

“世界上的自由人回答……”

在这无人知晓的小小山村,自由还有价值吗?这些孩子们懂得什么叫自由吗?他们能理解失去工作、不能写作、不能思考的这种自由意味着什么吗?请听,镣铐被打碎的声音……这是我们现在镣铐?谁是我们的敌人?是当年的西班牙人吗?或者是那些滥施淫威的人?是关押人民的监狱吗?是军官们?是手工制作的炸弹和假药吗?这位女教师为什么要把国歌教给这些孩子?他们缺吃少穿,问题成堆。这有什么意义?

我才发现其实自己是和衣而卧的,就像一名士兵,或是一

名乞丐，只不过我是脱了靴子而已。

有人在敲门，我不明白她怎么知道我已经醒了。快十一点了。她给我端来了煮好的马黛茶，还有蜂蜜，还有那种家常烤饼。

“孩子们正在课间休息，再有一个钟头他们就走了。’我看到她说完这几句话以后，带点挑衅般地望着我。

“有人问什么了吗？”

“我对他们说，我们有客人，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您去问候他们一下也不坏。大家都喜欢看到从别处来的人。这里很少有人来。再说，您的长裤，您的汗衫，还有那茄克，对他们来说都很新鲜。他们喜欢新鲜，您知道，这里没有电视。”

“是啊，当然，我洗洗脸，马上就去。您不和我一起喝马黛茶吗？”

“我已经吃过早饭了。我七点钟起床，因为孩子们八点钟到学校。可是，我们可以聊一聊，我已经跟您说过了，他们快走了。”

我没有说话，她把托盘放在桌子上，正打算走。

“我们今天能不能看看整个地区 我小时候到过这里，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需要找另外一匹马，或一头驴子，我还要继续赶路。我要到火车站去搭乘开往北方的列车。”

“您别着忙，您想，天已经开始下雨了。这一带，只要一下雨就不会很快停下来。好了，现在我该走了。”

她走了，我看着她远去。她身穿一件白色罩衫，但是我还是能看得见她那双修长而圆润的腿的一部分。她穿的鞋引起我的注意，因为那是一双船形鞋，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优



良品牌。

我坐在床上,透过窗外的雨,我观望着风景,那是我小时候多次视而不见的风景啊。风和雨,乱纷纷的群山。我已经30岁了。我度过了多少岁月才得以回到这一切之中来!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会逃亡,更没有想到过我可能回来。

我洗脸,穿衣,然后出门去看学生们。他们非常高兴地接待我,我看得出女教师很高兴,她怀着感激之情看着我。我发现她的头发梳得比昨天更讲究了,嘴唇闪闪发光。

孩子们离开学校了,又一次只剩下我们自己。我有点紧张。

“不早了,梅塞苔丝说:‘我去做点什么给咱们俩吃。’”

我在学校待了十天,二十天,已经不下雨了,可是,我还没有下决心出发。我用写作来打发上午,要不就阅读些什么,或者是修改些什么。每当出现危机时,我就喜欢修改。下午我给梅塞苔丝帮忙砍柴,生火。我用她让我去买的一种油漆替她油漆了教室。这一切使我感到自己还有用,是条男子汉,和别的男子汉一个样。

在这里居住的为数不多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没什么着落,他们吃的是自己种植的东西,有时候也宰杀一头小羊吃吃。他们自己烤面包,种点果树。离得最近的一个村庄也有四十公里路程。梅塞苔丝有一辆小卡车,是她哥哥送给她的礼物。梅塞苔丝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她告诉我说,她一直想当一名乡村教师,三年前与未婚夫来到这里。但是他感到厌倦,就走了。她一个人留在这里,已经一年了。

我仍然在想念塞西莉娅和孩子们,但是想得少了。我发

现自己又开始做梦了。孩子们的声音，白色的罩衫，一团团的毛线，乡村里的烤面包气味。我很少想到城市、牢房和看守。我要拯救自己，我要重新拥有 20 岁的年纪，让现在的这一切成为一场噩梦。我和塞西莉娅一道，在科连特斯散步，去看电影，跟朋友们一道喝咖啡，没完没了地争论有关马克思和奥尔特加<sup>①</sup> 的问题，争上好几个钟头。还有系里的那一道道走廊。并非一切都是回忆与怀念，有些东西是我喜欢的，就像现在的这些一样。

我醒来，发现是星期六。孩子们不来上学。我起来，走到厨房。梅塞苔丝煮了味道很好的咖啡，此时她正在把面包烤热。她的服装与平常的不一样。她穿了一条又宽又长的裙子，是深灰色的。她那浓密的鬈发披在手工编织的毛衣上，那件毛衣肯定是她自己编织的。我发现她正等着我跟她说些让她高兴的话题。突然，听到了喇叭声，从窗户看去，只见一辆吉普车开近了。我躲进一个房间，从那里可以听得清清楚楚。我在发抖，在出冷汗。几名警察走到梅塞苔丝身边，她已经走到门口了。我可以听得见他们的对话：

“你是一个人吗？”

“孩子们没有来，因为今天是星期六，可是，阿尔丰索神甫就要来了。”

“您不请我们喝一杯马黛茶吗？您总是那么不合群，美人儿，怎么样，您好像不喜欢警察？”

“我在履行我的职责，你们在履行你们的职责。”

<sup>①</sup> 奥尔特加（1945— ），尼加拉瓜当代政治家。

“我们在搜寻一名颠覆分子,有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发来了一份电报。”

“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你们为什么认为他会到这里来?”

“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名教师,是个哲学教师,或类似的学科的教师吧。说他大概会到这一带来搞破坏,因为他对这一带很熟悉,从这里到北方,他们搞了很多破坏活动。”

“这里没有什么人来过,可要是有什么情况,我会通知的。”

“是吗,小美人儿 您瞧,这里发生什么事情都会有人知道。不管怎么样,我们还会再来。如果您见到他,就告诉他,只要一遇见他,我们就会打死他,就像打死一条蛇一样。”

“好吧,有什么情况我通知你们。”

“回头见,美人儿,别忘了我们。您只要一打电话,我们几分钟就赶到了,特别是您想我们的时候。”

终于听到马达发动的声音了,一阵发动不起来的声音。我真害怕发动不起来,可是总算发动起来了。

梅塞苔丝转身回来,她的面色略显苍白,精神紧张。

“怎么啦?”

“他们走了,自从曼努埃尔走了以后,他们总来这里,这群笨蛋。我想他们好像猜到了什么。”

“最好甬去想它。等他们再来时,我已经不在了。今天你真漂亮,梅塞苔丝。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吗?”

“有时候我也进城,但是那在七十公里开外,可不算太近,特别是路况很糟糕。但是我很想去,因为我去看电影,还

去买书。”

“这么孤独,不能和任何人聊天,你不感到厌倦吗?”

“是的,有时候我感到压抑。可是在这个地方,有令我非常激动的人,我在这里有许多补偿。比方说,你来了。”

我握住她的手,她望着我。我想吻她,我吻了她,她让我吻。

“我们两个人多么孤独!”她对我说。

“可是你不必留在这里呀。并没有人强迫你。你也可以和我一起离去。”

“不,阿古斯丁,我觉得自己对这个村庄有义务。总得有人为他们做点什么。”

“你爱曼努埃尔吗?他为什么离开了你?”

“他逃走了,就像你也会逃走一样。首先是恐惧,其次是……明天阿尔丰索神甫就要来了。我想他能把你带往北方。他是个完全可靠的人。”

“我在这儿很好。我喜欢你,喜欢这个地方,这所学校。我喜欢像你一样的女人……”

我们手拉手地待了一会儿,柴火在燃烧,我们一起睡觉。我在那所学校和梅塞苔丝一起,差不多待了一个月。我爱她吗?我怎么啦?是出于需要还是出于爱情?

我又想起了塞西莉娅,她很难理解。胡安骑在他的小三轮车上,还有卡米拉……

明天我将和阿尔丰索神甫穿越国境。

# 地铁，巴勒莫一大教堂

——献给索科罗

安娜在卡尔车站上了车，占了一个座位。在地铁，就像在咖啡馆一样，总是遇到同样一批客人。那是早晨去奋战的那支大军。那位年轻的神甫，目光严肃，头发剪得短短的。那个漂亮的姑娘，她那披肩的头发黑得像乌鸦的翅膀，那个弹吉他的瞎眼汉子像一只猫头鹰，他在弹奏《我亲爱的可怜的母亲》，使人怎么也想不起培蒂诺蒂的优雅。那些门又一次挡去了地铁的一部分。现在已经是阿盖罗车站了。只差十分钟就到药系了，皮内尔·奥尔蒂斯正在那儿等着她。这位解剖学的教授没有发现，他和收藏在停尸房里的死人一样，有如槁木死灰。

现在上来了一位老者，他留着长长的白胡子，就像作家康斯坦修·比吉尔曾在他的故事书中写到过的人物一样。他很高，又瘦，但更显得单薄透明。看到他，安娜就不再去想她的课程了。她认识这个男人，见过他几次，也许，就是在地铁见

过吧。她看着他，觉得他是个犹太人。因此她不会是在家里见过他，因为她的父亲胡安·曼努埃尔·达拉盖依拉上校仇恨有这种根源的一切，仇恨具有这种秉性的人，使得他制服上少一些扣子<sup>①</sup>，要么他仇恨一些卖某种时装的商贩们。他仇恨毁灭城市的新建筑师们。说得更透彻一点儿，连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主教本人也算在内，他也恨。可是，她母亲却既温和又驯服。这就使安娜觉得更糟糕，她连自己的想法都没有。可她知道，他们爱她。

那个人坐在她身边，对她说：“你真像我的孙女，你的头发，你的肤色、身材和鼻子。”姑娘笑笑：“您觉得我像她，这真有趣，”她对他说：“她也有一只难看的宽鼻头吗？”是的，也和你一样是这个岁数。”地铁火车的快速使他们讲话的速度也变了。有时候，那声音使他们还能听得懂全部，有时候只听得懂一点点。到了大学车站，安娜道别，她觉得这个人挺怪，使她记起了她梦中的某个或某些情景，就像她在社团大厅里看到的贝尔格曼的影片里的情景一样（是的，一个男人在教堂祈祷。是一位神甫，但不是星期天和妈妈去的卡比尔多教堂教区神甫那样。人们对我说，我不可以与陌生人讲话，说军人应当照料好自己的孩子，因为此刻的国家已不比往常了，那些布尔什维克与俄国佬，还有其他种种。说我是独生女，大家都照料我，溺爱我。但愿哪天我还能遇见这个这么可爱的老人。）

以后几天，安娜没有见到这位老人。那位盲人还照来不误（“在那棵盛开的玫瑰树下／你让我发下誓言……”）可是，星

<sup>①</sup>指犹太人做的衣服质量差，因此扣子都掉了。

期三，她想万一他来了呢？她留下了一个位子，他朝她走过来，对她说，又见到了她真是很荣幸。说，有时候上帝说，……说信念可以移山……安娜问他是真的有个孙女吗？她做什么工作……“您是哲学教授或类似的什么人吗？”她问道。

“是的，”老人很高兴地说。“我有个孙女叫朱迪思。我在锡那耶大学教《圣经》诠释学，这就是说，我是个犹太人。这使你讨厌吗？”他接着说，想考验她。“说真的，我从来没这么想过。我们系里的犹太同学很聪明，我和他们从来没有矛盾。可我父亲却仇恨他们。他是军人，您知道吗？他说像梯麦尔芒这种人，就是办报的那位先生，该让他老实点，让他闭上嘴，不要把国家搞糟了。他说，犹太人总是破坏分子，或者是商人，或者是放高利贷的，说是共产主义导致了他们流血。”

老人向她解释，不管是穆斯林或是天主教徒都会做同样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对他人的不公正。就是这样想的军人，也并不是坏人。是由于当权者们滥用权势而扼杀了人的灵魂，这就是对上帝的冒犯，使国家糟糕。她说：“真遗憾，只差一站我就要下车了。您还常乘坐地铁吗？”

“只有星期二和星期五，是我上课的日子。我妻子病得很重，特别是我的孩子们和小孙女出事以后，我很少出门。”

“您的孩子们怎么啦？”

“既简单又恐怖。这是国家的痛楚。我们的孩子们，据他们说，卷进‘麻烦’里了，说他们是‘坏种’，他们满脑子马克思主义——上校是这么说的，他们碰到什么什么就腐烂。我女儿是心理学家，是个好姑娘，一天，她失踪了，和他们一道失踪的还有我5岁的孙女。据一个匿名者透露，他们试图逃跑时

被打死了，但小女孩还活着。十一年来我们一直在找她。这是他们 3 个人的照片，你看我孙女和你很像，不是吗？’

安娜眼中流露出震惊、恐惧与不安，那位矮个子金发女人，高高的鼻子，过几年她就会长成那样。那是她的母亲。

“赛义德，老爷爷，我要下车了。我有事，我害怕，我父亲在等着我。”

安娜飞跑到了大学，老人挥手向她致意。（我的父亲是军人，我的母亲是家庭妇女，我是九年前他们收养的唯一的女儿。我的亲身父母确实抛弃了我。他们是安特雷里约斯人。我现在的父母很爱我。那个小女孩还活着吗？那个老人这么说。是的，我的父母很爱我。这就是一切。）



# 假如我打破常规

——献给伊莱西达

非洲即意味着热带雨林的恐惧，气味和声音，草鹭的鸣叫，羚羊的奔跑，优雅的长颈鹿的漫步，它们在离外籍校长的家不远的地方徜徉。

狮子与河马离这个画面有点距离，但仍属于这个画面，一到晚上，你就感到害怕，尽管你有朋友，尽管你有仆人照料着。我起来好多次，给自己煮一点咖啡，或者是喝一点威士忌，以便驱走恐惧。我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呼吸，觉得有什么东西从身上爬过，我的脑子被这个‘学来的’世界搞得一片茫然，这个世界此刻对我来说是多么遥远，一片巨大的空白，为我们张开了罗网，可以把我们带进爱情或是死亡之中。

这就是我对非洲的感受，对于习惯于有‘严格的分寸’的简洁，对于轻快地掠过事物的耳朵来说，这好像一个太长的句子。

非洲涨得满满的，所以我决定打破常规。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这个黑人的世界是很陌生的，每一个在此踏足的人永远也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你还记得我到内罗毕时的情景吗？人们派你去接我，因为大学的系里派你给我当司机，但你不是我所了解的那种司机，你是司机兼仆人，我应当视自己为你的女主人、女老板。

我观察着你，带着一点好奇心，你穿着洁白的制服，你为我提箱子，你为我打开梅塞苔丝牌汽车的门，你过分的客气弄得我很紧张，但是，你的高傲的目光却使我喜欢。

我兴致勃勃而来，这是我第一次踏上非洲的土地。但是一想到它的热带雨林，它那没有关在动物园里的动物，还有它那里的人，我就很激动。

从我一乘上从罗马到内罗毕的非洲航线的飞机起，我不再是莱吉卡博士了。我觉得自己更加年轻，同时也更加孤独了。

我在思念恩利克，他比我年纪大些，他很乏味，软乎乎的肚子隆起，他并不打算结婚。在那边，我才 30 岁就觉得老了，可在这里我觉得自己既漂亮又生气勃勃。我为什么还要待在他的身边呢？我把我的这种冲动讲给陪伴我的珍妮·摩雷听。她对我说：“这都是你在孤独中的心血来潮，是天气造成的，甚至是由于饮食造成的，可是只要你一踏上飞往你的国家的飞机，一切就会变成幻觉了，只差十五天了。”

这里的人或肯尼亚那些拥有私人俱乐部和狩猎队的感情冷漠的白人说些什么与我有何相干？

我想和你一起出门，也许留下来和你待在一起，我想看看

你住的茅屋，去看看你去的市场。“马萨伊斯人和基库约人很危险，博士，’你对我说。可是我不想听你的，你本人就是个马萨伊斯人，很俊美，高高的个头，带着一只耳环，胸前有一串项圈，我梦见了蒙巴卡，我们一起游泳，海水的温暖与我们的亲密令人愉快，我们的躯体完美无比。

可是，怎么啦 我不明白，为什么就我一个人待在梅塞苔丝车里，可我从四点钟起就在寻找你。我从来不独自出门，更不用说到黑人区里去了。“阿玛忒斯，把玻璃摇下来，阿玛忒斯，求你了。怎么有这股气味？”

阿玛忒斯，我太喜欢非洲了！

“不，主人，不，博士，这只能是短时间。非洲，一开始挺吸引人。与我们黑人接触，与太阳和动物接触。您不觉得，可是您慢慢会感到。贝兰夫人，怎么了，您的汽车里没有我而行驶在黑人区？您没发现给您设置的炸弹吗？非洲也有恐怖主义，也有死亡和仇恨。现在我看到了您的信，您死了，可我，真愚蠢，我没有发觉，虽然另外一种烈焰在燃烧。我也没有打破常规，现在我要说出以前我没敢说出来的话。现在我要变得勇敢了。

现在我看到了，那气味，那声音，白色的草鹭飞起，还有那天空，好像是第一次看到……

# 玛利亚的商店

—— 献给安娜·玛利亚

早上一出门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像是在胳膊底下夹着一只天鹅，或者是体验一种甜蜜的感觉；就像是过去已经逝去的某个春天中的一日，两个女友在一间酒吧里相逢了。她们有好多年没见过面了，两人都费了点劲才认出了对方。莫妮卡，现在叫她玛利亚，因为这个名字对她选中的那个地方比较合适，她要在那里开一家妇女用品商店。她很年轻，化妆适度，看上去好极了，还带着点夫人气质。她的女友克劳迪亚，也尽量把自己拥有的最好的衣裳穿上，但是她还是显得很像个“乡下女人”，皮鞋很普通，皮包是塑料的。但是，朋友之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莫妮卡，你换了个街区，离开了拉帕特拉尔区，这有多么好！那里的一切都太差劲了！”

“你可别这么说，我还是很喜欢那里的。你想想，马拉多

纳兄弟是在那里出生的，在那个区里，我们度过了多么快乐的岁月。你过得不好吗？”

“过得还好，姐们儿。莱奥是个人尖儿，他对我挺好。就像我老妈所说的，他想使我要什么就有什么。另外，孩子们是一群野蛮人，有点可怕，但是都很漂亮。知道吗？和外婆一样，他们全都是黄头发。你的小铺子怎么样？”

“是商店，亲爱的。这里的一切都不一样，一开头，我必须费一点劲才能习惯。可现在我很好。”

“有个男朋友什么的吗？”

“目前还没有，商店就是我的男朋友，它占去了我所有的时间。知道吗？我要到欧洲去看看，去买些有特色的东西。我有一群很讲究的顾客，再说，他们很有钱。”

“看来你卖了不少货，什么时候都有人出出进进。”

“是的，我告诉你，有时候我和这些大阔佬之间还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呢。现在，一个新顾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好像是个外国人，有点阿拉伯人的特征。但是你要是看到他，你就会为他去死，就像电影里那样。”

“你是不是‘堕入情网’了吧！小心点儿，莫妮卡，另一个阶级的人只把我们看做是能跟他们上床的人。”

“不，姐们儿，我对你说的是另一种意义。作为顾客，我挺喜欢他，他已经来过好几次了。他买的衣服总是格调高雅，都是些最贵的衣服。他付两百美元或三百美元都满不在乎，他总是买丝的，或者什么新奇的东西。”

“三百美元，也就是合三百奥斯特拉尔。那是把莱奥的和他退休的老爹的工资加在一起，我的上帝，他从哪里弄来这么多钱！”

“当然不是靠工作赚来的，他是生意人，不赚固定工资。你要是看到他来时坐的那辆梅塞苔丝小轿车，那才叫棒呢！”

“你对他还有什么了解？”

“知道了，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塞西尔·丹维尔。”

“也许他是奥纳西斯<sup>①</sup>或马丁内斯·德·霍兹家族的人吧，谁会跟你说呢？”

“是的，他很有钱，但他不是阿根廷人，也不是希腊人，他更像是个阿拉伯混血儿……很可能是个伊斯兰总督。我父亲常说，要是鲁道夫·瓦连丁诺还活着，就不会有现在这些愚蠢的电影了。什么伊斯兰总督啦，还有其他什么啦，可是说实话，我老爹还是看好利蓓尔塔·莱克朗克<sup>②</sup>，好像她是头等大师。”

两位女友笑了。她们约定下星期二再见。商店开门的时刻到了。没几分钟，塞西尔·丹维尔就进来了。

“下午好，先生。您来得正好，因为我刚刚跟一个女朋友吃饭去了，我们俩已经好久不见了。”

“很高兴能见到您，因为我和您最谈得来。是的，我想要买几条黄色的或浅颜色的裤子。”

“买裤子 这尺寸是很难买对的！”

“很容易，因为她像您一样，高挑个儿，相当瘦。您能给试试吗？”

玛利亚稍稍迟疑了一下，但是，好吧，应当留住顾客。

<sup>①</sup>希腊船王。

<sup>②</sup>阿根廷女演员。

“您说她可以来更换 这是不可能的。再说,我妻子从来不退换我送给她的东西。特别是现在,她正在度过一段特殊的时期,那她就更不会来退换了。”

时装店里很忙,玛利亚也不便再去思考些什么了。一位夫人进来,她想试一件 38 号的衣服,可是,一眼就看得出,她应该穿 46 号的。

那一对年轻人,他们总是一起来,挑选流行色 甜瓜色,西瓜色,松绿色,都必须征得他的同意。那个胖胖的老人,肯定是为他的哪个年轻的情妇购物,他喜欢买红色的,或是金灿灿、银闪闪的颜色。

丹维尔先生,只要他一进来,凭那干爽而具有男子汉气派的香水气味就可以把他辨认出来。

“怎么样,姑娘们 有什么新闻吗?”

那位嬉皮士小伙子每次一来,就什么都看一看,可是,他什么都不买,但是玛利亚和她的女店员们都觉得他帅极了。

这两位女朋友,还是一如往常,每星期二见面,去吃一顿饭。克劳迪亚讲她那无聊的日常生活,孩子们患感冒,莱奥对她苛刻,要不然就说什么要是把宝瓶座与双鱼座,或是狮子座与天蝎座的人联姻,那该有多么好。她们笑起来,喝一杯酒,然后尽快地甩开这些关于仁慈、欢乐与忘却的话题。她们再次给自己套上那副枷锁,那就是好奇心,还有不能实现的愿望。但是这些绝不会使玛利亚难过,相反,她倒很高兴回到现实中,谈谈她的女友们,她父亲开的肉铺旁边的女邻居,又谈起罗却、埃克多,谈起罗珊娜。

“克劳迪亚,我把这一件上衣带来送给你,款式是新的,亲

爱的。”

“切,你怎么样 再过不久,我就会不敢认你了。谢谢你,我的姑娘!”

“你别犯傻,我是有意这样的,你最好和我一起在店里工作。”

“你是说着玩的吧?你总该认识一些人,他们无论是在能力上,或是在艺术修养上都比我强吧。我倒是对这事挺着迷。”

“说到有趣的人,这个星期,那位奇怪的丹维尔先生到我们这里来过两次。”

“他还是买那奇怪的 38 号的衣裳吗?”

“总是一个样,从来不问价钱。”

“可是,那位夫人,或者管她是什么人,她从来没有露过面吗?”

“从来没有,总是他自己来。”

“可是,会不会是他的几个女朋友呢?……”

“那么,会都是一个样吗 高个子,38 号,有浅颜色的眼睛吗 你不觉得奇怪吗?”

“也许他是个色魔,就像电影里出现的那样,他总是喜欢一样的女人,就像是个收藏家。”

“什么样的可能性都会有。但是我太好奇了,我简直要对你说,我喜欢上这位丹维尔先生了。”

“你还知道他一些什么 他的职业,他的家庭住址?”

“啊,我们有他的家庭地址,还有银行账号,都记录在顾客登记簿上了,因为他从来不向我们付现金,总是用支票。哎



呀,到开门的钟点了。你听我的,考虑一下和我一块儿干的建议吧。”

几个月过去了,丹维尔先生只来过那一次。突然,门铃响了,一位先生走进来了,他一表人才,身穿一件英式休闲运动衫,一条剪裁得当的长裤,还是夹着他那从不离身的公文包。

克劳迪亚,她已经在这家商店里工作了。由于有她女朋友的描绘,再有他用那种香水的气味,她一下子认出了他,不会是别人。

“您好,玛利亚小姐在吗?”

“她在,先生,我马上给您找去,她这就来。”

“您好,丹维尔先生。今天天气真糟糕,是吗?”

“您总是这么漂亮,哪怕下雨天也一样。”

“您要点什么,先生?”

“是呀,我有点匆忙,可是我想送件礼物,想给我妻子一次惊喜。您有学徒工吗?”

“有的,当然有。可是您还没有选中什么送给您妻子呢。”

“劳驾,请您为我挑选一件吧。应当是一套运动衫,要带些色彩,现代化一点。您不要忘记,我妻子和您一样,又高又瘦。”

“您愿意让我们什么时候把货送到?”

“十二点以后吧,我把签好的支票留在这里,您来填写,等我再来的时候,再跟我说吧。”

他说完以后,亲切地向玛利亚致意,走了。

“姐们儿,你遇到了什么样的顾客啊!他对你多么信任啊,这家伙有点神奇。”

“或者说,他是个慷慨的丈夫。克劳迪亚,到十二点的时候,你提醒我派达尼尔去送那套衣服。”

“行,你给他送一套贵的。对这种人要好好敲敲竹杠。”

又来了几个女人,有一个著名的电影演员,一位流行舞蹈家。

“莫尼卡,差五分十二点了。可是我有一个绝妙的想法。你亲自把包送去,让咱们揭开丹维尔太太的秘密。”

“可是,你以为我能见到她吗?首先会有一个门卫,然后会有一个女仆来接待我。”

“别,傻瓜,你撒个谎,就说是丹维尔先生让你亲自送去,这样你就能见到她了。”

“行,我去,总共才五个街口,帕莱拉斯大街 185 号。”

实际上她是跑着去的。阿雷纳莱斯大街,罗德里格斯·佩尼亚大街,阿尔维阿尔大街,玛利亚一边跑,一边瞎编着将在公寓的门口进行的对话。

“我找丹维尔先生,塞西尔·丹维尔。”

“您是哪儿的?”

“是玛利亚商店的。人家让我送一包东西到丹维尔先生住的公寓里。”

“好吧,他住在第十一层,他们总是耽误老半天才答话。”

一层,二层,四层,她觉得永远也到不了第十一层,紧闭的门打开了,她走进楼道,那装饰着英国版画的楼道,她按了门铃。

“小姐,您?”

“我要见丹维尔太太,我给她送来了一件礼物。”

从屋里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

“让她进来，米莲，请她进来！”

玛利亚有些胆怯地进去了。那是一副日本面具，尽量不显眼地与一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搞的一张脸混成一片，即便是在吉尔麦斯<sup>①</sup>的那家‘花季少女时代’或是埃斯梅拉达<sup>②</sup>的“斯坦因之家”<sup>③</sup>的蛋糕，也都不会是那副样子。那是一个肥婆，面色苍白，几近黄色。她坐在一把轮椅上。这是丹维尔夫人吗？是塞西尔·丹维尔的夫人吗？一张桌子上，好几个连口子都没有打开过的纸口袋白白地在那里沉睡，是“玛利亚商店”的那种绿褐色的纸口袋。

① ②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街区。

③ 德国人开的一家有名的糕点铺。

# 牧师的儿子

## ——献给胡安·克鲁斯

是的,我现在在这里,可实际上我无处不在。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我,因为我是艾曼努埃尔,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在我身上寄托了他所有的愉快。这个望着我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多洛莱斯,实际上,她就像是田野里的一支百合,那是纯洁的象征。我看我在天之父的小小鸟儿是怎样地飞到她的身边,从她的手里叼食,我觉得花园变得气势汹汹,就连萨尔莫那极轻的体重,我也觉得变成了碎片。弟兄们,没多久了,我就要和你们在一起了。我要听从我圣父的意志。

多洛莱斯问我:“以赛亚,你在这儿干嘛?”

可怜的小姑娘,她不懂。没有我,就不会有耶稣的舍身救世,我是来拯救他们的,也是来拯救你们的,好姑娘。多洛莱斯很爱动感情,也许她具有玛利亚的精神,她用心地听我的话,并且把那些话记在心间。但是,多洛莱斯太单纯,她只是

有点惊骇地望着我,笑着。当一切开始时,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没有注意到,我父亲教给我的,他教我念赞美诗,他让我背出来,不然就处罚我,可是这样很好。后来胡安给我施了洗礼,他把我浸泡在约旦河的水里,使我沾满了圣灵。一开头,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很艰难。那种表情,那种话语,那种宁静,那种用豌豆粉做的面饼和小虾米,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人不是光靠吃面包活着的。一个人越是微不足道,就越是简朴,离尘世的俗物就越远,相反,离天堂就越近,人们都说这是我父亲的话,但这一切对于我的教育是很有好处的。这个时刻已经到来。

伊实玛利,你曾经受过苦难,你的家庭应当已经适应了新的局势,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容易。我父亲每天用十字架敲着我:“路德把墨水瓶扔向魔鬼,打了个正着,魔鬼就会吓得胆战心惊地逃离你。”他说:“现在你会感觉良好,因为你只是一个以赛亚<sup>①</sup>的男子汉;身上没有一丁点儿神圣的你,为什么要逃遁到散发着牛血气味的下层?你为什么要去玩抓子儿游戏?你为什么以为自己可以治愈疾病,创造奇迹?”

我爱所多玛<sup>②</sup>,我爱戈莫拉<sup>③</sup>,我要消灭邪恶与罪孽。

儿子,为什么 你是全班第一名,是唯一的男孩,你听话,你不和别的男孩出去玩,你像我在家教你的那样,热情地向女教师问好。

①以赛亚,希伯莱的先知。

②所多玛,约旦河古城,居民作恶,淫乱被神祇毁灭。

③戈莫拉,巴勒斯坦古城,由于其居民作恶而被神祇毁灭。

昨天我姐姐伊迪丝来了,她对多洛莱斯说,如果我从这宗教狂热中恢复,就将回到科连特斯我的祖父、祖母那里。谁是伊迪丝?我没有兄弟姐妹,我没有祖父、祖母,我是圣子。我父亲是第一个圣子。我一开始就与上帝同在。这个女人,伊迪丝,她有罪,我要砍她,以免她的种子一浪一浪地传播开来。

多洛莱斯说,我说的话就是圣经,然而我应当回到我的现实。我是伊实玛利·奥尔特加,是胡安·奥尔特加,一位严厉的神甫的儿子。然而我的时候到了,捶击声与百人队长的哈哈笑声。我害怕,上帝啊,请把这圣餐杯挪开。

他们把我带到这里来,带到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看到我正驱赶教堂的商贩,我惩罚他们,给他们打上十字架的印迹……多洛莱斯对我解释,说他们正在流淌鲜血,我在向他们每个人低语:上帝是我的牧人,你们什么也不会缺少。“但是法警们仍在按我父亲的旨意行事。街角的那个男人扯着嗓子,弹着吉他,唱开了摇滚乐,乐声充斥着我的耳朵。为什么大家都看着我?唯一——一个向我走来,并且抚摩我的人是多洛莱斯。但是她无能为力。手里拿着一本书的那人走过来了,而和他在一起的那个百人队长拿来了一个杯子,强迫我喝下去。我的时辰到了吗?我看到了那条河流,约旦的河流,一切都出现了,我喊着,向多洛莱斯求援,我不想让他们把我带走。我不愿他们再把我关起来。但是我屈服了,因为我应当服从我的圣父的旨意……我的圣父呀,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做的事情。多洛莱斯在哭泣,那位路德派神甫在走廊的尽头哭泣。正下着雨,雨下得很大,就好像多洛莱斯在对我说,我是好人,她认出来我是被上帝选中的人,阿门。

# 散 步

—— 献给帕斯

神甫,我犯了一个大罪,而另一个罪孽更加严重,更加可怕,胡安神甫,因为我不想改正。我知道您不会原谅我,但是我必须把这告诉您。那是一周之前,我的儿子,我那独生儿子克里斯蒂安,不知道您以前是否听我说到过他,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是独自居住的,住在一套漂亮的公寓里,我有一台缝纫机,由于我患了关节炎,几乎不能用那缝纫机了,我还有我的电视机,我的编织物,还有我的好女佣荷塞法,她和我们在一起都三十年了。

我儿子很早就打来了电话,他请我和他一起去吃午饭,然后一起去剧院。神甫,您想想,我都不相信。自从埃尔南过世以来,我简直就没出过门。因为只有他才有耐心请我出门坐上小汽车,在天气好的时候让我坐在轮椅上遛遛。您知道拉腓尔有多么好!我使劲恳求上帝别把他从我身边带走,而是

先带走我，可是谁也不认识到好心的上帝那儿去的路，结果我留在这里，他到了那里！

我的儿子人并不坏，可他有五个孩子，再说，他的妻子卡门西达很厉害，她不喜欢让我的孙子们来看我。有一次，我听见她对大孙女悄悄说：“奶奶太老了，腿又那样，头脑也有问题，这种情景对你来说太悲伤了，对你的弟妹们更不利，所以我不带你们去。”我一声没吭，心想，我要是说话，事情就会更糟糕。拉腓尔快死的时候，他就劝我单独住，别去给他们添麻烦，由于他给我留下的生活条件还不错，我可以过得挺好，没有问题。

这些年我就继续这么过着。我唯一要做的是，一个月乘出租车去看一次病。荷塞法上午推着轮椅让我出门。有时候我也接待几位来看望我的女朋友。但是她们来得越来越少了。因为我们都是老太婆了。我 80 岁了，有时候我们挺累，我们想睡觉，我爱看电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家庭，可是家里人总是那么忙，很少有时间来看我们。神父，我把这些全讲给您听，是让您知道，当克里斯蒂安给我打电话说要带我出门时，我是多么激动，我差不多是哭着问他：

“你今天怎么行啦 你的办公室，还有卡门西达呢？”

“一切都安排好了 老太太，是一次长时间的散步，吃午饭，看剧，还有你喜欢的一切，此外，卡门西达还说，你可能需要买点什么东西。”

“不，孩子，买东西就不必了，让我们下次再买吧。”

他来得很准时，神甫，他很帅气，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也让我出门时穿上我最好的衣裳。说实在话，现在我不如拉腓尔



活着的时候那么漂亮了，但我还是穿上了一身蓝色的时装，一件蝉翼纱的上衣，拿着一个漂亮的皮包，让荷塞法把我的头发梳得好好的。

“你真漂亮，老妈妈。看来你打扮得就像爸爸喜欢的那样。”

“你也是，亲爱的孩子，你不知道我多么感谢你的这好兴头。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知道吗？我会走得好好的，抬我的时候我会很轻，再说，孩子，我告诉你，虽然我都 80 岁了，我没有憋尿的问题。”

我对他说的全是真的，神甫。我看到他感动了，不知为什么，他让我打电话，我只听到几声低语：“我不能，我对你说我不能……好吧，我尽量。”我有点害怕，我以为是我儿子有什么情况不好，您知道我儿子是行政长官。现在人们总说到什么情侣呀，什么与女秘书有瓜葛什么的。当我们下楼时，荷塞法帮我的忙，我还对她说卡门西达有多漂亮，对他照料得有多好，说到我的孙子们，说起他们有多聪明，有多么用功。克里斯蒂安很少回答我，他好像很难过，可是，到了汽车上他就镇静多了，我们开始回忆他小时候的事情，神甫，您还记得您帮我把他送进香巴那特学校吗？克利斯蒂安那时候是个多么好的孩子啊，他得了金质奖章，拿到工程师的头衔，谋到第一份工作，进了第一家工厂。

拉腓尔对自己的儿子是那么满意，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帮助他，我们让他到欧洲去旅行一次，可拉腓尔唯一不同意的是他的婚事。卡门西达也是良家女子，从一所教会学校毕业，这就是一切。但是拉腓尔觉得她的目光不纯净，没有情感。我

从来都不同意他的意见，然而，拉腓尔是多么有道理呀！

而里契蒙德,那个地方像我一样,还凑合存在着,我想,我小时候曾和我父亲一道进过那里。由于那里规矩很严,女人不许走进留给男人的地方,既不许漂亮的母亲去,也不许年轻的未婚女子去,要是谁和哪个不该亲近的人亲近,或者是去算家庭的老账,就会惹很大的麻烦。那是另一个时代,还有些人,在某个公寓养着个小情人,到马普勒买家具,他们晚上去那里过夜,回家来就编瞎话,说与阿尔维阿尔有个会,或是与谁一块喝醉酒了。他们快活是快活。可是,他们不讲假话的时候也让人觉得他们像在讲假话。那时候,跳米龙加舞还穿那样的衣裳,直到来了美国佬的时髦。总也弄不明白谁是谁,长长的过滤嘴香烟,金色的乱头发,还有那些项链,这就把男人给毁了,让女人堕落了,她们还没有屈尊到当小伴娘的地步。现在这个时代就这样!但是,我上了年纪,带着这种悲伤,我就喜欢这么信口开河。我来跟您说这些干嘛,神甫?您对我总是那么好。七点钟到了科隆,特里斯坦和伊索尔达,就像在雷希娜夫人的时代一样,啊,但愿上帝把她留在他神圣的王国里吧。那是最好的礼物。”

“孩子,我很感谢你所做的这一切,可是我想回去了,因为荷塞法在等我,而时间还早,孩子,你在我身上花费了一整天时间,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感谢你。”

“母亲,今天荷塞法不会等你了,因为我们已经给她放了假,我让她休息了。”

“你带我去你家吗? 祚门西达不会生气吗?”

“不,您应当到一个好的地方去休息。您没听说有个叫

‘好空气’的地方吗 您待在那儿,直到荷塞法回来……”

我的儿子继续把车开到一所大房子前,那里有一块大招牌上面写着:“好空气老年病院”。我下车时,我儿子哭个不停。可是,神甫,现在我在这里,到处都是铁栅栏,因为这是住满了患虹膜炎的老人。只有荷塞法来看望我,但是我们很少说话。神甫,一周来我再也忍耐不住了。我恨卡门西达,今天晚上我就走,神甫。我恳求上帝,让他把我带走,但上帝没听见,可是今天他听见了,他对我说我应该怎么做。我的儿子会怎么说呢?小可怜儿的……

# 再 见

## ——献给蕾蒂霞和罗伯特

随着火车的远去，列车好像把人都改变了。时值冬天，马蒂亚斯透过窗户，看着那一成不变的潘巴斯草原，草原长长的，就像无人的荒原一样，他想着圣路易斯，那是他将下车的地方。当侍者走过来时，他买了份咖啡和一份报纸。那位在桑巴却上车的小个子金黄头发的女人使他想起了他的母亲。（是的，那铺着黑地砖的院子，整整几个钟头的滑旱冰，他们差不多都留着跟父亲一样的胡子，不同的是，父亲的胡子是黄铜色的，据吉麦娜对我说，老爸的胡子颜色是……？这些我已经记不太清楚了，当人家把他杀死的时候，我还不满 10 岁。我现在倒也不说他活着该有多好，因为谁也不能依靠不可能的东西过日子。人家杀死了他，仅此而已……）

在那边，在圣路易斯，那是在某个钟点他要去的地方，他是在那里出生的。他的母亲在那里生活，一直到 20 岁。他想

睡，但是车厢在跳动，他被惊吓。他并不总是同样地睡着，首先是做同一个梦，有子弹的声音，还有鲜血。然后，老是做恶梦。一位戴眼镜的音乐家，一个坚实的鼻子，巡视着大海。他是马赫勒。好像他从一座坟墓里爬起来想说点什么，但是他并没有吭声，音乐还在梦中响起。在桑巴却上车的那个女人亲切地看着他，问道：

“你是圣路易斯人，还是走亲戚？”

“我只是去走走，到山上去。”

“可现在并不是登山的好时候，山上很冷，夏天去很美，让人想喊出声，说生活是多么美好，并且想到处去抓住太阳，好像你的身体太小了似的。”

虽然马蒂亚斯觉得眼皮很沉，但他还是睡不着觉。（我为什么要回到圣路易斯去呢？在那里我只有几个远亲，虽然我还拿着祖父写给他们的信，我想要做的是看看妈妈生活过的地方，访问一下她的学校，教堂。九年的时间过去了。她死了吗？就像我外祖母所说的那样。也许她藏在那里了，可是，九年了！）

我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看到一点点景色，也许是一位犹太教士，他的胡子长长的，那顶陈旧的帽子，一个孩子对他母亲什么都要，不是要甜奶，就是要杂志。那个披斗篷的小伙子。当警察进来报下一个车站的站名时，他不安地动了动。在梅塞苔丝村，上来了那些当兵的，他们很粗鲁，端着机枪，察看着人们。他们与马蒂亚斯的年龄差不多，但看上去很坚定，眼睛里看到的是死亡。马蒂亚斯不得不害怕，因为他懂得什么是所谓“行动部队”，但是他尽量显得很镇定。一位军官

问他：

“证件呢？”

然后问：

“你多大了，孩子？”

“16岁。”

“你该换换照片了，小孩儿。这上面还完全是个小娃娃，可现在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为了这种误会，可能发生谁也不愿发生的事，因为有这种事，你要小心。要把身份显示清楚。”

“你一个人旅行吗？”

“是的，可是我妈妈在圣路易斯等我。”

他们继续在车上搜索着。他们跟那位犹太教士开了个玩笑，问他把‘摩西’的银子藏到哪儿去了。然后，他们到那个穿着牛仔裤披着斗篷的孩子和那几个英国人那里。

“证件 你多大了 这张照片不是你的。”

“递过来，看，这张照片不是他的……”

那小伙子弯下身子，想不要显得害怕。可是他眨着眼睛，像受到惊吓的动物一样。

“过来，跟我们走一趟，我们到餐车上好好谈谈。要不然够你受的！”他们连推带搡地把那小伙子带出了车厢。

我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那位犹太教士翻开了他那本书。大家都沉默了（人们说我父亲就是这样被带走的。大概由于这样，我祖母才说，我不能无动于衷，她搞不明白这里或那里的政治，这让我生气。我记得我的何塞外公也不谈什么切·格瓦拉，或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也不谈他的一个女儿的失踪。我父亲在家里保留一张切的照片，是有人在埃斯特角给

他拍摄的。他向我解释说，国界并不存在，说权利属于人民。说实在话，我并不太懂，但是我记得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睛。我知道我父亲英雄般地死去，我的姐姐希麦娜，还有那操蛋的小子，那个伊万，那个橄榄球运动员，他们也都怀念他。当他们拥抱的时候，好像谈起了过去，我看得出，他们想保护我，不让我听到他们的谈话。可是我想，是由于我父亲，我母亲好多年前就失踪了。都怪他。)

到圣路易斯时，马蒂亚斯拿起了旅行箱，到祖父跟他提到过的“普林格莱斯大旅店”。他登记，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房间里之后，就去找母亲住过的那幢房屋。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不难找到这条佩德尔奈拉街（我记忆中那是一条挺宽大的街，可其实却是一条小街，尽是些土坯房，屋上的红瓦也不整齐，而且也掉了颜色。有一扇小门，两旁有两扇带铁栅栏的窗户，和其他所有的房子都一样，因为这里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我的母亲不在了。)

他按门铃，一位黄头发的女人来开门，她就是车上的那个女人。她真像他的母亲。（他对她唯一的记忆就是匆忙。说一声马蒂亚斯，快穿上你的裤子，我们上你外公家。那很旧的背心，一本小小的《圣经》，都放进箱子里了，再加上一本现在从不离手的《切·格瓦拉日记》。)

大家很清楚，这个女人不是他的母亲，他好像还在听见母亲说：“好了，孩子们，别把事情搞得更复杂。我很快就会回来的。”我说：“妈妈，我需要你。爸爸已经不在，明天我怎么办？”我听那个女人又对我说了一遍：

“孩子，怎么啦 你找不到你母亲啦 你母亲没死，你应

当要回你母亲，要求她回来。这是你的责任。如果你待在那儿，能得到什么呢？’

当马蒂亚斯回来时，他颈下挂着一张他母亲的照片，每逢星期四，和祖父一道，和全村人一道，在五月广场兜几圈，兜上一个小时，每个星期四都是这样……



# 玛丽亚妮达·罗丹的小小悲剧

——献给萨尔瓦多与安赫莱斯

当她与贝贝分手以后，就不住在这幢公寓楼里了。这是个鸟笼，或者是一个翘起来的阁楼，对她来说全都一样。总而言之，据她的律师说，形势还不完全明朗，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节省一点，谨慎一点，埋下头，学乌龟，藏到什么地方，而不要陷到别的不现实的事情之中去，至使自己名誉扫地。

应当避开来访者，不要在吃饭方面和雇女佣上浪费钱财，至少要等到律师敲定了，让她丈夫“自愿负担”她每月的一笔费用时才可以。最初的几年，玛丽亚妮达·罗丹还年轻，她法语讲得很棒，可以应付社交活动，还具有美厨知识，还能应付她的悲惨结局。但是，一种恐惧在困扰着她；每当有宴请时，她的女友们都盯着她，好像她肩上扛着一只口袋，想把每个人的丈夫都捉走似的，这种事，是她在经常进行的从巴黎大街到圣菲大街的某次散步中得知的。在喝茶与吃点心时，她

们就会知道了，她与这种行为无关。

关于这桩离婚案，在法院就打了好几年官司。自从贝贝·阿罗萨一走，她就租了这套公寓住着。她没什么可能，也没什么兴致搬到更好一些的地方去住。当她孤独一人的时候，一切都好像是地狱，总而言之，越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就越好。玛丽亚妮达倒还保留着两种改不掉的习惯：读席尔维娜·奇尔里奇的书，还有就是痛恨庇隆主义的“小伙子们”；这拨人其实都已经老得不能随心所欲地跳探戈了。

岁月没有白白地流逝，十年，十五年。总而言之，都一样。由于那是个最好的城区，还有花园别墅和马厩，不论是战争、饥饿、电影故事或政治变迁，都改变不了那里。那幢楼房，人们在那里租下这套或那套房间，它已经破败不堪了，就好像翅膀过早地衰老，像是后装上去似的，它眼看着一群群的鸟儿迁徙，一个工程师走了，又来了一群修缮工。最后，连挺得住的人也都倒下去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习惯了以笑脸对待难关。玛丽亚妮达住在第一层，从她的套房到通往大街的门口用不着上下台阶，还可以通向一个方形院子，那里有那么几座花坛，可怜巴巴地挨足球踢。

当玛丽亚妮达搬去时，那时没有几个孩子，有两三个正在蹒跚学步，晚上还要哭，可是看来一切还承受得了。现在玛丽亚妮达已经满 75 岁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忠实的阿盖达一直伴随着她，但是更像是两个人互相追求一种默契，以便让死神察觉不到她们的存在。

老朋友们以宽容的方式培植着同情和仁爱。她们从老远来看她，带她去散步，但是她们说，自己得赶快地回到各自的

家里，说丈夫等得不耐烦了，说时间过得飞快，孩子们不能总自己待着，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孩子们就会误入歧途，这成了一种说不清的城市恶习。

每天上午，接近中午的时候，她们就兜上一圈，既不多看也不多听。买买报纸，可也不读。到十二点半就回来了。每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就好像一个不太自信、也不太信教的人做祈祷一样。阿盖达走进玛丽亚尼达的厅里，只是为了看午休时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她坐下来，是的，这一点规矩还恪守着，她坐在比女主人的位置靠后一点儿的地方，以便保持一定距离，有时候她们一道为一位母亲痛惜，因为母亲的儿子在人群中走失了，要不然就是为一位瞎子在流浪中遇到的厄运伤感，这个瞎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旧巴勒莫。而现在，他待在十一号大街一群吉卜赛流浪者之中。

那个星期六的早晨，路上刮起了强劲的潘佩罗冷风，打破了常规。堂娜·玛丽亚妮达和阿盖达出门作中午的散步，可是回来时，女佣人到药房去买女主人需要用的药，那是早晨药铺学徒该送来、而没能送来的药。堂娜·玛丽亚妮达就要自己回家，离家总共就半个街区的路了，要不是草原上的强冷风潘佩罗，那位‘奥兹的朋友’<sup>①</sup>把她刮跑，就像把那个小姑娘刮到不知什么地方那样，本来是没什么问题的。街门打开了，她看到那长方形院子，她掉下来时看到天竺葵跑了，勿忘我花变大了，并且在走着，她还看见那个毫无责任心的贝贝，他胳膊上总是挽着一个迈波合唱队的女队员。千千万万个孩子在院

①这是一部题为《绿野仙踪》的美国童话中提到的狂风。

子里放肆地玩耍，小敞篷马车的音乐使她看到了她的童年，那座凉亭，她的第一次舞会，一个男舞伴拉着她，随着一支舞曲《在海浪上》兜着圈子。这个熟悉而永恒的院子为什么在她眼中变得极大而危险了。她不会，永远不会，再也不会在这里衰老了。玛丽亚妮达·罗丹的真正生活开始了。

# 那一切称为感情的事物

——献给特莱西达

我吃完了第二份俄式点心。与其说的出于需要，还不如说是出于习惯。我问弗朗西斯科，几点了。他对我说，时间还早，八点零七分。他问我干吗要急着走，说，我们不过刚来嘛：“你可别犯神经质呀。”这在十三分钟之前就应该问了，他在怀疑什么人吗？

就像每星期四一样，我早早就准备好去车间。是的，是去写作车间。那位很有权威的大胡子，在听别人朗读的时候，由于愤怒或失望，他的眼睛会发出光芒，就好像有人要把这些诞生在这二层楼房里的人物的生命从其身体里夺走似的。这个房间的窗户朝花园敞开，花园的围墙上爬满了金银藤，泉水的丁冬声依稀可闻。

车间到底怎么样？我喜欢车间吗？每星期四，我在那里是否觉得幸福？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不知道穿什么衣服才

好。我拼命找自己认为最适宜的衣服。穿长裤吗？也许最好。可是我什么时候穿过长裤呢？也许这条“手工编织”的裙子，再加上那件上衣，就像有名的编织艺术家埃丝黛尔·查孔那种跳奇洛埃舞的形象。我像往常那样，把头发梳得很规整，就像保莉娜所说的那样。最好就是拿那把头刷，仔细地梳一个很讲究的发式。干吗？要勾引什么人吗？就好像是随便一个什么女人，或者是为了使自己显得更年轻些，更像个知识型妇女吗？要是让司机送我去，他们准会把我当成一个阔佬。最好乘地铁去。看上去民主化一点，不要像是坐在开着窗户的出租车上，蓬乱着头发，抽着烟，好像去守灵似的；结果是，乘客的衣服被座位上的弹簧扎破了，一切都很滑稽。一开头，我从山上行走，然后我又走了 15 个街区的冤枉路，我搞错了方向。当我到大门口时，发现刚刚六点钟，而车间要六点半才开始。那么我到哪里去等着呢？这里不像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样容易找到小咖啡馆，那里每个街区就会有四个。我觉得一切都是黑黝黝的，人们总是谈到强盗、小偷什么的。好吧，可是我不戴首饰，我讨厌首饰，况且我也没有。就这副模样，谁会注意到我呢？我是走去的。总共才半个钟头。当然，天很冷，像维也纳一样冷，也没什么好看的。总而言之，我要走进一栋楼房，我要在大厅里，随便等什么，比如，我在等一位女友。

六点二十分不是很快就蹭到的。我叫门，进去了。我侧目看了看自己熟悉的绘画，一些装饰品，实际上我是很讨厌装饰品的。我更恨那些小盒子，那是一些女人最偏爱的东西，还有大家都有的廉价的手工艺品，可是，我却喜欢马布

切人<sup>①</sup> 编织的壁毯，斗篷和地毯。

我来到了他的圣殿。我感到某种特别的东西。那里很白净，壁炉里烧着火，空气里有一股东方熏香的气味。一群比我年轻的人，有些属于易怒型，另一些人很憨厚，还有些人那次没见到，或者说是我对他们没有什么感觉。大家都在仰慕那位导师，而他呢，则以亲切的、略带一点讽刺意味地说道：“我向你们介绍一下艾米莉亚，她将加入这个车间。她是阿根廷人，是一个派驻智利的外交官的夫人。”他最后这句话我不喜欢。更不喜欢什么夫人不夫人的。可是我没有开口，我顺从地接受了对自己的这个简介。

而余下的是：15岁开始写作，当了十年记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杂志上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曾经把这些向胡安·何塞讲过，但是他什么也没有遗漏。

“你来干什么？”一个冒失鬼问道。

“我想，至少跟你一样吧。”我气呼呼地说。

“要不然你已经是一个被认可了的女作家？”

我们开始上课了。啊，说实在话，也不是上课，但是在这里并不把什么希望许诺给你，倒是可以发现写作中的歧途。如果你不加速快跑，你就会停留在那里，磨呀磨，就永远是一张白纸，你的人物就哪里也去不了，因为你没有干任何实事，你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爱，或者为什么微笑，你停留在描写中，好像你在那里受罪，在重写《堂

<sup>①</sup> 马布切是生活在智利的土著居民。

拉米罗的荣耀》<sup>①</sup>（因为，就算拉雷塔是一位绅士，你是在写，可是当别人念完了两页后才醒过味儿来，为他开始读这本书而后悔。）

六个月，一年，我渐渐喜欢这车间了。我的短篇小说完全不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看上去很肤浅，但是其中包含着痛苦。一个我这样的资产阶级，一个悲观的女人，从自己的角落向整个大陆抛洒着咒骂，可能会经历过某种痛苦，或某种感情。而我在所谓“色情受虐狂”中对自己的虐待也毫不逊色。正如我那当心理学家的女儿所说，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付出的代价。她补充道：“是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善良的阿根廷人来说，就意味着一种庸懒与资产阶级相结合，以此来减轻由她丈夫或家务带给她的厌倦。”

通过胡安·何塞，我得以更好地了解世界。而胡安·何塞很高兴地看到这一位资产阶级女士把虚无抛在了身后，在这世界上找到了一个位置，找到了一点光明，一种象征的游戏。这些象征令人想起了洛德·吉姆<sup>②</sup>的神秘，或是那个柔弱女子卡杰琳娜·曼斯菲尔德<sup>③</sup>的那些故事中的温情。有谁能够知道我原来是什么样子？我知道些什么？我的真实感情，我一直长时间在考虑的是是什么，以及对亨利·詹姆斯的一个人物的执着。啊，今天是星期四，如往常一样，我准时到了，我和我的同伴们，那些真正的同伴们聊了聊。我毫不掩饰，拿来了一

① 《堂拉米罗的荣耀》（1908）是阿根廷作家恩·拉雷塔（1875 - 1961）写的历史小说。

② 洛德·吉姆，英国女作家，以写侦探小说见长。

③ 卡杰琳娜·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



个黑色的文件夹，那里夹着一篇小说，更确切地说，就是这篇小说。

我干吗要写这篇小说？为什么我一步一步地编写了一个又一个的变迁？它不应该在怜悯的笑声中，在藐视中命中注定地被我遗忘。这是斥责吗？要不，是幽怨？当我把那装满渐渐积累的一个接一个的故事，一股又一股幽怨的黑色文件夹放到大师的桌子上时，我是一个经得住轻易的赞扬，或是尖刻的书刊检查的人吗？第二天的报纸谈到那杀人的炸弹炸毁了大作家的车间，而警察断言，说他们手中掌握着这次阴谋的线索。我们想过，这又是一部短篇小说吗？是一些符号，在汉森的小说或是博尔赫斯想象的迷宫中，等于那杯茶吗？要是我永远搞不懂的话，故事该怎么结束呢？